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杨天石 著

◆ 蒋介石日记解读

做「圣贤」还是做「禽兽」

从向左到向右

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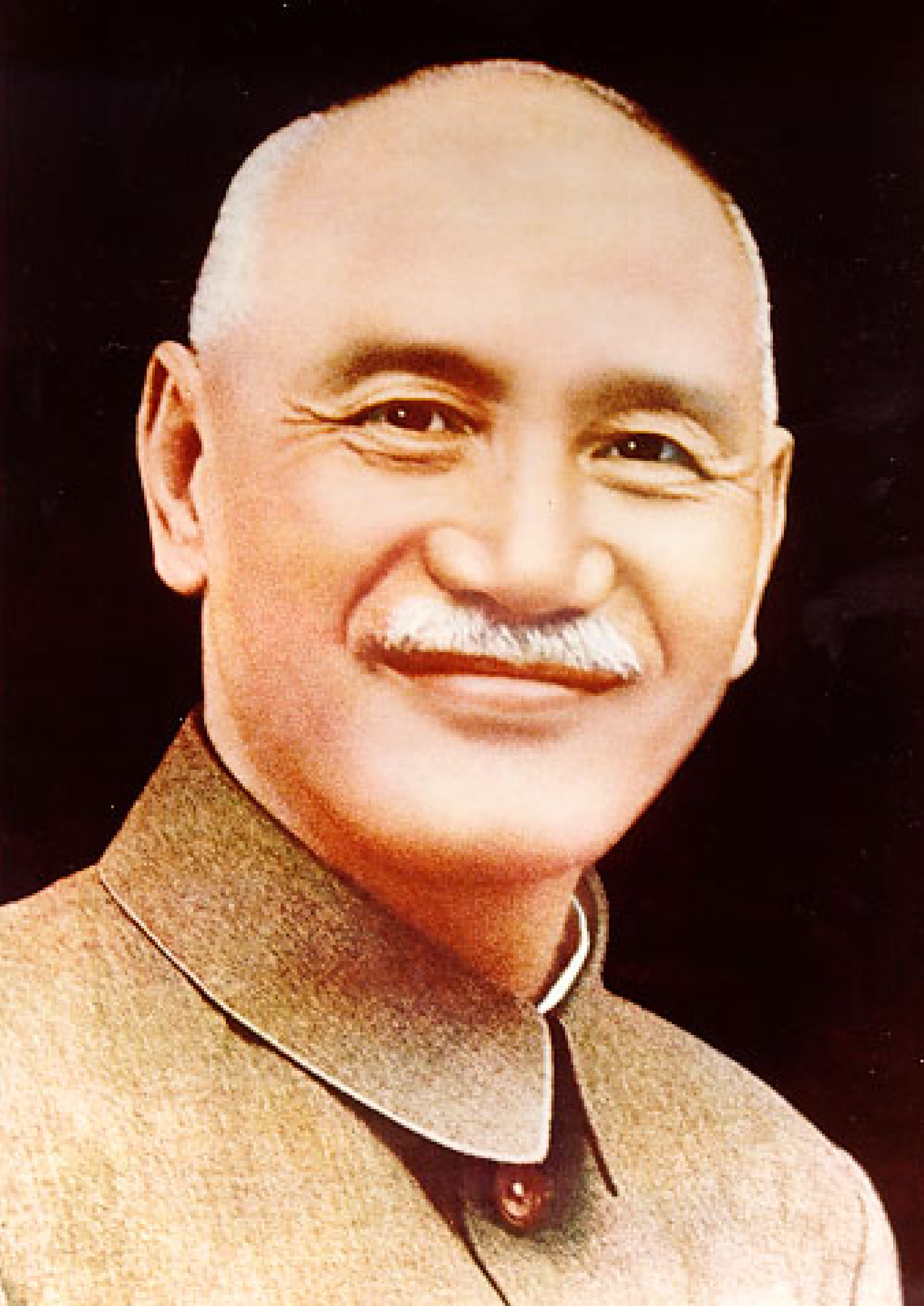
如何对待毛泽东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楊天石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先妣 王太夫人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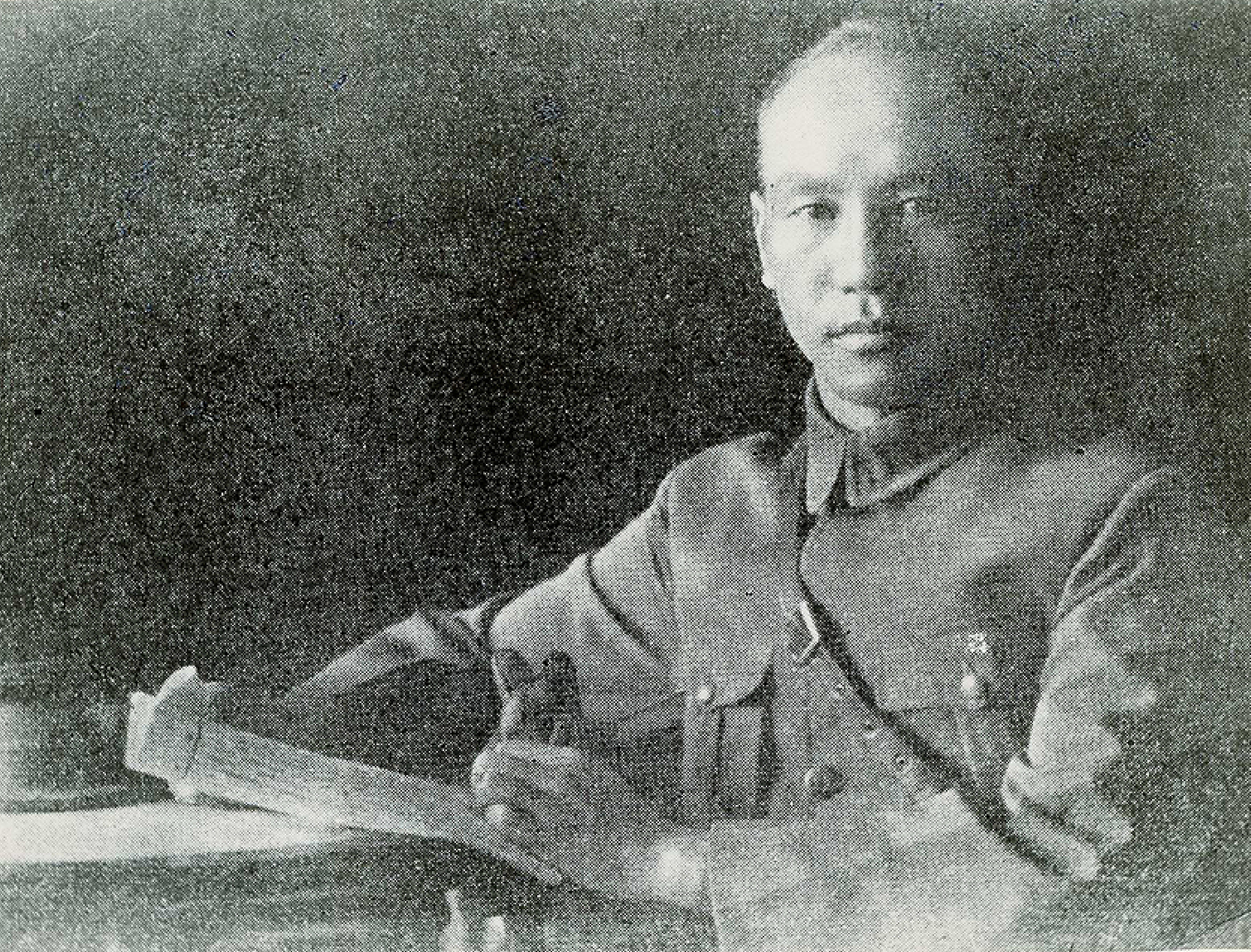
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

男 蔣中正敬書



國父主持開學典禮後與　蔣公（中後）何應欽（左）王柏齡（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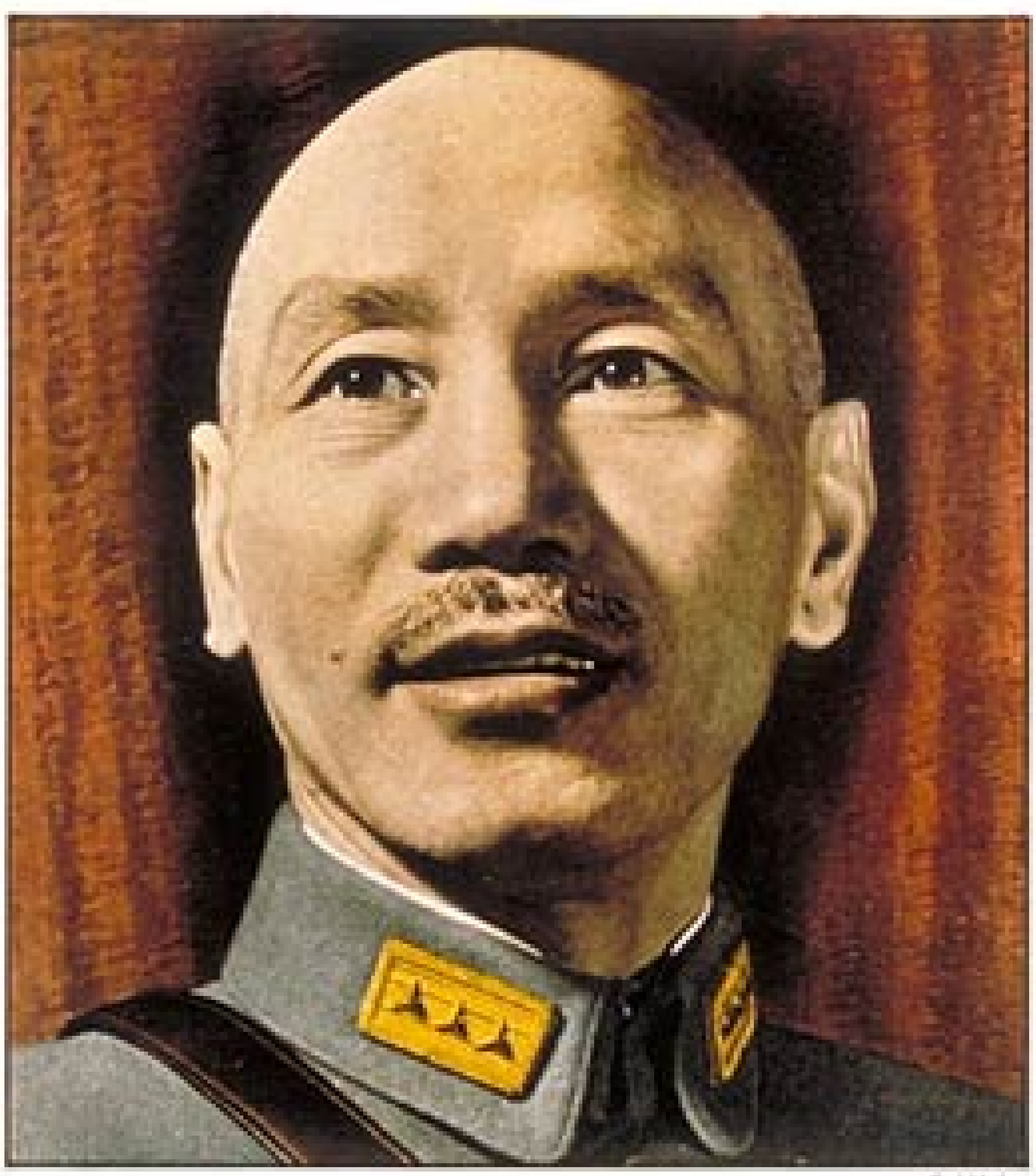






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



GISSIMO CHIANG

Five hard years, but the next is the hardest.

(World Battlefronts)



蔣主席暨經國緯國二公子攝於重慶




一江山成仁烈士追悼大會
殺身成其仁休同天地


1
2


23040



適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蔣中正敬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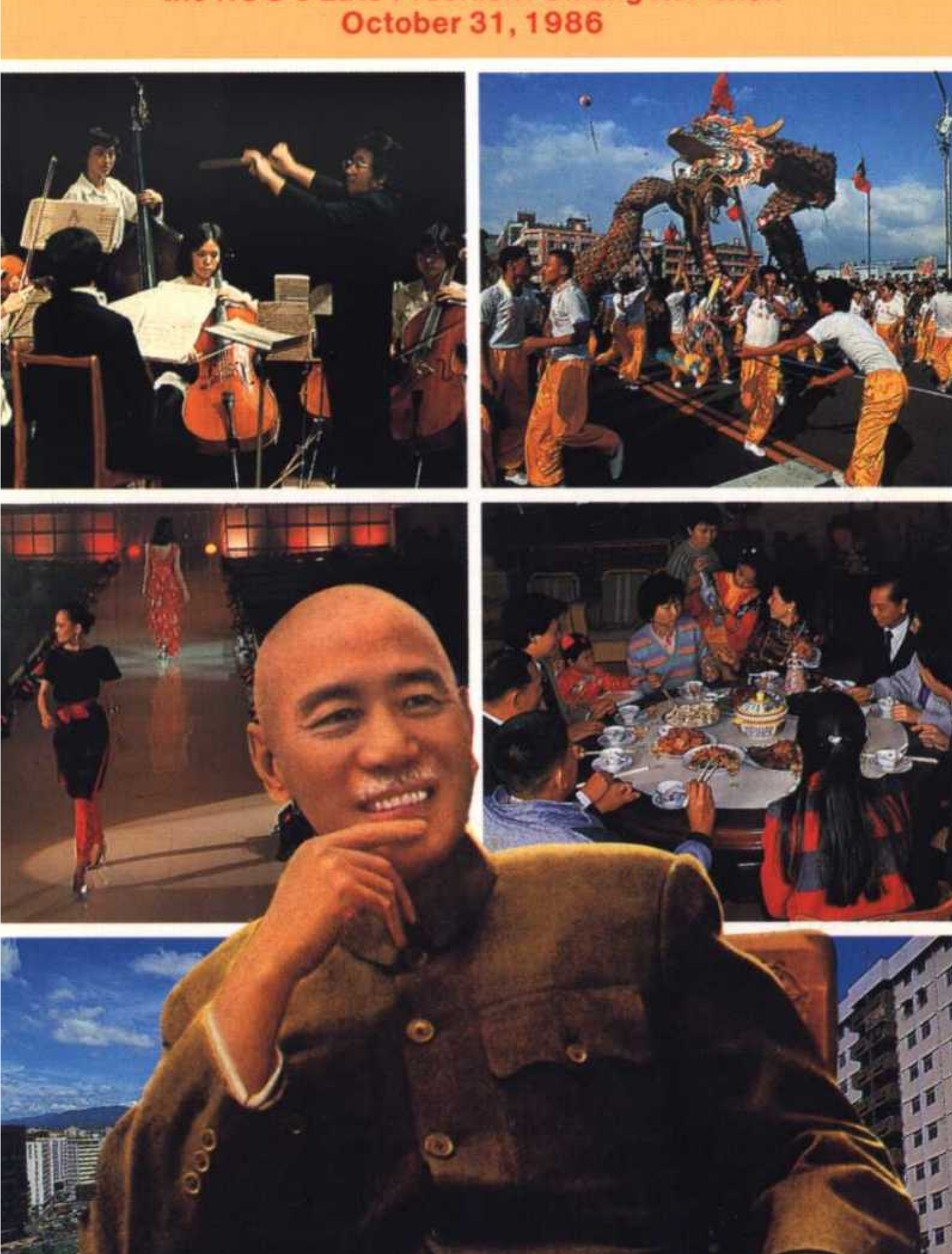



民主
倫理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中華民國先總統　蔣公百歲誕辰紀念

Centennial Birth Anniversary of the ROC's Late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October 31, 1986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大膽

三、 抗日期間

◆ 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調整國內外政策的開端

◆ 蔣介石與 1937 年的淞滬、南京之戰（附記：蔣介石為何開闢新戰場）

◆ 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日方誘和與蔣介石的應對及剎車

◆ 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

◆ 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石「抗戰到底」之「底」——兼述蔣介石如何對待被日本侵佔的東三省

◆ 蔣介石與史迪威事件——戰時中美之間的嚴重衝突

四、 國共矛盾

◆ 第三國際的解散與蔣介石「閃擊」延安計劃的撤銷——論「第三次反共高潮」並未成「潮」

◆ 如何對待毛澤東：扣留、「審治」，還是「授勳」、禮送？——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的心態考察

五、 對內政策

◆ 蔣介石親自查處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債舞弊案——且看蔣介石如何反腐敗

◆ 論國民黨的社會改良主義——對「百年老店」的新審視

六、 家庭生活

◆ 蔣緯國的「身世」之謎與蔣介石、宋美齡的感情危機

◆ 關於宋美齡與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的「緋聞」——駁考爾斯，兼辨李敖之誤

◆ 宋美齡的巴西之行與蔣介石的「婚外情」傳說——兼析其事與美國人要蔣交出軍權之間的關係

序言

［台灣］呂芳上

一

最近一百多年來，中國處在劇烈變動的時代。許多動亂的發生和曲折發展的過程，裡裡外外，直接間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領導人物、群眾活動、文化變遷、國際因素等的相激相蕩，才構成中國現今的局面。至少在半個世紀之前，以近代史作為史學學術研究的一支，還頗見爭議。近代歷史雖有數據宏富之利，但更有問題複雜、事多隱晦、人多在世的困擾，尤難擺脫現實政治的糾纏。所幸50年後的今天，尤其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全球冷戰架構解體，政治與學術空氣益見寬鬆，近代史研究已漸成氣候。以蔣介石研究為例，海峽兩岸對蔣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視為有成有敗、有功有過的"凡人"，蔣介石走入歷史，社會因此更見成熟。

二

1930年6月，陳寅恪為陳垣《燉煌劫餘錄》作序，說了這樣一段話：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

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發掘新資料、引進新理論、提出新問題、得出新結果，這是近代史學研究的基本精神。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即以近代中國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拋棄舊有思維框架、運用科際整合方法，具備國際視野、重視團隊合作的條件下，運用新資料，提出新問題，已逐步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視野。舉例言之，台灣在 20 世紀 80 年代解嚴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區"，例如國民黨內部派系問題、台灣史、中國共產黨史、"漢奸"等的歷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國民革命史觀下難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偉人事跡、群眾運動等。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世局發生重大變動，近代史研究也跟著發生意義深遠的變革。以國民黨史為例，在數據方面，國民黨數據的空前開放，蔣介石檔案的全盤解密，蔣介石日記的陸續公開，對民國史研究議題的開發、歷史問題的解決均具正面意義；在歷史解釋方面，舊有思維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論述，歷史不再為政治服務已完全可能。擺脫僵化史觀、遠離偉人教條，去除條條框框，"黨史"、"國史"可以區分，"黨同伐異"的話語系統逐漸淡去，把握宏觀、研究微觀，還原"史學是找資料證明的學問"，帶給近代史學者更多發揮的空間。這也正是海峽兩岸歷史學者歡迎的氣氛，想來也應是楊天石教授新著出版的重要時代背景。

三

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據原始資料還原其本來面目，一直是史家的興趣也是任務。早在 2002 年楊天石教授即有感於民國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國人物難免塗脂抹粉，致事件雲遮霧繞，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訪四海，廣搜史料，然後以專題發掘蔣介石自民初以迄 20 世紀 40 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以便進一步準確地闡述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本此精神，2006 年 3 月，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首次開放蔣介石日記時，楊教授是學者中進入檔案館內閱讀日記拔得頭籌者，上窮碧落下黃泉，他的勤快、執著與用功，直叫人敬佩。

大體歷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資料之後，得尋求基本史實的確鑿、深切認識時代環境、掌握各階段思想的發展，集中關鍵又發人深省的議題上進行發揮，不迴避、不竄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為上乘之作。楊教授的諸篇論文根據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復又以各種文獻、史料比證、勘核，可謂充分佔有並正確運用史料的優勢；從蔣介石自認對孫中山、陳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經營上海號子（證券交易所）的失敗，1923 年蔣自認"吾前程發軔有望"的蘇聯之行說起，到蔣胡湯山事件，對日秘密談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蔣、史、宋（子文）角色與衝突，重慶談判中蔣對毛澤東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的內心世界，乃至於蔣的私生活，每一議題都從疑點出發，回到論證嚴密的答案中。這本書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談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確答案的歷史議題，這種問題意識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識的兼備而已。

四

2007 年夏，個人有幸，與楊教授同時在胡佛研究所檢閱蔣介石的日記。楊教授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給口才，思路清晰，見識廣博，予人印象深刻。楊教授早期治文學，然後有哲學訓練的機緣，終乃投入歷史的研究，其根柢之深厚，卓然成家，自有淵源。

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一如楊教授所言，是治民國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學家可以長時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寶藏。我們樂於看到楊教授第一部努力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著作的出現，民國史學界一定會熱切期待他續集、三集……的出版，因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現，一個重要又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蔣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龕，走出政治的牢籠，真實的面貌才會呈現。

2007 年 12 月 25 日敬序於南港

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複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聖，絕對正確，永遠英明，彷彿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於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彷彿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於斯人。

蔣介石生於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逝世於1975年4月5日，活了 88 歲。他一生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許多大事。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孫中山逝世後，領導北伐、清黨、剿共、抗日、內戰，很長時期內擔任中國黨、政、軍三方的最高領導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又兩次分裂。1949年後退到台灣，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個中國，在活過 88 年以後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被神化、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勳盛德"，"光華流澤"；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化、醜化為人民公敵、元兇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

兩種情況，簡單的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

廓清迷霧，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正確評價其功過是非，揭示其本相，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國共關係，正確認識和書寫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有其必要；對於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也有其必要。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 30 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 60 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我從 20 世紀 70 年代起，投身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第一步，在海內外廣泛收集資料，第二步，選擇若干重大問題進行研究。20 世紀 30 年代，蔣介石曾將他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我曾以這批資料為主撰寫了一批論文。2002 年，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後，我又多次到台灣，研讀蔣介石帶到台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其日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又一批論文。2006 年 3 月，寄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我有幸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2007 年，胡佛研究院繼續開放日記的 1932 至 1945 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訪問該院。

日記，記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於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

歷史秘密。當然，只看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大量閱讀相關的檔案資料和文獻，反覆比較、勘核，同時，將蔣的所思、所行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實的蔣介石來。

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鼓勵。1988 年，我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後，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2001 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 2002 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過若干困難。2003 年，有少數幾個人化名給中央領導和有關機構寫信。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本書是我多年來所寫關於蔣介石研究專題文章的一個精選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陸和台北的蔣介石日記仿抄本或類抄本寫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開放的日記手稿複印本寫成（本書註釋簡稱為"手稿本"）。由於類抄本經過不同程度的刪削、改動，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訪問，又利用日記手稿的複印本對各文所引日記進行核對，並作了部分增補或修訂。

2006 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閱讀蔣介石日記時，新華社有一位記者要求我簡

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定性"。我曾說過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複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同年在香港鳳凰衛視演講時，我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細的闡述：大陸時期，蔣介石反清、反袁（世凱）、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是功；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1927 年至 1936 年的"清黨剿共"和 1946 年至 1949 年的三年內戰，是大過。台灣時期，實行土改，反對台獨，是功；白色恐怖，是過。我至今仍堅持這樣的看法。也許有讀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這是正常的。見仁見智，說三說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斯所禱也。

看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通過"爭鳴"，人們對蔣介石，對中國國民黨史，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將會進步，將會深入，距歷史本相將越來越近，科學性也會越來越強。應該說明的是，本書根據蔣介石的日記論述蔣介石生平的若干問題，故副題《蔣介石日記解讀》，但是，本書遠不足以概括蔣豐富、複雜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現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故以後會有續集、三集的出版。

感謝蔣方智怡女士開放蔣介石日記的無私而勇敢的決定。感謝胡佛研究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多年來給予的閱讀便利。感謝馬若孟（Myers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

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

斯為序，並期待海內外廣大專家、讀者的批評。

著者，2007 年 7 月 15 日寫於美國斯坦福大學之 BlackwelderCourt，時為第四次訪問胡佛研究院也。

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

一 日記現狀

根據現有資料，蔣介石的日記約始於 1915 年，28 歲，止於 1972 年 8 月，85 歲，距離去世只有 3 年。這一年，蔣介石手肌萎縮，不能執筆，因此停止了長達 57 年的日記。蔣的這 57 年日記，遺失 4 年。其中 1915、1916、1917 三年，遺失於 1918 年底的福建永泰戰役。當時，蔣介石遭北軍襲擊，孤身逃出，日記、書籍大部分失落。現在能見到的 1915 年日記僅存 13 天，為蔣當年在山東任討袁軍參謀長時所記。胡佛研究院對外所稱 1917 年日記實際是蔣自撰的回憶，題為《中華民國六年前事略》，回憶 1917 年以前的個人歷史，並非日記。1924 年的日記則可能遺失於黃埔軍校時期，毛思誠在 20 世紀 30 年代編輯《蔣介石日記類抄》時就未能見到。因此，蔣介石日記現存 53 年，共 63 冊。在中國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這麼長時段的日記存世，內容如此豐富，大概絕無僅有。

蔣介石日記原由蔣本人保管。蔣去世後，由蔣經國保管；經國於 1988 年去世後，囑其幼子蔣孝勇保管。孝勇於 1996 年去世後由其夫人蔣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 年經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女士動員，決定將日記寄存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時間為 50 年。胡佛研究院的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親自去加拿大及美國加州的蔣宅，將這批日記攜到胡佛。

蔣介石日記的狀況並不很好。若幹部分已經霉爛、損毀。胡佛研究院接受這批日記後，立即投入力量修復、保存，並用現代科技進行微縮攝影，製作復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儀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蔣家委託對日記進行初讀，對涉及個人隱私的少量內容進行技術處理。2006 年 3 月首度向公眾開放 1918 至 1931 年部分。2007 年 4 月又開放至 1945 年，其餘部分將陸續開放。其少量技術處理部分將在 30 年後全部恢復原狀。

蔣介石日記有手稿本、仿抄本和類抄本、引錄本等幾種類型。胡佛研究院開放的蔣介石日記絕大部分由蔣介石親筆書寫，可以稱為手稿本或原稿本。蔣從早年起，即陸續命人照日記原樣抄錄副本。抗戰時期，蔣介石離開重慶出巡，為了防止遺失，有部分日記由秘書俞國華抄存。由於這兩種本子從內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樣，因此可以稱為仿抄本。這種仿抄本，大陸保存少數，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數，自 1920 年至 1970 年，中缺 1924 年、1948 年、1949 年各年。

蔣介石一生崇拜曾國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國藩有日記，還有別人替他編輯的《曾文正公日記類抄》。20 世紀 20 年代至 30 年代，蔣介石陸續將自己的日記、來往函電、文稿等許多資料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管。毛即利用這批資料編輯長編性著作《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同時，毛思誠模仿《曾文正公日記類抄》的體例，將蔣的日記分類摘抄，計有黨政、軍務、學行、文事、雜俎、旅遊、家庭、身

體、氣象等約十種，統名為《蔣介石日記類抄》。一般稱之為"類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蔣的日記原文，然後加以文字潤色，並不改變蔣的原意，所以還是可信的。但是，仍有個別地方，毛思誠為了將蔣的形象顯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動和原文相差較遠。例如，蔣早年比較激進，主張將資本家"掃除殆盡"，毛思誠就改為"如不節制資本"。又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日記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維護領土"的說法，但毛思誠卻修改為："以堅強不撓之氣概吞壓強虜"。這一改，蔣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實了。毛在編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後，《蔣介石日記類抄》和少數蔣日記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電、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寧波家中。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氏後人將這批資料藏在夾牆裡。"文革"中，紅衛兵砸破牆壁，發現這批資料，逐級上報，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撥交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文革"後，毛氏後人將這批資料捐獻給國家。

抗戰時期，蔣介石命奉化同鄉王宇高、王宇正繼續按分類原則摘抄自己的日記，分《困勉記》、《省克記》、《學記》、《愛記》、《遊記》五種。《困勉記》記錄蔣在艱難中勉力奮鬥的事跡。《省克記》記錄蔣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學記》記錄蔣的讀書心得。《愛記》記蔣的人際關係和對同事的看法。《遊記》記蔣的遊歷。主要資料來自蔣的日記，但編者也偶采日記之外的資料，而且有些資料我們今天已經難以一一見到。其特點是用第三人稱的口吻記述，和毛思誠的《蔣介石日記類抄》並不完全相同。不過，編者基本上忠實於日記。編者所述和日記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內容一般抄自日記手稿本，因此可以大體歸入"類抄

本"。不過這五種本子的文字都較日記手稿本簡括，也有編者潤飾、修改之處。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內容，日記手稿本沒有。例如，1940 年 11 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向重慶國民政府求和，蔣當月 7 日的日記手稿為："周作民受敵方請托條件轉達者，商人不察，以為較倭汪之條件減輕，其實文字變換，而內容無異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記》的記載則為："此條件，不過文字變換，而內容實無少異。錢新之不察，以為較汪奸之條件減輕矣，希望政府採納，是只知私利而不顧國家者也，可痛。"兩種本子，內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後者點出了在松岡和蔣介石之間牽線的銀行家錢永銘。這一變動，一種可能為蔣介石審閱時所加，一種可能是編者根據其他資料所加。兩相比較,《困勉記》這一條的史料價值顯然更高。當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價值的史料，被《困勉記》的編者刪掉了。

蔣介石在命人編輯《困勉記》等五書之外，又命同鄉孫詒等編輯《事略稿本》。這是年譜長編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月、日收錄、排比與蔣的生平有關的各種資料，如文告、函電等，其中也大量摘錄蔣的日記。該書上接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自 1927 年始，止於 1949 年。同樣，它對蔣的日記有刪選，有壓縮，有加工。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編者為了維護蔣的形象，對日記手稿本中的部分內容有所諱飾。有些地方，編者還曾根據後來的歷史環境對手稿本的文字作過刪改。例如，抗戰後期，蔣介石與美國衝突時，曾經多次在日記中痛罵"美帝國主義"。這些激烈語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困勉記》等五種稿本現藏於台北"國史館"。《事略稿本》也藏於該館，近年來陸續刊行。不過，由於該稿卷帙龐大，刊行速度較慢，全部出版恐尚須時日。

秦孝儀主編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可以視為《事略稿本》的簡本。其中所引蔣的日記未作說明，也有修飾，個別改動甚至距手稿本較遠。該書印數很少，屬於內部資料性質。由於該書僅編至 1949 年，近年來，台灣學者劉維開教授等正在續編，已出 1950 年、1951 年、1952 年三冊。

此外，20 世紀 50 年代，日本產經新聞社以日文出版了《蔣總統秘錄》。為幫助該社編輯此書，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派專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蔣介石日記在內大量文獻，因此該書在敘述蔣介石生平時曾部分引錄蔣的日記。後來美國學者黃仁宇寫作《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一書，即根據《蔣總統秘錄》和《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此後海內外學者研究蔣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記不少出於此書。其實，黃仁宇本人並未讀過任何蔣日記的手稿本、仿抄本或類抄本。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事略稿本》,《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蔣總統秘錄》等書不以公佈蔣的日記為目的，其主體部分也不是蔣的日記。勉強分類，只能稱之為蔣的日記的"引錄本"。至於 2007 年初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的張秀章編著的《蔣介石日記揭秘》則是一本偽書，筆者已有兩文揭露，此處不贅。①

二 真實性問題

日記記錄本人當日或當時親歷親見之事或個人所為所思，不僅比較準確，而且私密度很高，歷來為史家所重視。蔣介石，是近代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決策者，長時期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從他的日記中，人們能夠瞭解蔣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動以至他的極為隱秘的內心世界，瞭解蔣介石和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權力運作過程，特別是瞭解那些不見於新聞媒體、政府公報，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內幕。但是，蔣的日記可靠嗎？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常常碰到這樣的問題。

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為寫給別人看的，這種日記往往裝腔作勢，把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例如閻錫山的《感想日記》，滿篇都是《論語》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聖成賢的，沒有多大價值。一種是主要為寫給自己看的。此類日記，目的在於自用，而不在於示人傳世，其記事抒情，或為備忘，或為安排工作與生活，或為道德修養，或為總結人世經驗，或為宣洩感情，往往具有比較高的真實性。蔣的日記大體屬於此類。

蔣雖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後生活一直比較荒唐，我曾稱之為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1913 年，"二次革命"失敗，蔣介石亡命日本東京，受孫中山之命，加入中華革命黨，同時盡力讀書，在這一年讀完《曾

國藩全集》，深受影響。1916 年，他的引路人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這件事給了蔣介石以極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學，以繼續英士革命事業自任。"①他決心從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靜坐、反思，按儒學要求克己復禮。此後的一段日記應該比較真實。其後，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繼續用儒學、特別是宋明道學的要求來約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記成為他個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願望是真誠的，日記自然也有相當的真實性。此後，他的日記逐漸增添新的內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記錄，治兵、治國和處理人際關係的經驗總結等。蔣每日、每週、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記也就相應成為反思的載體。這一段時期，蔣介石還不會想到他將來會成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要人，他的日記會長期流傳，成為歷史學的研究資料，因此，沒有必要在日記中矯飾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權勢日重之後，他自然明白其日記的重要，但是，由於他繼續通過日記記錄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計劃，提醒應注意事項，並繼續用以治心修身，是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會如實記錄，而不會有意作假，自己騙自己。例如，他抗戰期間的日記一般分幾個部分：1.提要。記當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養要求。2.預定。記一二日內應做之事。3.注意。記對國內外形勢的思考和應加注意之事。4.記事，記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錄。6.本星期預定工作綱目。7.本月反省錄。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蔣在這些項目中造假，等於是給自己造成混亂。

說蔣記日記一般會"如實記錄"，並不等於說蔣在日記中什麼重要的事情都記。有些事，他是"諱莫如深"的。例如，1927 年的四一二政變，顯系

蔣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謀劃之舉，但日記對此卻幾乎全無記載。又如，1931 年的軟禁胡漢民事件，蔣只記對自己有利的情況，而不利的情況就不記。再如，抗戰期間，蔣介石派宋美齡去香港指導對日談判，他就絕對不記。蔣自己就說過，有些事情是不能記的。可證，蔣記日記有選擇性。同時，他的日記只反映他個人的觀點和立場，自然，他所反對的人，反對的事，反對的政黨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樣子。因此，只能說，蔣的日記有相當的真實性，不是句句真實，事事真實，而且，真實不等於正確，也不等於全面。研究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不看蔣日記會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麼都相信，也會上當。

蔣的日記，主要為自用，而非主要為示人，為公佈。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點得到證明。

一、蔣身前從未公佈過自己的日記，也從未利用日記向公眾宣傳，進行自我美化。當然，他會想到身後立傳，使自己的事跡流傳的需要，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記》和《事略稿本》一類著作完成。蔣一般會選擇自己的同鄉或親信進行編輯，這些人自然會本著"為尊者諱"的原則，刪削或修改部分內容，而蔣本人也會逐本校閱，嚴格把關。

二、蔣喜歡罵人。在日記中，蔣罵過許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黃郛，親屬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漢民、孫科、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下屬如周至柔等，幾乎沒有人不被他罵，而且罵得非常狠。蔣如果考慮

到要示人、要公佈，他就不會在日記中那樣無所顧忌地罵人。

三、在日記中，蔣寫了自己的許多隱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間的艱難掙扎，甚至為解決生理需求而進行"自慰"等。此類事，蔣在日記中都如實記錄，顯然，記這些，決不是為了示人，更不是為了樹立自己的高大與神聖的形象。

因此，我的結論是，蔣介石日記是研究蔣介石，研究近、現代中國歷史的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對於研究亞洲史、世界史也有相當的價值。有經驗的、精心的閱讀者從中將會發現很多可以推進或加深其研究的內容，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觀點，寫出更準確、更科學、也更豐富的歷史著作。

蔣介石的早年思想-- 從向左到向右

這裡所說的蔣介石的早年，指 1918 到 1926 年，時當 32 歲到 40 歲之間，這一時期，蔣介石追隨孫中山革命，和共產黨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較重要的時期。但是，歷史不能割斷，一個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斷，因此本文的考察範圍將適當下延。

一個人的日記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內心世界。本文所用資料，以蔣介石留在大陸的日記為主，結合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 2006 年開放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少數地方則以其他資料參證。

為什麼考察從 1918 年開始呢？因為蔣介石此前的日記僅存片斷，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戰時失落。

讀書生活：吸納新潮，崇拜舊學

五四以後，新思潮大量湧入，知識分子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新式書報，企圖從中找尋救國真理，蔣介石也不例外。這一時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為自己的學課①，自覺地、有計劃地閱讀《新青年》等刊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方面的書籍，儼然是個思想開通、追求進步的新派人物。

蔣介石閱讀《新青年》始於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記中不斷出現有關記載。如：

1919年12月4日日記云："看《新青年》雜誌。"①
1919年12月5日日記云："上午，看《新青年》。往訪林士及執信。下午，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7日日記云："看《新青年》，定課程表。"
1919年12月10日日記云："看（《新青年》）易卜生號。"
1920年4月9日日記云："在船中看《新青年》雜誌。"
1926年4月21日日記云："上午看《新青年》雜誌。"
1926年4月22日日記云："上午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記云："下午看《新青年》雜誌。"

五四以後，各種新式刊物如雨後春筍，但蔣介石對《新青年》似乎情有獨鍾，除該刊及北京大學羅家倫等編輯的《新潮》外，別的刊物蔣介石很少涉獵。

經濟問題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中心問題。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發現，他曾經用相當多的精力鑽研經濟學的有關問題。如：

1919年12月8日日記云："下午，看孟拾路著《經濟學原論》。"
1919年12月12日日記云："看津村秀松著《國民經濟學原論》第一章。

"

1920 年 2 月 6 日日記云："看《經濟學》，至《社會主義》止。"

1925 年 3 月 30 日日記云："船中看《經濟學》，如獲至寶也。"

1925 年 5 月 4 日日記云："上午看《經濟思想史》。以後擬日看《經濟思想史》及《將帥之拿破侖》數十頁。"①

在閱讀經濟學有關著作的過程中，蔣介石也偶爾寫下他的感想。1920 年 1 月 16 日日記云："看經濟學，心思紛亂，以中國商人惡習不除，無企業之可能。"②同年 2 月 7 日日記云："看《經濟學原論》完。津村主張，皆調和派的論調，其中不能自圓其說者亦只顧滔滔不絕，誠實堪笑，亦甚堪憐也。"

研究經濟學不可能不研究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蔣介石同樣投入過相當的精力。如：

1923 年 9 月 6 日日記云："下午看馬克思經濟學說。"

1923 年 9 月 21 日日記云："下午看馬克思學說。"

1923 年 9 月 22 日日記云："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1923 年 10 月 4 日日記云："上午復看《馬克思學說概要》，習俄語，下午看《概要》。"

1923 年 10 月 7 日日記云："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1923 年 10 月 9 日日記云："下午看《學說概要》。"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給蔣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奧難讀。據他自述,《馬克思學說概要》的"經濟主義"部分，他讀了三遍，還感到"不能十分瞭解，甚歎馬克思學說之深奧也"。③有時，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讀來讀去，他終於讀出了滋味，甚至讀出了"趣味"：

1923 年 9 月 24 日日記云："今日看《馬克思學說概要》，頗覺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厭棄欲絕者再。看至下半部，則倦不掩卷，擬重看一遍也。"

1923 年 10 月 18 日日記云："看《馬克思傳》。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樂而不能懸卷。"

看書看到了"不能懸卷"的程度，說明蔣介石對馬克思主義已經有了相當瞭解並且相當有感情了。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代表作，對該書，蔣介石也有涉獵。

1923 年 10 月 13 日日記云："晚，看《共產黨宣言》。"

1923 年 10 月 16 日日記云："看《共產黨宣言》。"

從蔣介石日記中，還可以看出，他還多次閱讀《列寧叢書》，印象良好。1925 年 11 月 10 日日記云："晚，看《列寧叢書》第五種。其言勞農會與赤衛軍之組織與所犧牲之價值，帝國主義之破產原因，甚細密也。"同年 11 月 21 日日記云："看《列寧叢書》。其言權力與聯合民眾為革命

之必要，又言聯合民眾，以主義的感化與訓練為必要的手段，皆經歷之談也。"

在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過程中，蔣介石接受了某些影響。1925 年 11 月，他準備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作序，打算既談人生觀，也談宇宙觀，苦無心得，最後決定重點闡述"精神出自物質，宇宙只有一原"二語，顯然，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不過，這一時期，蔣介石又讀到了《太〔泰〕戈爾傳》一書，使他又從馬克思主義身邊走開了。同年 11 月 12 日日記云："太〔泰〕戈爾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列寧以權力與鬥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學言，則吾重精神也。"這段日記表明：在唯心與唯物的二元對立中，蔣介石選擇了"唯心"；在"愛與快樂"和"權力與鬥爭"的二元對立中，蔣介石選擇了泰戈爾學說。這成為他後來走向基督教，拒絕馬克思的起點。①

這一時期，蔣介石也曾深入地研究過德、法、俄諸國的革命史。1923 年，他認真地讀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926 年，他在閱讀《法國革命史》的過程中發現俄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6 月 9 日日記云："看《法國革命史》，乃知俄國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發明，十有八九，皆取法於法國及改正其經驗也，可寶貴也。"可見，他對俄國革命中的許多做法是持肯定態度的。其後，他認真地閱讀《俄國革命史》一書。6 月 23 日、26 日、27 日、28 日，其日記都有閱讀該書的記載。7 月 21 日，他開始閱讀《俄國共產黨史》。8 月 11 日，他在向衡州

進發船中繼續閱讀《俄國革命史》，並且在日記中寫道："甚覺有益。"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1年12月，他還在閱讀該書。②

蔣介石日記中，也常有他閱讀孫中山思想有關著作的記載。如：

1923年5月9日日記云："看《平均地權論》。"
1925年1月9日日云："摘錄《精神教育》"軍人之勇"，中師之精神文辭，使人閱之而不能掩卷，可謂觀止矣！"
1925年1月16日日記云："船上看《民生主義》第三講完。到省校辦事。晚，回長洲，船中看《民生主義》第四講完。打倒帝國主義，解除人民痛苦，為余一生事業。《三民主義》一書，博大精深，包羅萬有，而其主腦則在此二語也。"①
1926年8月7日日記云："看《建國方略》……全以經濟為基礎，而以科學方法建設一切，實為建國者必需之學。總理規劃於前，中正繼述於後，中華庶有豸乎？"②
1926年8月8日日記云："甚矣行易知難之理大矣哉，非總理孰能闡發無遺也。"

從這些記載中，不難看出蔣介石對於孫中山的崇拜心情。

五四時期許多新潮人物大多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強烈批判態度。蔣介石與他們不同，他雖然吸納新思想，卻並不廢棄舊學。1914年至1915年之間，蔣介石研讀王陽明、曾國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稱"研究至再，

頗有心得。甚至夢寐之間亦不忘此三集。"③五四前後，他喜讀諸葛亮《前出師表》和文天祥《正氣歌》等，也喜讀《心經》等佛學著作。④不過，他最喜讀、常讀的還是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著作。1921年4月29日，他重讀《曾文正公全集》，有"舊友重逢"之感。1922年3月，他讀胡林翼的《撫鄂書牘》，決定"日盡一卷"。比較起來，蔣介石讀新學諸書，常常食而不化，而讀舊學諸書，則如魚得水，常常用以作為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或用以作為治兵、從政的規範。如：

1922年3月25日日記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經驗之談，千古不易之論，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確也。"

1922年4月11日日記云："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傳，而曾公獨言其進德之猛，是可知其虛心實力，皆由刻自砥礪之德育而來，其辦事全在於"賞罰嚴明、知人善任"二語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過於曾公矣！"

1922年11月14日日記云："晚，看曾公尺牘，至《復陸立夫書》，有"事機之轉，其始賴一二人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而其後人亦為之和，天亦為之應"。信乎，吾可不以潛移默運之人自任乎！"

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對蔣介石的深刻影響。

1926年以後，蔣介石的讀書生活逐漸發生方向性的轉變，即廢棄新學，專讀舊籍。例如，他1934年的讀書計劃為：王船山、顧亭林、程朱、《資

治通鑒》、張居正、王安石、管子、韓子，沒有一本新潮方面的書。這種情況，反映出蔣介石思想的重要變化。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侵華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遭到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因此，民族主義思想空前發達起來。

蔣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當時主要內容是反清，宋遺民鄭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經是他最愛讀的著作。①五四運動後，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思想逐漸向反帝方向發展。

五四運動給了蔣介石以強烈震動。他高度評價中國人民在運動中表現出的鬥爭熱情和愛國精神，視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所在。當年 9 月 24 日日記云："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總統府門前，要求力爭山東各權利及各處排日風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吾於是卜吾國民氣未餒，民心不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①1920 年 6 月，蔣介石出資 5000 元，與陳果夫等創立友愛公司，購買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銀價大落。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金融機關，在外人之手，國人時受壓搾，可歎也。"同年 11 月 8 日，蔣介石遊覽香港，看到英人在當地大規模建設的狀況，慨歎道："英人之規劃宏遠，誠足浩歎。此皆吾錦繡河山，自不能治，而使人治

之，尤為可惜！"

蔣介石不僅反對外人侵佔中國土地，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而且反對為洋人服務的洋奴買辦。1920 年 9 月 3 日，他往訪張靜江，為車伕所侮辱。下午打電話時，又為"電話手"所梗，蔣介石極為生氣，在日記中寫道："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蔣介石將車伕、"電話手"等類人視為"洋奴"是錯誤的，但從這段日記中不難看出他對洋場買辦一類人物的憎惡。

1923 年 9 月，蔣介石受孫中山派遣，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12 月 12 日乘輪自大連回上海。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敗不堪。蔣介石居然由此預言："吾料東邦帝國資本主義之命運，不久將盡矣！"

蔣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現於五卅運動後。1925 年 6 月 23 日，廣州群眾為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遊行示威，隊伍經過租界對面的沙基時，英國軍隊悍然開槍射擊。群眾死 50 餘人，傷 1 7 0 餘人，形成沙基慘案。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黃埔赴廣州途中，覺得一路景色淒涼，天空"頓呈不可思議之紅灰色"。第二天，他在發病高燒中仍集合士兵講話。第三天，他在日記提要欄目中寫下："如何可以滅此橫暴之陰〔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記中書寫"仇英"標語，總計約近百條，如：

英虜皆可殺！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虜我必殲汝！

英夷可不滅乎！

汝忘英虜之仇乎？

英夷不滅非男兒！

英番不滅革命不成！

英番不滅能安枕乎？

漢有三戶，滅英必漢。

英虜，我的同志為你殺害！

英番不滅，國家焉能獨立！

英夷不滅，焉能解放世界人類！

一年將匝，英番如故，竊自愧餒弱。

新年又逾二日，試問對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舊歷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盤踞如故，思之痛徹骨髓。

英夷氣焰方張，當亟圖最後對付，不可徒幸其國內工黨革命也。

蔣介石把"英虜"、"英夷"看做是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英虜"、"英夷"也必欲除蔣介石而後快。1925 年 10 月 19 日蔣介石日記云："陰〔英〕番勾通北段（祺瑞），竟以十萬金懸賞執余。"21 日日記云："陰〔英〕番畏我益甚，而謀我更急乎！"

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給了港英當局以沉重打擊。1926 年 3 月下旬，港英當局得到英國政府授權，決定提供 1000 萬元借款，用於改良廣州市政，企圖以此為餌，誘使國民黨人結束罷工。當時，廣州市長伍朝樞和孫科都有意接受英國條件，遊說蔣介石，爭取支持，但蔣介石卻堅決抵制。4 月 14 日日記云："梯雲急於解決罷工問題，以貪英國借款，推其意為英人所利誘，余反對之，並斥其妄。不料哲生為彼所愚，後以余據理反對，彼亦無異詞。"同年 7 月 21 日，廣州工人糾察隊因英僑拒絕檢驗貨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當局派兵佔領深圳車站。當日日記云："蠻番不問理由，即將我深圳車站派兵佔領，事之可恥孰甚於此！"次日日記再云："得陰〔英〕番佔領深圳之報，不勝憤激，乃與鮑顧問磋商應付諸事。"可見，蔣介石的反英並非只是一時熱情。

除英國外，蔣介石對美、法等國也持警惕態度。其日記云："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對美國外交，更曾嚴厲批判。1926 年 1 月 7 日，蔣介石接見美國新聞記者，"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儘管蔣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間的行動卻是十分審慎、溫和的。1926 年末至 1927 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欖枝。1 月 2 日，通過黃郛向日本駐武漢總領事高尾亨表示："國民黨軍斷不會對租界發難"，"目前只希望對租界組織實行改良（例如給中國人參政權等）便可滿足，並打算採取緩進的、

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實現這一目的"。①同月 25 日，蔣介石接見日本駐九江領事大和久義郎，說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針是：尊重歷來的條約，不採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動加以廢除，一定負責償還外債，充分保護外國企業。①同月底，他在廬山會見留日時的老師小室靜時也表示："對於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佔領杭州、南京等地後，擬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議。若各國對於此合理的要求不予採納，則更講求他種手段。"②

社會觀：厭惡舊社會，立志改造中國

蔣介石出身鹽商之家，社會地位不高，又早年喪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紳的歧視和壓迫，因此，極不喜歡鄉村士紳階層。③1919 年 2 月，他在閩南長泰軍中，憶及往事，勾起宿憤。26 日日記云："吾國紳耆階級之不破，小民終無樂利之一日。"1921 年 10 月，蔣介石在家鄉興辦武嶺學堂，受到鄉紳的阻撓，28 日日記云："鄉願阻礙不少。周星垣之守舊迂闊，不可言狀，鄉間事辦理之難如此。"29 日又稱："鄉居極感痛苦，事事為鄉願所阻礙，不能改良稍些，愧恨無涯。"他甚至發誓："鄉願不死，殊無回鄉之樂，甚想不願來鄉也。"④

蔣介石也不喜歡商人和資本家。1919 年 10 月 12 日日記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勢利，尤為可惡。資本家不掃除殆盡，則勞動家無樂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說："為平民之障礙者，不在官僚與武人，

實在資本家與紳耆扞格其間。以致一切權力不能伸張，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議員，名為民意代表，實則媒介於紳耆、官僚之間。凡有罪惡，皆此種蝨賊所造成者也。吾以為革新社會，資本家與紳耆二者之中等階級，須先掃除廓清。"

蔣介石在上海經營交易所，從事證券與棉紗等物品買賣期間，目睹董事們傾軋、壟斷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對資本家的厭惡感。1920 年 1 月 24 日日記云："赴開元會議交易所選舉董事。商人積弊，仍不能脫把持與專制，大股份壓制小股份，大多數壓迫小多數，舞私牟利，壟斷其間。小商人中雖有達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籌，以致中國實業，日趨衰落，安得將此種奸商市儈一掃而空之，以發榮社會經濟也。"①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壓迫的同時，蔣介石也感受到房東的壓迫與欺詐，進一步增加了他對資本家的憎惡。蔣介石同年 12 月 9 日日記云："晚，為房東朱子謙作惡不仁，心甚憤激，資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僅如此，房東還企圖吞沒蔣妾姚冶誠寄存的交易所單據。同月 22 日，蔣介石日記云："為富不仁，復欲害人，居心毒極！滬上商人行為卑陋至此者，見不一見，亦無足怪，惟恨冶誠之生事也，氣極矣！"

以交易所的活動為紐帶，蔣介石結識了上海資產階級形形色色的人物。對他們，蔣介石日記常有嚴厲的批評。1921 年 5 月 11 日云："知交股價落，不勝煩悶。遇盛四及一班無賴，社會之形態丑劣，嫌惡實甚，無可如何也。"1922 年 11 月 28 日云："中國商人，見之頭痛。商家利祿之心，

狡猾之謀，過於官僚也。"1923 年 2 月 3 日云："又因奸商妒忌，發怒憤激，殊非其道。"凡此種種，都表露出蔣介石對資本家和商人們的憎惡。

對軍閥，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 年 8 月 20 日日記云："看《申報》，知浙江偽督楊善德已於 12 日病斃，繼其任者為盧永祥。羊死驢繼，吾浙其無噍類乎！"
1921 年 3 月 2 7 日日記云："北方無不倒之理，惟在吾黨能起而應之耳！"
1922 年 6 月 14 日日記云："黎元洪違法入京，就總統之位，從此天下又起紛糾，政客、議員之肉，其足食乎？恨手無寸鐵，不能一掃荊棘，憂悶無已！"
1925 年 12 月 1 日日記云："郭（松齡）宣言討張作霖而戴張學良，可稱滑稽。然如此矛盾，則北方大小軍閥不能不自行瓦解耳。舊時代崩潰之症象，於此益明矣！"①
1926 年 7 月 12 日日記云："余以關稅會議為賣國條件，決心與吳佩孚宣戰，通告中外。"

這些日記表明了蔣介石反對北洋軍閥的鮮明態度與立場。

與憎惡商人、資本家相反，蔣介石對工人有一定同情。

蔣介石對工人接觸不多，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勞動與生活狀況也瞭解不

多。1921 年 8 月，蔣介石在鄉監督改建廳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勞狀況，有所感動。28 日日記云："工人之辛苦危險，可謂極矣，資本家見之，如無慈悲之心，非人也。"10 月 21 日日記繼云："自歎為我一人，而苦彼二十工人，自朝至暮，除食事外，毫未休息，每日足作十小時余苦工。嗚呼！小工何罪，其苦如此，資本家與勢力家之不勤儉自持，厚利報工，其必為神人所不容。不必言近世之潮流如何，徒問你自己良心過得去否耶！可不警惕乎？"11 月 6 日日記再云："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場法如不速實行，小工無法保護，中國人民只見死亡病傷，決無完全生存之理。有責者其可不惻然設法，實行提倡乎？"這些地方，顯示出蔣介石願意通過社會改良的途徑改進工人的生活待遇。

1925 年 7 月 7 日,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革命六大計劃"，其中說："工人為革命中有力之成分，且對於吾革命前途之難易成敗，實有莫大之影響。"但是，他的具體建議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為我國犧牲之失業工人"，"利用罷工工人建築道路"等寥寥數語。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對罷工工人，可"酌加編製，施以軍事及政治之訓練，以植工人軍之基礎"①。不過，這一思想，對蔣介石說來，恰如火星一閃，後來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②。

在北伐進軍途中，蔣介石還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廠。1926 年 9 月，蔣介石參觀安源煤礦，發現廠主無能，受到日本資本壓制，停工近 1 年，便主張："工人乘此廠主放棄權利時，起而自己管理也。"③不過，蔣介石只同意對工人生活做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堅決反對階級鬥

爭。還在北伐出師前夕，他就宣佈："階級鬥爭及工農運動的罷工鬥爭，在戰時是破壞敵人的力量和方法，對付敵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黨和政府之下，罷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動。"④北伐出師之後，國民革命軍佔領地區的工人運動日漸發展，蔣介石曾發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絕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決了工潮"，同時則要求工人集中在"本黨之下"，"受本黨指揮"，"非但不應該仇視商人，並且須在可能範圍內急謀諒解"。⑤此後，罷工日漸頻繁，蔣介石仇視工人運動的態度日漸明顯。1927 年 1 月底，他與小室靜談話，一方面聲稱"勞動者地位之向上與幸福之增進，乃吾等之主義，故不能中途而輟"，表示不能動用軍隊來"制止勞動者之罷工"，但同時又說："唯勞動者苟有跋扈行為，甚且危及國際關係，亦不能過於放任，彼時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①這些地方，已經預示了他日後的行動方向。

蔣介石一度認為，中國"不存在大土地佔有制"，"中國很少發生大土地所有者與農民之間的衝突"②。但是，蔣介石的早年日記顯示，他對土地問題還是關心的。1926 年 2 月 3 日，蔣介石與鮑羅廷談話，鮑主張以"解決土地問題為革命之基礎"，蔣介石表示贊成，日記云："余亦以為然，惟憂無法引起全國大革命耳。"但是，這以後，蔣介石逐漸傾向於北伐期間，暫不提出土地問題。③出師前夕，鮑羅廷建議發佈土地政綱，蔣介石不贊成；鮑提議攻克武漢時發佈，蔣還認為太早。④不過，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這一問題。同年 7 月 30 日，他收到鄧文儀的俄國來信，述及土地問題，日記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國家化（即歸國有）與土地社會化（即歸社會分配），如太平天國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

究土地問題，有一解決之方。"8 月 1 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電張靜江、譚延闓，要他們和鮑羅廷商量，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土地制度委員會，規定詳細辦法，或根據"平均地權"所言，再加細定，"逐條登報，公諸國人參考，且可臨時應用也"。⑤

1926 年 12 月 7 日，國民黨中央部分人員及鮑羅廷等在廬山開會，討論各地工農運動問題。會議"對工人運動主緩和，對農民運動主積極進行，以為解決土地問題之張本"。蔣介石在會上表示："只要農民問題解決，則工人問題亦可解決也。"①這一時期，蔣介石所率領的北伐軍受到湖南各地農民協會的熱烈歡迎和積極支持，因此，蔣介石對農民運動和農民協會都相當有好感。8 月 3 日日記云："各村人民與農會有迎於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農民協會組織尤其發達，將來革命成功，還在湖南為最有成績。"

民國期間，使用奴婢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奴婢們大多沒有人身自由，受到各種虐待。蔣介石對奴婢有一定同情，主張禁止畜奴。1918 年，蔣介石在福建永泰軍中，聽到一陳姓主婦毒打婢女之聲，很為之不平。1919 年 9 月，又見到鄰婦虐待婢女，較往日陳婦尤甚，憤慨地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奴婢之制不革除，尚何有社會平等之可言乎！吾覺欲求人類平等，第一當先除奴婢毒制也。"②

蔣介石還反對家族觀念。1920 年 1 月 23 日日記云："家族觀念打不破，家族範圍跳不出，埋沒古今多少英雄。"③

以上種種，都表現出蔣介石所受五四後新思潮的影響。

出於對舊社會的厭惡，蔣介石有改造中國社會的志向。1919 年 11 月，蔣介石在日本，發現各書坊中社會主義書籍特多。4 日日記云："吾知其社會改革必不遠也。以中國人民不識字者之眾，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實行，則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識普及，其改革進程之速，更可知矣！"當時，日本自然主義作家武者小路實篤接受空想社會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等思想影響，提倡新村主義。蔣介石在日本讀到了《新村記》一書，有所觸動，即萌生"改造本鄉"的念頭。①1920 年 12 月，他自覺"矜張自肆，暴躁不堪，對於社會厭惡更甚"。②日記云："我對中國社會，實厭惡已極，其將何以謀脫也？"。③這一時期，他對邵元沖等宣稱："中國宜大改革，宜徹底改革。"④

早期，蔣介石認為中國缺乏實行共產主義的條件，但對共產主義並不反感。1920 年 2 月 2 日日記云："書廚包工來，欺偽百出，心甚嫌惡。中國工人之無道德，無教育如此。對於共產事，甚抱悲觀。非從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後，斷乎談不到此。"⑤1923 年蔣介石出使莫斯科時，認為中國革命應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行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階段才是宣傳共產主義，實行"經濟革命"、"社會革命"。⑥1925 年 12 月，他在《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中稱："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⑦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記中表現出來思想，他

的上述言論當非完全是違心之言。

左右之間

孫中山在世時，國民黨內部在聯俄、容共等問題上，即有不同意見。孫中山去世後，迅速形成對立的兩派，通稱左派與右派。

蔣介石最初站在左派方面。1925 年 11 月 23 日，林森、鄒魯、謝持等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通過《取消共產黨員國民黨黨籍》、《鮑羅廷顧問解雇》等案。12 月 24 日，在上海另立中央。同月下旬，廣東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王柏齡等人準備示威響應。28 日晚，蔣介石從汪精衛處得到有關消息，當日日記云："王柏齡糊塗至此，可惡殊甚，嚴電阻止，不知有效否？"

當時，蔣介石反對在軍中形成派別。1926 年 1 月 2 日日記云："下午，對各將士痛誡派別之惡習，不禁淚下。"當時，在黃埔軍校中，與孫文主義學會對立的是左派組織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2 月 2 日，他約孫文主義學會與青年軍人聯合會兩派幹部開聯席會，限令高級官長退會，同時要求雙方幹事互入兩會，企圖消弭二者之間的界限。4 月，又進一步要求兩派組織同時取消。

"三.二〇"事件後，右派紛紛做蔣介石的工作，企圖爭取他站到自己一邊。

4 月 3 日，劉峙、古應芬、伍朝樞三人陸續見蔣，進行遊說。蔣介石日記云："右派徒思利用機會，聯結帝國主義以陷黨國，甚可歎也。"同月 5 日，宋子文向蔣介石反映，廣州右派計擬召開市黨部大會，舉行示威，蔣介石立即函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加以制止。次日，蔣介石並通電反對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表示"誓為總理之信徒，不偏不依，惟革命是從。凡與帝國主義有關係之敗類，有破壞本黨與政府之行動，或障礙我革命之進行，必視其力之所及掃除而廓清之。"①

蔣介石反對右派的立場一直持續了很久。北伐期間，樊鍾秀一直在河南南部活動，組織軍事力量，企圖響應北伐。1926 年 8 月，蔣介石聽說居正、謝持有離間樊鍾秀等與北伐軍的打算，憤怒地在日記中寫道："彼等誠反革命矣！"②同年 9 月 16 日，蔣介石會見田桐、周震鱗後，在日記中留下了"其語不堪入耳"的記載。

不過，由於蔣介石在聯俄、容共問題上和西山會議派的觀點有相通之處，因此，最終必然會走到一起。1926 年 5 月 22 日日記云："總理責任交給國內青年，願以奮鬥之青年贊成國民黨，然而非欲黨員對三民主義疑為不澈底之革命也。如言不澈底，則俄國革命迄今仍未澈底也，不革命一語，為宣佈革命黨員之死刑，聞者無不反對，革命必致破裂。應聯合革命的新舊黨員對外也。"這段日記，已經預示著他和西山會議派矛盾的溶解。

"一個主義，一個黨"

1923 年，蔣介石訪問蘇聯，原擬請蘇方支持國民黨人在蒙古的庫侖建立軍事基地，遭到拒絕。他滿懷期望訪問蘇聯，卻沒有得到什麼具體成果。但是，他卻總結出了一條經驗--必須獨立、自動、不受外人支配。

蔣介石在訪問蘇聯時，遇到過一個名為趙世賢的中國青年，相談融洽。離開蘇聯時，蔣介石又和這位年輕人作了一次談話："略述此次來俄經過情形，戒其毋為外人支配。"此後，蔣介石即力圖擺脫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控制，並力圖和左派及中共爭奪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1926 年 3 月 8 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商決"大方針"。蔣稱："中國國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實權皆不宜旁落，而與第三國際必能一致行動，但須不失自動地位也。"①同月 30 日，又在日記中表示："只要大權不旁落外人之手，則其他事皆可遷就也。前日政府事事聽命於外人，以致陷於被動地位，此非外人之故，而精衛自讓之也。"5 月 21 日日記再云："革命需求自立，不可勉強遷就。世界革命應統一指揮，但各國革命政權仍須獨立，不能以用人行政亦受牽制。"這時，蔣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獨立自由地處理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當年 12 月，蔣介石聽說托洛茨基將要出使中國，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29 日日記云："黨務、政治不能自由設施，則勝無異於敗也，托氏來華，或能改正，而本身應具獨立之心也。"

蔣介石的蘇聯之行還使他得到了一條經驗，即革命必須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他開始致力於"一個主義、一個黨"宣傳和努力，並以此為指針，處理國民黨內的左右派紛爭。1926 年 6 月 7 日，他在黃埔軍校發表演講稱："俄國革命所以能夠迅速成功，就是社會民主黨從克倫斯基手裡拿到了政權……什麼東西都由他一黨來定奪，像這樣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們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同月 26 日，他與邵力子談話，強調"革命以集中與統一為唯一要件"。①不久，他即派邵力子赴蘇，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要求共產國際承認中國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

誰妨礙革命的統一和集中呢？蔣介石覺得是中共。1926 年 3 月 9 日日記云："共產分子在黨內不能公開，即不能開誠相見。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分子貌合神離，則未有能成者。"於是，他的第一步便是限制共產黨的發展。1926 年 5 月 14 日日記云："對共黨提出條件雖苛，然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5 月 16 日，他訪問鮑羅廷，表示"甚以兩黨革命，小黨勝於大黨為憂，革命不專制不能成功為憂。"5 月 27 日，他在高級訓練班致開學詞，聲稱為"集中革命勢力"，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應退出共產黨。6 月 8 日，他明確向鮑羅廷提出："共產分子在本黨應不跨黨理由。"②

由於鮑羅廷等人的抵制，蔣介石要求跨黨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的目的未能實現。此後，蔣介石日記中不滿共產黨發展與活動的記載日增。如：

1926 年 7 月 3 日日記云："各處宣傳，多是ＣＰ，心甚不悅。"
1926 年 8 月 23 日日記云："閱《嚮導》報，陳獨秀有誹議北伐言論，其用意在減少國民黨信仰，而增進共產黨地位也。"
1926 年 8 月 30 日日記云："他黨在內搗亂，必欲使本黨糾紛分裂，可惡也。"

這樣，他雖然知道"總理策略既在聯合各階級"，表示"余不願主張違教分裂"，①但他最終還是走上了和共產黨"分裂"的道路。

蘇俄創立了一黨制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沒有想到，蔣介石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以對付共產國際和中共。

蔣介石的日記表明：1.他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礎；和共產黨合作，也有一定思想基礎。2.在若干問題上，早年的蔣介石與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之間有一定分歧。這些分歧，屬於革命陣營的內部矛盾，並非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後來在這些分歧基礎上演化為爭取領導權的鬥爭，並進而演化為你死我活的生死鬥爭，是不幸的、遺憾的。3.蔣介石既是國民黨中心主義者，也是個人中心主義者。在蔣看來，他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凡與他持不同意見或反對他的人都是"敗類"或"反革命"，都需要加以"制裁"。1927 年 2 月，他在南昌演講稱："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①這段話，典型地表露出他的個人中心心態。同一時期，他在日記中表示："鮑爾廷固為罪人，而一般趨炎附勢之敗類更可殺也。"②這一段話，是對他上述演講中"革他的命"一語的註腳，不久之後進行的武力清黨已經在此埋下了伏筆。

本文中文本原載紐約天外出版社 2002 年 9 月出版的《慶祝吳教授相湘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收入拙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原有"蘇俄觀"一節，因本書另有專文，故刪去。

做"聖賢"還是做"禽獸"

-- 蔣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戰

儒家學派認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項事業的起點。《大學》有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說法，又有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程序。到了宋明時代，道學家們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張,一方面將儒學倫理規範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則前所未有地細密設計了各種遏制"人欲"的辦法。

蔣介石很早就接觸宋明道學，不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體力行者。在他的日記裡，有大量修身的記載。從中不僅可以看出他的個人修養歷程和極為隱秘的內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徵：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道學信徒、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志士。

重視修身，按照道學家的要求進行修養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辛亥革命之後，"狹邪自娛，沉迷久之。"①1919 年 7 月 24 日，他回憶當時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辦理無狀"的八字考語。①由於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 年 3 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與戴拚命的念頭，但他旋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亦於

此可見一般"，"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②一直到 30 年代，蔣介石想起早年種種劣跡，還痛自悔恨。日記云："少年師友不良，德業不講，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已失之晚矣！"③又云："少年未聞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至今悔之不及"④。一言之不足，反覆言之，當系出於內心，而非泛泛虛語。

為了克服年輕時期形成的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1919 年 5 月 24 日日記云："今日有研究性理書，思憤發改過，以自振拔之機，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謂"性理書"，指的就是宋明以來道學家們的著作。蔣介石不僅讀，而且選抄對自己進德有用的語錄，寫入日記，甚至作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銘。例如，1919 年，他為自己選擇的箴言是"靜敬澹一"四字，同年 8 月，增改為"精渾澹定，敬庶儉勤"八字。1923 年 1 月 5 日，他模仿道學家的做法，自製銘文："優遊涵泳，夷曠空明，曄然自充，悠然自得，此養性之功候也。提綱挈領，析縷分條，先後本末，慎始圖終，此辦事之方法也。"⑤在此之後，他仍然覺得意有未足，又抄錄道學家們常說的"修己以嚴，待人以誠，處事以公，學道以專，應戰以一"諸語，作為對自己立身處世的要求。⑥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例如 1923 年 1 月 4 日日記云："晨興，思良友，竊取乎朱子"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二語以自循省。"①可見，他對朱熹的學說有所瞭解。哲學史上有所謂

朱陸異同之爭，或是朱非陸，或是陸非朱，蔣介石對兩派均無所軒輊，日記中也常有讀王陽明著作的記載。如，1926 年 11 月 17 日日記云："車中悶坐，深思看陽明格言。"

在這一方面，他是兼收並蓄的。

宋明以後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1921 年日記云："晚編《曾文正公全集》。此書已經看過，甚以為遺失於永泰縣之役。今竟復見，不啻舊友重逢也。"②永泰之役，指 1918 年 9 月蔣介石在福建討伐李厚基的一次戰鬥。此戰中，蔣介石中敵緩兵之計，倉促中棄城出走，僅以身免，隨身攜帶的曾國藩著作連同日記等物遺失殆盡。蔣既自稱"不啻舊友重逢"，可見他對曾著的感情。

20 年代，蔣介石仍然喜讀曾國藩的著作。1922 年歲首，他曾節錄曾國藩的"嘉言"作為自己的"借鏡"。其內容有："慮忘興釋，念盡境空"；"涵詠體察，瀟灑澹定"；"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志帥氣，以靜制動"；"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捨，乃能有所全"等。1925 年 1 月 2 日，他又將曾國藩的"懲忿窒慾"、"逆來順受"、"虛心實力"、"存心養性"、"殫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當年日記卷首。可見，他在力圖按曾國藩的訓導立身處世。其後，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給予曾國藩以高度評價，如：

1925 年 1 月 9 日日記云："看《曾文正公雜著》，其文章真可告不朽矣！"

1925 年 2 月 10 日日記云："終日在常平站候車，看曾公日記，以勤、恕、敬三字相戒，可為規範矣。"

1926 年 3 月 8 日日記云："昨今兩日，看曾公《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端，謗毀之來，不一而足。而彼勸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訣與硬字訣，徐圖自強而已。"

曾國藩之外，蔣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胡有云："林翼至愚，當不自作聰明；亦惟林翼頗聰明，當不自用其愚。"1922 年 3 月，蔣介石讀到這段話，不禁悚然歎惜，日記云："可知我自作聰明，實為至愚之人，以後切不可自作聰明也。"①胡集中曾論及"愚公移山"、"精衛銜石"等古代寓言或神話，蔣介石讀後深有所感。日記云："因知成功之難，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收一段落，豈可心猿意馬，朝三暮四，猶豫不決，輕舉妄動，來往隨便乎！以後應不再作回家掃墓之想，吾母有靈，其亦以此為慰安乎！"②胡集書牘中云："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懸一死字於臥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則於以求生，或有生機。"蔣介石讀後特別將它們節錄下來，用以自勵。

道學著作中有《菜根譚》一書，蔣介石也很喜歡。1926 年 3 月 7 日日記云："途中看《菜根譚》，以毋憂弗逆與不為物役二語最能動心。"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19 年 10 月 23 日日記云："過去之罪惡，悔恨莫及；將來之嗜欲，奢望無窮。若不除此二者，將何以求學立業也。"
1920 年 1 月 17 日日記云："中夜自檢過失，反覆不能成寐。"①
1922 年 10 月 25 日日記云："今日仍有幾過，慎之！"②
1925 年 2 月 4 日日記云："存養省察之要，未能實行也。"
1925 年 9 月 8 日日記云："每日之事，自問有欺妄與愧怍之事否，日日以此相課。"

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是經常檢討自己的。

宋明道學家有所謂"功過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頭，畫紅圈；做了壞事，有了壞念頭，畫黑圈。蔣介石則專記自己的"過失"，較之道學家們還要嚴格。1920 年 1 月 1 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 4 月 15 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③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誇妄、頑劣、輕浮、侈誇、貪妒、吝嗇、淫荒、鬱憤、仇恨、機詐、迷惑、客氣、責智、好閥等 16 種。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錄。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蔣介石很重視日記在自己修養過程中的作用。毛思誠根據他的指示將日

記分類照抄，其中有《學行》一類，蔣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給他，"以備常覽"。④

蔣介石之所以重視個人修養，不同時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為了做"古來第一聖賢豪傑"①。五四運動爆發，蔣介石從中看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他當時在修身上對自己的要求，應是上進、自強的表現。其後，蔣介石投身國民革命，參加廣東革命根據地建設，反映出傳統道學中"民胞物與，宏濟群倫"思想對他的影響②。北伐戰爭期間，國共矛盾逐漸尖銳，蔣介石處境困難，他企圖通過修養錘煉自己，應付環境，獲取突破難關的意志和力量③。1927 年以後，蔣之地位已定，繼續修養則是為了做"國家代表"④。

戒色

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認，人有兩種天性：食與色。但是，孟子又主張，人必須遵守道德規範，否則和禽獸就沒有差別。清朝的道學家唐鑒曾經提出："不為聖賢，則為禽獸。"從蔣介石的日記裡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力圖做"聖賢"，不做"禽獸"。為此，他和自己的慾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

1919 年 2 月，蔣介石在福建曾勉勵自己："好色為自污自賤之端，戒之慎之！"⑤次月，他從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曾因"見色起意"，在日

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①不料第二天，他就在旅館中"見色心淫，狂態復萌，不能壓制矣"。不過。他當晚又檢討："介石以日看曾文正書，不能窒慾，是誠一生無上進之日矣"！他勉勵自己，在花花世界努力"砥礪德行"。②

到上海後，蔣介石與戀人介眉相會。4 月 23 日，蔣介石返閩，介眉於清晨 3 時送蔣介石上船，蔣因"船位太污，不願其送至廈門"，二人難捨難分，介眉留蔣在滬再住幾天，蔣同意，在滬住了一周。事後深自懺悔。日記云："母病兒啼，私住海上而不一省視，可乎哉？良心昧矣！"③此後的幾天內，蔣介石一面沉湎慾海，一面又力圖自拔。日記云："情思纏綿，苦難解脫，乃以觀書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轍耳，豈獨余一人哉！"④在反覆思想鬥爭後，蔣介石終於決定與介眉斷絕關係。5 月 2 日，介眉用"吳儂軟語"致函蔣介石，以終身相許，函云：

介石親阿哥呀：照倷說起來，我是只想銅鈿，弗講情義，當我禽獸一樣。倷個閒話說得脫過分哉！為仔正約弗寄撥倷，倷就要搭我斷絕往來。我個終身早已告代撥倷哉。不過少一張正約。倘然我死，亦是蔣家門裡個鬼，我活是蔣家個人。⑤

從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的身份屬於青樓女子。蔣有過和介眉辦理正式婚娶手續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訂立"正約"（婚約）。蔣批評介眉"只想銅鈿，弗講情義"，而介眉則自誓，不論死活，都是蔣家人。

蔣介石收到此信後，不為所動，決心以個人志業為重，斬斷情絲。1919年5月25日日記云："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業！"同年9月27日，蔣介石自福建回滬。舊地重遊，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記中有幾條記載：

10月1日："妓女媼客，熱情冷態，隨金錢為轉移，明昭人覷破此點，則戀愛嚼蠟矣！"①

10月2日："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②

10月5日："自有智覺以至於今，十七八年之罪惡，吾以為已無能屈指，誠所謂決東海之水無以滌吾過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轍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10月7日："無窮孽障，皆由一愛字演成。"③

上述各條，可能都是蔣介石為割斷與介眉的關係而留下的思想鬥爭記錄。從中可見，蔣介石為了擺脫情網，連佛家的"色空觀念"都動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2日的日記："潛寓季陶處，半避豺狼政府之毒焰，半避賣笑妓女之圈術。"當時，北京政府在抓捕作為革命者的蔣介石，而青樓女子介眉則在尋找"負心漢"蔣介石，迫使蔣不得不躲進戴季陶的寓所。

蔣介石謀求與介眉斷絕關係是真誠的，但是，卻並不能戒除惡習。10月15日日記云："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④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面，有下

列日記可證：

10 月 30 日："自游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慾能制，頗堪自喜。"
11 月 2 日："今日能窒慾，是一美德。"
11 月 7 日："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

可見，蔣介石的自製最初是有成績的，因此頗為自喜，然而，蔣介石終究難以羈勒心猿意馬。11 月 4 日日記云："色念屢起，幾不能制也。"同月 8 日，蔣介石到"森福家待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12 日，又在日記中寫道："一見之下，又發癡情。何癡人做不怕耶！""海外逆旅，豈有妙妓真心眷客者，先生休矣！"①

同年 11 月 19 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 月 13 日日記云："今日冬至節，且住海上繁華之地，而能不稍應酬，閒居適志，我固為難事矣，近日固不知如何為樂事也。"②12 月 31 日歲尾，蔣介石製訂次年計劃，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慾。"他將這一計劃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③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 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製與放縱的記載：

1 月 6 日："今日色念突發，如不強制切戒，乃與禽獸奚擇！"

1 月 14 日："晚，外出遊蕩，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

1 月 15 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慾之難也！"

1 月 18 日："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

1 月 25 日："途行頓起邪念。"

可見，這一個月內，蔣介石時而自制，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欲"的不斷交戰中。

第一個月如此，第二、第三個月，也仍然如此。

2 月 29 日："戒絕色慾，則《中庸》"尚不愧於屋漏"一語，亦能實行。污我、迷我、醉夢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3 月 25 日："邇日好遊蕩，何法以制之？"

3 月 27 日："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

3 月 28 日："色慾不惟鑠精，而且傷腦，客氣亦由此而起。"

3 月 30 日："邪念時起，狂態如故，客氣亦盛，奈何奈何！"

4 月 17 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 月 27 日："色念未絕，被累尚不足乎？"

7 月 2 日："抵沈家門，積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穢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棲宿。"

當年 7 月 3 日，蔣介石遇見舊友陳峻民，暢談往事，蔣自覺"舊行為人

所鄙"，因而談話中常現慚愧之色。這以後，蔣又下了決心，日記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記錄。8 月 7 日日記云："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可見，蔣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頭，因此"為眾所鄙"始終是蔣介石心頭的夢魘，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檢點。8 月 9 日日記云："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 日日記云："午後，神倦假眠，又動邪念。身子虛弱如此，尚不自愛自重乎！"①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9 月 6 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①11 月 6 日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1 年全年，蔣介石繼續處於"天理"與"人欲"的交戰中，其日記有如下記載：

1 月 18 日："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藥之。"
5 月 12 日："余之性情，邇來又漸趨輕薄矣。奈何弗戒！"
9 月 10 日："見姝心動，又怕自餒，這種心理可憐可笑。此時若不立志樹業，放棄一切私慾，將何以為人哉！"
9 月 24 日："欲立品，先戒色；欲除病，先戒欲。色慾不戒，未有能立

德、立智、立體者也。避之猶恐不及，奈何有意尋訪也！"
9 月 25 日："日日言遠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為耶？"
9 月 26 日："晚，心思不定，極想出去遊玩，以現在非行樂之時，即游亦無興趣。何不專心用功，潛研需要之科學，而乃有獲也。"
12 月 1 日："陪王海觀醫生診冶誠病。往游武嶺，頗動邪思。"
12 月 8 日："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

道學家主張，一念之萌，必須考察其是"天理"，還是"人欲"。倘是"天理"，則"敬以存之"；倘是"人欲"，則"敬以克之"。上述日記，大都屬於"敬以克之"一類。

1922 年，蔣介石繼續"狠鬥色慾一閃念"。日記有關記述僅兩見。9 月 27 日云："見色，心邪不正，記過一次。"10 月 14 日，重到上海，日記云："默誓非除惡人，不近女色，非達目的，不復回滬。今又入此試驗場矣，試一觀其成績！"次年，也只有兩次相關記載，3 月 1 日云："近日心放，色利之欲又起，戒懼乎！"6 日云："出外閒遊，心蕩不可遏。"兩年中，蔣介石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閃現，並無越軌行為，說明他的修身確有"成績"。

1925 年，蔣介石在戒色方面繼續保持良好勢態。4 月 6 日日記嚴厲自責云："蕩念殊甚，要此日記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為人乎！"11 日日記云："下午，泛艇海邊浪游，自覺失體，死生富貴之念自以為能斷絕，

獨於此關不能打破，吾以為人生最難克制者，即此一事。"這段日記寫得很含蓄，看來，蔣介石打熬不住，又有某種過失。同年 11 月 16 日晚，蔣介石參加蘇聯顧問舉行的宴會，在一批外國人面前"講述生平經過、惡劣歷史"，對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1926 年全年安靜無事，僅 11 月 21 日日記云："見可欲則心邪，軍中哀戚不遑，尚何樂趣之有！"

蔣介石的懺悔不僅見於日記，也見於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後的狀況時就自我批判說：

當時涉世不深，驕矜自肆，且狎邪自誤，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則對餘力加排斥，余乃憤而辭職東遊。至今思之，當時實不知自愛，亦不懂人情與世態之炎涼，只與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遊，故難怪知交者作冷眼觀，亦難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也。且當時驕奢淫逸，亦於此為盡。民國元年，同季回滬，以環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奮發，毀之一旦，仍未自拔也。①

膺白，指黃郛，蔣介石的把兄弟。從這份《事略》裡，可見當時蔣眾叛親離，為人所不屑的狀況。本文一題《蔣主席自述小史》，這時，蔣顯然已經成為"黨國要人"，但他不僅不隱諱早年惡跡，反而有意留下相關記載，這是極其不易的。

懲忿，對自己的暴怒常常自責、愧悔

蔣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個大毛病是動輒易怒，罵人、打人。為了革除這一惡習，蔣介石也進行了多年修養。

《易經 損卦》云："損，君子以懲忿制欲。"後來的道學家們因此將"懲忿"列為修身的重要內容，要求人們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惡語傷人及相關行為。蔣介石對此也很重視，日記云："以後修身之道，端在懲忿，其次窒慾也。"①

蔣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點。1919 年 1 月 3 日日記云："近日性極暴躁。"同月 7 日，有黃定中者來談報銷問題，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事後追悔，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驕肆殊甚，而又鄙吝貪妄，如不速改，必為人所誣害矣。戒之！戒之！"幾個月之後，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復萌，"心懷憤激，怨語謾言，不絕於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蔣介石"自覺暴戾狠蠻異甚。屢思過之而不能"，因此，寫了"息心靜氣，凝神和顏"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還曾有意閱讀道學著作，用以陶冶性情②。

然而，俗話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種弱點如果已經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頗為艱難的。1919 年 6 月 27 日，蔣介石感歎說："厲色惡聲之加人，終不能改，奈何！"7 月 29 日再次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氣"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蔣介石有

時剛剛作了自我檢討，不久就再犯。同年 8 月 5 日，蔣介石與陳其尤談話，談著談著，"忽又作忿恚狀"，蔣深自愧悔，但是當晚繼續談話時，蔣"又作不遜之言"。這使蔣極為苦惱，日記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辭安定，其惟養吾浩然之氣乎！"

除了罵人，蔣介石有時還動手。

1919 年 10 月 1 日，蔣介石訪問居正，受到人力車伕侮辱，不覺怒氣勃發。居正家人與車伕辯論，發生毆打，蔣介石見狀，忿不可遏，上前幫力，自然，蔣介石不是車伕的對手，反而吃虧。接著，又"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蔣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 1917 年在張靜江門前毆打車伕，被辱受傷一事，真是與此同一情景。當日日記云："與小人爭閒氣，竟至逞蠻角鬥，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蔣介石打車伕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更多的是打傭人。1920 年 12 月，蔣介石在船中與戴季陶閒談，戴批評蔣"性氣暴躁"，蔣聲稱"余亦自知其過而終不能改"，認為要杜絕此病，只能不帶"奴子"，躬親各種勞役。

1921 年 4 月，蔣介石因事與夫人毛氏衝突，二人"對打"，蔣介石決定與其離婚。4 日，蔣介石寫信給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縷訴與其妹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正在此時，發現毛氏尚未出門，又將毛氏"咒詛"一通。當日，蔣在日記中自責說："吾之罪戾上通於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以後對母親及家庭間，總須不出惡聲。無論對內對外，憤慨無似之

際，不伸手毆人，誓守之終身，以贖昨日餘孽也。"然而，自責歸自責，蔣介石仍然時發暴性。見之於日記者有下列記載，試為分類：

（一）打罵傭人、侍衛、下級：

1921 年 4 月 7 日："叱嚇下人，暴性又發，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記過一次。"

1925 年 2 月 21 日："自誤飲水，遷怒下人，逞蠻毆打，尚有人道乎！記過一次。"

1925 年 2 月 22 日："吾勉為莊敬寬和，以藥輕浮暴戾之病，則德可進，世可處也。叫人不應，有頃始至，又逞蠻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謂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 年 3 月 4 日："肆口漫罵，自失體統，幾不成其為長官，記大過一次。"

1925 年 10 月 5 日："昨夜十時到黃埔，閽者弛臥，鼾聲達門外，久叫始應，又動手打人。記大過一次。"

1925 年 10 月 11 日："為傭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將奈之何！""暴戾極矣，動手打人，記大過三次。"

1926 年 1 月 5 日："腦脹耳鳴，心煩慮亂，對傭人時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終身痼疾矣！"

（二）辱罵同事、同僚：

1921 年 10 月 22 日："慶華、穎甫先後就談，又發暴性，犯不著也。"
1922 年 2 月 25 日："下午，回八桂廳，對禮卿發脾氣，自知形態不雅。"
1926 年 1 月 13 日："茂如來會，以其心術不正，敗壞校風，憤恨之餘，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 年 8 月 1 日："動手打人，蠻狠自逞，毫無耐力，甚至誤毆幕友，暴行至此極矣！"

（三）對像不明：

1925 年 3 月 3 日："欲為蓋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學養。近日常多很（狠）厲憤狷，而無靜默沉雄氣象，其何以幾及之也？"
1925 年 3 月 5 日："昨夜罵人太甚，幾使夢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長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惡態，尚何學養可言乎！"
1925 年 10 月 7 日："今日暴性勃發，幾視國人皆為可殺。"

以上三種情況中，不論哪一種，蔣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對，因此事後對自己也多所責備。他也曾設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罵人，手不打人，言不憤激，氣不囂張"。又立誓作到"四定"，即"體定、心定、氣定、神定"。還曾提出"三要"，即"謹言、修容、靜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蠻，幾乎成為他的終身"痼疾"。

戒客氣，警惕虛驕

蔣介石日記中常見"戒客氣"的記載。所謂客氣，指的是一種虛驕之氣。《宋書 顏延之傳》稱："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悔。"因此，宋明時代的道學家們也將"戒客氣"作為修養要求。

根據現有資料，蔣介石批評自己的虛驕之氣始於 1919 年。當年 2 月 4 日，蔣介石出席許崇智的晚宴，席間，蔣介石"客氣與虛榮心並起，妄談孫先生事"，當日即懊悔無已，在日記中自責，認為自己的言談"不覺自暴其誇鄙，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難得，檢討原因，認為自己"常有驕矜暴戾之色，盛氣凌人之事"，不能"虛心包容"，所以有才之人不樂為己所用。①

此後，蔣介石即將"客氣"作為自己修養中的大敵之一，稱之為"凶德"。1919 年 9 月 9 日日記云："言多客氣，為人所鄙，良用慚咎。謹其言，慎其行，自強其志，不徇外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 11 月 24 日日記云："近日思想漸趨平實，欲改就社會上做一番事業，奈私利心、野心、客氣終不能消除何！"

蔣介石認為："客氣"的表現之一是"言語輕肆，舉動浮躁"，針鋒相對地提出："我守我拙，言語遲鈍。"①表現之二是是氣質漲浮，行為佻達，說話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無言，能言不如不能言。

日記稱："人之是非好惡，已之愛憎取捨，默會於心，斯得之矣，何以言為哉！"

1923 年 7 月 16 日，蔣介石清晨醒來，自省差誤，認為自己"為人所嫌棄者乃在戲語太多，為人所妒忌者，乃在驕氣太甚，而其病根皆起於輕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後要"謹然自持，謙和接物"。他表示："寧為人笑我道學，而不願人目我為狂且也。"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們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從中滾脫出來。南宋淳熙八年（1181 年），陸九淵到朱熹的白鹿洞書院講學。陸的講題是《論語》中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二語。他說："今人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朱熹對他的這段講詞非常欣賞，認為"切中學者深微隱痼之病"。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 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慾祛私，含垢明恥"，明確地要求自己"寡慾"。6 月 24 日日記云："今日餒怯有餘，謹慎不足，終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於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蔣介石這裡所說的"敬"，指的是敬於所事；"澹"，指的是"澹"於所欲。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放在首位，而不岌岌於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 1920 年 2 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可以充滿慾望，慾望足以敗壞各種事業，不先建立各種事業，而務謀饜足慾望，是捨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慾"，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潔。1921 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 9 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行軍務，蔣乘機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鬥爭劇烈，日記云："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並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勝貪字，此心超然於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餘地乎！"1923 年 7 月，蔣日記有云："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於上海的十里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 年歲末。蔣介石檢點賬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譜，頓覺驚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 年 4 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同年 5 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

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們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於"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在道學家的修養要求裡，寡慾，不只是寡於物質生活，也包括求名一類精神生活內容。在這一方面，蔣早年對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 年 1 月 22 日日記云："好名之念太重，一聞蜚語，即覺自餒，是不能以革命主義為中心，而以浮世毀譽為轉轂，豈得謂知本者乎！"

尊"誠"，重視形貌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範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後來被視為道德修養的準則和境界。《禮記 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將"誠"視為天的根本屬性，要求人們努力求誠。在《中庸》有關思想的基礎上,《大學》進一步將"誠意"作為治國、齊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後，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聖人之本",要求人們經過"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後,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誠、尚誠。1922 年 11 月 20 日日記云："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這裡，"誠"被蔣介石視作一種馭下之道。1923 年 5 月 4 日日記云："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

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這裡，"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1924 年 5 月 3 日日記云："機心未絕，足墮信義與人格。"這裡，"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準則。

道學們不僅提出了諸多內心修養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體外貌方面也有許多規範。朱熹寫過一篇《敬齋箴》，要求人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在這方面，蔣介石也是身體力行者。1925 年 2 月 11 日日記云："蒞團部時履不正，為屬下窺見，陡覺慚汗。"近年來出現若干影視作品，其中的蔣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這是符合蔣的性格的。

中世紀的修養方法

道學形成於宋明時代，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也是中國儒學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其總體作用在於將傳統的儒學倫理規範哲學化，以便進一步強化其教化作用，藉以整飭人心，調節社會矛盾，鞏固既定社會秩序。但是，其中，也包含著若干合理因素。

蔣介石少年頑劣，時代的激流將他推進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學日本，歸國革命，追隨孫中山。這樣，蔣介石早年就具備了兩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兩種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長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長過程中，道學曾促使他勵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性。但是，這也使他比較拘守傳統文化。

原載台北《傳記文學》2001 年 5 月號

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蘇聯之行

一　早蓄游俄願

俄國十月革命引起世界列強的恐慌與敵視。美、英、法、日等國首先選定在俄國遠東、西伯利亞等地區發動進攻。4 月 5 日，日軍在海參崴登陸。繼之，謝苗諾夫、鄧尼金等紛紛起兵，攻城掠地，成立政府。蔣介石很早就關心俄國革命。1918 年 7 月 24 日，蔣介石日記云：

西比利亞霍爾瓦斯政府與海參崴政府兩相分離，皆為日本所利用，而置國家於不問， 其不步中國之後塵者幾稀矣！[1]

從上引日記可以看出，蔣介石指斥那些投靠日本的白衛軍頭目，認為他們將走上與中國軍閥同樣的賣國道路。1919 年 11 月，蔣介石在遊歷日本期間，得悉反蘇維埃力量所組織的「西伯利亞政府」被迫遷離鄂木斯克，攻擊彼得格勒的白衛軍也已被擊退。他高興地在日記中記下這一消息，並且寫了一句：「利寧（列寧）政府之地位，為此更加鞏固矣！」[2]隨後他寫了一篇題為《列國政府對付俄國勞農政府的手段如何》的稿子，投寄在上海出版的《星期評論》2 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不過，蔣的這一嘗試並不成功，文章未被刊出。11 月 15 日，他從神戶乘輪迴國，在船上閱讀《俄國革命記》，在日記中寫下「想望靡已」4 字。[3]

蔣介石原來羨慕歐美，這一年夏天，還曾有過「籌措費用，遊歷歐美三年」以及「先赴法國，遊歷世界」的想法，不過，很快他就決定遊歷俄國，為此下工夫學習俄文。11 月 27 日，蔣介石日記中開始出現「究俄文」三字。次日，出現「上午，往讀俄文；下午，習俄文」的記載。當時，孫中山也已在觀察和研究俄國的革命道路，決定派人赴俄留學，特別請了一位俄國教師在廖仲愷家裡為革命黨人上俄語課。蔣介石「往讀」的地方應該就是廖宅。蔣介石學俄文堅持了好幾年，一直到 1923 年底，他的日記不斷有類似記載出現。其間，朱執信還為蔣介石講過一次俄語。[4]

1919 年 12 月 3 日，蔣介石日記云：「復滄白信，研究俄國事情。」滄白，指楊庶堪，四川巴縣人。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重慶起義的領導人。1918 年被孫中山任命為四川省省長。蔣介石在與楊恕堪通信，「研究俄國事情」之後，1920 年 1 月 9 日日記又云：「下午往□□生處議事，命我以代表名義赴□。」很可能這是孫中山派遣蔣介石訪問俄國的最早記載，可惜由於日記字跡漫漶，不能確定。1920 年 3 月 14 日，蔣介石萌生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日記云：「革命當不分國界，世界各國如有一國革命能真正成功，則其餘當可迎刃而解。故中國人不必要在中國革命，亦不必望中國革命先成功。只要此志不懈，則必有成功之一日，當先助其革命成功能最速之國而先革之也。」4 天以後，戴季陶到蔣介石處，商議赴俄。蔣介石思考之後，覺得廣東局面不佳，赴粵只能「為人作嫁」，「不如往俄，自練志識」。[5] 幾天之後，這種想法更加熾烈，日記云：「近日看得國事皆非國內所可解決，極思離國他行。」[6]5 月 26 日晚，

蔣介石邀約戴季陶、朱執信、廖仲愷到住處來一起商量，擬於 1 月內啟程，蔣介石和戴季陶各出三千元作為旅費。不過，蔣介石不久即遵孫中山之命，赴福建漳州指揮作戰。7 月 19 日，蔣介石再生赴俄之想。同年 9 月，俄羅斯共產黨阿穆爾省中國支部書記劉謙到上海會見孫中山，建議聯合中俄革命力量，在新疆集中兵力，打倒中國北方的反動政府。孫中山決定派大元帥府參軍李章達使俄，蔣介石同行。22 日，孫中山打電話給蔣介石，以俄國、四川、廣東三地，讓蔣介石選擇。蔣覺得：去廣東,「則公益大而個人損失不小」；去俄國,「同行者非知交，暫不能行」。[7]蔣選擇去四川，但最後聽廖仲愷的話，去了廣州。

1921 年 1 月 1 日，蔣介石預定當年應做之事 4 項：其中第一項即是「學俄語，想到俄國去視察一回，實在做一些事業」。最後一項則是到北京去,「研究北京社會的內容，偵察北京附近的地形。還要藉著議員的名義，結交幾個新朋友，或者就在北京組織一個新學社，團結狠好同志，否則如有機會，即可以借議員的名義，到俄國去視察一回。」[8]從上述日記可見，蔣介石夢繞魂牽的還是想去俄國考察。

1922 年 9 月,蘇俄代表越飛的軍事隨員格克爾將軍到滬,與孫中山會談。孫中山於 8 月 30 日致函蔣介石，要他從溪口趕來上海，參加會談。9 月 10 日，蔣介石到上海，但第二天就離滬還鄉。12 日，孫中山再次致函蔣介石，要他到上海住十天，詳籌種種。9 月 21 日蔣介石的日記中出現下列 8 個字：「往俄無害，往贛有利。」不過，一直到 10 月 3 日，蔣介石才帶著蔣緯國再次來滬，直奔孫府,「談時局」。他是否與格克爾見過

面，日記中沒有留下任何訊息。

機會終於來了，出任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

1923 年，機會終於來了。

孫中山一直在努力和蘇俄聯繫，爭取蘇俄支持。1922 年 11 月 21 日，孫中山致函蔣介石稱，肯定他的訪蘇之願。函稱：「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9]12 月，孫中山寫信給列寧，告訴他，「本人擬派遣全權代表於近期往莫斯科，與你和其他同志磋商合作事宜，以裨俄中兩國的合法利益」。[10]同月，孫中山寫信給蘇俄代表越飛，聲稱自己可以調動大約 1 萬人從四川經過甘肅到內蒙古去。控制位於北京西北的進攻路線。他詢問越飛：「貴國政府能否通過庫侖支援我？」[11]同年年底，俄羅斯與烏克蘭等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1923 年年 1 月，孫中山和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孫中山要求蘇俄給予 200 萬金盧布的援助，同時表示願意派遣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5 月 1 日，越飛自日本東京轉給孫中山一封蘇聯政府的電報，同意提供 200 萬金盧布，並且宣稱，準備提供軍事物資，幫助孫中山在中國北部和西部建立作戰單位，開辦軍校。12 日，孫中山復電越飛，感謝蘇俄的慷慨援助，表示將派代表去莫斯科磋商。[12]5 月 10 日晚，孫中山設宴招待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蔣介石應邀作陪，「研究一切」。12 日，蔣介石日記有「商議赴歐事宜」一語，可見，在孫中山的「聯俄」

計劃裡，蔣介石佔有愈來愈重要的位置。不過，孫中山當時想親自訪問莫斯科。6 月 17 日，孫中山任命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但蔣介石因對許崇智及西南各軍不滿，覺得廣東事無可為，於 7 月 12 日，向孫中山辭職返滬。

7 月 13 日，蔣介石在香港致函時任孫中山大本營秘書長的楊庶堪，自述性格特點，說明「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遠離中國社會，在軍事上獨當一方，便宜行事，而無人干預其間，則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函稱：「為今之計，捨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13]

此後，蔣介石日記陸續出現下列記載：

7 月 23 日：「接季新（汪精衛）轉來（廖）仲愷電。」
7 月 24 日：「復季新函。」
7 月 26 日：「上午，往訪季新、煥廷（林業明）兄，決定赴俄之議，於個人設想，則心甚安樂也。」

廖仲愷電今尚未見，顯然，其內容應為通知蔣介石使俄一事。至 7 月 26 日，蔣介石和汪精衛以及國民黨本部財務部長林業明商量之後，「赴俄之議」就定下來了。多年宿願，即將實現，蔣介石非常高興。這以後，進入籌備階段。蔣介石忙著找人商量，物色成員，閱讀資料，其日記載：

7 月 27 日：「往訪煥廷，致仲愷電。」

7 月 28 日：「晚季新、溥泉（張繼）諸兄來，商赴歐事。」

7 月 30 日：「下午，劍侯（沈定一）、季新、仲輝（邵力子）、煥廷諸同志來談，共宴於小有天。」

7 月 31 日：「上午與玄廬（沈定一）談天，下午看《新疆遊記》。」

8 月 5 日：「晚，約會馬林及各同志，商決赴俄事。」

馬林是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1921 年初由共產國際派來中國，推動組織中國共產黨，促進國共合作。蔣介石在和馬林等商量之後，組織孫逸仙代表團一事最後定案。蔣介石任團長，成員為：

沈定一，浙江蕭山人。中國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後曾任浙江省議會議長。1920 年參與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早期黨員，但不久即脫黨。

張太雷，江蘇常州人。代表團中的唯一中共黨員。1921 年在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書記，時任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

邵元沖，浙江紹興人。中國同盟會會員，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機要秘書。1919 年留學美國，後受孫中山之命，考察國民黨海外組織。

王登雲，陝西醴泉人。美國留學生，曾任舊金山華文報紙主筆，代表團的英文秘書。瞿秋白視之為「無賴」。中共方面曾企圖阻止王登雲參加代表團，未能成功。

次日，蔣介石會見汪精衛。同日，瞿秋白、張太雷來訪，「詳談一切」。下午，蔣介石趕製軍服。三時後，乘船回鄉。到溪口後，整書檢衣，預備啟程。蔣介石自稱其心情悲喜參半。喜的是符合自己盡快脫離「中國污穢社會」，根本解決國事的心願，「前程發軔有望」，悲的是「吾黨在國內缺少人才，苦我黨魁，且對兒女不免戀愛也。」[14]

8 月 14 日，蔣介石回到上海，會見林業明和王登雲。其後，蔣介石忙著量衣、照相、看牙。15 日一早，蔣介石寫信向廖仲愷報告，又給交易所同事周駿彥、夫人毛氏的二兄毛懋卿等人寫信，拜託各事。其後，又訪問張太雷和瞿秋白。當晚，汪精衛設宴踐行。午夜，沈定一從紹興匆匆趕來。

快要遠行了，蔣介石面對經國、緯國兩個兒子，自感時有依戀不捨之心，有時甚至背著人流淚，彷彿十二三歲時離開母親出外讀書時一樣。蔣介石對自己的這種心情也有點奇怪。

起行赴俄，心繫緯國

8 月 16 日是預定出發的日子，蔣介石 6 時起床，首先給許崇智、楊庶堪、胡漢民、廖仲愷及姚冶誠等人寫信，然後外出拜會汪精衛、張靜江、邵力子諸人。回時已是正午，經國、緯國及陳果夫、陳潔如都到蔣介石的

住處大東旅社送行。1 時 15 分，蔣介石、沈定一、張太雷、王登雲一行四人登上日輪木神丸。邵元沖當時在歐洲，準備從那裡直接赴俄。2 時正，輪船啟碇。緯國雖不是蔣介石親生，但最受寵愛。蔣介石在船上聽到小兒的聲音，就以為緯國在喊父親，夢中都會驚醒。18 日，船抵青島。入口時，雨霧連連，山色不青，但見港灣污穢，秩序紊亂，除少數苦力外，並不見有一警察及港吏，像似無人管理的自由港。1922 年，王正廷代表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涉，收回青島，出任青島商埠督辦，被北京政府視為外交重大勝利。如今蔣介石看到其成績不過如斯，徒負虛名，擔心將來收回其他租界時發生困難，深覺可歎。

在船上，蔣介石除寫信，想念緯國外，大部分時間用於閱讀、抄錄《蒙古地誌》，為赴蘇後的談判作準備。19 日，船抵大連。上岸後，發覺街道頗似日本的橫濱。華人在大連約 7 萬人，一切訴訟均聽命日人，連會審公堂都沒有。整個「關東州」，不能設立一座中國學校，不能派一中國官吏，連租界都比不上。蔣介石覺得「言之可歎，思之傷心，莫甚於此」。[15]當日 10 時，換乘火車。20 日到長春。一路 7 百里，所見所聞，皆是日本勢力，好像進入日本國境一樣。21 日到哈爾濱。24 日，由哈爾濱搭車赴莫斯科。25 日，到達中俄交界地滿洲裡。當地居民約有千家，華俄雜處，市況蕭條。蔣介石等一行由俄方代表迎接，換乘汽車過境。所謂國界，不過是一條延長的土塍而已，雙方皆無人監視，可以自由進出。45 分鐘後，到達孟邱夫斯克，重上火車。

8 月 26 日，車抵赤塔。一路山明水秀，森林濃郁，蔣介石想不到西伯利

亞居然有此佳景。27 日，車抵上烏金斯克。蔣介石眺望風景，觀察形勢，覺得地形類似中國南方的山河。他南望蒙古，覺得從此離國日遠，頗有「不勝依依」之感。27 日，車過貝加爾湖，一望無際，風濤如海，被蔣介石視為「佳景」。29 日之後，道路住宅，漸漸整齊，有點歐洲景色了。

曾經和孫中山共同發表宣言的蘇俄代表越飛也在這列車上，由於病重，蔣介石等未能與之相敘。

抵達莫斯科，稱蘇聯共產黨是「姐妹黨」

9 月 2 日下午 1 時，蔣介石等一行經過長途旅行之後，抵達莫斯科車站，隨即乘汽車前往招待所。當日，正值莫斯科召開群眾大會，22 萬遊行群眾高舉紅旗前往會場，街道上到處擠滿了人群。蔣介石從未見過如此盛大而沸騰的場面，心情也跟著高昂起來，視為生平一大快事。第二天，蔣介石等拜會外交人民委員部東方部部長，會談一小時，商量會見蘇聯人民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日期。蔣介石對會談和受到的接待很滿意，日記云：「相見時頗誠懇，皆以同志資格談話，尚未有失言過語之辭，私心亦安。」[16]9 月 5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蔣介石等會見契切林，談話一時半，由沈定一擔任記錄。蔣介石覺得契切林「語頗誠摯」，自己的談話也很「適中」，「無失當之處」，彼此都覺得「甚為投機」[17]。當天蔣介石就致電汪精衛和林業明，向孫中山報告。

9 月 7 日，蔣介石等會見俄共（布）中央書記魯祖塔克。

「我們是被派到莫斯科來的國民黨代表，來這裡的目的主要是要瞭解以其中央委員會為代表的俄國共產黨，聽取對我們在中國南方的工作的一些建議，並互相通報情況。」蔣稱。

「我受俄共中央委託，歡迎代表團來訪。國民黨按其精神與俄共（布）非常接近。此外，還有另一些重要情況使中國的勞動群眾同蘇聯接近。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兩國人民都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蘇聯的領土有幾千俄裡與中國的邊界毗連，因此蘇聯人民同中國勞動人民發生聯繫是很自然的。遺憾的是，中蘇兩國勞動人民之間沒有任何接觸，這有礙於加強這種自然的聯繫。代表團的到來是向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魯祖塔克回答。

魯祖塔克的話使蔣介石聽來倍感舒服，他以更為熱情的話語回報魯祖塔克：

「國民黨一向認為，蘇聯共產黨是自己的姐妹黨。今天，代表團希望聽到對俄國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階段、對革命時期所犯的錯誤以及對共產黨在革命進程中的作用和意義的簡單介紹，因為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可能對國民黨在中國的工作很有教益。」

魯祖塔克樂於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他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談到了

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原因，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發展工業和組建紅軍等多方面的問題。蔣介石很重視，當日日記稱:「其革命成功之點：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農人要求共產；三、准俄國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聯邦制。其革命缺點：一、工廠充公後無人管理；二、集中主義過甚，

小工廠不應同樣歸國有；三、分配困難。」對魯祖塔克所談到的俄國當時建設情形，蔣介石記錄稱：一、兒童教育周密；二、工人皆施軍隊教育；三、小工廠租給私人。除了在日記中記下的魯祖塔克的言論大綱外，蔣介石還表示:「詳言另錄」，可見他此次談話的重視。

魯祖塔克向蔣介石等介紹了俄國革命的成功之點與缺點外，提議國民黨代表團和共產國際代表組成專門委員會，討論一些細節問題，並且協調國民黨同俄共中央的行動。魯祖塔克提議，為了雙方的利益，最好有一名國民黨代表常駐莫斯科。蔣介石對魯祖塔克的「盛情的同志式接待」和所介紹的俄國情況表示感謝，聲稱不反對成立委員會和國民黨代表常駐莫斯科。談話至此結束。[18] 當天下午，蔣介石等拜會共產國際東方局局長吳廷康（維經斯基）。這是位「中國通」，1920 年被派到中國，推動組織中國共產黨，與李大釗、孫中山都有交往。

會見紅軍高級領導人，暢談進軍北京計劃

9 月 9 日 ，蔣介石等再次訪問吳廷康。下午 3 時，訪問蘇聯革命軍事委

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等。此前，孫中山任命的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譚延闓一度佔領湖南省會長沙，因此，斯克良斯基首先向代表團祝賀，說：「為國民黨而高興，因為我們將國民黨視為戰友。」在互相問候之後，蔣介石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幾項要求：

1、俄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盡量向中國南方多派人，去按紅軍的模式訓練中國軍隊。
2、向孫逸仙代表團提供瞭解紅軍的機會。
3、共同討論中國的軍事作戰計劃。

斯克良斯基答覆說：已經向中國南方派去了一些人，需要等一等，看南方軍隊怎樣使用已經抵達的同志。俄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並沒有多少瞭解中國並且懂得漢語的幹部，不可能向中國南方派出大量軍事指揮員。他表示，因為有大約 30 名中國人在俄國東方民族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在俄國為中國人成立專門的軍事學校。經過交換意見，雙方迅速達成協議：在俄國境內為中國人建立兩所軍事學校：一所高級學校，培養懂俄語的指揮員（不低於營級，）30 人。校址設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一所是中級軍校，建在靠近中國的地方，海參崴，或伊爾庫茨克，500 人。關於代表團瞭解紅軍問題，斯克良斯基表示完全可以接受。

談到軍事作戰計劃，蔣介石聲稱：代表團擁有孫逸仙授予的全權。他介紹說：孫逸仙幾乎沒有任何軍事工業，香港距離廣州只有 40 里，英國

人阻止向廣州運輸軍事物資，因此，南方軍隊長期裝備不足。而且，香港對孫逸仙軍隊的後方構成嚴重威脅，一旦南方軍隊向北挺進，英國人就會收買附近幾個省的軍隊在後方暴動。此外，外國人在長江流域擁有大型內河艦隊，南方軍隊一接近這個地區，英國和美國的炮艦就會立刻阻止。外國人絕對不會允許南方軍隊打敗吳佩孚。因此，南方軍隊的總參謀部和國民黨的代表團在動身來莫斯科前夕決定，將戰場轉移到中國的西北地區。這是孫中山派出代表團的目的。

蔣介石接著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介紹中國的軍事形勢以及孫中山和吳佩孚的力量對比。他建議：「在庫倫以南鄰近蒙中邊境地區建立一支孫逸仙的新軍。由招募來的居住在蒙古、滿洲和中國交界地區的中國人，以及由滿洲西部招募來的一部分中國人組成。在這裡按照紅軍的模式組建軍隊。從這裡，也就是從蒙古南部發起第二縱隊的進攻。[19]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聽完蔣介石的說明，建議蔣介石用書面形勢闡明這項計劃。這次會談進行到當晚七時，持續三個多小時。蔣介石覺得斯克良斯基「和藹可親」，參謀長克姆熱夫也熱心幫助中國。他在日記中寫道：「俄國人民無論上下大小，比我國人民誠實懇切，令人欣慕，此點各國所不及也，其立國基礎亦本於此乎！」[20]

從 9 月 10 日起，蔣介石開始在招待所起草「作戰計劃」。11 日下午，蔣介石和蘇聯軍事學校管理總部主任彼得羅夫斯基敘談一小時，彼得答應向代表團提供各種學校教材，同時向代表團詳細介紹俄國軍隊中政治委

員制度和共產黨組織狀況：每個團部都由黨部派一政治委員常駐，參與團中主要任務；凡有命令，均須經其簽署才能有效；團裡的共產黨員，不論士兵或將校，在團的活動中擔當主幹，凡有困難勤務，皆由其黨組織負責人擔任。12 日上午，蔣介石寫完「作戰計劃」，加進可能是由沈定一起草的「宣傳計劃」，總名為《中國革命的新前景》。13 日，開始起草《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14 日寫成。

《中國革命的新前景》與《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

《中國革命的新前景》與《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是蔣介石親自起草的兩份文件。

《中國革命的新前景》共 18 個部分。在《緒論》部分，蔣介石表示：「中國人民不但飽嘗中國國內軍閥暴政的痛苦，並且還備受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已經下決心要使中國完全徹底革命化，並且實行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1、各民族獨立自由；2、人民自由行使各項政治權利；3、大工業國有化。接著，蔣介石開宗明義地提出：

從軍事觀點看，我們暫時還不能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內，在中國東南地區奠 定永久的基礎，所以，我們希望在靠近俄國友邦邊境的中國西北地區找一個適當地方，作為我們實行革命計劃，與中國軍閥和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戰鬥的軍事基地。[21]

還在 1921 年 1 月，蔣介石就曾上書孫中山等人，建議「當以西北為第一根據地」。[22]至《中國革命的新前景》，蔣就作了更充分、明確的闡述。《緒論》以下為《中國目前形勢》、《敵人》、《軍事行動目標》等部分，蔣介石稱：「中國的軍閥和由他們組成的北平政府已經向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徹底投降。」「他們正在進行同國民黨截然相反的活動，因為後者不讓他們毀滅中國，正在全力以赴進行公開的秘密反對他們的鬥爭。」「中國的內戰看起來是內部事務，實際上是國民黨和外國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的戰爭。」蔣介石接著說明國民黨和中國軍閥之間的實力對比，提出國民黨的敵人是直系軍閥，其主義是「做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赤裸裸的傀儡」，其領袖是曹錕和吳佩孚。蔣稱：當時有包括奉系和「安福系」在內的十多省正在計劃反對曹、吳，學生和工人的運動，平漢鐵路工人的罷工，已經戳穿吳佩孚的愛國主義口號，中國人民都非常支持孫博士關於成立「工人隊」的意見。國民黨的最後目標是北平。

第五部分為《兩個擬議中的軍事基地》。第一個在蒙古庫侖，第二個在新疆的烏魯木齊。蔣介石從軍事根據地和軍事目標之間的距離、地理位置、行軍時間、國際關係、戰略等方面將兩者作了詳細比較，認為庫侖比烏魯木齊具有「更多的優越性」。蔣介石建議，在庫侖，從平漢鐵路招募工人和從災區招募農民，以年輕、有覺悟的中國人做軍官，用紅軍的名義進行訓練，兩年以後開始進攻。但是，蔣介石又建議，用烏魯木齊作永久根據地，同俄國合作，幫助東方其他被壓迫民族進行反對資本

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他說:「我主張在這兩個地區同時建立軍隊，在庫侖建立主力部隊，在烏魯木齊建立增援團隊。」

第六部分為《中國的自然特點和它的交通情況》。以下依次為《敵人的兵力》《敵人如何部署部隊》、《敵人內部情況》、《國民黨的兵力》、《國民黨軍隊情況》、《國民黨和它的敵人的軍事供應及其財政狀況》、《用庫侖做根據地和以北平為目標的軍事準備時間》、《進軍的西翼》、、《軍事行動階段》、《擬議中的軍事編製和兵力》、《軍事預算》、《各種籌備組織工作》。

軍事計劃之外，可能由沈定一起草的「宣傳計劃」全名《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方案》，共 10 條。提出建立上海大學，在上海建立大型出版社、更多的通訊社、擴大上海《民國日報》，在廣州和北平創辦兩種大型報紙，出版一種月刊和一種週刊，成立一個委員會，出版各種不定期的小冊子等。最後提出，《方案》將在聯席會議上討論。

在《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中，蔣介石對比中俄兩國革命，一個「將陷於絕境」，一個「收效之速，一日千里」，自感有愧於心。《意見書》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認為其原因在於黨魁「注全力於外交與政黨」，未能直接掌握軍事。蔣稱：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在於革命軍佔領彼得格勒這一政治中心，並且固守不失。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在於未能「直搗北京」，反將全國的政治中心袖手讓與袁世凱，以致中外結合，使北京成為惡勢力中心，根深蒂固。蔣表示:「為今之計，中國革

命之法，唯有軍事與宣傳雙方工作，同時並進。以實力為剷除現在惡勢力之張本，而以宣傳事業作主義上之根本培養。」蔣介石批評南方的「革命軍隊」已經沒有革命精神，只在「借革命名義以謀其私人之權利」。他提出：「中國惡勢力之根據地，反革命派之大本營以及其一切內亂與外侮之策源地，皆在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如望中國革命之奏效，非先打破此萬惡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則革命絕無成功之望。」蔣介石並且認為，要「對列強作戰，打破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亦非打破北京不為功」。[23]

《意見書》中，蔣介石還聲稱，無論內亂與外侮之壓力如何強暴，中國革命黨決不當調和派，也決不代表資本階級，革命精神始終如一，只要變更方法，改善環境，三年之內，必有成效可睹。

蔣介石將這兩份文件起草完成後，略感輕鬆。不過，他沒有就此定稿，一直在修改中。

根據魯祖達克的建議，沈定一於 9 月 15 日起草「兩黨聯結文稿」，並且擬於下星期二成立有國民黨代表團和共產國際代表組成的專門委員會。16 日，沈定一完成「草約」，蔣介石 又忙著和沈一起研究「條文」。[24]

被熱情的紅軍士兵抬了起來，批評外交人員「下流無賴」

9 月 16 日，俄國陸軍學校學生舉行畢業典禮，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加裡寧及紅軍各領導人都出席並發表演說。下午，蔣介石等應邀參加，受到與其他各國出席人員不同的特別招待，使蔣介石等頗感自豪。17 日，參觀步兵第 144 團。事先，軍事院校管理總局秘書盧果夫斯基向莫斯科軍區司令穆拉托夫等人打好招呼，指示說：有中國共青團團員來訪，舉行歡迎儀式，訪問盡量秘密進行。蔣介石本來是準備穿上全套軍服的，結果，接受俄國人建議，改穿便服。當時，這個團剛剛演習歸來，營房還在修繕，生活尚未進入正軌。蔣介石等參觀了連隊、營房、紅角、號令、修理部、醫務室、俱樂部、圖書室、機槍小隊、廚房、麵包房、俄共支部，而且品嚐了紅軍戰士的食品，瞭解了每週的食譜。不過俄國人對蔣介石等還是有點警惕，沒有讓他們參觀武器庫。盧果夫斯基在向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書面匯報時，特別聲明：「我也沒有介紹特別秘密的資料」。[25]

在有 400 名紅軍士兵出席的大會上，蔣介石發表演說，首先稱讚「紅軍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強大的軍隊」，他接著說：

紅軍戰士和指揮員們！，你們戰勝了你們國內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但你們還沒有消滅世界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你們要準備同他們決戰，因為你們要在其他民族的幫助下完成這一事業。請記住，每一個戰士的義務就是犧牲。要時刻準備為你們的事業去犧牲，這就是勝利的保證。 我們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國民黨黨員，我們是軍人，我們是戰士，

我們也準備在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犧牲。

蔣介石表示：「我們來這裡學習並與你們聯合起來。當我們回到中國人民那裡時，要激發他們的戰鬥力，戰勝中國北方的軍事勢力。」[26]

蔣介石的講話不時被經久不息的掌聲和高昂的《國際歌》樂聲打斷。講話結束時，與會者高喊「烏拉」。蔣介石情緒激動。據俄國人記述：「看來，他講話時充滿著強烈而誠摯的感情。他在結束講話時幾乎是在吼，他的雙手在顫抖。」離開軍營時，蔣介石等被紅軍戰士抬起來，輕輕搖擺，一直抬到汽車前。上車後，蔣介石等仍然非常激動，不斷讚美紅軍戰士的「精神」和「熱情」，認為這是他們在其他任何一支軍隊中都沒有見過的。蔣告訴全程陪同的盧果夫斯基說：「印象非常好。他為紅軍的『精神』所感動。他們所有人——指揮員和戰士——並不是首長與部下，而像是農民兄弟。」[27]

蔣介石在參觀紅軍第 144 團的表現並不是故意造作。當日，他在日記中有同樣的記載：「其軍紀及整理雖不及日本昔日軍隊，然其上下親愛，出於自然，毫無專制氣象。」對於紅軍中的「雙首長制」，即司令員之外，還有一位黨代表，蔣介石也感覺不錯，認為兩者之間分工恰當，「亦無權限之見」。「大約軍事指揮上事務皆歸團長，而政治及智識上事皆歸政黨代表，尤其是精神講話及平時除軍事外之事務，皆歸代表也。」[28]

9 月 19 日，蔣介石等參觀步兵第二學校。20 日，參觀研究毒氣的軍用

化學學校。22 日，參觀高級射擊學校，看到了十五世紀以來的各種槍支，共約數百種，其中俄造騎兵用機關手槍，可連發三十五響，輕便非常，給了蔣介石很深印象。他在日記中慨歎道：「俄國武器之研究及進步可與歐美各國相等，不比我國之腐敗也。」

初到莫斯科，受到熱情接待，蔣介石的印象是好的，只是覺得物價高。9 月 8 日晚，蔣介石等往前皇家劇院觀劇，聽說正廳票價每人約需五個金盧布，感到莫斯科生活程度不低！14 日，蔣介石外出買鞋，定價九十金盧布，蔣介石驚詫地叫起來：「太貴了！」不過，蔣介石對這些均覺得無所謂，並不十分在意。使他在意的是蘇聯政府工作人員的態度。

9 月 23 日，代表團中唯一的共產黨員張太雷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發生爭論，蔣介石為張太雷幫腔。事後悶悶不樂，認為「其部員之下流無賴，實使人討嫌」。[29]24 日，蔣介石仍不能釋懷，日記云：為外交部員無禮怠慢，使人嫌惡，幾欲回國。余之性質，實太狹褊，不能放寬，奈何！」蔣介石早年性格的特點是任性。前些年在孫中山、陳炯明手下工作的時候，常常因與人不合，立刻甩手走人，辭職不幹。這次雖因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不敬，萌生回國念頭，但是，這畢竟是在外交場合，他還是忍住了。

參觀彼得格勒等地，為市況蕭條及海軍士氣擔憂

9 月 25 日晚 9 時，蔣介石等一行乘火車前往彼得格勒等地參觀。

9 月 26 日下午，參觀冬宮。先參觀博物館，收藏以瓷器、圖畫為多，宮殿的牆壁、柱子，均用紅、白、綠三種大理石為原料。其後參觀冬宮的覲見廳、寢室、書房、餐廳、浴室、會議廳、禮堂等處，或稱為金間，或稱為銀間，或稱為翡翠間，給蔣介石的印象是「鋪陳華麗」。不過，其中最吸引引起蔣介石卻是展出的俄國革命黨歷史，特別是革命前的艱苦鬥爭與巨大犧牲。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惟其中新設一層，皆述革命黨經過歷史之慘狀，殊令人興感也。」

9 月 27 日，參觀海軍大學及海軍學校。

9 月 28 日　參觀海軍博物館。該館陳列彼得大帝以來俄國海軍的發展史，包括人員及艦船模型等。俄國海軍的發展迅速，使蔣介石頗感「驚駭」。同日，乘船遊覽涅瓦河，一直到海口為止，使蔣介石等充分領略了彼得格勒形勢的宏壯。三時後參觀製造潛艇的工廠。第二天，再由彼得格勒乘船，參觀喀琅施塔得軍港，登上「摩拉塔」戰艦及第二號潛水艇。9 月 30 日，參觀大劇院和「伊曬克」教堂。蔣介石一直登上教堂的最上一層，彼得格勒四郊百餘里之內的風景，一一收入眼底。對這一教堂建築的宏大壯麗，蔣介石歎為「實所罕睹」。

10 月 1 日 ，參觀前皇村，這是歷代沙皇居住的宮殿，蔣介石日記稱：

「其建築之宏大，裝飾之華麗，誠所謂窮奢極欲。大理石與翡翠之柱壁、地板，不足奇也。」對沙皇尼古拉西的宮殿，則認為遠遠超過法國的凡爾賽宮，「世無其比」。歸途中順道訪問一戶人家，受到親切接待。一位既漂亮又熱情的俄羅斯女郎一會兒翩翩起舞，一會兒揮指彈琴，使得一向貪戀女色的蔣介石歎為「誠尤物也」。[30]

從 9 月 26 日到 10 月 1 日，蔣介石等在彼得格勒參觀、訪問共 6 天。當時，俄國經濟還處於困難時期，喀琅施塔得軍港兩年前還發生過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暴動。蔣介石的總印象是：「市況凋零，民氣垂喪，皆不如莫斯科之盛，而其海軍人員之氣象，更不良佳，殊堪為蘇俄憂也。」[31]

再回莫斯科，向托洛茨基等呈遞《備忘錄》

10 月 2 日　上午十一時，蔣介石等回到莫斯科，又因為為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弄鬼」生氣，蔣介石覺得自己意志不堅。日記云：「寬容大度，包羅萬象，方能成偉大事業。器小如此，奈何！」

還在彼得格勒訪問期間，蔣介石就在起草一份信稿。9 月 27 日日記云：「早起，致函稿成。」28 日日記云：「早起修正函稿。」30 日日記云：「上午，繕正函稿。」回到莫斯科的當晚，蔣介石將函稿謄錄一遍，大功告成。10 月 3 日，代表團內部為函稿及《中國革命的新前景》發生爭論，只是「稍有齟齬」，情況並不嚴重，但蔣介石卻很不高興，日記云：「交

友實難，吾自不慎，有何言也。」10 月 5 日，蔣介石修改《中國革命的新前景》，定名為《孫逸仙代表團關於越飛 5 月 1 日東京電中所提建議之備忘錄》。一直到晚上十點才睡。日記云：「同伴參差，蕭然寡欣。交友之難，可歎！」10 月 6 日，蔣介石檢點《函稿》及《備忘錄》，一份送交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一份送交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函稿》目前只有英文打字稿留存下來，現翻譯如下：

親愛的同志：

我們受孫逸仙博士委派，為建立中國國民革命的主要軍事力量，前來討論在中國的西北邊境建立革命的軍事組織的計劃細目。5 月 1 日，蘇維埃政府通過越飛發自東京的電報，答應給我們的領導者以相關援助，對此，我們首先要充分表達感激之情。5 月 12 日，孫博士復電，接受俄國人的建議並陳述說，他將為此投入很大的精力。該電已自廣州電達越飛和達夫謙。有信通知我們，孫博士的回答已經電告莫斯科。我們受我們黨的領導人的委託，前來和你們討論建議的軍事部分。但是，我們也將利用這一機會，討論建立政治思想戰線的方案，作為成功地執行我們計劃的基礎。俄國同志在此領域有偉大的經驗，因此，我們期待關於我黨宣傳工作的討論將給予我們許多有價值的情報。這些，我們在不遠的將來會需要。 在所附《備忘錄》中，我們已經陳述了這一計劃的兩個方面，但是，我們必須強調，這是我們的特別任務，以達到一項軍事組織的明確決定。它將不僅是中國革命成功的絕對需要，而且會在太平洋地區的鬥爭中有偉大的實際作用。在這一鬥爭中，俄國和中國的革命軍隊

將抵抗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這一力量，企圖將中國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並且成為蘇俄的真正危險。[32]

函末，蔣介石表示希望，盡早與蘇方會見，討論《備忘錄》，以便盡快執行計劃。可以看出，這封信和前述蔣介石寫就的《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已經大不相同了。

《備忘錄》分《緒論》、《軍事計劃》、《宣傳》、《結論》四大部分，共 8200 餘字。[33]

從筆者見到的部分英文打字稿看，它在篇章結構上作了較大調整，但和《中國革命的新前景》並無很大不同。

好壞印象夾雜的蘇俄觀感

蔣介石遞上《備忘錄》後，主要任務完成，就等著俄國人回答，因此日子過得並不緊張。俄國人乘機安排蔣介石等人看戲、看芭蕾舞，參觀莫斯科的工廠、農村和克里姆林宮等處。

10 月 8 日晚，往莫斯科大劇院觀劇。「此劇系俄國各民族各種演劇模型」，大概是一場綜合性晚會，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親自登台演出。蔣介石日記稱：「台上印刷機器隨時印布宣傳品，實乃共產主義國之特色

也。」[34]

10 月 25 日下午，參觀莫斯科的燈泡製造廠及發電廠，考察廠中的工人俱樂部、，教室、音樂補習室、販賣合作社、圖書室、閱報室、膳廳、劇場等地，感到「應有盡有」。對工廠為工人配備「專科教師」，以備工人業餘學習，以及職工會與共青團，蔣介石都表示滿意。對工廠舉辦的展覽會，展示廠史及工人狀態，列表說明廠中資本盈虧，供工人觀覽，注重社會科學等做法，蔣介石也都贊成。

10 月 28 日，看芭蕾舞。演員們的精湛舞姿看得蔣介石等人目瞪口呆，歎為觀止。蔣介石日記稱：「演劇婦女之活潑動作，無異機械，吾國優伶萬不及也。」

10 月 30 日，參觀莫斯科西郊的農村。先進入村蘇維埃，蔣介石覺得類似奉化鄉間的自治會，但制度不同。繼而參觀消費合作社、小學校。小學展覽的是學生自製的工具和自繪圖畫，蔣介石感覺較中國教育為新穎。最後參觀鄉蘇維埃。蔣介石覺得規模較大，司法、行政、立法三權皆由出於此，鄉村警察亦出於此。

11 月 1 日，參觀克里姆林宫，正值衛生人民委員報告，蔣介石坐在台下聽了約一小時。克里姆林宫留給蔣介石的印象是建築宏大，但裝潢則比不上彼得格勒的冬宫等處。

11 月 5 日，參觀俄國共產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故居。

11 月 6 日晚，到莫斯科市蘇維埃，參加慶祝十月革命節紀念大會，聽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以及當年起義水手、海軍士兵等演說。

11 月 7 日為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六週年紀念日。上午九時，蔣介石等到紅場參觀閱兵式及群眾遊行。自 11 時起至下午六時止，遊行尚未完畢。參加者有軍隊 2 萬，飛機 16 架，炮車八門，機關鎗車一隊。炮車和機關鎗車，蔣介石都未見過，充分感到俄國軍械的先進和軍容的威嚴。典禮讓蔣介石看到了俄羅斯人民對政府的擁護，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觀今日之運動，足知蘇維埃政府對於人民已有基礎，殊足以破帝國主義之膽。吾於蘇俄無所間言。」但是，蔣介石仍然覺得，俄國「中級以下人材缺乏，辦事時間延遲不准，緩慢非常，而其高級人員處事或尚感情，是其短處。至於其有否自滿之志，則吾尚未敢斷言也。」

11 月 15 日下午，參觀博物館。

閒暇時，蔣介石自己參觀市場，或者獨自沿著美麗的莫斯科河散步。有一次，蔣介石一個人搭船，順流到莫斯科西南的「不寂之園」去觀光。那裡是莫斯科的最高處。風景優美，蔣介石感到有些像東京的上野公園，但比上野還要美。公園的最西邊是府雀山，相傳拿破侖到莫斯科後，曾先登此山。蔣介石徘徊於山徑和森林之間，眺望全城，自覺精神爽暢，稱譽此地為「莫斯科第一勝景」。此後，蔣介石又去過三次。

11 月 16 日 ，拜訪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裡寧。加裡寧給蔣的感覺是「完全一農民」,「言語誠實，行動自在」。蔣介石和他談起國外大勢，不知所答。蔣介石暗自將加裡寧和曾任中國總統的黎元洪比較，覺得黎「狡猾餒弱」，因此轉而讚美加裡寧,「誠不愧為勞農專政國之議長也」。[35]

11 月 19 日晚，參觀莫斯科市蘇維埃大會。內容為報告一年來的工作成績：工業已恢復至戰前的 60％；工資比去年增加一倍；新增工人宿舍可容一萬餘人；3 萬失業工人，政府每月津貼每人 8 元。蔣介石日記稱：「是其重要報告也。」

11 月 21 日　　蔣介石訪問越飛。下午,訪問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盧稱：蘇聯的教育方針：1、廢除宗教；2、男女同校；3、接近實際生涯；4、學生管理校務；5、統一教育制度；6、注重勞工學校；7、專門學。盧並稱：中央與地方合計，現在常年教育經費約占國家總預算的 14％，共為一億四千萬元。蔣介石對盧的談話很重視，將其所談比較詳細地記在日記裡,但他還覺得教育預算偏底,「尚不足其預算三分之一也」。

從俄國人那裡，蔣介石得知各地都有共青團組織，蔣介石稱之為「少年共產黨支部」。對「少年共產黨支部」注重培植青年，蔣介石讚美其為「第一優良政策」。[36]蔣介石也瞭解到，當時的蘇維埃政府，看不起知識分子和商人,「優待農工而輕士商」，這本來是一項「左傾」政策，但

蔣介石也贊成，在日記中表示：「吾亦無間言也。」[37]

---

[1]《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18 年 7 月 24 日。本文所引蔣氏日記，均同，不一一註明。

[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19 年 11 月 5 日。

[3] 手稿本殘損，據《蔣介石日記類抄·文事》補。

[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 1920 年 2 月 14 日云：「下午，執信來教俄語。」

[5]《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0 年 3 月 18 日、19 日。

[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0 年 4 月 26 日。

[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0 年 9 月 22 日。

[8]《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1 年 1 月 1 日。

[9] 《孫中山全集》第 6 卷，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616 頁。

[10] 卡爾圖諾娃：《加倫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7 頁。

[11]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6 頁。

[12] 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4 頁

[13]《與楊庶堪縱談粵局與個人行止》,《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別錄》, 第 91 頁。

[1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8 月 6 日、7 日。

[1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8 月 19 日。

[1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9 月 3 日。

[1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9 月 5 日。

[18] 以上對話，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282–283 頁。

[19]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287 頁。

[20]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9 月 9 日。

[21] 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原存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

[22] 《蔣介石年譜初稿》，檔案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 頁。

[23]《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籌筆》(一)，00001，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24]《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9 月 16 日。

[25]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291 頁。

[26]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292 頁。

[27]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292–293 頁。

[2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9 月 17 日。

[2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23 日。

[30]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0 月 1 日。

[3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0 月 2 日

[32] To Comrade Trotzky ,Skliansky & Kameneff.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3] Memorandum of the Delegation of Dr. Sun Yat Se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oposal Mentioned in the Telegram of A.A. Joffe Sent from Tokyo May 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0 月 8 日。

[3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16 日。

[3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4 日。

[3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4 日。

俄國人拒國民黨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的要求，蔣介石大失所望

俄國人長期將蒙古視為其勢力範圍。1911 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沙俄乘機派兵進入蒙古，導演「獨立」。1921 年，紅軍為追剿沙俄白衛軍，進佔庫倫，此後即長期不肯撤兵。蔣介石要求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自然不能為俄國人所接受。10 月 18 日 契切林約蔣介石 往見，但臨時有病，未見。10 月 21 日下午，蔣介石拜會契切林，集中談「蒙古自治問題及根本計劃」。契切林沒有正面回答可否，只籠統地強調「蒙古人怕中國人」，要蔣介石與蘇共領導人商談。26 日，蔣介石致函契切林，反駁說：

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現在中國北京政府的軍閥，決不是怕主張民族主

義的國民 黨，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離開怕的環境。這種動作，在國民黨正想把 他能夠從自治的途徑上，達到相互間親密協作底目的。如果蘇俄有誠意，即應該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狀況。須知國民黨所主張的民族主義，不是說各個民族分立，乃是主張在民 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間親愛的協作。所以西北問題正是包括國民黨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們實際解除歷史上所遺傳籠統的怕。[1]

訪蘇前，蔣介石沒有料到事情會如此不順利。發出致契切林函後，蔣介石一整天都心神不佳，悶悶不樂，日記云：「可謂缺少經驗，自討其苦也。」[2]25 日，蔣介石致斯克良斯基一函。28 日，再各致契切林和斯克良斯基一函。這時候，蔣介石已經對他所受到的接待和蘇方的拖延不復表示不耐。11 月 1 日，契切林寫信向季諾維也夫報告，說明蔣介石「已經神經過敏到極點，他認為我們完全不把他看在眼裡。」[3]

蘇聯方面對國民黨的要求遲遲不復，固然由於蒙古問題，同時也由於蘇聯正熱衷於在德國、保加利亞、波蘭等地發動革命，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11 月 2 日，托洛茨基致函契切林與斯大林，要求「極其果斷地和堅決地」向國民黨代表團「灌輸」:「他們面臨著一個很長的準備時期」，「軍事計劃以及向我們提出的純軍事計劃，要推遲到歐洲局勢明朗和中國完成某些政治準備工作之後。」[4]11 月 11 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次與蔣介石等人會談。

當日上午，蔣介石檢出《意見書》，仔細審查，精心作好談話準備。下

午見面時，斯克良斯基開門見山，表示不贊成國民黨代表團的計劃：

「孫逸仙和國民黨應該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為不然的話，在現有條件下的一切軍事行動都將注定要失敗。」他以「十月革命」為例，說明那是「俄國共產黨長期堅持不懈的工作」的結果。他要求國民黨在中國也做同樣的工作，首先全力搞宣傳，辦報紙、雜誌，搞選舉運動，等等。

「孫逸仙同越飛會談以後，國民黨加強了自己的政治活動，但黨認為同時也有必要開展軍事活動。」蔣介石還想盡力一搏，針鋒相對地與斯克良斯基辯論。他接著說明：「在俄國，共產黨只有一個敵人，而在中國，地球上的所有國家的帝國主義者都反對中國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國採取軍事行動是必要的。」[5]

斯克良斯基寸步不讓，要國民黨「首先應該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對工農的工作上」。他說：「有必要在近幾年只做政治工作，軍事行動的時機只有當內部條件很有利時才可能出現。」他尖銳地批評蔣介石提出的軍事計劃：「發起你們方案中所說的軍事行動，就是事先注定要失敗的風險。」為了不讓蔣介石完全失望，斯克良斯基提出，可以允許「中國同志」到蘇聯軍事學校學習。參謀部學院可以接受 3—7 人，軍事學校可以接受 30—50 人。至此，會談已經進行了兩個小時，蔣介石等無話可說了，表示將於 11 月 22 日回國，希望再一次會見斯、加二人，並且請他們轉交一封信給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6]

在歸途中，張太雷向陪同的俄國人表示：「在學習了蘇聯的經驗之後，本代表團應該同意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意見。」據這名俄國人事後的匯報，會談前，蔣介石由於神經緊張，過度勞累，一再要求送他去療養院休養兩周，而在與斯克良斯基會談之後卻表示：不要張羅療養院和醫生，自己感覺好多了。這名俄國人由此作出結論說：「中國人對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會見是滿意的。」[7]

事實是，俄國人拒絕了蔣介石的庫倫軍事計劃，蔣介石的內心極為憤懣、失望。當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 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 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8]

11 月 12 日，蔣介石給汪精衛發了電報，又給契切林寫了封信。整天「心緒沉悶」。他想起了當時國內的狀況，更加抑鬱，日記云：世人虛偽，本黨同志，優秀者或死節，或遠離，現在所見者，只有「趨炎附勢，爭權奪利，吹牛拍馬，以公濟私，卑陋惡劣，互相利用挑撥之徒」，其他人則「貪似狼，猛似狗，蠢似豕」。想到這裡，蔣介石在句末重重地寫下了「可歎」二字。

蔣介石又給斯克良斯基和契切林各寫了一封信。

批評蘇俄政府「無信」，察覺斯大林等人「排斥異己」

蔣介石在俄國時間久了，對俄國社會瞭解漸多。11 月 24 日日記云：「俄國中級人才太少，政府往往為其下所蒙蔽，而其輕信、遲緩、自滿，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觀察，專尚客氣。人而無信，尚不能立，況其國乎！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亦其國之一大弊也。吾為之危。」這一段日記前半段批評蘇俄政府「無信」，後半段，批評「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

1919 年 7 月，蘇俄政府曾由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宣稱：「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獨自從中國人民那裡的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給中國人民。」[9]1920 年 9 月，加拉罕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聲稱：「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本階級從中國殘暴地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10]當時，蒙古問題是中蘇之間的重大糾紛。1923 年 1 月，越飛與孫中山會談時，曾向孫表示，俄國現政府從來不想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也絕無使其脫離中國的目的。[11]1923 年 9 月 16 日，加拉罕到北京談判，專門向報界聲明：蒙古應為中國之一部，俄國決無若何侵並計劃。[12] 現在，蘇方堅決拒絕蔣介石在庫倫設立軍事基地的計劃，自然要被蔣視為「無信」。

俄國共產黨從 1921 年起進行「清黨」，至 1922 年 3 月召開聯共（布）第 11 次代表大會前，已經開除了 17 萬黨員，佔全體黨員的 25%左右。第 11 次黨代表大會上，由於列寧已經病重，出生於格魯吉亞的斯大林當選為總書記，並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陸續形成「三駕馬車」以至「七人小組」，壟斷蘇聯黨和國家大權，將托洛茨基排除在外。1923 年 4 月，聯共（布）召開第 12 次代表大會，「清黨」仍在進行。同時，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也漸次進入火熱狀態，開始批判托洛茨基本人和他的擁護者拉狄克和克拉辛等。這些，不能不給蔣介石留下印象。11 月 24 日日記所稱「排斥異己」，顯指斯大林等人。蔣介石認為這是蘇聯的「大弊」，並且聲稱「吾為之危」。

蔣介石晚年回憶說：「在蘇俄黨政各方負責諸人之中，其對我國父表示敬重及對中國國民革命表示誠意合作的，除加密熱夫、齊采林是俄羅斯人之外，大抵是猶太人為多，他們都是在帝俄時代亡命歐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國的。這一點引起了我特別注意。我以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拉迪克與越飛等，比較關切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可是越飛自中國回俄之後，已經失意了。我並且注意到當時列寧臥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黨內，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導的國內組織派，暗鬥如此激烈，我就非常憂慮

他們這樣鬥爭，必於列寧逝世之後，對於中俄合作的關係，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13]蔣介石的這一段回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他 11 月 24 日

的日記。

認真攻讀馬克思著作，但崇拜孫中山，婉拒加入中共

在蘇聯期間，蔣介石有較多空閒。除了學俄語，讀吳承恩的《西遊記》，學習拉手風琴，彈琵琶外，不少時間都用在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上。其日記載：

9 月 21 日下午，看《馬克思學說》。

9 月 22 日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9 月 24 日，看《馬克斯學說概要》。日記云：「頗覺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厭棄欲絕者再。看至下半部，則倦不掩卷，擬重看一遍也。」

9 月 25 日下午，看《經濟學》。

10 月 3 日晚，看《共產黨宣言》。

10 月 4 日　上午，看《馬克思學說概要》。下午看《概要》。

10 月 7 日　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10 月 9 日 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概要》。

10 月 10 日，下午，看《馬克斯思學說》之《經濟主義》。日記云：「複習第三遍完，尚不能十分瞭解，甚歎馬克思學說之深奧也。」

10 月 16 日，看《共產黨宣言》

10 月 17 日，看《共產黨宣言》。

10 月 18 日，上午看《馬克思傳》。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樂而不能懸

卷」。

10 月 20 日，下午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史》。

11 月 1 日，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史》。

從上述日記可見，蔣介石這一時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不僅很積極，很認真，一遍、兩遍、三遍地讀，有時還讀得很有興趣，樂不釋手。但是，蔣介石仍然高度崇拜孫中山。

當蔣介石訪問蘇聯之際，蘇聯政府也正派其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來華和北京政府談判。9 月 8 日，加拉罕致電孫中山，稱孫為「新俄國的老朋友」，表示希望得到孫的幫助[14]。9 月 16 日孫中山復電加拉罕，其中談到：「中俄兩國之真實利益使雙方採取一種共同政策，俾吾人得與列強平等相處，及脫離國際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的壓迫。」[15]10 月 9 日，蔣介石從蘇聯報紙上讀到孫中山這一電報，高興地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俄報登載中師復喀拉漢宣言，甚為得體，且有反對帝國資本主義之決心，不勝欣喜。」

10 月 10 日是當時中國的國慶節。從下午起，蔣介石就在預備演講，題目是中國國民黨的歷史。當天晚上，在莫斯科的全體中國學生到蔣介石寓所，共同慶祝「雙十節」。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蘇聯共產黨都派代表前來祝賀。蔣介石講了大概一個半小時，自覺「頗有條理」。接著是演劇、獻技，奏《國際歌》，一直到夜 12 時方散。

大概蔣介石在演說中比較突出地宣揚了孫中山的功績，第二天，蔣介石就聽到批評：「有崇拜個人之弊」。當時在俄國的中國學生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在領袖與群眾的關係上，在孫中山的個人作用上有某些新看法，本是很自然的事，但蔣介石卻不能理解，他聯想到中國國民黨和俄國共產黨內的情況，更增添一層憂慮。日記稱：「甚笑中國人自大之心及其願為外人支配而不願尊重國內英雄，此青年之所以能言難行而無一結果也。黨人好尚意氣，重妒嫉，而俄黨下級人員較吾中國更甚，此實為俄黨慮也。」[16]

10 月 13 日，蔣介石到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在那裡讀到孫中山致列寧、托洛茨基和契切林的三封信，其中稱蔣介石為「我的參謀長和密使」，聲稱「蔣將軍要和貴國政府及軍事專家一起提出一項由我的軍隊在北京西北地區進行軍事行動的建議。茲授權蔣將軍代表我全權行事。」[17]蔣介石感受到孫中山的「至誠」，心頭一熱，不覺淚下。孫中山為中國革命奮鬥多年，尚未成功，蔣介石頗為孫中山不平，日記稱：「天何不欲至誠之人成功而使其久屈也！」[18]同日，蔣介石還收到汪精衛、廖仲愷的來信，也都對蔣充滿期待，使處在異國他鄉的蔣介石感到溫暖。10 月 18 日，蔣介石再次接到孫中山手擬長電，又一次受到感動，日記云：「中師誠摯之辭，每使人讀之淚下，其非比長於文字者故為此籠絡之語，此其更可貴也。」

其間，曾有人動員蔣介石加入中國共產黨，蔣介石答以「須請命孫先生。」蔣的答覆使動員者失望，批評蔣是「個人忠臣」，這一批評又很快為蔣

介石得知，大為不滿。[19]到當年 12 月 13 日，蔣介石離開蘇聯回國，見到「留俄同志」致孫中山函稿，其中論及孫中山周圍「忠臣多而同志少」，更使蔣介石「閱之甚駭」。其實，這本是一句要求加強國民黨內民主建設的善意勸告，但蔣介石不能理解。日記云：「少年輕躁自滿，詆笑道義，殊為可歎！排人利己之徒，誘引青年，自植勢力，而不顧黨誼，其實決不能自成其勢。夢夢之人，惟有一歎而已。」[20]這裡所批評的「少年」和「排人利己之徒」，顯指當時的部分年輕的共產黨員，這是蔣介石對中共發生嫌隙的開始。第二年 3 月，蔣介石更致函廖仲愷訴苦說：「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洋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寧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戴）洋奴光榮之銜。」[21]

與共產國際領袖季諾維也夫爭論，主張中國革命「兩步走」

蔣介石等到莫斯科後，曾於 10 月中旬通過吳廷康向共產國際提交過一份《關於中國國民運動和黨內狀況》的書面報告。該報告認為：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政權一直掌握在軍閥手中，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濟剝削日益增強。國民黨的任務是「推翻世界資本主義」。中國的國民革命具有國際性質。《報告》對三民主義提出了新解釋：民族主義意味著「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反對帝國主義，扶助弱小民族。民權主義指每個人都擁有言論、結社、集會、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須來自人民，取得人民幫助並為了人民。民生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所有大工業、所有

土地都屬於國家，由國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資本主義的危害。但是，由於現時的經濟條件，中國不可能立即實行共產主義。民生主義是當前中國「最能接受的經濟制度」。《報告》還提出：國民黨必須進行改組，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為宣傳工作尋找政治口號。同時，必須在反帝運動中同蘇維埃俄國合作。這種合作不僅為中國革命帶來好處，也會為世界革命帶來好處。[22]

吳廷康收到國民黨代表團的《書面報告》後，約蔣介石在適當時刻拜會共產國際主席團，但其時間卻一再延宕，不能確定，蔣介石覺得很失面子，不大高興。11 月 25 日，吳廷康再次相約，而又不定具體時間，蔣介石「憤激不堪，婉言拒其約會」，但吳廷康一再要求，蔣介石勉強答應。當晚 7 時，蔣介石到共產國際主席團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首先會見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據蔣介石日記稱：「各國共產黨主席皆履會，情形頗佳」。會上，蔣介石發表演說：

國民黨代表團是奉國民黨領袖孫逸仙之命派出的，目的是在這裡，在莫斯科這個世界革命的中心，同共產國際的同志們進行坦率的討論。

演說中，蔣介石重點對孫逸仙的民生主義，特別是「兩步走」的設想作了闡釋。他說：

民生主義是通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我們認為，對中國革命來說。目前最好政策是，作為第一步，使用「（爭取）獨立的中國」、「人民政府」、

「民族主義」之類政治口號。作為第二步，我們將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做一些事情。

蔣介石說明，由於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民不識字，屬於小農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因此中國「目前不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不能使用「共產主義口號」，否則，「就會造成小土地所有者對這些口號的錯誤理解」，「會使他們加入反對派陣營」，「跟隨中國軍閥反對我們」，「會使中國革命不能取得成功」。「所以目前我們的綱領是旨在聯合中國人民的所有人士，以便借助於統一戰線來取得革命的巨大成功」。接著，蔣介石說明，孫逸仙博士 30 年前開始革命時，就使用三民主義為口號，人民已經習慣，軍閥也不會特別注意，小農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不會反對。

演說中，蔣介石還闡明瞭國民黨對世界革命的設想：「主要基地在俄國」，贊成「俄國同志幫助德國革命取得成功」。他說：

國民黨建議，俄國、德國（當然是在德國革命取得成功之後）和中國（在中國革命取得成功之後）組成三大國聯盟來同世界資本主義勢力作鬥爭。借助於德國人民的科學知識、中國革命的成功、俄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該國的農產品，我們將能輕而易舉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將能推翻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

蔣介石展望，三、五年之後，中國的國民革命就能成功，一旦取得成功，「我們就開始進行第二階段，即在共產主義口號下展開工作。我們認為，

那時，中國人民將更容易實現共產主義。」[23]

蔣介石對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的報告很滿意，日記中自稱，訪蘇以來所作報告、講話，「亦以今日為最從容而有條理也」。[24]演講後，蔣介石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科拉羅夫等人的提問並作了答覆。季諾維也夫在總結中聲稱，共產國際的中國問題委員會將繼續開會，同國民黨代表團討論，作出決議。

季諾維也夫關心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之間已經開始的合作，希望國民黨做工作，將兩黨部分成員之間的可能發生的困難和誤解減少到最低程度，要求在中國工人罷工的時候，始終站在工人一邊，積極支持工人鬥爭，並且特別強調，這種支持應該是「認真的和積極的」。季諾維也夫表示，他不能肯定，得到的消息是否確實，有人對他說，漢口「二七罷工」時期，國民黨的支持不夠「強而有力」，其「冷淡態度使人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國民黨注意這一點，在工人的所有衝突和發動中，國民黨的支持真正是堅決有力的，以便不給埋怨和抹煞帶來口實。

對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季諾維也夫明確表示，「不是共產主義的口號」，要使這些口號「更具體，更明確」。關於「民族主義」，季諾維也夫說：它應該「不為新的資本家階級、新的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統治提供可能」，「它不應用中國資本家的統治去取代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也「不應導致建立中國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權地位」，「不應該導致對生活在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壓迫」。關於「民權主義」，季諾維也夫表示，

「民權主義在歐洲已是一個反動的口號，民權主義不贊成革命。」在中國，它能否成為「進步口號」，取決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勞動群眾有可能捍衛自己的權利，並把自己的事業推向前進」。

關於「民生主義」，季諾維也夫稱，未必有必要詳細討論，如果把它理解為「致力於把勞動群眾，如耕種土地的莊稼人」從賦稅重負等壓迫下解放出來，那就不必反對。但是他明確表示，「這完全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是「有可能導致真正的社會主義目標的發展」。[25]

蔣介石表示，原則上同意季諾維也夫的講話，但他強調：「我們不是為資產階級而進行革命工作的。」「目前我們希望，小資產階級和我們建立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但是，我們並不為它的利益而鬥爭。」

季諾維也夫對蔣介石的回答作了有條件的肯定：「當然，共產國際並不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否則我們就不會同這樣的黨打任何交道。我們認為，國民黨是人民的政黨。它代表那些為爭取自己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力量。」「國民黨也是革命的政黨。」

會議最後，蔣介石要求共產國際派一些有影響的同志到中國，仔細研究中國局勢，領導國民黨，就中國革命的問題提出建議。季諾維也夫接受蔣介石的建議，答應向中國派出一位負責的代表，並請代表團轉達對中國國民黨，特別是孫逸仙同志的「熱烈的兄弟般的問候」。[26]

11 月 28 日，共產國際主席團發佈《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該決議由布哈林、科拉羅夫、庫西寧、阿姆特爾以及吳廷康組成的委員會起草，共 8 條。它批評國民黨「沒有吸收城鄉廣大勞動群眾參加鬥爭」，把希望寄托於國內反動派，建議對三民主義作出新解釋，使之成為「符合時代精神的民族政黨」。

關於民族主義，《決議》認為，它的含義是：「要消滅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要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不僅要消滅外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而且也要消滅本國資本的殘酷剝削。」決議提出，民族主義對外體現的是「健康的反帝運動的概念」；對內，和「同受中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少數民族的革命運動進行合作」，公開提出「民族自決」原則，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關於民權主義，《決議》認為，應使其有利於勞動群眾，只有那些真正擁護反帝鬥爭綱領的分子和組織才能享有權利和自由，決不能為在中國的幫助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軍閥）的分子和組織享有。

關於民生主義，《決議》認為，應該解釋為把外國工廠、企業、銀行、鐵路和水路交通收歸國有，同時，對中國的民族工業實行「國有化原則」。《決議》認為，不能提出「土地國有化」，只能提出，「消滅大土地所有者和許多中小土地佔有者的制度」，將「土地直接分配給在這塊土地上耕種的勞動者」。

《決議》要求國民黨重視中國工人階級，放手發動其力量，「把全國的解放運動建立在廣大群眾的支持上」，善於運用在華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同工農國家的蘇聯建立統一戰線，同日本的工農解放運動和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建立聯繫。[27]

共產國際的這份決議有正確的部分，也有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部分。蔣介石讀後，在日記中寫道

普〔浮〕泛不實，其自居為世界革命之中心，驕傲虛浮。其領袖徐諾微夫（按，即季諾維也夫——筆者）似有頹唐不振之氣，吾知不久必有第四國際出現，以對待該黨不正之舉也。[28]

下午，蔣介石赴共產國際會見其秘書，「應酬數語，即辭行」。

會見托洛茨基，蔣介石和沈定一差點打起來

托洛茨基是列寧的戰友，十月革命的重要領導者。此時雖然受到斯大林的批判、排斥，但仍然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到蘇後，一直希望見到他。

10 月 16 日，蔣介石致函托洛茨基。

11 月 9 日，蔣介石草擬致托洛茨基函稿。

11 月 18 日晚，改正致托洛茨基函。

11 月 19 日，發致托洛茨基函，大意云：「此次負國民黨使命，代表孫先生來此，要求貴政府於本黨所主張西北計劃，力予贊助。華人懷疑俄國侵略蒙古一點，務望注意避免。並即辭行。」[29]但是，直到 11 月 27 日，托洛茨基才接見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全體。

托洛茨基表示早就想會見代表團，但由於生病，未能這樣做。現在健康恢復，有可能同蘇聯的朋友——孫逸仙的代表們交談。他說：「只要孫逸仙只從事軍事行動，他在中國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業人的眼裡，就會同北方的軍閥張作霖和吳佩孚別無二致。」他建議「國民黨的絕大部分注意力應當放到宣傳工作上」，說是「一份好的報紙，勝於一個好的師團。在目前情況下，一個嚴肅的政治綱領比一個不好的軍團具有更大的意義。」他要求國民黨「把軍事活動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盡快放棄軍事冒險」。對於國民黨提交的備忘錄，托洛茨基明確表示：「國民黨可以從自己國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發起軍事行動。」[30]

蔣介石試圖作最後的爭辯，力圖說明各國帝國主義殘暴地壓制一切革命宣傳，國民黨政治活動困難，但托洛茨基則表示：政治宣傳必須適合於具體情況。報刊上只發表那些根據新聞檢查條件可以發表的東西，告示

和傳單可以宣傳自己的觀點。應該有合法的工作和地下的工作。托洛茨基的這些話再次堅決地表明，蘇聯共產黨和政府不支持國民黨在蒙古的軍事計劃。

蔣介石的日記沒有記錄托洛茨基的上述態度，只有簡單的幾行字：「其人慷慨活潑。其言革命黨之要素，忍耐與活動，二者相輔並行而不可一缺也雲。余之性質，厭倦與消極，此所以不能成事也。」[31]

會見托洛茨基後，蔣介石很生氣，認為托洛茨基在騙他們。他在代表團內部說：「如果蒙古想獨立，那需要我們承認，需要我們給予他獨立，而不是他自己承認自己。」沈定一反對蔣介石的意見，二人發生口角，差一點打起來。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傳說：「中國代表團內部在打仗！」[32]

在抑鬱無聊中歸國

會托洛茨基的當晚，蔣介石向契切林辭行。28 日下午 3 時，應外交人民委員部之宴。敘談 3 小時，「凡想說的話，大略各露其端倪，使其自繹。」[33]6 時，送邵元沖登車回德國。在邵元衝到莫斯科以後，蔣、邵已經結為兄弟，交換了蘭譜。臨別時，蔣介石頗有「不盡依依，良友去之何速」之感。當晚，蔣介石與趙世賢談話，「略述此次來俄經過情形，並勉其不使為外人所支配而已。」[34]趙大概是留蘇學生。11 月 18 日，蔣介石

與他有過一次談話，認為是「青年有為之士，殊可貴也。」29 日，蔣介石向越飛夫人辭行。下午二時登車。張太雷留在莫斯科，沒有隨蔣介石等歸國。此次訪蘇之行，蔣介石主要的目的沒有達到，勞而少功，加之與沈定一吵架之後，兩人關係緊張。蔣介石自悔「擇友不良」，見沈心煩，在車上也懶得說話。3 時正，火車開動，蔣介石感到「抑鬱無聊已極」。11 月 30 日，從車上望去，「冰天雪地，一望無際，日色沉沉，慘淡無光」。21 日，車過一座盛產寶石的城市，蔣介石本想買點寶石玩具，帶給經國、緯國，但因錢不多，只得作罷。12 月 8 日，到中國國境，一片平原，只有由東北至西南一帶，有不甚高峻的山脈。蔣介石是軍人，立刻想起北方戰事適合採取攻勢。八時後到滿洲裡。當地長官前來迎接，頗為慇勤。代表團全體均無護照，因事前有電報通知，一律放行。當日到哈爾濱，地方高級長官來接，蔣介石因用的是假名，迴避不見。

12 月 10 日　蔣介石到大連，逛老虎灘。12 月 12 日，登亞拉伯船。本定下午四時啟碇，因裝貨不足，至第二天早晨方開。蔣介石感歎道：「日商信用，遠不如前，而船中腐敗形狀，不堪言爾。吾知東邦帝國資本主義之運命不久將盡矣。」[35]13 日，蔣介石開始在船上寫作《游俄報告書》。14 日續寫，時作時輟，不寫時便在甲板上與王登雲一起跑步。訪蘇 4 個月以來，蔣介石至今才感到心地略暢。日記云：「風平浪靜，船位寬暢，亦一樂事也。」14 日，繼續寫作《游俄報告書》。15 日，船入吳淞口。九時登岸回家，陳潔如還未起床。

當天下午，蔣介石往訪張靜江後，即登上江天輪，趕回奉化。胡漢民、

汪精衛、廖仲愷、林業明、陳果夫諸人都到船上與蔣介石相會，詳敘別情。蔣介石向廖仲愷等人簡要匯報了訪蘇之行，說明俄國人對代表團「很同情」，「他在一些會議上發表了演說，人們把他抬了起來，音樂打斷了他的講話；人們向他說明了與政治工作有關的各種情況，甚至向他講了黨內在中國問題上存在的意見分歧」。蔣概括說：「這一切給他留下了很誠懇的印象。」「蘇聯有給予支援的真誠願望，問題在於，國民黨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務。」[36]此前二日，孫中山在廣州已經啟動了在近代中國具有重大意義的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重新進行黨員登記，委任廖仲愷、譚平山、陳樹人、孫科、楊庶堪等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因此大家都勸蔣介石回滬，參加上海地區的黨務改組，但蔣介石執意不從，一心趕回溪口，紀念母親王太夫人的六十冥誕。他只向孫中山捎去一個建議，任命楊恕堪為廣東省省長。回奉化後，蔣介石又將他所寫的《游俄報告書》寄給孫中山。不過，這份《報告》至今尚未發現。

去廣州向孫中山報告，孫認為蔣「過慮」

12 月 16 日早 7 時，蔣介石船抵寧波，雇了座轎子，兼程趕回溪口。二時半到家，沒有休息，就趕往母親墓地參拜。當晚就住在新近落成的慈庵中。24 日，又赴祖父母墓地參拜，同時視察亡弟的墳塋。

這邊蔣介石在家鄉省墓，那邊廖仲愷、孫中山急如星火地等待蔣介石匯報。12 月 20 日，

在上海的廖仲愷致電蔣介石，告以鮑羅廷有事商量，黃埔軍校急待開辦，要蔣立即乘輪來滬，共同南下。22 日，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聯名致函蔣介石，說明已將蔣的建議向孫中山提出，「待商之事甚多」，要求蔣介石勿因省長問題未決而拖延來滬時間。26 日，胡、廖、汪三人再次致函蔣介石，轉抄楊庶堪復電，中稱：「鮑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歲，兄若不來，必致失望。」又稱：「軍官學校由兄負完全責任辦理，一切條件不得兄提議，無從進行。」[37]27 日，張靜江也致函蔣介石，認為「似不宜再緩」。28 日，汪精衛轉來孫中山 24 日電報，中稱：

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台意對於時局、政局有所主張，皆非至粵面談不可，並希約靜江、季陶同來，因有要務欲與商酌也。[38]

同日，廖仲愷也致函蔣介石，說明上海諸人最遲 1 月 4 日搭船離滬，要求蔣「萬不能再延」。函件以前所未有的語氣責備說：「否則事近兒戲，黨務改組後而可乘從惰氣乎！」[39]

儘管眾人一再催促，蔣介石還是在 1 月 16 日才到達廣州。4 天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24 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30 日，孫中山任命楊恕堪為廣東省省長。2 月 3 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

到廣州後，蔣介石即向孫中山口頭報告訪蘇情形，同時提出對國共合作的意見。孫中山原本支持蔣介石的軍事計劃。1923 年 10 月 9 日，他就向蘇聯派遣來華的顧問鮑羅廷表示：我還等待著我派赴莫斯科的代表所進行的談判的結果。很明顯，我期待著在莫斯科的這些談判能夠取得豐碩成果。[40] 蘇俄政府拒絕蔣介石的計劃，孫中山不能沒有失望之感。不過，孫中山認為，「唯一的朋友是蘇聯」，因此，他批評蔣介石「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對國共合作問題，孫中山也認為蔣介石過慮。[41]據蔣介石多年後的回憶，孫說：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何況，蘇俄也承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因此，孫中山決心堅持聯、俄容共的決策。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蔣介石認為參加大會的共產黨員「挾俄自重」，「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於 2 月 21 日向孫中山辭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職務，離粵還鄉。3 月 14 日，他致函廖仲愷，將共產黨區分為「國際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又將「俄國共產黨」的「主義」與「事實」分開，表示「主義」雖可信，而「事實」則不然。信中，蔣介石強烈指責「俄黨」對中國的政策，他說：「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42]蘇聯支援中國革命，有其真誠的一面，蔣介石將其與英、法、美、日並視，稱

其為變相的「凱撒之帝國主義」，是錯誤的，但是，揆諸歷史，蘇聯在其國家發展中，確有其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的一面，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蔣介石對蘇聯和中共的批評並沒有堅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堅決主張聯蘇、聯共的左派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原載上海《世紀》，2007 年第 2-3 期

---

[1]《蔣介石年譜初稿》，第 137-138 頁。

[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26 日。

[3]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308 頁。

[4]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309 頁。

[5]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311 頁。本文原件為俄文，本文引用時對中譯文的口氣略有變動。

[6]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310-312 頁。

[7]《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第 312–313 頁。
[8]《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11 日。
[9]《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卷第一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5–16 頁。
[10]《蘇中關係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 1959 年俄文版，第 51–53 頁。
[11]《孫越宣言全文與國共聯合》，《外交月報》第 2 卷第 1 期。
[12]《時報》，1823 年 9 月 19 日。
[13]《蘇俄在中國》第 29–30 頁，《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專著》。
[14] 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中華書局版，第 1687 頁。
[15]《孫中山全集》第 8 卷，中華書局 1986 年版，第 216 頁。
[16]《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0 月 11 日。
[17] Allen Sues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city Press,1968,p.234.
[18]《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0 月 13 日。
[19]《蔣介石年譜初稿》第 168 頁。
[20]《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2 月 13 日。
[21]《蔣介石年譜初稿》第 168 頁。
[22]《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 297–302 頁。
[23]《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 330–331 頁。
[24]《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25 日。
[25]《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 335–337 頁。
[26] 以上對話，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

第 337–338 頁。

[27]《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 342–345 頁。

[2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28 日。

[29]《蔣介石年譜初稿》，第 140 頁。

[30]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 340–341 頁。

[31]《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27 日。

[32]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 383 頁。

[33]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28 日。

[3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1 月 28 日。

[3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 年 12 月 12 日。

[36]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 384 頁。。

[37] 《蔣介石年譜》，第 144–145 頁。

[38] 《蔣介石年譜》，第 144 頁。

[39] 《蔣介石年譜》，第 145 頁。

[40] N.Mitarevsky, World Soviet Plots, Tientsin Press ,1927.

[41] 《蘇俄在中國》第 32 頁，《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專著》。

[42] 《蔣介石年譜》，第 167 頁。

蔣介石與 1937 年的淞滬、南京之戰

1937 年的淞滬之戰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規模巨大、作戰最烈的一次戰爭，時間長達三個月，日方動員兵力約 25 萬人，中方動員兵力約 75 萬人，其後的南京之戰實際上是它的尾聲。兩次戰爭時間相連，地區相連，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戰役的兩個不同階段。

蔣介石決定拒和、應戰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長期對日本採取妥協退讓政策；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細，方針難定，日記云："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逼我屈服乎？""將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①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軍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戰"，同時電復北平市長秦德純等，"應先具必戰與犧牲之決心，及繼續準備，積極不懈，而後可以不喪主權之原則與之交涉"。②

當時，中日兩國國力、軍力相差懸殊，因此，在國民政府內外，都有一部分人積極主和，或者設法推遲大戰時間。在國民政府內部，以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徐永昌為代表。他認為，中日空軍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戰準備至少尚須六個月。7 月 14 日，徐永昌致函軍政部部長何應欽，

主張"和平仍須努力求之"。①16 日，徐致電閻錫山，"請為和平運動"。②18 日，通過魏道明轉告外交部長王寵惠，"在能容忍的情勢下，總向和平途徑為上計"。③何應欽同意徐永昌的意見，建議徐向時在廬山的蔣介石陳述。21 日，徐永昌致函蔣介石稱："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蓋大戰一開，無論有無第三國加入，最好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其後日本系工業國，容易恢復，我則反是，實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④24 日，他又向蔣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難挨的事"。⑤

在知識階層中，胡適、蔣夢麟等都主張"忍痛求和"，認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為此，胡適兩次面見蔣介石。7 月 30 日，他向蔣提出，"外交路線不可斷"。五日，他向蔣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解決中日兩國間的一切"懸案"，換取東亞長期和平。⑥8 月 6 日，胡適要求在大戰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蔣介石的書面建議中提出：1.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2.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3.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⑦胡適希望經過努力，能在中日間維持五十年的和平。

和戰是攸關國家命運、前途的大計，蔣介石不能沒有矛盾。7 月 10 日，蔣介石認為，日軍挑釁，意在奪權盧溝橋，"此為存亡關頭，萬不使失守也"。①12 日，蔣介石得知日本關東軍已到天津，內閣宣言動員全國政界與產業界擁護閣議，感到"勢必擴大，不能避戰矣"！當日下午，與汪精衛商談時局。②同日晚，蔣介石決定在永定河與滄保線作持久戰，

嚴令制止與日方的妥協行為。16 日，蔣介石邀集各界人士 158 人在廬山舉行談話會，討論《應戰宣言》。該《宣言》空前堅決地聲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③但是，對於這份宣言應否發表，何時發表，眾議不一，蔣介石自己也猶豫不定。16 日日記云："宣言對倭寇影響為利為害？應再研究"④17 日日記云："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餘，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戰禍乎？""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時間！"⑤19 日，蔣介石決定排除阻力，公開發表"應戰宣言"，"再不作倭寇迴旋之想，一意應戰矣"。日記云："人之為危，阻不欲發，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⑥當日決定核發戰鬥序列。為了減少這份《宣言》的衝擊力，他將之改稱為"談話"。

廬山談話的措辭空前激烈，但是，蔣介石並沒有下決心關閉"和平解決"的大門，所以同時表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此後，隨著日本軍事行動的擴展，蔣介石的抗戰決心逐漸堅決。27 日，日軍全面進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蔣介石日記云："倭寇既正攻北平，則大戰再不能免。""預備應戰與決戰之責任，願由一身負之。"①28 日，日本政府下令長江沿岸近三萬日本僑民撤離，顯示出異乎尋常的跡象。同日，北平淪陷。30 日，天津淪陷。蔣介石感覺到，再不抗戰，必將遭致全國反對。其日記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蔣介石認為：中國方面可謂完全

沒有組織與準備，弱點很多，"以此應戰，危險實大"，但日本"橫暴"，"虛弱"，"以理度之，不難制勝"，"為民族之人格與振興民族之精神，自有轉危為安，因禍得福之機"。②7 日，蔣介石召開國防會議，會上，何應欽報告軍事準備情形，提出第一期擬動員一百萬人投入作戰，其中，冀、魯、豫方面約 60 萬人，熱、察、綏方面約 15 萬人，閩粵方面約 15 萬人，江浙方面約 10 萬人，可見，當時尚未將上海地區視為主戰場。何陳述的困難有財政開支擴大，槍械、子彈勉強可供六個月之需，防禦工事未完成，空軍機械不足等。蔣介石在談話中對胡適主張頗有譏刺，參謀總長程潛甚至指責胡適為"漢奸"。會議決定"積極抗戰與備戰"。③通過此次會議，抗戰遂被正式確定為國策。

當時，蔣介石估計中日戰爭將是一場"持久"戰，戰期大約一年，而且估計"對外戰爭易於內戰"。④

中國軍隊力圖"先發制人"，但缺乏重武器，攻堅戰未能取勝

上海處於東海之濱，距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不過三百公里。1932 年 5 月的中日《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中國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隊"維持秩序，而日軍則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吳淞、江灣、閘北等地駐兵，建立據點。為防止日軍自上海入侵，南京國民政府於 1934 年起密令修築上海周邊工事，在吳縣、常熟等地，利用陽澄湖、澱山湖構築主陣地——吳福（蘇州—福山）線，在江陰、無錫之間構築後方陣地——錫澄線，同時在乍

浦與嘉興之間興建乍嘉線，以與吳福線相連。其後，又在龍華、徐家匯、江灣、大場等地構築包圍攻擊陣地，並且擬有《掃蕩上海日軍據點計劃》。①盧溝橋事變發生，蔣介石為加強上海防務，接受何應欽推薦，任命張治中為京滬警備司令。張受命後，即命所部化裝為保安隊入駐上海虹橋機場等處。7 月 30 日，張治中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況異常，"似宜立於主動地位，首先發動"。蔣介石同意張治中的設想，復電稱："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②

日本海軍積極主張向華中地區擴張。7 月 16 日，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中將向日本海軍軍令部報告：局限戰將有利於中國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戰困難，"為制中國於死命，須以控制上海、南京為要著"。③8 月 7 日，米內海軍大臣建議杉山元陸軍大臣向內閣提出，為保護青島和上海日僑，應迅速準備派遣陸軍赴華。④次日，長谷川清得到指示，為因應事態擴大，實施新的兵力部署。9 日，上海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長大山勇夫中尉攜帶士兵齋籐要藏，以汽車衝入虹橋機場，開槍射擊中國保安部隊，中國保安隊當即還擊，將大山等二人擊斃。⑤日軍乘機在上海集中兵艦，以陸戰隊登陸，要求中國方面撤退保安隊，拆除防禦工事。海軍中央部通知第三艦隊稱，除武力外，別無解決辦法，將在陸軍動員之後 20 天開始攻擊。10 日，日本內閣會議同意派遣陸軍。長谷川清命在佐世保待命的艦隊開赴上海。12 日，陸軍省決定動員 30 萬兵力分赴上海與青島。

保安隊是上海地區僅有的中國部隊。蔣介石認為，撤退保安隊，上海將

與北平一樣為日軍佔領，決定拒絕日方要求，同時下令準備作戰。11日，蔣介石得悉日艦集中滬濱，決定封鎖吳淞口。同日，命張治中將所屬八十七師王敬久部、八十八師孫元良兩師自蘇州等地推進至上海圍攻線，準備掃蕩在吳淞和上海的日軍，拔除其據點。①當時，日本在上海的海軍特別陸戰隊總兵力不超過 5 千人。②12 日，國民黨中常會秘密決定，自本日起，全國進入戰時狀態。③何應欽在會上表示："和平已經絕望"，"如果他稍有動作，就要打他，否則，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難了。"④

張治中原定於 13 日拂曉前開始攻擊，但蔣介石因英、美、法、意四國駐華使節等方面正在調停，要張"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⑤同日上午九時 15 分，日本陸戰隊水兵衝出租界，射擊守衛橫濱路東寶興路段的中國保安隊，中國軍隊還擊。⑥10 點半，商務印書館附近的中國軍隊與日軍發生小衝突。⑦同日黃昏，八字橋附近日軍炮擊中國軍隊，中國軍隊以迫擊炮還擊。①日軍並以坦克掩護步兵攻擊八十七師陣地，日艦連續炮擊上海市中心。②14 日拂曉，張治中奉蔣介石令，發起總攻。同日，中國空軍出動，轟炸日第三艦隊旗艦及在虹口的海軍陸戰隊本部。淞滬之戰爆發，意味著中國在華北之外，又開闢了第二戰場，名副其實地進入"全面抗戰"。很快，淞滬戰場就成了中國對日作戰的主戰場。

戰爭初起，中國方面以優勢兵力進攻日軍在滬各據點，雙方在上海虹口、楊樹浦等處進行巷戰。15 日至 18 日之間，中國軍隊進展至閘北、虹口、

楊樹浦之線。20 日夜，推進至滙山碼頭，將日軍壓迫至黃埔江左岸狹隘地區，同時包圍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等據點。但是，日軍在上海的據點大都以鋼筋、水泥建成，異常堅固。8 月 17 日，張治中向蔣介石報告說："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堅，但因每一通路，皆為敵軍堅固障礙物阻塞，並以戰車為活動堡壘，終至不得不對各點目標施行強攻。"這種攻堅戰，中國軍隊必須配備相應的重武器。張治中報告說："本日我炮兵射擊甚為進步，命中頗佳，但因目標堅固，未得預期成果。如對日司令部一帶各目標命中甚多，因無燒夷彈，終不能毀壞。"③僅有的三門榴彈炮，一門因射擊激烈，膛線受損；一門膛炸；一門不能射擊。這種情況，自然無法克敵制勝。

中國軍隊當時是否完全缺乏攻堅武器呢？並非。關鍵在於何應欽沒有想到，蔣介石也沒有想到。11 月 20 日，蔣介石檢討說："緒戰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滅滬上敵軍。何部長未將所有巷戰及攻擊武器發給使用，待余想到戰車與平射炮，催促使用，則已過其時，敵正式陸軍，已在蚒江碼頭與吳淞登陸矣。敬之（指何應欽--筆者）誤事誤國，實非淺鮮。"④

蔣介石對張治中的指揮不滿意。8 月 20 日，陳誠向蔣介石提出，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南下直撲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事以牽制之。①蔣介石對陳誠的這一戰略思想沒有表示肯定或否定，僅答以一定要打。同日，軍事委員會將江蘇南部及浙江劃為第三戰區，蔣介石兼任司令長官，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陳誠為前敵總司令。張治中被任命為淞滬圍攻區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

發奎被任命為杭州灣北岸守備區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守衛上海左翼浦東。這些舉措，說明蔣介石開始重視上海戰場，但是，蔣當時還沒有在上海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對這次戰爭的艱難與嚴酷也還缺乏認識。當日日記云："本日滬戰頗有進展，南口陣地已固，此心略安。對英提案運用其能實現，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以今日戰況或有退卻可能也。判斷情報，倭寇陸海軍意見紛歧，政府內部不一致，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勢也。"②次日，日本拒絕英國調停，蔣介石感到事態嚴重，"憂心倍增"。③22 日，蔣介石下令成立第十五集團軍，以陳誠為總司令，守衛上海右翼長江江岸。

日本陸、海、空軍協同，中國反登陸戰失利

日軍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續進攻，必須通過海上的遠距離運輸，將軍隊源源不斷地送到中國戰場。中國海軍的軍力本極有限，艦艇在戰爭開始時或被炸沉，或奉令自沉長江，封鎖航道，已經沒有和日艦進行海上作戰的能力；空軍能作戰的飛機不過一百八十餘架，不足以從空中遏制日本運兵艦艇的航行。④中國軍隊所能進行的只有反登陸，在海岸及相關縱深據點佈置軍隊，阻遏日軍，但是，中國方面又未予以足夠重視，守衛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

8 月 13 日夜，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出兵。15 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為討伐中國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採取斷然

措施之地步"。①同日，日本政府下令，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率領第三、第十一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協助海軍，掃蕩、殲滅上海附近的中國軍隊，佔領上海。17 日，日本閣議決定："放棄以往所採取之不擴大方針，採取戰時態勢上所需要之各種準備對策。"②22 日，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率第三、第十一師團到達上海東南的馬鞍群島。23 日，日軍第十一師團在三十餘艘軍艦密集炮火的掩護下，於長江南岸川沙口強行登陸，佔領川沙鎮，第三師團在吳淞鐵路碼頭登陸，進攻上海北部的吳淞、寶山等地。據中國方面第九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長史說回憶："在 23 日拂曉以後，日空軍開始猛烈轟炸，使我援軍不能接近，日海軍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軍登陸。我沿長江岸守備的第五十六師和沿黃埔江口守備的上海市保安總團，兵力薄弱，日陸軍登陸成功。"③

日軍登陸後，中國方面力圖阻止敵人向縱深發展。張治中在敵機猛炸下騎自行車趕赴前線，一面任命王敬久為淞滬前敵指揮官，指揮部隊固守原陣地，一面抽調第十一師彭善在部、第九十八師夏楚中部北上，拒止登陸之敵。雙方在羅店等地激戰。中國軍隊向日軍發動數次猛攻，雖有進展，但均未奏效。28 日，守衛羅店的中國軍隊傷亡過半，日軍第十一師團佔領羅店。31 日，日軍第三師團攻佔吳淞鎮。9 月 1 日，日軍精銳部隊久留米第 12 師團等三個師團到達上海，實力大增，向中國軍隊發動全線攻擊。9 月 5 日，日軍以優勢兵力及戰車、炮艦、飛機聯合進攻，中國第十八軍第九十八師姚子青營奮力抗戰，激戰至第二日，全營官兵壯烈犧牲。①蘊藻濱沿河之戰，"雙方死亡俱奇重，濱水皆赤，所謂流血成河，顯系實在景況。"②據陳誠報告，該部自 8 月 22 日參戰，至 9

月 7 日，僅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六五個師即傷亡官兵 9039 名，第六師吳淞一役，即傷亡過半。"大部受敵飛機、大炮轟炸，人槍並毀"。其三十六團第二連，守衛火藥庫，"死守不退，致全部轟埋土中"。③

由於江岸地形有利於日本陸海空軍協同作戰，日軍又源源增援，中國軍隊為減少損失，只能主動退守。史說回憶說："日軍在長江沿岸及黃埔江沿岸繼續登陸，與我軍一個點一個點地爭奪，往往日軍白晝佔去，夜間我又奪回。""在日軍艦炮火下，傷亡慘重，往往一個部隊，不到幾天就傷亡殆盡地換下來了。我親眼看見教導總隊那個團，整整齊齊地上去，下來時，只剩下幾付伙食擔子。"④9 月 10 日，第十五集團軍右翼陣地被突破。11 日，第九集團軍奉命向北站、江灣等地轉移。

反登陸戰爭失利，日軍後續部隊源源增加。9 月 11 日，自青島調來的日軍天谷支隊進入月浦鎮。12 日，由華北方面軍轉調的後備步兵十個大隊陸續抵達上海戰場。14 日，自台灣調來的重籐支隊登陸。中國軍隊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

為維護中蘇交通線，蔣介石決定吸引日軍改變主戰場；為配合外交鬥爭，蔣介石決定堅守上海

9 月 11 日以後，中國軍隊轉入頑強的守衛戰。

作為淞滬戰場的最高統帥，蔣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國軍隊的不利態勢。8月28日，羅店失陷，蔣介石日記云："近日戰局，漸轉劣勢，人心乃動搖矣。"31日，吳淞失守，蔣介石再次在日記中表示："我軍轉入被動地位矣。"在這一形勢下，蔣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仗將如何打下去。9月2日日記云："戰略應盡其全力貫注一點，使敵進退維谷，以達我持久抗戰之目的。""敵之弱點，以支戰場為主戰場，故其對華戰爭全在消極，且立於被動地位，故我如處置得策，不難曠日持久，使敵愈進愈窮也。"①這則記述說明，儘管上海戰場形勢不利，但蔣介石決定"全力貫注一點"，在上海長期拖住日軍。其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作戰組長劉斐等向蔣提出，淞滬會戰應"適可而止"，部隊應及時向吳福線國防工事轉移。蔣介石一度接受這一意見，下令執行，但第二天又決定收回命令。②同月14日蔣介石日記云："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抗戰乎？"③兩種方案，前者意味著在上海和日軍決出勝負，後者意味著向吳福線轉移。這則日記，說明蔣對自己的戰略決定有過猶疑。但是，這一時期，蔣從全國各地抽調的部隊正陸續到達淞滬戰場，因此，蔣仍然決定長期堅守上海。其日記云："各部死傷大半，已覺筋疲力盡，若不支撐到底，何以懾服倭寇，完成使命也？"④16、17日，日軍發動總攻擊，中方陣地動搖，前線指揮官向蔣要求撤退，蔣嚴令死守，並親往昆山督師。⑤21日，蔣介石調整部署，將中國軍隊分為右翼、中央、左翼三個作戰軍。右翼軍以張發奎為總司令，下轄第八、第十兩個集團軍；中央軍以朱紹良代替張治中為總司令，下轄第九集團軍；左翼軍總司令陳誠，下轄第十五、第十九兩個集團軍。

當時，中蘇之間的槍械、彈藥有兩條運輸線。一條是經外蒙古、內蒙古、山西大同至內地，一條經新疆、甘肅、山西，連接隴海路。9 月 11 日，大同失陷，蔣介石極為震痛。14 日日記云："閻之罪惡甚於宋之<失>平津，其為無膽識，一至於此，實為夢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對於蘇俄之運貨交通更生困難矣。"當日，蔣介石向自己提問道："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抵抗乎？"①25 日，蔣介石得悉平漢線中國軍隊潰退，河北滄州不守，估計日軍將進攻河南鄭州，中俄之間的第二條聯絡線有可能截斷，決定加強上海戰場，吸引日軍主力。②27 日，蔣介石決定四項抗敵策略："一、引其在南方戰場為主戰場；二、擊其一點；三、持久；四、由晉出擊。"③10 月 8 日，蔣介石決定調驍勇善戰的桂軍加入上海戰場。10 月 15 日日記云："相持半年，遲至明年三月，倭國若無內亂，必有外患，須忍之。"17 日，蔣介石到蘇州督師。次日，中國軍隊在上海戰場發動總反攻。

蔣介石之所以決定堅守上海，一是為了減輕華北戰場的壓力，維護中蘇交通線，同時也是為了配合外交鬥爭，爭取對即將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有較好的影響。《九國公約》簽署於 1922 年 2 月，其簽字國為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國。該條約表示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強調各國在華機會均等與中國的門戶開放。盧溝橋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即向國聯申訴，要求"譴責日本是侵略者"。國聯沒有採納中國的要求，提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10 月 16 日，比利時向有關 19 國發出邀請，初定同月 30 日在布

魯塞爾召開。蔣介石希望通過該次會議，"使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並促使英、美允俄參戰"。①因此，蔣希望在該會召開之前，上海戰場能有較好的戰績，至少，要能堅守上海。據唐生智回憶，蔣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這一仗，要打給外國人看看。"②同月 22 日，蔣介石通電全軍將士，說明九國公約會議即將舉行，全體將士"尤當特別努力，加倍奮勵"，"於此時機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國際地位與友邦同情"。③為此，蔣介石向全國各地普遍調兵。24 日，蔣致電龍雲，詢問滇軍出發各部到達何處，要龍命令該軍"兼程急進，望能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初到滬參戰"，急圖在會前有所表現的企圖躍然欲出。④

日本政府採取對應措施，不斷從華北、東北及國內向上海戰場增兵。10 月 1 日，日首相近衛、陸相杉山、海相米內、外相廣田會議，通過《中日戰爭處理綱要》，決定發動十月攻勢，擴大華北和華中戰局，將中國軍隊分別驅逐至河北省及原上海停戰協定規定區域以外，迫使南京政府議和，結束戰爭。此後，上海戰場日軍參戰兵力超過華北，達 9 個師團，20 萬人以上。17 日，日本陸軍省限令上海作戰部隊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會前攻克閘北、南翔、嘉定一帶。⑤

雙方既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較量，戰場上的拚殺自然更加激烈。10 月 21 日，廣西增援部隊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率部到滬，向蘊藻濱沿河之敵發起全線反攻。桂軍作戰勇敢，但武器落後，缺乏與現代化武裝的日軍作戰的經驗，未能挽救危局。22 日蔣介石日記云："滬局以桂軍挫敗頓形動搖。滿擬以桂軍加入戰線為持久之計，不料竟以此為敗因也。"①次

日，桂軍因傷亡過大，撤至京滬鐵路以南地區整理。②其他部隊也傷亡慘重，第三十三師打到官兵僅剩十分之一，師長負傷，旅長失蹤。③25日，中央軍第七十八軍第十八師朱耀華部防地為日軍突破，朱軍放棄位於上海西北的戰略要地大場。至此，蔣介石才覺得"滬戰不能不變換陣地"，決定命中國軍隊作有限度的撤退，轉移至蘇州河南岸。但是為了給世人留下仍在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印象,他決定在閘北"派留一團死守"。④27日夜,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團附謝晉元奉命率部留守閘北四行倉庫，演出了八百壯士（實只四百人）孤軍抗敵的悲壯一幕。31日，該團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堅持至1941年12月18日。

蔣介石認識到，中國的對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消耗戰，但是，他提出的戰略原則卻是防守戰。8月18日，他發表《告抗戰將士第二書》，主張"敵攻我守，待其氣衰力竭，我即乘勝出擊"。"要固守陣地，堅忍不退，以深溝高壘厚壁，粉碎敵人進攻。"⑤9月13日，蔣介石手擬《告各戰區全軍將士文》，再次強調固守，"雖至最後之一兵一彈，亦必在陣中抗戰到底"。⑥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開軍事會議，仍然表示："要嚴密縱深配備，強固陣地工事"，"要不怕陣地毀滅，不怕犧牲一切"，"我們已移至滬戰最後一線，大家應抱定犧牲的決心，抵死固守，誓與上海共存亡"。⑦

要殺敵衛國，自然需要強調犧牲精神，但敵人擁有海、空優勢，配備重武器，呆板的防守戰必然帶來巨大的傷亡，最終也難以守住陣地。當時，日方有各種飛機1500架，而中國僅有戰鬥機、轟炸機300架。①8月

24 日，張治中致蔣介石、何應欽密電云："連日敵機甚為活躍，全日在各處轟炸，毫無間斷，我軍日間幾無活動餘地，威脅甚大。"②白崇禧也表示："無制空權，仗無法打。我官兵日間因飛機不能動，夜間因探照燈亦不能動。長期抵抗，須另有打算。"③淞滬之戰，中國軍隊士氣旺盛，英勇抗敵，但蔣介石單純防禦，將幾十萬精銳密集於長江南岸狹長地區內，層層設防，硬打死拼，大量消耗中國軍隊的有生力量。後來，蔣介石回顧淞滬戰役，就曾自我檢討，認為自己沒有在九國公約會議之前，及早退兵於吳福線、乍嘉線陣地，"而於精疲力盡時，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堅強之過也"。④

日軍最初制訂的作戰計劃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灣登陸，佔有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帶。為此，日軍早就對杭州灣實施偵察，收集地誌資料。⑤金山衛水深，可停艦艇，又有利於登陸的沙灘，明代倭寇擾浙時，即在此登陸。8 月 20 日，蔣介石得報，金山衛有日本水兵登陸偵察，指令"嚴防"。⑥10 月 18 日，軍事委員會第一部作戰組情報提出，日軍有在杭州灣登陸企圖，但估計登陸部隊最多一個師，不會對上海戰局有什麼影響。①倒是張發奎有警覺，親到當地巡察，並配置了兵力：以第六十三師擔任乍浦、澉浦防務，以第六十二師擔任全公亭、金山嘴防務。10 月 26 日，中央軍撤到蘇州河南岸後，浦東防務緊張，張發奎遂將第六十二師主力調防浦東，當地僅餘該師少數兵員，實力空虛。②

11 月 5 日，日軍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個半師團的兵力，在艦炮掩

護下，於杭州灣北岸的金山衛登陸。中國軍隊因兵力懸殊，無法阻擋。中國統帥部急令已調浦東第六十二師的主力回兵，會同新到楓涇的第七十九師合力反擊，並令從河南調來、新到青浦的第六十七軍向松江推進。蔣介石希望借此穩住陣地。6 日，蔣介石日記云："如我軍能站穩現有陣地，三日以後當無危險矣。"③但是，由於天雨泥濘，加上日機轟炸，中國部隊行動遲緩，日軍後續部隊源源登陸。第六十七軍從河南調來，尚未集中，即遭敵各個擊破。8 日，松江失陷，這樣，退守蘇州河南岸的中國軍隊側背受敵，有被圍殲危險。

日軍在金山衛登陸，上海戰場中國軍隊的側背受到嚴重威脅，有可能陷入包圍，使退卻無路，全軍覆沒。有鑒於此，白崇禧再次向蔣介石提議，中國軍隊向吴福線後撤。11 月 7 日，朱紹良、何應欽等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後撤之時會"④。蔣介石權衡利害，這才認識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日記云："保持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失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相較，當以前者為重也。"⑤同日，蔣下令中國軍隊自上海蘇州河南岸撤退。⑥但是，他仍然擔心此舉會對《九國公約》會議造成不良影響，痛苦地寫道："蘇州河南岸以兵力用盡不能不令撤退，但並非為金山衛登陸之敵所牽動耳，惟藉此戰略關係退，使敵知我非為力盡而退，不敢窮追與再攻，是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必甚大也。"①

忽視杭州灣北岸防務是重大的戰略錯誤。後來蔣介石總結說："由大場撤退至蘇州河南岸以後，易朱紹良，以張發奎為指揮官，使金山衛、乍

浦一帶，負責無人，而且不注重側背之重要，只注意浦東之兵力不足，調金山大部移防浦東，乃使敵軍乘虛直入，此余戰略最大之失敗也。"②

一個優秀的軍事家必須既善於組織進攻，又善於組織撤退。蔣介石下令在蘇州河南岸撤退後，中國軍隊爭相奪路，秩序混亂，作戰能力喪失殆盡。郭汝瑰說："淞滬戰役我始終在第一線，深知三個月硬頂硬拚，傷亡雖大，士氣並不低落，戰鬥紀律良好，只要撤下來稍事整理補充，即可再戰。唯有大潰退，數日之間精銳喪盡，軍紀蕩然。如在敵攻佔大場時，就有計劃地撤退，必不致數十萬大軍一潰千里。"③11 月 11 日，中國軍隊撤出上海南市，上海市長發表告市民書，沉痛宣告上海淪陷。

據日方統計，至 11 月 8 日止，日軍在上海戰場陣亡 9115 名，負傷 31257 名，合計 40672 名。④但是，中國方面損失更大。據何應欽 11 月 5 日報告，淞滬戰場中國軍隊死傷 187200 人，約為日軍的 4 倍半。⑤更加嚴重的是，潰退後的軍隊雖然仍有龐大數量，但缺乏武器、彈藥、糧食，士氣低落，喪失鬥志，不經整頓，已經很難再次投入戰鬥了。

南京：守乎？棄乎？

日軍攻佔上海後，軍方出現兩種意見，一種認為軍隊已經非常疲勞，必須休整，一種意見認為，軍隊雖然疲勞，但仍應攻佔南京。11 月 7 日，

日軍編組華中方面軍，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規定以蘇州、嘉興連結線為"統制線"，在此以東作戰。但是，第二天，日軍就兵分兩路。一路以上海派遣軍為主力，沿滬寧鐵路線西進，一路以第十軍和國崎支隊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結。13 日，日軍一部在常熟白茆口登陸，聲勢更盛。15 日，第十軍幕僚會議認為，中國軍隊已處於潰散狀態，如果把握戰機，斷然實施追擊，二十天即可佔領南京。華中方面軍贊同佔領南京的意見，認為"現在敵軍的抵抗，各陣地均極微弱"，如不繼續進攻，"不僅錯失戰機，且令敵軍恢復其士氣，造成重整其軍備的結果，恐難於徹底挫折其戰鬥意志"。①

日軍自太湖南北同時西進，威脅南京。11 月 13 日，蔣介石決計遷都，長期抗戰，粉碎日寇迫訂城下之盟的妄念。日記云："抗倭最後地區與基本線在粵漢、平漢兩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難，當在最後五分鐘。""決心遷都於重慶。"②但是，南京是戰是守，意見不一。高級將領中普遍反對"固守"。有人明確表示，不應在南京作沒有"軍略價值之犧牲"，白崇禧主張改取游擊戰，劉斐主張適當抵抗之後主動撤退，只作象徵性防守。③蔣介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11 月 17 日，他曾經考慮過請美、德兩國出面調停，也曾考慮請英美促進蘇聯參戰，在南京固守或放棄之間"躊躇再四"。④不過，蔣介石和唐生智都認為，南京為首都所在，總理陵墓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犧牲。蔣並表示，願自負死守之責。將領們認為統帥不宜守城，時在病中的唐生智遂自動請纓。①19 日，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劉興為副司令長官，負責守衛南京，時間為三個月至一年。②不過，蔣介石也確知南京難守。11 月 26 日，蔣

介石拜謁中山陵及將士公墓，歎惜道："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對上、對下，對國、對民無以為懷矣。"③這正是蔣內心矛盾的表現。

淞滬之戰打響後，主和之議一直未歇。9 月 8 日，蔣介石日記云："主和意見派應竭力制止。""時至今日，只有抗戰到底之一法。"④次日日記云："除犧牲到底外，再無他路。主和之見，書生誤國之尤者，此時尚能議和乎！"⑤及至淞滬戰敗，主和之議再盛。居正原來堅決反對和議，力主逮捕胡適，此時轉而力主向日方求和，並稱："如無人敢簽字，彼願為之！"⑥11 月 30 日，蔣介石處理南京戰守事畢，慨歎道："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高級將領皆多落魄望和，投機取巧者更甚。若輩毫無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時倡言抗戰如斯之易為何所據也。"⑦

為了守衛南京，中國統帥部的第三期作戰計劃規定：京滬線方面，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既設工事，節節抵抗，同時抽調兵力，以一部轉入滬杭線，抵禦向太湖南岸進軍的日軍，一部增強南京防禦能力。計劃稱，在後續援軍到達時，將以皖南的廣德為中心，與敵決戰，在錢塘江附近殲滅日軍。⑧當時，中國軍隊已退至第一道國防線--吳福線，但是，這道被譽為中國興登堡防線的國防工程卻"無圖可按，無鑰開門，無人指示"。①19 日，日軍進佔蘇州。俗話云："兵敗如山倒。"吳福線不守，中國軍隊主力繼續向錫澄線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寧國（安徽）等地潰退，蔣介石原來以為"有良好地形，堅固陣地，可資扼守"的錫澄線同樣沒有發揮作用。11 月 20 日，蔣介石調集第二十三集團軍川軍劉湘部五個師、兩個獨立旅，由四川趕到皖南廣德、浙西北的泗安、長興

一線。不過，川軍作戰能力很低，紀律很壞，"聞敵即走"，並未發揮多大作用。②11 月 23 日，蔣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將領訓話，局勢也並無改變。11 月 25 日，無錫失守。26 日，位於太湖南岸的吳興失陷。蔣介石得悉錫澄線守軍撤退秩序不良，日記云："不分步驟，全線盡撤，亦未得呈報，痛心盍極！"③29 日，日軍侵佔宜興。30 日，日軍攻陷廣德，從東南、西南兩個方面對南京形成包圍之勢。12 月 1 日，江防要塞江陰失守。同日，日方下達"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應與海軍聯合進攻中國首都南京"的皇命，日軍分三路進攻南京.

蔣介石反對與日本議和,但不反對國際調停。早在日軍金山衛登陸之際，德國大使陶德曼即受日方委託，向蔣轉達日方媾和條件，"防共協定為主"，蔣介石"嚴詞拒絕之"。④24 日，蔣介石曾經寄以希望的《九國公約》會議閉會，沒有取得任何積極性成果。12 月 2 日，蔣介石為行"緩兵計"，再次會見陶德曼，表示願以日方所提條件為談判基礎，但要求先停戰後談判。6 日，蔣介石得悉句容危急，決定離開南京，他在日記"雪恥"條下寫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三年組織，三年準備。"⑤7 日，蔣介石飛離南京。日記云："人民受戰禍之痛苦，使之流離失所，生死莫卜，而軍隊又不肯稍加體恤愛護，慘目傷心，無逾於此。"又寫道："對倭政策，惟有抗戰到底，此外並無其他辦法。"①到廬山後，蔣介石即研究、制訂全國總動員計劃，準備在"全國被敵佔領"的最壞情況下仍然堅持奮鬥。②他勉勵自己："寧為戰敗而亡，毋為降敵而存。"③

南京的防禦工事分"外圍陣地"與以城牆為主要依托的"復廓陣地"兩種。

12 月 5 日，日軍進攻"外圍陣地"。8 日，湯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國軍隊進入"復廓陣地"。9 日，日軍逼近南京城牆，兩軍在光華門、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門等處激戰，光華門幾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 10 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堅決拒絕。12 月 11 日，松井石根下令總攻。

淞滬戰後，中國軍隊消耗過大，蔣介石百方拼湊，守城兵力僅得 12 個師，約 12 萬人，而且士氣極端低落，其中新補士兵約 3 萬人，未受訓練，匆促上陣，官兵間尚不相識。這種情況，本已不能再用守衛戰、陣地戰一類的作戰形式。蔣介石之所以堅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輕易失守，攸關體面；二是對蘇聯出兵有所期待。

當時在國際列強中，蘇聯是唯一表示願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家。8 月 21 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久議未決的互不侵犯條約，蘇方允諾中國可不以現款購買蘇聯軍火。9 月 1 日，蔣介石就在國防最高會議上預言，蘇聯終將加入對日戰爭。④28 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奉召返國，曾和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談及蘇聯參戰的必要條件。⑤10 月 22 日，蔣致電時在莫斯科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楊傑，詢問如《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失敗，中國決心軍事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日期。11 月 10 日，伏羅希洛夫在宴別中國代表張沖時，要張歸國轉告：在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俄當出兵，決不坐視。30 日，蔣介石致電伏羅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謝，電稱："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後、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蘇俄實力

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①當時，蔣介石將蘇聯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 月 5 日，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回電稱，必須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或其中大部分國家同意"共同應付日本侵略時"，蘇聯才可以出兵，同時還必須經過最高蘇維埃會議批准，該會議將在一個半月或兩個月後舉行。②此電與楊傑、張沖的報告不同，蔣介石內心感到，蘇俄"出兵已絕望"③，但他仍然再次致電斯大林，表示"尚望貴國蘇維埃能予中國以實力援助"。④不僅如此，他還繼續以之鼓舞身邊的高級將領，聲稱"俟之兩個月，必有變動"。⑤12 月 6 日，蔣致電李宗仁、閻錫山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必可轉危為安。"⑥這裡所說的"國際形勢必大變"，仍指蘇聯出兵。12 月 11 日，蔣已經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⑦但第二天卻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等稱："經此激戰後，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惟我革命轉敗為勝唯一之樞紐。"蔣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來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①不難看出，蔣所說所的"內外形勢必一大變"的"外"，仍然包含蘇聯出兵在內。"蘇俄無望而又不能絕望"②，這正是蔣介石當時的無奈心理。

蘇聯與中國同受日本侵略威脅，因此，支持中國抗戰，但是，蘇聯更擔心德國入侵，日蘇之間的矛盾又尚未發展到必須干戈相見地步，蘇聯自然不可能輕易在遠東有所動作。

12 月 12 日，日軍繼續猛攻，中華門、中山門、雨花門、光華門等多處城門被突破，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決定大部突圍，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於情況混亂，撤退命令無法正常下達。除少數部隊突圍外，大部分軍隊擁至長江邊，形成極度混亂的局面。挹江門外，"被踏死者堆積如山"。③"僅有之少數船舶，至此人人爭渡，任意鳴槍。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隊以槍擊毀，沉沒者有之，裝運過重沉沒者亦有之。"④12 月 13 日，日軍攻陷南京。

在極端困難的狀況下堅持抗戰國策

首都失陷，常常和國家淪亡相聯繫，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有的現象。一時間，日軍驕橫氣焰達於極點，中國政府、中國軍隊、蔣介石個人都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怎麼辦？中國的路應該怎樣走下去？

12 月 15 日，蔣介石召集高級幹部會議討論，當時的情況是："主和主戰，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①汪精衛本來對抗戰就信心不足，這時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蔣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組織掩護"。②顯然，汪企圖拋棄抗戰國策，在國民政府之外另樹一幟。孔祥熙這時也從"傾向和議"發展為"主和至力"。③18 日，蔣介石日記云："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④當時，陶德曼的調停還在繼續，蔣介石擔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較"和緩"的

條件，誘使中國內部發生爭執與動搖。26 日，蔣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議和條件，發現較前"苛刻"，認為"我國無從考慮，亦無從接受"，內部不致糾紛，心頭為之一安，決心"置之不理"。⑤2 月 7 日，蔣介石召集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討論，主和意見仍佔多數，於右任等甚至當面批評蔣介石"優柔而非英明"。⑥會上，蔣介石堅持拒和。28 日，蔣與汪精衛、孔祥熙、張群談話，聲稱"國民黨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求自由與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敵，訂立各種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我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⑦次日，再與於右任、居正談話，表示"抗戰方針，不可變更。此種大難大節所關，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也。"⑧蔣介石認為，與日本議和，外戰可停，而內戰必起，國家定將出現大亂局面。次日日記云："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①1938 年 1 月 2 日，蔣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決心："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②他最終決定，拒絕德國方面的斡旋，堅持既定的抗戰國策。

從 8 月 13 日至 12 月 13 日，蔣介石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指揮抗戰四個月，淞滬、南京之戰顯示了中國軍隊、中國政府、中國人民的堅強不屈的精神，打擊了日本的侵略氣焰和在短時期內速勝的美夢。此後，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廣大戰場上就愈陷愈深，終致不能自拔。

從戰爭學習戰爭。淞滬和南京之戰期間，蔣介石和部分國民黨高級將領認識到，中國對日抗戰是持久戰，必須以空間換時間，必須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能在局部地區拼消耗；必須懂得運用陣地戰、守衛戰以外的其他作戰形式。9 月 16 日，蔣介石日記云："上海之得失不關

最後之成敗，不必拘泥於此也。"③11 月 7 日，日記再云："此時各戰區以發動游擊戰爭，使敵所佔領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之防不勝防也。"④12 月 1 日日記云："戰敗敵軍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時間上作長期抗戰，以消耗敵力；在空間上謀國際之干涉，與使敵軍在廣大區域駐多數兵力，使之欲罷不能，進退維谷，方能制敵之死命，貫徹我基本主張，此旨萬不可稍有動搖。"⑤同月 16 日，南京失守後的第三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國民書》稱："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堡壘，以制敵之死命。"①這些地方都說明，通過挫折和失敗，蔣介石的戰略思想有了長進。

還在淞滬之戰的緊張關頭，蔣介石曾經在日記中寫道："凡我中國之寸土失地皆灑滿吾中華民族黃帝子孫之血跡，使我世世子孫皆踏此血跡而前進，永久不忘倭寇侵佔與慘殺之歷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毀滅絕，期達我民族鬥爭最後勝利之目的。"②淞滬之戰雖然失敗了，但是，中國軍人所表現出來的浴血苦戰、視死如歸的愛國精神與犧牲精神必將長留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第 1 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年 3 月出版。

附記：蔣介石為何開闢新戰場

當華北戰場危急之際，蔣介石主動開闢淞滬戰場。舊說之一以為，這是蔣介石為了將日軍的進攻矛頭由自北而南引向由東而西，以免日軍過早地攻佔武漢，截斷國民政府自南京西遷的道路，是一項很高明的戰略決策。此說曾引起激烈爭論。一派主張蔣在事前即有明確意識，一派主張蔣在事前並無明確意識。兩說長期相持不下。

關於開闢淞滬戰場的原因，蔣 1938 年 5 月 5 日曾在《雜錄》中寫道："敵軍戰略本以黃河北岸為限，如不能逼其過河，則不能打破其戰略，果爾，則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綽綽有餘，是其先侵華北之毒計乃得完成，此於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華北之戰略，一則逼其軍隊不得不用於江南，二則欲其軍隊分略黃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駐華北。中倭之戰必先打破其侵佔華北之政策，而後乃可毀滅其侵略全華之野心。總之，倭寇進佔京滬，其外交政策已陷於不可自拔之境，而其進佔魯南，則其整個軍略亦陷於不可收拾之地也。"①據此可知，當時蔣介石開闢淞滬戰場的目的，在於分散日軍兵力，粉碎其首先佔領華北的侵略計劃。

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
-- 日方誘和與蔣介石的應對及剎車

中日秘密談判可以說是抗日戰爭期間最詭異的事件。這不僅表現在中日雙方，而且也表現在中國內部。一方面，蔣介石屢屢對孔祥熙的謀和活動加以阻遏，但是，蔣介石本人又親自掌控過幾次對日秘密談判。不將這些情況研究清楚，就無法真正瞭解談判全局，也無法瞭解蔣介石的真實對日意圖。

精心指導的蕭振瀛與和知鷹二之間的談判

南京陷落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主和派一度抬頭，但蔣介石堅決拒和，力主堅持抗戰國策。1938 年 3 月 13 日，蔣介石專門在日記本中寫了一段話："中國對倭抗戰，決非爭一時之勝負與得失，而為東亞千百世之禍福有關，故不惜任何犧牲，非達到此目的，終無戰亂終止之期。"①但是，同年 4 月，中國軍隊在山東台兒莊取得勝利，蔣介石覺得中國有了和日本侵略者談判的籌碼，思想的天平開始傾向"和平"一端。4 月 9 日日記云："此時可戰可和，應注重和局與準備。"②此後，日方有希望英國出面充當調人之意，而蔣介石也曾決定派張群使英，在當地與日本進行和平交涉，以便於英國從中斡旋並擔保。①5 月下旬，日本內閣局部改組，近衛首相以陸軍前輩宇垣一成大將出任外相，企圖借助他

來抑制陸軍。蔣介石看出宇垣將對華主和，準備利用宇垣，壓制日本陸軍中的少壯派。但是，蔣介石也提醒自己，防備宇垣對中國內部實行"挑撥離間"。②日記云："敵國陰狠，講和時更增危機也。"③果然，宇垣上台後，即不斷向中國搖晃橄欖枝。蔣介石則以"剛柔得宜"的政策相對應。④一面抵抗日本侵略軍對武漢的進攻，一面也和日方代表在談判桌上周旋。8 月下旬，蔣介石開始指導蕭振瀛和日本軍部特務和知鷹二進行談判。

蕭振瀛（1886—1947），字仙閣，號彥超，吉林扶餘人。曾任西安市長。1930 年任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總參議。1935 年任天津市市長。次年任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席。其間，曾多次與日軍駐華北將領多田駿等人談判。1937 年抗戰爆發，蕭振瀛任第一戰區長官部總參議。1938 年 7 月下旬或 8 月初，日本軍部特務"蘭工作"負責人和知鷹二到達香港，蕭振瀛與和知是"舊友"，因此受命與和知談判。談判中，和知提出總原則 6 條，其中有誘餌，也有新的侵略要求：1.停戰協定成立之時，兩國政府正式命令，停止一切陸、海、空軍軍事敵對行動，中國政府以新的姿態，恢復七七盧溝橋事件以前狀況。2.日本政府絕對尊重中國主權、領土、行政之完整。3.兩國軍事完全恢復戰前原有狀況後，以平等互助為原則，商訂經濟協定，以謀東亞經濟全面的合作。4.兩國謀國防上之聯繫，在共同防止共產主義目標下，商訂軍事協定。5.兩國政府努力恢復兩國人民情感上之親善與諒解，取締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論。6.兩國在此次事變中所發生之一切損失，以互不賠償為原則。和知提出的《經濟協定基本原則》共 4 條：1.本平等互助原則，儘先歡迎日本投資，如日

本財力不逮，可向歐、美各國商借資本。2.資源與市場之緊密調整與提攜。3.兩國互惠關稅之協定。4.戰後復興之合作。其《軍事協定基本原則》共 3 條：1.中日兩國共同防衛，共同作戰。2.平時訓練，得聘請日本軍事顧問及教官，向日方訂購及補充器材。3.國防之聯繫。軍事內容與情報之交換。①

當時，日軍正節節向武漢逼進，和知"求和"，使國民黨內部的部分"主和"派覺得是個機會，但蔣介石對此卻不抱希望。8 月 26 日，蔣介石與智囊、《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商談，對張表示："觀察倭寇在華之權益與設施，豈能隨便放手還我乎？若無重大變化與打擊，彼決不罷手。一般以為和知來求和抱樂觀者，實未究其極也。"②他在日記中明確寫道："對和知應拒絕。""倭寇軍閥不倒，決無和平可言。惟有中國持久抗戰，不與言和，乃可使倭閥失敗，中國獨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③9 月 23 日，蔣介石返回漢口，主持匯報會議，決定對策。由於和知的條件首先就是"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這是蔣介石求之不得的夢想，自然勾起蔣的興趣。會議決定："倭必先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與恢復七七事變前之原狀，然後方允停戰。"④此前，國民政府一直要求，在與日本談判時必須有第三國保證，但是，就在幾天前，英、法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犧牲捷克主權以綏靖納粹德國，因此，匯報會議決定，可直接與日方談判。9 月 26 日，蔣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會局長、有對日交涉經驗的雷嗣尚到港，加強談判力量。這一時期，蔣介石正在觀察歐戰的狀況，認為如歐戰不能即起，有機即和；如歐戰果起，"則對倭更須作戰到底"。①

9 月 27 日，蕭振瀛、雷嗣尚與和知鷹二第一次會談，首先告以軍事協定不能簽訂。和知答稱，軍事協定與經濟協定，均在恢復七七以前原狀後再辦。事後，蕭電蔣報告。蔣復電指示："1.與對方談話，切不可稍有一點增減，必須依照所面述之範圍，萬不可有所出入。2.不可抱有成就之望，要知我方全處被動地位，遷就不但無益，必受大害。如主動方面有誠意，我方不遷就，亦能成就也。3.每日在途中住宿地，能通長途電話時，請通電話一次，以便隨時接洽，恐逐日局勢有變化，俾可隨時洽商也。4.對於無商量餘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試探，必須堅強拒絕，以我方本不望有所成就，而所慾望成者，實在對方也。此意須特別認識，並知我國至此，實毫無其他希望，只有死中求生之一途也。5.一切言語態度，須十分穩重從容，萬不可帶有急忙之色。緩急先後，皆由其便。我方必須以無所為〔謂〕之態度處之，更不必要求其必答，有所期待也。須知我方除此之外，並無再可商洽之事，即以此為最後之辦法也。6.所寫具體各件，切不可以書面明示彼方，且須對彼言明，無具體成文之件攜來，一切皆以口頭商洽，作為臨時相商之事可也。"②

當日午後，蕭振瀛等與和知第二次會談。蕭等向和知說明：1.中國方面，自孫總理至蔣委員長，對於日本之強盛，均有深刻之認識與敬意，企求自存、共存，與日本共定東亞大計。日方苟有和平誠意，中國必以誠意應之。2.日方嘗強調東亞主義，以"東亞之事，東亞之人自了之"為內容，中國亦甚同情，但因弱國恐受強國欺凌之故，始終不願直接交涉，必須有第三國介入並保證，方能重建和平，但如日方確有誠意，尊重中國行

政、主權及領土之完整，則中國自當以最大誠意，與日方直接談判，不要第三國介入。此事如能實現，即東亞主義之大成功，即日方之大勝利、大收穫，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3.現在日軍進攻武漢，大戰方酣，中國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著，為停止軍事，恢復七七前之狀態。4.如果軍事停止，一切恢復七七前狀態後，中日兩國誠意展開兩國、兩民族之全面合作，將來定可做到經濟合作，外交一致。5.中國自十六年清黨以來，即站在堅決剿共立場，日方必有正確認識，共產主義斷乎與中國國情不能相容。中國國內之防共，中國自能為之。6.日方尊重中國行政、主權、領土之完整，對於中國內政絕不干涉。中國人最恨者，為日、鮮浪人之販毒，認為是滅種政策，必須切實取締；中國最疑畏者，為日方所設在華特務機關，認為是亡國政策，必須加以取消。7. 中國不騙人，作敵徹底，作友也徹底，將來必做到中國人愛日本如愛中國，同時日本人愛中國亦應如愛日本。8. 如果日方能以強國大國風度，照此做去，不問國際形勢如何演變，即在日本極不利之環境下，中國亦必以最大誠意直接談判，重建和平。①

和知認為蕭振瀛的談話在原則上、精神上與日方認識相同，雙方取得初步結論：1.停戰協定中不涉及軍事協定字樣。2.俟恢復七七事變前狀態後即訂經濟協定。3.對中方提出的不訂軍事協定問題，和知本人認為可以商量，但恐東京方面堅持，故對此點表示保留。4.和知同意，由日本先發和平宣言，中方以和平宣言響應，即停止進攻若干日，作為雙方正式代表簽訂停戰協定的時間，其簽訂地點可在香港。5.雙方和平宣言須以電報事前商定原稿，方得發表。6.和知定 28 日晚回東京，作最後決定，

於 10 月 10 日前電告，和知本人隨後即來香港。7.和知離港後請雷嗣尚飛漢，面陳詳情。②

同日，蔣介石致電蕭振瀛，要求向對方堅決表示："原狀未復，誠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國之事實證明以前，決不允商談任何協定。不僅軍事協定之字樣不得涉及於停戰協定之中，即經濟協定，在原狀未復以前，亦不能商談。"關於"經濟協定"，電稱："兄等攜來經濟協定之原稿，無異亡國條件，更無討論餘地。"關於"停戰協定"，電稱："只可訂明停戰之時間、地點與日本撤兵及恢復七七以前原狀之手續與月日，此外不能附有任何其他事項。"關於"停戰日期"，電稱："停戰之日，即為停戰協定同時發表之日，決不可以停止進攻若干日為簽訂協定之時間。換言之，中國於停戰協定未簽訂之前，絕不願停戰。"蔣介石並要蕭振瀛鄭重聲明："原狀未復，且未有以平等待我之事實證明以前，決不能再提軍事協定，且絕無保留之餘地，否則請明告對方，無從再約續談也。"①蕭振瀛收到蔣的電報後，於當日與和知進行第四、第五次會談，反覆討論，和知表示願作讓步：1.對停戰協定中不出現軍事、經濟協定字樣一條，認為可以商量。2.對中方要求日方以事實表示誠意，非恢復七七前原狀後，不商談任何協定一條，表示"頗諒解"。但是，和知也表示，關於將來中日合作的具體內容,事前須取得一種"無文字的諒解","否則，日方無以自圓其立場"，證明中方"毫無誠意，日本斷難相信"。②28 日晚 12 時，和知離港回國，行前向蕭振瀛透露：日方此舉的國際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電請日方與中國謀和，共同對蘇；其次要原因則為日本國內困難重重，不堪應付長期戰爭，擬在軍事優勢下，以較大讓

步取得和平。和知稱：近衛文麿、板垣征四郎、多田駿等雖有遠識，但日本朝野各方，尚無普遍認識。此次回東京，遭遇困難必多，將拚死努力，於 10 月 10 前以日方最後態度相告。③

9 月 29 日，蕭振瀛致電蔣介石，報告 28 日與和知會談情況，聲稱前後談話，均以恢復七七事變前狀態為唯一前提，與蔣的指示並無出入。在轉述和知臨行前密告的日方謀和原因後，蕭稱：和知此次奉近衛、板垣、多田之密令而來，態度確甚誠懇、坦白，條件亦較以前多次提出者為合理。最近東京將舉行重要會議，決定武漢會戰之後的對策，但日方亦有主張"硬幹到底"者，南京偽組織、北平偽組織又多方破壞和局，故前途定多周折。①他要蔣介石表態，"若雙方意見，距離尚不甚遠，而和知再度來港，我方應如何應付，應請預籌"。②

蕭振瀛與和知在香港的談判以日方承認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前提，符合蔣介石的要求，談判也似乎進展順利，蔣介石甚至開始研究和談成功時的停戰、撤兵要點。10 月 1 日，蔣介石日記云："甲、分區交代。乙、交接與衝突時之地方治安維持辦法。丙、交接時防制（止）誤會。丁、預防察綏與冀東及偽組織之處置。"又云："停戰、撤兵後，先訂不侵犯條約，後商互助協定。"③10 月 2 日，蔣介石從孔祥熙處讀到香港情報一件，其中談到日人百武末義回國活動中日議和情形，百武希望瞭解，如果日本發表和平聲明，中國是否能夠發表聲明響應。蔣介石當即電詢孔祥熙，"其言是否可信"。他指示："總要前途先擬整個確實辦法，再談雙方宣言也。"④此後，中國方面即開始草擬《和平宣言》。

中方草擬的《和平宣言》稱：

中國所求者，惟為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與民族自由、平等之實現。日方誠能如其宣言所聲明，對中國無領土野心，且願尊重主權、行政之完整，恢復盧溝橋事變前之原狀，並能在事實上表現即日停止軍事行動，則中國亦願與日本共謀東亞永久之和平。內求自存，外求共存，此為中國立國唯一之政策，亦為世界各友邦所深信，況與日本為同文同種之國家，誠能共存共榮，何忍相仇相殺！苟日本能以誠意相與，中國亦以誠意應之。倘使能以此次戰爭之終結為樞紐，一掃荊棘，開拓坦途，共奠東亞永久之和平，是不僅為中日兩大民族之幸，亦為世界全人類和平之福也。

蔣介石特別在"中國亦願與日本共謀東亞永久之和平"一句下以紅筆加寫了一段話："我政府對於和戰之方針與其限度，早已屢次聲明，即和戰之標準全以能否恢復七七以前之原狀為斷。蓋始終以和平為主，認定武力不能解決問題也。"①中方也草擬了《停戰協定》草案等有關文件。《停戰協定》草案共 5 條：1.停戰協定成立之同時，兩國政府即命令各該國陸、海、空軍停止一切敵對行動，日本並即撤兵，在本協定簽字後三個月內恢復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前之原狀。2.日本政府絕對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3.兩國政府努力恢復兩國人民情感上之親善與諒解，取締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論行動。4.兩國在此次事變所發生之一切損失，以互不賠償為原則。5.本協定自發佈日起發生效力。草案提出：該協定

可在福州或九龍簽字，在中國方面發表《和平宣言》後一日公佈。日軍撤兵分三個時期，每期一個月，至第三期時，日軍完全撤出黃河以北及黃河、長江以南，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考慮到清末《庚子條約》規定外國軍隊在平津一帶有駐兵權，蔣介石特別以紅筆加添了一句："日本在平、津一帶之駐軍人數務須與庚子條約相符，勿多駐兵。"②關於當時存在於華北、華中的兩個偽政權，草案提出：1.自停戰協定簽訂之日起兩星期內，南北兩偽組織即行取消。2.國民政府對於偽組織之參加者，寬大處理，但絕不能有任何條件。關於中日兩國合作問題，中方提出："必須在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後，方能商訂協定，事前只能交換意見，成立精神上的無文字的諒解。"關於《經濟協定》，草案提出："絕對以平等互惠為原則"，日方"所提原則，尚須修改"，"將來舉行經濟會議，決定具體內容"。在此，蔣介石以紅筆批示："此時絕對不得商討內容與具體辦法。"①關於《軍事協定》，草案提出："在恢復原狀後，可先商訂互不侵犯條約。"蔣介石批示稱："此可研究。"②關於"滿洲國"問題，草案擬訂了"相機應付"的三條談判意見：1.日方自行考慮，以最妥方式及時機，自動取消"滿洲國"，日本保留在東北四省一切新舊特權，但承認中國之宗主權。2.中國承認東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華一切特權為交換條件（如租界、領事裁判權、駐兵、內河航行等等）。3.暫仍保留。蔣介石在第三條後加了一句："待商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再談。"③

10 月 8 日，雷嗣尚到漢口向蔣介石請訓，蔣當面指示：1.對方如確有誠意，應在 10 月 18 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續，否則不再續談。2.我方絕對不

要停戰，更不害怕漢口失守，盡有力量支持長期抗戰，此層應使對方徹底認識。3.直接談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決而言，並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對方如不質詢此點，我方自不必自動說明。4.此次談判，系對方主動，我方誠意與之商洽，對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實，散播不利於我方之宣傳，否則認為對方毫無誠意。5.停戰協定系兩國政府間之協定，不可作為前線軍隊與軍隊間之協定。6.談判重點應集中於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若對方能做到此層，以後雙方定能開誠合作。④蔣特別強調："絕對拒絕之事，寧死勿允。""凡將來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處束縛。""破裂則不怪，越范則不可。"①

和知於 9 月 28 日離港返回日本後，於 10 月 15 日再到香港。16 日，與蕭振瀛會晤稱：回國後向近衛、多田、板垣等人匯報，都認為蔣介石"有誠意"，願意放棄此前歷次宣言，以誠意商談。日方並經最高會議決定，中日停戰協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協定，但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後必須有七項諒解。甲、防共軍事協作及駐兵；乙、中國政府之調整；丙、偽組織之收容；丁、"滿洲國"之承認；戊、中國領土主權之尊重；己、日、華、"滿"經濟提攜；庚、戰費互不賠償。這七項"諒解"表明，日方雖然聲稱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但頑固地要求中國簽訂《防共軍事協定》，在中國國土上駐兵，承認"滿洲國"，並且狂妄地要求中國政府改組。和知深知這些條件不可能為中國政府接收，因此有意作了"弱化"，其"解釋"是：甲、如中國政府自動實行反共，則可秘密約定。所謂駐兵，指將來在內外蒙邊防，雙方作軍事佈置之意。乙、所謂"中國政府之調整"，指"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員參加，以便促進中日兩國親善之關係"。丙、所

謂"偽組織之收容"指對其主要人物酌予安置。丁、滿洲國問題暫可不談，待合作三、二年後再商解決。戊、日、華、満經濟提攜，満字可不涉及，軍事協定亦可不再訂。和知稱：前次所談原則，只有軍、參兩部最高首腦同意，此次則已取得內閣全體之同意。表面雖近煩苛，實際已經讓步。如防共問題，倘使中國自有辦法，則協定之有無，仍可從長商討。又稱：自天皇以下對於此事均盼速決，只須雙方誠意努力，當可順利解決。關於日軍當時仍在向華南進兵問題，和知解釋說，此系以前預定計劃。如和談有眉目，即可停止。和知並表示，可致電日本軍部，通知前方，對於夜間飛機，不加襲擊，以便代表在香港、漢口之間往來。對於和知提出的上述條件，蕭振瀛稱："超出前談範圍，不能答覆。"17 日夜，蕭振瀛致電何應欽，請示"究應如何"。①

10 月 18 日，何應欽復電指示：日方所提"諒解"，甲、乙、丙、丁四項，都是"干涉中國內政"。"若行政不能獨立，無異等於亡國，萬不能承認。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無誠意，不必續談"。關於戊項，何應欽認為，日方僅提"中國領土、主權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國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國。如其有誠意，則其宣言必須言明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決不能將行政二字刪而不提也"。關於己項，何應欽稱：中日經濟提攜，必須在恢復原狀後方可商討。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可言"。日方有無誠意，以 10 月 20 日為期，過此即作罷論。何應欽提醒蕭振瀛說："須知侵粵以後，內外情勢大異，不容有從容商酌餘暇也"。②該電在當時的談判文件中被稱為"巧未電"。

何應欽發出"巧未電"後，又迅速發出"巧酉電"，補充說明：關於日方所提甲項，歷年以來，委員長及中央所發宣言一再聲明，除三民主義外，不容有共產主義存在，此為我方堅決立場。如對方不提甲、乙、丙、丁四項，則將來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後，在內外蒙邊境軍事佈置一層"或可情商"。電稱："若對方果有誠意，弟可向委座懇切進言，但不能作為軍事協作或防共之諒解事項。又互不侵犯協定，我方願在恢復事變前之原狀後，即行商訂，然後再商經濟協定也。"③不過，"巧酉電"發出後，何應欽覺得其中有不妥之處，又於 19 日發電糾正："該電末句"然後再商經濟協定也"，應改為"再商經濟合作也""。當時，中方《和平宣言》已經起草完畢。何應欽在電中特別指示："在日方宣言稿未提出之前，不可先將我方宣言稿示之。"①該電稱為"皓卯"電。發出此電後，何應欽仍不放心，又於同日發出"皓午電"，電稱：

密。奉諭：昨日各電，關於經濟合作與軍事佈置等事，必須待恢復原狀後，以能否先訂互不侵犯協定為先決問題。又無論何項合作，必以不失我獨立自主之立場而不受拘束為法則，請於此特別注意。②

兩日之內，連發四電，可見何應欽的重視。"巧酉電"中，何應欽在"或可情商"四字後加注說明"系遵電話諭所改"；在"懇切進言"四字後，何應欽加注說明，"系遵電話諭所增"；本電一開始就是"奉諭"二字，這些地方都說明，上述各電，反映的都是蔣介石的主張。

10 月 19 日，蕭振瀛與回漢請示又於 18 日趕回香港的雷嗣尚繼續與和知

談判。在長談 7 小時之後，雙方在六個方面取得"大體接近"的意見。1.雙方《和平宣言》原稿，須互相同意，宣言在停戰協定簽訂後再發表，作為協定之解釋而發。2.《停戰協定》內容只載以下三項：（1）規定停戰日期及地點。（2）日本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3）在恢復戰前和平狀態後③，中國政府誠意與日本謀兩國間之全面的④親善合作。3. 日軍撤退問題，中方要求規定撤退期限，和知表示，日本天皇詔令班師，約須一年方能撤完。4.經濟合作問題：（1）以絕對平等互惠為原則；（2）在恢復戰前和平原狀後召集中日經濟會議，決定具體內容。5."滿洲國"問題，保留二年，中國再考慮日方所關心之滿洲問題，誠意謀合理解決。6.雙方因戰爭所發生之一切損失，互不賠償。①

蕭振瀛在電報中稱：上述六點，"均接近我方腹案"。此外尚有三點，和知極端為難，研究費時甚久，即：1.和知欲將撤兵及其將來諒解留交正式代表團談判，我方則堅持須先商定一切內容，方能成立停戰協定。此點經討論，和知表示同意。2.關於防共軍事協定及駐兵問題，蕭等恐其別有打算，堅請說明具體辦法。和知稱，防共可不要協定，只要中國自行鏟共，問題即可解決。所謂軍事協作及駐兵問題，系指內外蒙一帶之軍事共同佈置而言。對此，蕭等表示：1.中國自行清共，日方不必提及。2.在恢復戰前和平原狀後，內外蒙邊軍事共同佈置可商，但其他區域必須完全恢復戰前原狀。②蕭稱：此點和知已電東京請示，尚未得復。關於收容偽組織，和知閃爍其詞，若有難言之隱。蕭等稱：取消南北偽組織，系和議一切前提，否則，恢復原狀一語，毫無意義，且此問題，前已完全解決，此次應不再談，否則，無從再談和議。對此，和知及參與

談判的何以之均稱：土肥原一派仍支撐偽組織，王揖堂、梁鴻志聽說和知赴港，已聚集滬上，問題趨於複雜化，須去電請示，得復後尚須再聽取北平、上海現地意見，方能定案。蕭等遂聲明：1.南北兩偽組織及戰區內一切偽組織，必須即刻取消；2.中國方面可表示，凡參加戰區維持治安者，一律寬大處置。和知最後表示，個人同意，仍須電東京請示。③

蔣介石在收到蕭振瀛與和知 19 日的長談資料後，立即研究並以紅藍鉛筆作了修改。其一，在"大體接近"的第三條上以紅筆眉批：1.撤兵日期必須在停戰協定詳細載明；2.必須載明恢復七七前原狀。3.此"全面的"三字不能加入。其二，在"為難"問題的第二條上以藍筆眉批："必須先行撤兵，恢復七七原狀，然後再商駐兵問題。內外蒙交界之線最多以張北、沽源與大青山以北之線，對於興和、陶林、武川、固陽、安北，必須駐紮華軍。其三，在蕭等堅決表示的第二點"其他區域"四字下，以紅筆加了問號，在"必須完全恢復戰前原狀"句上以紅筆眉批："區域二字，應改為事項，否則對方將解釋為察、綏二省全境矣。"①以上情況表明，為了換取日方承認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在停戰協定簽訂後即行撤兵，蔣介石考慮過：同意日軍在長城以外某些地區駐兵的要求。

10 月 21 日清晨，和知離港，返回東京。行前，與蕭振瀛密談，聲稱因防共軍事協定、駐兵及偽組織問題，頗形煩難。上海方面，梗阻尤大。土肥原曾來電，請其返滬，故決定先回東京，向中央部陳述，擬在 10 月 25 日以定案電告中方。蕭振瀛稱：如和局可成，必須在 10 月 30 日

前完成手續，11 月 10 日前在福州簽訂停戰協定，否則即作罷論，不再續談。②同時約定，由和知通知日軍，自 23 日至 27 日午後九時至午前三時之間，停止攻擊香港至漢口的夜間航班，以便往來。關於中方全權代表，和知要求由何應欽出任；日方全權代表，何以之暗示，土肥原偏見頗深，以多田駿代替土肥原最佳。③

蕭振瀛在寫給蔣介石、何應欽的報告中稱：和知態度，確甚懇摯，一切問題，有研究而少爭執，但是，日方動員 60 個師團，耗財百億，死傷數十萬，必需求得代價，方能自圓立場，因此，我方"惟有善用內外形勢，示以不可克服之力量，又餌以將來可以合作之誠意，似可就我範圍，實現和局"。④

蕭振瀛對和談前途有某種樂觀，蔣介石卻一直心情矛盾，舉棋不定。9 月 27 日，蔣介石萌生"歐戰如不能即起，對倭有機即和"的想法，但他又擔心和議達成後可能出現的三種狀況，一是停戰後日方不撤兵或不繳還華北，二是共黨擾亂，不從命令；三是英美不悅。①10 月 3 日，蔣介石繼續研究和議，日記云："媾和險矣。敵軍對支院與特務總監之既經設立，豈肯輕易放棄？"他除繼續擔心日軍停戰後拒不從華北、上海、察、綏等地撤退外，還擔心"對內宣言"以及"死傷軍民之撫慰"等問題。②5 日日記云："敵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決，以探我軍虛實緩急之情。小鬼可鄙，何能施其伎倆也？余惟有以拙制巧，以靜制動而已。"③7 日，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敵來求和是否為緩兵消耗我主力之計"，決定確定限期，不許日方拖延時日，同時絕對拒絕軍事協定與經濟協定。④10

月 12 日，日軍在廣東大鵬灣（應為大亞灣--筆者）登陸。13 日，攻佔河南信陽。日軍的這這兩次軍事行動使蔣介石強烈懷疑日方的和平誠意，決心堅持抗戰。日記云："倭既在粵登陸，我應決心持久抗戰，使之不能撤兵。""勿以國際外交之關係而影響作戰方針。""勿忘三年前以四川為抗戰根據地之準備，況平漢粵路以東地區抗戰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敵猶不能佔領武漢，則以後抗戰必更易為力。敵軍侵粵，實已達成余第三步之計劃矣。"⑤此前，蔣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國和平會議解決中日一切問題的打算，日軍侵粵，戰區擴大，不僅讓蔣看到了日軍陷入被動，會出現更多的"滅寇良機"，而且讓他感到，英國與日本妥協的可能將會減少，召開太平洋各國和平會議，共同對付日本希望已經大為增加。10 月 14 日，蔣介石致電蕭振瀛稱："敵既在粵登陸，可知其毫無誠意，不可與之多談。"①他隨即決定將前此準備的"諒解"方案作廢。此時，進行多時的武漢會戰已近尾聲，預定打擊日軍的計劃已經完成，為保存有生力量，蔣介石決定自武漢撤退，正在草擬《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10 月 21 日，蔣自思云："敵方答覆延緩，並無誠意之表示，余當考慮發表宣言以示決絕。語云：寧為玉碎，毋為瓦全，非下此決心，無以救國。"②24 日，蔣介石接受各將領要求，離開武漢。次日，下令對武漢若干要害地區，進行爆破，以免為日軍所用。

和知鷹二返日密商後，旋即來華，10 月 25 日到達上海，立即致電蕭振瀛，盼何應欽急赴福州，同時聲稱將派人攜函赴港，28 日可到。蕭振瀛認為"和局當已有望"，於 26 日致電何應欽及蔣介石，聲稱待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即詢明詳情，如與在港所談沒有大出入，即請和知到福州商定，

同時請何應欽前往。電稱："何部長應即準備，待電即行。"③29 日，和知所派之人到港，聲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兩方"爭持甚烈"，正在上海會談。如果難以作出決定，和知仍擬返回東京，請"最高幹部"決定。④同日，蕭振瀛致電孔祥熙，報告上述消息，聲稱此外各問題，仍與在港所定腹案大體無出入，統由雷嗣尚帶到重慶進呈。⑤

前文已經指出，蔣介石對和知的活動本不抱希望。10 月 27 日，蔣介石得悉日本同盟社宣傳電及板垣征四郎於 26、27 兩日先後發表的好戰談話，認為"敵寇野心並未減殺，而且有緩兵與誘惑之狡計"，決定發表早就在草擬中的《告全國國民書》，以示決心。①28 日，蔣介石又接到重慶行營主任張群來電，認為日本外相宇垣辭職，求和空氣已淡，必須我方持久抗戰，使敵益感疲乏之後，由英美聯合，形成國際中心力量，著手調停，才能實現"差強人意之和平"。他說："抗戰至現階段，決無拋棄立場、根本改變國策之理。"②30 日，蔣介石命何應欽轉令蕭振瀛，停止和談，返回重慶。③同日，蔣介石致電孔祥熙、汪精衛、王寵惠，要他們考慮對日宣戰的利害問題。電稱："今後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鎖，故我對於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顧慮。若我宣戰，則美國必實行中立法，可斷絕敵人鋼鐵、煤油之來源，實於敵有害也。又我如宣戰，對於國聯及各國關係，均應精密研究，切實探明，望即令我駐外各大使全力進行。如何？請核。"④31 日，蔣介石在南嶽致電張群，要他立即發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不可再緩。日記云："發表告國民書後，敵必又受一不測之打擊，使其以後之威脅失效，更使其進退維谷。"⑤同

日,《告全國國民書》正式公佈。該文說明抗戰根據，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廣大、深長之西部諸省。武漢會戰予敵重大打擊，任務已畢，目的已達，現決定放棄武漢，轉入主動有利之地。文稱：

我國在抗戰之始，即決定持久抗戰，故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抗戰之決心。唯其為全面戰爭，故戰區之擴大，早為我國人所預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於抗戰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戰為全面長期之戰爭，故必須力取主動而避免被動。敵我之利害與短長，正相懸殊；我唯能處處立主動地位，然後可以打擊其速決之企圖，消滅其宰割之妄念。

文末，蔣介石號召國人"自今伊始，必須更哀戚、更悲壯、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戰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①文告發表後，蔣介石很滿意。11 月 1 日日記云："《告全國國民書》自讀之，覺為最近第一篇之文字，必使國民知感，且使敵國知畏也。"②大概當時主和派對發表此文有意見，同月 2 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既知持久抗戰是民族唯一出路，為何復有徘徊遲疑？此心既決，毋再為群議所惑。"③12 月 17 日，日本特務土肥原到香港，邀蕭振瀛見面，蔣介石指示："不准蕭赴港"，"應堅拒不理。"④

蕭振瀛與和知的談判因蔣介石的剎車而中止，但日方對這一線索仍存有期待。1938 年 12 月，汪精衛自重慶逃到越南河內，加緊與日方勾結，日本對華政工人員中出現兩派。一派將希望寄托在汪精衛身上，一派仍

以蔣介石為談判對象。1939 年 3 月，何以之及和知鷹二相繼抵港。12 日，何以之致電在重慶的蕭振瀛說：日方正在實行"擁汪倒蔣"毒謀，為國家大局，"在內必先除汪，在外必多聯美"。土肥原與和知二人均以"收拾時局自負"，希望蕭到港一談。⑤蕭振瀛在香港的孫、施兩位助手也向蕭報告，認為土肥原與和知"與聯汪派主張不同，暗鬥甚烈，實為我方利用、以敵制敵之良好機會"。報告稱："此時如能利用土、和，繼成前議，固屬圓滿，即難完成，至少可以牽制聯汪政策不能決定，亦於我有利而無害。"孫、施二人要求蕭振瀛將有關函電密呈蔣介石，從長考慮。同時建議蕭本人速來香港一談，"在國際情形好轉之下，奸黨勾結未成之前",找出一條解決問題的"新途徑"。①蕭振瀛接獲上述電報後，於 13 日致函蔣介石稱："伏查汪日關係，乃由日本軍部影佐等從中斡旋，不僅土肥原等極為憤慨，皆抱收功在我之願，板垣近於議會中亦鄭重聲明，汪既不能號召國內，而與日本尤無歷史關係，欲求中日永久之合作，絕非汪輩之所能為力者，言外之意，當系仍欲與鈞座間取得諒解。"蕭向蔣請示："對方既極端欲賡續前議進行，和知又將來港，究應如何應付之處，恭請鑒核示遵。"②對蕭振瀛此函，蔣介石未作答覆。1939 年 9 月，和知鷹二通過其助手轉告蕭振瀛，汪精衛將於本年 11 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蕭來港重開談判，在汪組府之前與日本簽訂停戰協定，阻礙汪的計劃實現。10 月 6 日，孔祥熙致函蔣介石，要求允許蕭振瀛再次赴港談判。10 月 9 日，蔣介石復函孔祥熙稱："兄與蕭函均悉。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希以此意轉蕭可也。"③這是蔣阻遏與日方和談的最嚴厲的一次指示。④至此，蕭振瀛與和知鷹二的關係遂告結束。

面對特殊的日方代表

在秘密談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軍部或政府人員，但是，也有個別談判，其出面者系"民間人士"。例如萱野長知與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參加中國同盟會，與孫中山、黃興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參加中國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組織有鄰會，提倡日中友好。1927 年任鐵道大臣，是已經退出日本政壇的元老級人物。二人在頭山滿的推動下，得到近衛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間斡旋和平。①

1938 年 7 月，萱野長知首次到港活動，其談判對手為孔祥熙系統的賈存德與被孔派到香港的馬伯援。同年 10 月初，萱野再次到港，近衛首相及頭山滿均派人到港協助，其談判對手改為軍統局在香港的工作人員鄭東山。萱野向鄭表示：1.目前形勢甚迫，但日本政府及人民均不願戰，軍部方面，僅少壯軍人主戰，高級將領則不盡然。如雙方能開誠相見，仍不難覓取和平辦法。2.宇垣外相去職後，萱野曾向近衛首相請示，和平談判應否進行，嗣接近衛復電，聲稱方針不變，仍照前約進行，政府當負全責。談話中，萱野並以近衛原電相示。和萱野同時來港的外務省政務次官松本忠雄則稱：萱野年高德重，中國各院院長均為其友輩，必須派能代表中央，並與彼有交誼之大員，如孔祥熙、張群、居正等前來談判，且須軍統局鄭介民陪同。經鄭東山解釋，萱野同意由鄭介民來港商談。10 月 15 日，戴笠向蔣介石請示："茲事關係重大，該員所請先派鄭介民秘密赴港試與商談一節，是否可行，理合轉呈鑒核。"②蔣介石

沒有批准鄭介民赴港，戴笠遂決定由杜石山與日方聯繫。杜石山，亦作杜石珊，廣東興寧人，早年留學日本，為士官生，娶一日女為妾。民國初年曾出任統領，後長期息影香港。抗戰爆發後經曾政忠③介紹，參加軍統局工作。杜石山與萱野長知等人的談判由戴笠領導，目的在收集情報，因此，與日方交談中的許多言詞均虛假不實。但是，戴笠曾多次書面向蔣介石匯報，因此，我們可以從留存檔案中窺知談判的真實情況。

據萱野向杜石山稱，近衛首相曾屢次致電萱野催促，萱野則仍堅持要求鄭介民迅速到港。他說："中日事件，如久延不決，於日本固有重大禍害，而中國之不利，則尤甚於日本。""現日本當局，灼見及此，深願和平解決。其整個決策，為積極求和，不得則繼續軍事行動，並從事第二偽中央政府之產生。中國似應趁機派員來港接洽，以無條件、無理由之和平解決。"①其後，萱野又直接打電話給杜石山②，聲稱擬與鄭介民先生進行之事，已與近衛首相、頭山滿、宇垣大將、有田外相、荒木大將等疏通妥當，近衛並已奏准天皇，定期停戰，請迅速督促鄭介民來港晤商。12 月 9 日，戴笠再次將上述情況向蔣介石報告，蔣仍無批示。1939 年 1 月 6 日，萱野回日活動。

蔣介石不能長期不理萱野長知這樣和中國革命有過密切關係的日本友人。1939 年 3 月 4 日，蔣介石致電杜石山稱："歷次來電暨萱野翁前日來電，均已誦悉。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於平等與互讓之基礎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日本方面，究竟有無和平誠意，並其和平

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實詢明，佇候詳復。"③杜石山收到此電後，即電邀萱野返港。3 月 10 日，萱野返港，告訴杜石山，他回日後遍訪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都瞭解蔣的"偉大"，頭山滿準備親自來華與蔣會晤。中日之間應當"平等言和，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和平的基本原則為：甲、中日兩國同時發表和平宣言；乙、由中日兩國政府各派遣大員會議於約定地點，議明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丙、至於防共與經濟提攜問題，重在實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而奠中日共存共榮之大計。④12 日，萱野提出，雙方政府代表可在軍艦上見面。①3 月 16 日，宋美齡到港指導談判。②17 日，萱野、柳雲龍、杜石山商討條件，最初為九條，後經修改，定為七條：1.平等互讓。2.領土（完整）主權（獨立）。3.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4.撤兵。5.防共協定。6.經濟提攜。7.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關於滿洲，另議協定。③宋美齡對七條、九條都有意見，批評說："此種條件，何能提出於國防會議耶！如能辦到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當時時記住。蔣先生可以提出國防會議者，即可成功。"④18 日，杜石山等將七條電告蔣介石。⑤杜在電文中勸蔣在汪精衛"所欲謀者未成熟之前"作出決定。⑥19 日，蔣復電命繼續進行，同時稱，得"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八字便可，余請商量改刪。"⑦關於"防共協定"，宋美齡及蔣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約辦理。

3 月 29 日，小川平吉到港參加談判，行前致函萱野，說明此行得到首相平沼、外相有田、陸相板垣及近衛、頭山滿等人支持，受命來華情況，要求蔣介石派遣"有權威之代表"到港談判。⑧小川到港後，命萱野轉交

杜石山親筆函一件，內稱，日本政府尚未確認蔣介石有和平誠意，"最良之方法則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又稱，日本要求國民政府改組，而國民政府認為不可能，他本人有一打破僵局的方案，但該案"內容極微妙，而須秘密，非親見蔣委員長或其心腹的要人不能盡其委曲"。①4 月初，戴笠到港，向軍統局在港人員指示："此時我與日本絕無和平可言"，"必須以熱衷和平姿態為餌，以遂行吾人之謀略，首要之圖，為阻滯汪偽組織，不使於短期內成立。"②同月 2 日，戴笠致電蔣介石云：

中央於此次小川來港之機會，可否密派一絕對可靠而與小川認識，且在現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員來港，與小川晤談，藉以刺探對和平之真實態度。如此事鈞座認為絕不可行，則生處可設法令杜石珊置之不理。是否如何，謹乞鑒核示遵。③

4 月 3 日，杜石山也電蔣催促。這以後，蔣的日記中連續出現對戰和問題的思考。

4 日日記云："吾人必須苦撐一年，必待倭寇筋疲力盡，方得有和可言，此時決非其時也。"④

5 日日記云："如有以近衛建立東亞新秩序之聲明為和平根據者，即為賣國之漢奸。"

6 日日記云："敵求和之急與其對俄屈服之情狀，可知其圖窮匕見，應付之方應特別審慎。""對敵宣傳：甲、須由倭王下令撤兵；乙、恢復七七前原狀後談判。丙、取消東亞新秩序聲明；丁、太平洋會議。"

4 月 8 日日記云："對記者發表，在東亞新秩序聲明之下，絕無和平之可

言。

4 月 14 日日記云："倭派小川探和，以平等互讓、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三點為原則，而不言行政完整，可笑。"①

以上日記足證，蔣介石當時並無與日方議和的想法。不過，這時候，蔣尚未決定如何對待小川。4 月 9 日日記云："對敵探小川應否回復？"10 日日記云："對小川策略應速定。"

可見，這時候，蔣尚在研究思考中。

小川在向蔣發出第一函後，又於 4 月 10 日再次致函蔣介石，聲稱"為東亞前途以及中日兩國百年大計而來，幸有以教之"。②13 日，蔣介石復電稱："小川先生本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兩國戰爭之中，不能派代表來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馬伯援君致意也。"③馬伯援早年留學日本，曾任中華留日基督教學生青年會總幹事，雖是日本通，但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從未擔任過重要職務，順便委託這樣一個時在香港的"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與小川周旋，說明蔣意在敷衍。

對與馬伯援接談，小川尚未來得及表態，馬即於 4 月 14 日突然去世。21 日，萱野、小川二人與杜石山見面，嚴厲批評杜向蔣報告不夠詳盡，聲稱馬即使不死，也非討論"秘密大計"之人，如居正、孔祥熙不能來港，則應與蔣先生直接晤談。萱野、小川稱：與中國方面約定大計之後，即可趕程歸東，報請政府，懇請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決定，藉天皇之諭旨，

壓服一般軍人。現在王克敏、陳中孚、溫宗堯、吳佩孚、汪精衛等均與日方已有聯繫，力量不弱，如不從速約定，乘機解決，則在王、汪等人的謀劃根深蒂固之後，吾人雖欲愛護國民黨，亦恐難以為力。二人不無情緒地埋怨說："待命日久，仍無消息，似已成騎虎難下之勢，此應請蔣先生乾綱立斷，速下決心。想多年相知，必不致難為老朽也。"①同時，日方則積極宣揚，如在 5 月 10 日前不能得到和議的復函，即在江漢地區成立偽組織。②

軍統人員面對萱野與小川這兩個自稱與蔣"多年相知"的"老朽"，不敢怠慢，立即將情況轉報蔣介石，聲稱"小川翁既以垂暮之年，奉命前來，其誠意可嘉，其愛我尤切"，要求蔣指示馬伯援去世之後的繼任人選及應付小川等人的辦法。③4 月 24 日，蔣在日記中明確寫道："拒絕小川等之求和。"④5 月 11 日，蔣介石製訂"和平前提三原則"，其內容為：甲、以九國公約為依據。乙、以英、美、蘇、法共同調解下，尤須以英、美二國為保證，恢復和平。丙、必先恢復七七戰爭之前狀況後再談和平條件。⑤15 日，蔣介石繼續研究歐洲局勢，認為如國際民主陣線勝利，則中國亦可獲最後勝利，"故我國之決勝時期，仍取決於國際戰爭之結局，而抗戰到底，不與倭敵中途妥協，是為獨一無二之主旨"。⑥這就說明，蔣在思想上再次堅定了抗戰路線。這以後，國民黨人員雖仍和小川等繼續接觸，但屬於虛應故事了。

5 月 11 日，小川通過杜石山再次致函蔣介石，敘述自己多次"援助"中國，盧溝橋事變後與近衛首相商量收拾時局辦法，以及與頭山滿組織主和團

體等經過，要求蔣介石"當此難關，毅然不惑，如揮快刀而斬亂麻"。函稱："如蒙幸領鄙意，願派遣要員來港商議，倘足下以僕之赴渝為便，僕應偕萱挺身赴渝，面聆大教。若不然者，則僕即去港歸國，一任局面如何惡化。"⑦16 日，重慶方面派專機取走該函。21 日，蔣介石指示："杜石山絕不准與小川來往"，同時命將小川原函退回。①27 日，杜石山遵命辦理。其情況，據戴笠報告：萱野除歎息外，默不一言，小川則莞爾而笑，並調侃說："僕此行，誠不出板垣將軍之所料矣。"他告訴杜石山：板垣認為，蔣先生自西安事變後，受共產黨之計，實行抗日政策，日本雖欲和，而蔣先生不能和，因此不希望自己以老耄之年，徒勞往返，自己曾十二次提出意見書，才得到板垣批准，現在"所提條件，不蒙明察，辜負余心，是板垣將軍誠有先見之明。烏呼，豈非天乎！"②二人決定於 6 月 2 日離港。

萱野、小川都是曾對中國革命作過貢獻的人，背後又有頭山滿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蔣一度對談判有興趣，宋美齡到香港指導即是明證。蔣介石之所以在關鍵時刻下令中止談判，其原因在於歐戰爆發，蔣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和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因此積極調整國際戰略。1939 年 4 月 29 日，蔣介石日記云："必使歐洲戰局擴大至遠東，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則英在遠東勢力勿使為倭或俄乘歐戰之機，取得漁利。"③同時，他也看到了日本經濟能力的嚴重不足。自記云："余已催英與俄速訂軍事同盟，使俄、倭對歐戰不能旁觀坐大，而倭連日五相會議，對歐外交政策舉棋不定，然其最後必實行與德、意訂立軍事同盟，以其軍閥之囂張，如倭王不准，則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對我國，一面

恫嚇，一面求和，猶想從中取巧，未知其經濟尚有支撐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絕之宜矣！"④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與杜石山等談判外，還曾於 5 月 6 日約見在香港的《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數人願"和"，但少壯軍人有領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會以重兵駐紮華北及沿海，永久佔領半個中國。張季鸞答稱：中國純以保衛國家為目的，只求日本承認中國為對等的獨立國家，達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則，一定拚命打。關於日本要求與中國訂立反共協定一事，張表示：這就等於讓中國"無端拋棄抗戰以來同情中國之英、法、美、蘇諸朋友，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精神上亦有牴觸也"。關於中共，張稱："蔣公看此問題很輕。戰後之中國完全根據三民主義及法律處理一切，即凡不違法之人與事，皆可承認。"①對張季鸞所言，小川不能反駁，只能苦笑。

小川決定離港後，於 5 月 27 日約曾任駐日領事的羅集誼談話，表示願在行前與張季鸞一晤，張拒絕不見。5 月 30 日，張季鸞致函蔣介石稱："小川個人未必無誠，但在敵方並無正式好的表示以前，政府斷不可派人來談。熾雖在局外，亦當拒不與見。"②不過，重慶方面並未對小川等採取決絕態度，雙方始終保持著藕斷絲連的關係，直到 1941 年 6 月。有關情況，我在《抗戰前期日本"民間人士"和蔣介石集團的秘密談判》一文中已有論述，茲不贅述。③

"和平"底牌與張季鸞香港談判的夭折

張季鸞是報人，但是，從 1938 年 1 月起，張季鸞即受蔣介石派遣，到上海從事"對敵運用"，後來又參加蔣介石的外交謀劃、國際宣傳和對日秘密談判，成為蔣的高級智囊。1940 年 7 月 2 日，蔣介石收到張季鸞的報告，當日日記提醒自己注意研究"敵閥求和之誠偽"。④幾天後，蔣復函張季鸞，指示談判機宜，日記云："敵方間接求和之心雖切，然其方法與政策，仍毫無變更。我應囑季鸞以最低限度轉示之：甲、談政策，不談條件。乙、談情感與利害而不談權利、得失；丙、對於中國人心之得失，應令特別注意蘇俄對華之宣言（放棄在華特權）；丁、放棄北平至山海關駐兵權；戊、漢口租界提前取消。己、內河航權應取消。庚、青島與海南島完全交還。辛、熱河先行交還。壬、東三省問題、借用港口問題、東亞聯盟問題，待和平完全恢復，撤兵完全實行後再談。癸、天津與上海租界定期交還。子、保障問題。丑、撤兵手續，平綏路、張家口與歸綏一帶，必須在第一期撤完。"①前文已述，日軍自山海關至北平的駐兵權，為清末《庚子條約》所規定，1938 年蕭振瀛與和知鷹二談判時，蔣曾同意保留。但是，這裡蔣卻明確要求日方放棄。此事表現出，在與日方談判中，蔣的妥協性逐漸減弱。此後，蔣介石在與張季鸞會面時又不斷指示，其 7 月 19 日日記云："季鸞來談，敵閥野心如昔，毫未改變。"②25 日，張季鸞再來，談東北問題以及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事。③蔣日記云："敵在華之工廠與營業，各項商民之處置，敵非萬不得已，決不願撤退也。"④顯然，這是蔣與張討論中的議題。

1938 年 10 月，和知與蕭振瀛的談判因蔣的剎車停止後，和知繼續尋找和重慶方面聯繫的線索。1940 年 8 月，和知動員一位希臘商人，到重慶上書蔣介石，"其內容無異乞降，此為從來所未有"，蔣介石由此推斷，日本急於向東南亞發展，向中國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⑤他與張季鸞討論，認為可以利用這一形勢，謀求在於我有利的條件下，與日本媾和。⑥但是，他很快就認為，"敵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越幼稚毒劣，應即切戒嚴防之"。①13 日，蔣介石發表《"八一三"三週年紀念告淪陷區民眾書》，盛讚淞滬之戰中國軍民的英勇表現，中云：

我們中華民族有悠久偉大的歷史，有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有至大至剛的民族正氣；我們在淪陷區的同胞們，要知道我們中華民國的版圖，決不會放棄寸地尺土的，要知道敵人有必然失敗的道理，更要知道我們前方後方的軍民，都在加緊努力來迎接這最後的勝利。②

蔣介石將這篇文告的發表看成是對日本的沉重打擊和對自己的警策。日記云："余於八一三紀念日告民眾書，仍以光明正大態度痛斥敵軍之凶暴，激發同胞敵愾之精神，發揮殆盡，此為對敵當頭一棒，冀其有所覺悟，勿敢輕來嘗試也。自後對余之認識或能更進一步乎？否則，不僅不能使之醒悟，而且反中其軟化利誘之計，更不可為計矣！"③這段日記表明，蔣已經意識到，自己既要抵擋日本的軍事進攻，又要謹防日本的"和平"誘惑。

這一時期，蔣介石大概每個月都會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條求和消息。為了

確定談判"底牌"，蔣介石命張群等人開始起草一份文件，參加者有張季鸞、陳佈雷等人。至８月下旬，文件定稿，題稱《處理敵我關係之基本綱領》，該文包括《建國原則》、《對敵策略》、《平和條件》等內容，其《對敵策略》總原則為：保衛國家獨立、民族自由，而作戰媾和之實際策略以度德量力為依歸。下分五條：

1. 領土之完整，主權之神聖不可侵，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自由之確保，為國家民族存亡、主奴所關，故必須犧牲一切，長期抗戰，以求其貫徹。

2. 利於長期抗戰，而不利於迅速反攻，此量力之義也……確保長期抗戰之實力，鞏固全民族救亡自衛之精神，由軍事上、經濟上、外交上疲睏敵人，逐漸減少其"力"的方面之優勢，而增加其"德"的方面之弱點，以期敵我間之形勢逐漸於我有利，以終達作戰目的之成功。

3. 不論時間如何長久，環境如何困難，必須貫徹成功，不容中途自餒。惟作戰為現實的問題，必須自定最大限與最小限之成功條件，衡量彼我，根據事實以為運用。

4. 最大之成功為完全戰勝，收回被佔領、掠奪之一切，不惟廓清關內，並收復東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則為收復七七事變以來被佔領之土地，完全規復東北失地以外全國行政之完整，而東北問題另案解決之。以上兩義，前者戰勝之表現，後者則為勝敗不分，以媾和為利益時之絕對要求。

5. 我國為被侵略國家，故和議之發起，必須出自敵方……應深切考查，其條件是否無背於我建國原則，而足以達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須

在確認為我作戰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貫徹之時，始允其開始和平之交涉。

以上五條，其最重要之點在於將抗戰成功分為"最大限"和"最小限"兩種。必須在保證"最小限"，即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原狀時才能開始與日本進行和平交涉。

關於《平和條件》,《綱領》分《理論原則》與《具體條件》兩方面。其《理論原則》規定：1.日本必須真實承認中國為絕對平等的獨立國家。2.此次議和之後，期成立平等互尊之新關係。3.日本須放棄過去戰前及戰時對華不友善之政策及宣傳。4.除東北懸案另作專案解決外，其餘一切有損中國主權之事實，皆須徹底糾正。

《綱領》中有一部分為《堅持之件》，共 8 條，其中關係重大者為 1—4 條及第 7 條。

1. 凡作戰而來之軍隊，應限期完全撤退。河北及華北部隊，應撤離河北及察哈爾省境以外。

2. 凡所佔長城以內及察綏之土地，與沿海及海上各島嶼，應完全定期交還。

3. 凡佔領地內之偽組織，均應自戰鬥終止之日，由日本負責撤銷，不能作為中國內政問題。所有偽組織之法令與契約，一概不能承認，並不能要求任何佔領地內行政上之特殊化。中國行政完整必須完全恢復，不容有任何干涉內政之舉。

第 40 節：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12)

4. 東北問題，須待和平完全恢復後另案交涉，現在不能提議（但熱河不在東北範圍之內）。

……

7. 不平等條約之廢除，須於和約發表時，同時自動聲明且有定期之實行。①

在上述各條旁，有注稱："8 月 31 日張攜港之件"，可見，這份文件是為張季鸞赴香港談判準備的。

8 月 25 日，蔣介石與張季鸞談話，日記云："和戰要點：一、打破敵國侵略滅華政策；二、消滅敵人優越奴華心理；三、恢復中國獨立自由地位。和戰方針：甲、以基本條件為標準；乙、以不失時機為要旨；丙、國際期待為下策。"26 日日記再云："一、我有實力可恃，不患其違約。二、我有根據地存在，不患其和議決裂。三、敵人有求於我，國際上、地理上、經濟上、軍事上，皆非我合作不可。四、敵有懼於我。甲、領袖權威。乙、革命精神。丙、三民主義。"②

29 日，再次與張季鸞、陳佈雷會晤，擬定"最低限度"條件，指示交涉時，應持堅決態度，"對條件不可遷就"。③31 日，張季鸞飛港。但是，也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又改變主意，日記云："敵寇時時以日、滿、支名詞為對象，如何而望其徹悟與和平？我國損害傷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輕易言和？"①9 月 1 日，蔣介石命陳佈雷起草致張季鸞函，有所指示。陳

因當日沒有飛港班機，改發短電。②陳電今不可見，但 9 月 2 日張季鸞復函云："在未得尊電前，即決定不與和某見面。"可見，陳電內容為，要張不與和知會晤。7 日，蔣介石乾脆命陳佈雷致函張季鸞，要他從香港回來。③

張季鸞 8 月 31 日抵港後，即得悉"桐工作"的有關情況，感到日方"愚昧淩亂"，"可決其今後無大的作為"。④此前，和知曾告訴張季鸞，日本政府將收回軍方的對華談判權，另作準備，又托人帶話，東京只主張內蒙暫駐少數兵員，其他無大問題。9 月 1 日，張季鸞召見和知的助手何以之，要何轉告和知：1.日本政府如準備自辦對華交涉，"須徹底覺悟，重新檢討"，"必須互相承認為絕對平等的獨立國家"，"凡不合此義者，概不必來嘗試，勸彼亦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見面"。2."中國是不許任何地方駐兵，不許任何地方特殊化的。"⑤此後，張季鸞即利用和知，以"桐工作"中的問題反對板垣，製造日本內部矛盾，同時則抬高身價，拒不與和知見面。9 月 3 日，張季鸞致函陳佈雷表示："弟意非和氏有東京敵總部之新意見，決不與之見面。"①次日，和知離港，返回東京，張季鸞命何以之電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誠意委託不必再來；不是日本誠意改變對華政策，誠意謀真正之和平，則不可接受委託。要之，與弟何時見面並不重要，日政府苟無真正誠意，見我何用！"②

儘管張季鸞拒絕與和知見面，但是，他內心還是希望繼續維持與日方的秘密談判的。9 月 17 日，何以之面見張季鸞，告以和知來電稱：已於 9 月 10 日在福岡會見東京要員，偕飛南京，與板垣協商，決定以和知、

板垣為核心，辦理對華交涉，將再飛東京，取得正式委託，然後南來。同日，張致函陳佈雷，要求代為向蔣請示，"是否在港逗留一見"？17 日，蔣指示可"在港靜候"。③但是，蔣介石很快就失去耐心。20 日日記云："和知求和遷延之原因，其必待敵軍侵越時來見有所要脅。"④22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對張季鸞等"無方而好事"的批評。⑤同日，陳佈雷即致函張季鸞，要他結束在港工作，立即回渝。不過，張季鸞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日本方面一直宣傳願與中國政府謀和，他要"試驗"其真偽。23 日，張季鸞致陳佈雷函云："對今後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為判斷局勢之第一關鍵，在看是否以敵大本營之名義來開正式交涉，果來交涉，即當認定其有若干誠意……蓋既來交涉，則為承認是國家與國家間之正式議和，一也；漢奸當然取消，二也。"⑥可以看出，張季鸞與陳佈雷的"微有不同"在於，張相信日本可能有"若干誠意"而陳相反，顯然，陳的態度反映蔣的觀點。

9 月 24 日，張季鸞致函陳佈雷，表示遵囑結束在港工作。25 日，張季鸞與何以之"最後晤面"，告以一兩月之內，如東京確有正式講和誠意，許可和知通信一次，本人亦當"拚其最後之信用"，轉達一次。談話中，張季鸞並按照陳佈雷來函指示，通知日方，如欲講和，須有與中國建立平等"新國交"的決心，承認偽滿、中日聯盟等要求萬不可向中方提出，本人也不能轉達。9 月 27 日，張季鸞致函陳佈雷，承認蔣介石比自己高明："前年以來之懸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斷有誤，幸行動上未演成錯誤，一切處理尚近於明快，此則近年特受委員長之訓練，得不至拖泥帶水，就弟個人論，誠幸事也。"①10 月 4 日，張季鸞回到

重慶，其精心準備的與和知的談判計劃終於成為廢案。

企圖以"和談"阻撓日本承認汪僞政權

1940 年 7 月，近衛文麿第二次組閣，松岡洋右出任外相。松岡對軍部和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所做的"誘和"工作不滿,決定收歸外務省掌握和領導。他將這一工作委託給自己的門生西義顯和松本重治等人。西義顯將希望寄托在交通銀行董事長家錢永銘身上。錢是江浙財團的重要成員，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一度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松岡對錢永銘這一人選很滿意，誇口說很快就會成功。當時，日軍計劃南進，從英國和荷蘭手上奪取東南亞，急於和重慶國民政府達成妥協，以便拔出深陷於中國戰場的泥足。

同年 8 月，西義顯到香港訪問正寄寓在那裡的錢永銘，動員他投入對重慶的"和平工作"。錢提出：如果恢復到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前的狀態，日軍能夠全面撤兵，或許能同重慶進行談判。②他表示，自己可以負責促成寧渝合作，但須請上海金城銀行經理周作民出面與日方接洽。①據西義顯回憶，錢當時提出三項條件：1.重慶、南京兩政府合併，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統一政府。2.日本政府以中國的新統一政府為談判對象，從中國全面撤退為推行日華戰爭所派遣的全部兵力。3.日本政府與新中國政府締結防守同盟。9 月 18 日，西義顯偕錢永銘的代表張競立等到東京訪問松岡洋右外相。10 月，松岡簽字同意錢永銘提出的條件。②不過，

後來松岡實際向重慶提出的是外務省東亞局第一課課長太田一郎所擬六條：1.承認"滿洲國"（必要時以秘密文書約定）。2.共同防共。3.撤兵。4.經濟提攜（作若干讓步）。5.治安駐兵（長安三角地帶不駐兵）。6.不要求蔣介石下台。③

松岡洋右除委託西義顯外，又親自致函時在上海,與錢永銘、周作民關係深厚的船津辰一郎，拜託他協助進行。④船津曾任日本駐天津、上海、奉天總領事，有和國民黨人員打交道的豐富經驗。10 月 17 日，西義顯攜帶松岡的親函訪問船津。同日，船津訪問周作民，說明本人應松岡要求，將去香港活動，周表示恢復兩國間的和平也為本人所希望。10 月 19 日，松本重治會見周佛海，面交日方所擬"和平"條件，托周作民轉交錢永銘。周佛海的印象是："與在京所談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減為一年，蒙疆及特定地點駐兵，雖形式略異，實質完全相同。"⑤21 日，船津與周作民同船赴港。在港期間，周作民與錢永銘以日方提出的方案為核心，草擬報告與意見書，托因事來港的金城重慶分行經理戴自牧帶回重慶。⑥

11 月 7 日，蔣介石研究錢永銘、周作民轉來的"和平"條件，大為不滿，日記云："周作民受敵方請托條件轉達者，商人不察，以為較倭汪之條件減輕，其實文字變換而內容無異也。"①不過，當時蔣介石正在向美、英兩方提出"合作方案"，建立同盟，尚未得到答覆，②日本方面又準備在 11 月 30 日承認汪記南京國民政府，這使蔣介石感到憂慮。他擔心德國、意大利會跟踵承認，擔心正在和德國拉關係的蘇聯會對華冷淡，也

擔心國內民心、軍心的動搖。17 日日記云："英美未與我確實合作以前，對倭不使其承認汪偽為宜，此亟應設法運用者也。"③18 日，蔣決定派張季鸞赴香港，日記云："派季鸞赴港，作錢、周之答。"④

松岡洋右除利用錢永銘等與重慶談判外，又通過德國出面，對重慶政府施加壓力。11 月 11 日，德國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約中國駐德大使陳介談話，聲稱："近聞日自新內閣成立後，亟圖解決中日問題，已擬於近日內承認南京政府。日如實現，義（意）、德因與同盟關係，亦必隨之，他國或尚有繼起者。此於中國抗戰，或益加困難……倘閣下認為有和解可能，則請轉達蔣委員長及貴政府加以考慮，以免誤此最後時機。"⑤14 日，蔣介石接到陳介來電，認為這是"倭求和進一步之表示"，於 18、19 兩日分別接見英、美駐華大使，告以陳介來電情況，說明日本承認汪偽之舉，將動搖中國民眾抗戰信心，進而影響中國國內日趨嚴重的經濟與軍事問題。⑥21 日，蔣介石電復陳介："日本果欲言和，自應將其侵入我國領土之陸、海、空軍全部撤退。""若日方以承認偽組織為詞，使我與其議和，則彼既無恢復和平之誠意，我方亦決不以此有所措意也。"①這通電文，表面上致陳介，實際上是說給日本人聽的。同日，日方宣稱，重慶方面如不在 12 月 1 日之前與日方言和，將承認汪政權。蔣介石不受威脅，日記云："此種宣傳，只有增加我對英美合作提議之效。蓋倭寇宣傳，以此為恫嚇吾人之計，實拙劣無比也。"②24 日，蔣介石得到蘇聯通知，繼續援助中國武器，感到寬慰。26 日日記云："如何能使俄與英美合作，此為今日唯一之要務也。"③這則日記表明，蔣介石當時所孜孜以求的是與俄、美、英等國結成抗日聯盟，與日本談判不過

是為了阻撓其承認汪偽政權,並非根本之計。27 日,汪精衛致電蔣介石,聲稱已與日方完成"調整國交條約",與"友邦"內定,只須"恢復和平,確立治安,則撤兵期限,仍踐前諾,無所改變",要求重慶方面"立下決定,宣佈停戰"。28 日,蔣介石得知有此電文,在日記中斥以"為敵寇作倀"。④

張季鸞到達香港後,即向錢永銘提出:國民政府對於日方誠意仍有懷疑,因為日方宣稱,如重慶方面在一定期間內沒有肯定答覆,就要承認南京政府。對於此類威脅,國民政府"非常不滿"。張向日方提出兩項條件:1.無限延期承認汪政權。2.無條件全面撤兵。⑤張稱:倘若日本政府答應履行上述條件,中國政府準備同日本政府進行和平交涉。11 月 23 日,在松岡外相的力促下,日本五相會議決定接受張季鸞提出的條件,要求中國政府迅速任命正式代表來日,日本政府將延期承認汪精衛政府。其後,錢永銘即將有關情況電告重慶,並請杜月笙攜帶詳函飛渝,要求指派前駐日大使許世英為首席正式代表。①27 日,重慶擬派許世英赴港。至此,談判似乎頗有進展,但第二天就發生變化。

日本內部的擁汪勢力一直很頑強。28 日,日本內閣會議由於受到軍方和日本派駐南京的阿部信行特使的壓力,決定按原定日期承認汪偽政府。同日深夜,日本駐香港總領事田尻愛義得到東京電告,力謀挽救已成局面,改變日本政府的決定。他立即要求錢永銘電告重慶,必須迅速同意日本的"和平原則",任命正式談判代表。②同日夜,蔣介石接到錢永銘來電,得知日方變卦,非常憤怒,日記云:"觀察敵倭與錢新之所談及

其態度，仍以威脅為主。其松岡外長尤為荒唐。無論文武人員皆不可理，若一交手，即以卑污惡劣猙獰之形態畢露。無禮無信之國，不可再理，焉能不敗哉。"③他決定通知錢永銘，對日"決絕不理"。30 日，日本正式承認汪偽政權，蔣介石的第一反映是"東亞戰爭不知延長到何時方能結束"，第二反映是："我促英、美、俄更進一步之表示與助我，此其時乎！"④同日，松岡洋右致電錢永銘，表示願繼續與重慶議和。12 月 1 日，錢永銘和張季鸞分別將有關情況轉報陳佈雷，陳的強烈感覺是："敵之狼狽失態，可謂無所不至。""松岡之可笑，洵無以復加也。"⑤12 月 3 日，蔣介石讀到陳佈雷摘錄的錢、張報告，憤怒地在日記中對松岡寫下了"仍想繼續欺詐，惡劣極矣"的考語。①

日本承認汪偽政權一事使蔣介石憂心忡忡。1940 年 12 月 1 日，蔣與其宣傳幹部研究"如何能安定民心"，夜不能寐，自稱當夜只熟睡了三個小時。②次日，他在"國父紀念周"上報告，說明這是近衛內閣的"自殺"行為，自感"頗費心力"。③其實，日本承認汪偽政權一事對當時的政局、戰局並無多大影響，蔣介石過於緊張了。

1941 年之後，還有個別日本人士企圖在中日間斡旋和平，但蔣介石已了無興趣。1942 年 4 月，和知鷹二的機關總務部長黑木清行，受頭山滿及萱野長知鼓動，攜帶萱野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慶面見蔣介石，調解中日戰爭，恢復兩國邦交，否則自殺。賀耀組、陳佈雷二人認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擬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芃生訊問。如果不能利用為反間，則應拘留，不許釋放。"蔣介石批示："應即拘押監禁。"④

日方求和，蔣介石主動剎車

日本侵華，採取的是以戰為主，以誘和為輔的兩手策略。同樣，蔣介石也用這兩手策略對付日本。一方面，蔣介石堅持以武力抵抗日軍進攻，同時，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與日本進行秘密談判。

如前述，蔣介石雖對蕭振瀛與和知鷹二之間的談判不抱希望，但是，由於和知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誘餌，這使蔣覺得不妨一試。談判中，蔣細心研究情況，指導起草並親自修改有關文件，除將東北問題擱置另議外，蔣曾準備以同意日本在長城以外某些地區駐兵為條件，換取日軍自中國關內地區撤兵。但是，當蔣發現日方拖延不決，並無誠意之外，立刻下令終止談判，後來並以"殺無赦"警誡孔祥熙、蕭振瀛與和知重開談判的企圖。1939 年，萱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與中國軍統人員談判，力圖面見蔣介石。這是兩位和中國有過特殊關係的日本人，在他們後面，又有日本"主和"人士頭山滿和近衛等政要的支持。最初，蔣介石對談判持有興趣，宋美齡、戴笠都先後到港指導。但是，歐戰的爆發使蔣介石看到了中國抗戰勝利的途徑和希望，因此毅然採取決絕態度，禁止軍統談判人員再與小川等來往。1940 年 8 月，蔣介石為了應付日本方面頻繁的談判要求，指導張群、張季鸞、陳佈雷等制訂《處理敵我關係之基本綱領》，作為對日談判的原則和準繩。該文件的最大特點是將抗戰結果分為"最大之成功"與"最小限之成功"兩種，但是，當張季鸞於

同月底帶著這份文件赴港，企圖首先爭取"最小限之成功"時，蔣介石卻阻止張與和知鷹二見面，並且迅速命他回渝，使這次經過鄭重準備的談判還沒有開始就夭折了。同年 7 月，近衛第二次組閣後，為了抽出兵力，侵略東南亞地區，一面緊鑼密鼓地準備給予汪偽政權以外交承認，一面通過外相松岡洋右推進"錢永銘工作"，繼續誘惑重慶國民政府和談。蔣介石擔心日本承認汪偽會在外交和內政兩方面嚴重影響中國抗戰，派出張季鸞赴港談判，企圖加以阻撓。日本政府雖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條件，但是，最終還是在軍方的壓力下承認了汪偽政權。

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長期對日妥協，力圖延緩對日全面作戰時間；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被逼抗戰，但是，他仍長期為戰與和的矛盾所糾纏。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幾次談判說明，他在堅持抗戰的同時，也還在某些時候對和平解決中日戰爭存有期待。談判中，他雖不肯承認"滿洲國"，不肯立約放棄中國對東北的主權，但在一段時期內，他卻只將抗戰目標定在"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這些，都反映出蔣在對日抗戰中的軟弱一面。不過，應該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談判，都是日方求"和"，蔣只是被動應對而且都由蔣主動剎車。在談判中，他的態度逐漸堅決，條件逐漸提高，是日漸強硬而非不斷軟化的。

蔣介石思想中的戰、和矛盾存在過很長時期。就在蔣介石受松岡洋右欺騙，憤而斥責日本為"無禮無信之國"後不久，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對敵宣傳，使知非由美國或蘇、德出而保證，決不能解決戰事之意。""敵次任內閣，如果為海軍系聯美派出任，使美得調停中倭戰事，則和平有望

矣。"①1941 年 2 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裡訪問重慶。居裡向蔣提出：本人來渝，常聞傳言，某某等秘密對日進行和議，請直率相告。蔣答：

自由中國絕對無一人願與日本言和。倘英、美能繼續予以援助，亦決無人表示不滿。此間人士皆決意除最後勝利外，他無所求，何言隔〔個〕別之和平！我人已作此最大之犧牲，日本已陷無援助、無希望之絕境，英、美已在精神上、物質上予我以一切援助，故不論日本以任何動人之條件向我求和，而此未成熟之對日和平，余將一律視為中國之失敗。余可向閣下保證，對日和議必在英、美參加之和平會議席上談判之，此外無中國可以接受之可能。余願時機成熟之時，此項會議由美國召集之，一如召集九國公約之華盛頓會議。惟華盛頓會議時，無蘇聯參加，深盼此會議亦有蘇聯一席耳。②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會集刊》第 2 輯，社科文獻出版社 2006 年 2 月出版。

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

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和日本之間，國力、軍力都相距很大，因此，還不能立即與日本展開大規模的戰爭。他們主張，仍應以妥協方式與日本達成"和議"。淞滬抗戰爆發，中國軍隊主動向日軍進攻，標誌著抗戰國策的確立和全面抗戰的展開，但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都仍有部分人主張"和平"。淞滬之戰失利後，主和之議更盛，孔祥熙是這一部分人中的重要代表。現存檔案表明，中日之間的許多秘密談判雖由日方主動，但中方的掌控者則是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後於 1938 年初升任院長的孔祥熙。多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這些活動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真實態度的反映，代表蔣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實出人意料，蔣介石對孔祥熙掌控的這些談判大都持反對態度，曾多次批評，甚至以極為嚴厲的口吻加以阻遏。這種情況，與我們的傳統認識大相逕庭，值得鄭重討論，以求推進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加深對蔣介石其人的全面認識。

拒絕被孔祥熙視為"天賜良機"的陶德曼調停

1937 年 11 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收日本政府委託，向蔣介石提出停戰議和條件：1.內蒙古自治，一切體制類似外蒙古。2.華北非武裝區擴大至平津鐵路以南。3.擴大上海的停戰區，由

國際警察管制。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本貨的進口稅。7.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同月 9 日，陶德曼通過蔣介石身邊的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威脅孔祥熙："如果戰事拖延下去，中國的經濟崩潰，共產主義就會在中國發生。"①28 日，陶德曼在漢口會見孔祥熙，重申上述條件。29 日，孔祥熙致電在南京的蔣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漢"重要同志"會晤，都認為"長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調停，時機似不可錯"。電稱："複查近來黨政軍各方及民間輿論，漸形厭戰。弟意此次戰爭，我已犧牲甚鉅，除非軍事確有勝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國力，再圖來茲。"②30 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蔣介石，認為陶德曼出面調停，這是"天賜良機，絕不可失"，建議蔣"乘風轉舵"，改變抗戰國策，函稱："前方戰事既已如此，後方組織又未充實，國際形勢，實遠水不救近渴。而財政經濟現已達於困難之境，且現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覺悟，猶多保存實力之想。若至寄人籬下之日，勢將四分五裂，此時若不乘風轉舵，深恐遷延日久，萬一後方再生變化，必致國內大亂，更將無法收拾。"③他認為日方所提條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舊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須一一接受，盡可作為討論之範圍"，建議蔣介石在接見陶德曼時原則表態，至於具體條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戰，稍事整理"。可見，孔祥熙對抗戰形勢極為悲觀，陶德曼出面調停，對他說來，可謂喜出望外。

蔣介石與孔祥熙不同，這一時期，蔣的抗戰意志相當堅決。11 月 20 日，蔣介石發佈遷都重慶命令，決心持久抗戰。日記云："老派與文人動搖，主張求和。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①他對武將也很失望，感歎道："高級將領皆多落魄望和，投機取巧者更甚！若輩竟

無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戰如是之易為何所據也！"②但是，蔣介石不能不考慮前方軍事失利的嚴重情況。29 日，蔣介石得悉日本委託陶德曼調停的消息，立即決定加以利用，約其來京面談。日記云："為緩兵計，亦不得不如此耳！"③12 月 2 日，蔣介石與陶德曼談話後，一度對日本有過幻想，希冀其能有所"覺悟"。日記云："聯俄本為威脅倭寇。如倭果有覺悟，則幾矣。"④但不久，日軍即以加緊進攻南京粉碎了蔣的幻想。12 月 7 日，蔣介石離開南京，到達江西星子，日記云："對倭政策，惟有抗戰到底，此外並無其他辦法。"⑤9 日，研究全國總動員計劃，日記云："團結內部，為國相忍。""統一抗戰指使〔揮〕，使共黨歸服，消除矛盾行動。"⑥26 日，日方由於軍事上已經取得巨大勝利，通過陶德曼提出四項新的強硬條件：1.中國政府放棄親共、抗日、反滿政策而與日、滿共同防共。2.必要地區劃不駐兵區，並成立特殊組織。3.中國與日、滿成立經濟合作。4.相當賠款。四條之外，另附兩項條件：1.談判進行時不停戰。2.須由蔣委員長派員到日方指定地點直接交涉。蔣介石認為"其條件與方式之苛刻至此，我國無從考慮，亦無從接受，決置之不理"。⑦27 日，召開最高國防會議討論，參加者多數主和，蔣介石堅持不可，受到於右任等人的譏笑。①28 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孔祥熙、張群等談話，聲稱"國民黨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求自由、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敵，訂立各種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我國家與民族永遠之束縛。"②29 日，蔣介石與於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國民黨元老居正談話，表示"抗戰方針，不可變更"。他說："此種大難大節所關之事，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也。"③1938 年 1 月 2 日，蔣介石再次見到陶德曼轉達的日方條件，決心"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

亡"，決定嚴詞拒絕。④但是，當時日軍攻勢銳利，中國軍隊需要休整與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不得不虛與委蛇地敷衍日方。1 月 12 日，在孔祥熙和張群的指導下，外交部擬具口頭答覆稿，認為日方所提四項條件，"太屬空泛，願明晰其性質與內容後，予以詳細考慮與決定"。⑤這一口頭答覆稿的目的在於"拖"，以便既不明確拒絕日方條件，又為中國軍隊爭取時間。但是，口頭答覆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覆的四個問題卻被蔣介石否定。這四個問題是：

1. 所謂中國放棄親共政策而與日、"滿"合作，實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國究應採取何項步驟?

2. 所謂非武裝區與特殊制度，究擬設在何處？特殊制度之性質如何?

3. 經濟合作一層，其範圍如何?

4. 日方是否堅持賠償一點，是否對於中國方面所受之巨大損失，可予考慮？⑥

蔣介石當時正在河南開封佈置防務，見到此件後，認為這將使談判具體化，立即以"限一小時到漢口"的特急電通知孔祥熙與張群，表示"最後四項問句切不可提"。①15 日，孔祥熙會見陶德曼，面交英文答覆，委婉地表示："為以真誠的努力尋求在中、日兩國間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們已經表示，熱誠希望得知日方所提"基本條件"的性質與內容。以便更好地表達我們對日本所提條件的看法。"②16 日，蔣介石決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則，則拒絕其轉達。"③17 日，蔣介石日記云：

"拒絕倭寇媾和之條件，使主和者斷念，穩定內部矣。"④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日本政府極為惱怒，將蔣視為對華"誘和"或"誘降"的最大障礙，必欲去之而後快。1 月 15 日，日本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決定否認"蔣政權"。次日，近衛首相發表聲明，聲稱"日本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望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⑤蔣介石對此的反應是："此乃敵人無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⑥此後，日本政府即決定，以蔣介石"下野"作為中日"和平"的必要條件。

制裁唐紹儀謀和

日軍佔領上海後，即企圖物色在中國政壇上有過重要地位和聲望的人，與重慶國民政府談判，或直接出面組建傀儡政權。其中之一就是唐紹儀。唐紹儀，字少川，清末任外務部右侍郎、奉天巡撫、郵傳部尚書。武昌起義後任袁世凱內閣的全權代表，與革命黨人在上海議和。民國建立，臨時政府北遷，唐紹儀任第一任內閣總理。此後，唐紹儀歷任要職，其地位和聲望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上海淪陷後，唐紹儀留居法租界，日本船津辰一郎等人便多方設法，企圖拉唐下水。唐的住處，不斷有各色人物登門。重慶國民政府為防止唐為敵所用，也不斷與唐聯繫，許以國民參政會主席、國防最高委員會外交委員長或駐德大使等職，任其擇一。據說，蔣介石還曾致函唐紹儀，擬聘請其為"高等顧問"。①1938 年 5 月，法學家羅家衡到武漢，會見汪精衛、孔祥熙等人。汪稱："現在的局面，

只有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才是辦法。現在日本不是較以前對華主張緩了一步麼？從前日本是不以蔣政府為對象的，現在日本僅主張不以蔣個人為對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蔣的下野是不成問題的。我只要國家有救，甚麼犧牲都可以的。"孔祥熙則表示，最好由唐個人與日本方面試談條件。②

唐紹儀接受汪精衛和孔祥熙委託後，即於 5 月底或 6 月初在上海與日方談判，其條件大略如下：1.取消以前一切不平等條約，如二十一條、塘沽、何梅等協定。2.日本軍隊完全撤退。萬一拘於庚子條約，其所駐軍隊亦不得超過歐美各國所駐軍隊數目之上。3.（中國方面）絕對不賠款，因自動停戰議和，非戰敗和議可比。4.中、日、滿經濟合作。唐並表示，中國方面如必欲取消滿洲獨立，可在今後和議中由唐出面交涉。③唐紹儀的計劃是：在兩個月後日軍到達河南雞公山時，或由中國"最高領袖"授意前方將士自動停戰，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汪精衛等與日本素有關係的"老同志"，代表政府或人民團體赴香港談判，他本人屆時當前往參加，但決不單獨負責。①6 月 17 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決定"鳥工作"計劃，準備起用唐紹儀及吳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強有力的政權"。②27 日，唐紹儀托大女兒（諸昌年夫人）持函，到武漢會見孔祥熙，聲稱"以國難為慮，渴望於國事有所襄助"，"欲得公正和平，須中日公開談判"。③7 月 5 日，諸夫人回滬，攜回孔祥熙致唐紹儀函，函云："戰爭初期，我方別無選擇；時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孔要求唐憑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試探日方和平意向，同時，聯絡中日有名望的民間人士，呼籲雙方當局進行和平談判。④8 月上旬，孔祥熙在香港的親信訪

問諸夫人。諸稱：有日本東京陸軍最高長官的全權代表向唐紹儀提出三項條件：1.停止反日運動；2.反共；3.經濟合作。該代表稱，日方沒有領土野心，願保障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無賠款。諸夫人向孔在香港的親信表示："此次因系院座（指孔祥熙--筆者）再三勸慰，少老（指唐紹儀--筆者）始肯與日人見面，探詢條件。該日軍代表之來，亦極不易，所持條件，可作基本談判之初步原則。""如我方認為可商，當再與進行詳洽。"諸夫人並稱：該代表定 8 月 5 日返滬，如有所命，請在 8 月 15 日前示下，免過時機，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⑤8 月 9 日，孔祥熙致電蔣介石，匯報上述情況。

蔣介石這一時期仍然不贊成孔祥熙的謀和活動。6 月 23 日，蔣介石與孔祥熙談話稱："敵人至今滅亡我國之野心，固已為我粉碎，即其對粵漢速戰、速決之信心，亦已為我消滅。最後勝利於我確定矣。"他囑咐孔祥熙"不可另自接洽"。⑥7 月 12 日，日機大炸武漢，警報解除後，蔣介石再次與孔祥熙談話，勸止他的謀和活動。談畢，蔣介石慨歎道："庸之對敵行同求和，彼猶不知誤事，可歎！"①蔣在接到孔祥熙關於諸夫人的活動情況報告後，立即於 8 月 10 日復電孔祥熙，電稱："關於少川接洽和議事，弟極端反對。請其於政府未決定整個政策與具體辦法以前，切勿再與敵人談話，以免為敵藉口。"②當時，蔣介石對於孔祥熙秘密與日本談判的情況已經有所察覺，蘇聯駐華外交官也為此向中方瞭解情況，因此蔣在電報中特別提醒孔祥熙："日人近時特放一種空氣，甚傳兄屢提條件交敵人，皆為日敵所拒。此種空氣，影響於我內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談。務請兄注意為禱。"③

8 月 11 日，孔祥熙電復蔣介石，首先表示尊重蔣的意見，"承囑一節，自應注意。"接著，為自己轉報唐紹儀女兒談話一事解釋，向蔣道歉："此次諸夫人談話，顯系買好，原電轉陳，藉供參考，不意增兄煩慮，殊覺不安。"關於他本人和唐紹儀發生關係的原因，孔聲稱目的在於爭取唐，阻止唐為敵所用。電稱："少川為人秉性及過去在粵經過，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淪陷後，日方對少川多方誘惑，時思利用。且聞伊不甘寂寞，曾發牢騷，恐其萬一為敵利用，影響大局，同志中屢為弟言，囑早設法，故利用其親友盡力勸慰，使其為中央用。"關於蔣電所稱向日方提交和平條件問題，孔堅決否認："和議問題，完全彼方自動，時有報告前來，所以未曾拒絕者，原欲藉以觀察敵情，供我參考，並未提及任何條件。日人放造空氣，原屬慣技。與弟絕無關係。"④

在歷史上，唐紹儀反對過孫中山。1920 年，孫中山在廣州恢復軍政府，唐不願支持，退居家鄉。1931 年，汪精衛、孫科等在廣州成立政府，與蔣介石對抗，唐是常務委員之一，後來胡漢民與蔣介石對立，領導"西南派"從事公開的與秘密的反蔣活動，唐又曾出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因此，蔣介石不喜歡唐紹儀，更反對唐出面和日本進行秘密談判。當時，日本方面正在動員唐紹儀出面，在南京組織偽政權，1938 年 1 月，蔣介石即得知有關情報，日記云："其急欲造成唐紹儀為南京之傀儡者，亦無法中之一法也。①7 月 9 日，蔣介石分析日本對華強硬的原因，其第三條就是：唐紹儀"希冀拆散我政府"。②9 月 11 日，蔣介石再次分析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對華政策，認為當年 6 月至 7 月之間，板垣之

所以強硬，其原因在於，"錯認我內部有分裂及強逼餘下野之可能"，同時，也由於"我內部文人態度曖昧與唐紹儀老奸之施弄陰謀"。③同月下旬，日本特務土肥原到上海訪問唐紹儀，說服唐起草了《和平救國宣言》。④9 月 30 日，唐紹儀即在家中被軍統特務刺殺。第二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實為革命黨除一大奸。此賊不除，漢奸更多，偽組織與倭寇更無忌憚矣。總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敵，我黨革命之障礙，以唐奸為最也。"⑤唐紹儀被刺一事，撲朔迷離，多年來成為疑案。蔣介石的這一則日記表明，此事當出於蔣的決定。

制止賈存德、馬伯援與萱野長知等人的談判

日本侵華，採取的是"和戰兩用"政策，即一面武力進攻，一面政治誘"和"。1938 年 2 月，日本將在長江下游的侵華部隊改編為華中派遣軍，以畑俊六大將為司令官。畑俊六接任後，即一面籌畫進攻武漢，一面通過萱野長知、松本藏次等人與中方聯繫。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與孫中山、黃興結識，參加中國同盟會，曾多次參預援助中國革命的活動。抗戰爆發後受頭山滿及松本石根大將之命來華，找尋與重慶方面談判的機會。畑俊六對萱野說："戰事無論延長至何時，總有和平之一日，希望有一瞭解日本者出而負責收拾善後局面，締兩國共存共榮之同盟。"①又當面召見孔祥熙在上海的親信賈存德②說："現在日本的對象已不是蔣委員長了，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維新政府，但是，蔣委員長、孔院長想到同盟會時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覺悟，亦未嘗不可談判和平。"③他指示

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當年 5 月，賈存德密攜萱野致孔親筆函，自滬至漢。函稱："現在中日戰爭，無異萁豆相煎，勢將兩敗俱傷，絕非東亞之福，希望捐棄小嫌，維持大局。"④賈並向孔轉述萱野意見：現在日軍對和平要價過高，實難談商，必須設法使國內和平派抬頭。如中方暗示同意，本人極願回國為和平奔走，並已派人與頭山滿接洽云云。⑤萱野所言，符合孔祥熙心意，復函稱："中日接壤最近，唇齒相依，在歷史上地理上關係極為密切，互助則能共存，相殘必致偕亡。""究修百年之好，抑種百年之仇，似全在貴國少數軍人之一念。"孔要求萱野聯絡日本的"忠君愛國之士"，"責以正義，曉以利害"，促使少壯軍人早日醒悟。孔本人則聲稱："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榮之百年大計起見，亦當竭盡綿薄，以從事焉。"①同時，孔祥熙還準備了一封致頭山滿的信件，也交賈帶回。6 月初，賈回到上海，與松本藏次見面，代表孔祥熙表示："中日相持，仇者快，親者痛，利害詳如來函，如能保領土完整，修萬代之好，兩國幸甚。現以院長地位，亦樂與公等挽救兩國之危局，不知公等有無善策？"②6 日，萱野詢問有無孔祥熙復電，賈當時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只好編造了一通假電報出示萱野。7 日，萱野偕松本飛返東京。③13 日，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實業總長王子惠告訴賈存德：日本軍部訓令，如蔣介石不表示休戰時，決定三路進攻漢口。④21 日，萱野回到上海，與賈存德討論與孔祥熙會面地點。⑤23 日，孔祥熙向蔣匯報此事，聲稱"在此時期，似不妨虛與委蛇，以分化其國內主戰派與反戰派之勢力"。⑥

此函發後，蔣介石迅速回電批評。蔣電未見，但其基本精神從孔祥熙 6

月 25 日復蔣電可以窺知。孔電云："頃奉手示，至佩卓見。弟前接賈生來電，當即復電切戒。茲承尊囑，已又去電嚴諭。"孔特別向蔣表白，為避免發生意外情況，已預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賈存德之電，均系秘書具名；前致萱野函，也是採取另附名片的辦法，並未簽字蓋章，希望蔣寬心。孔同時向蔣匯報，剛剛接到賈存德來電一件，"已答以現尚無暇，囑將切實辦法先行探明電復，備作參考，此外，僅對萱野奔走辛勞略表慰勉而已。"⑦

當時日方認為，與中國"和平"的最大障礙是蔣介石，因此堅決要求蔣下野。7 月 1 日，孔祥熙致電賈存德，表示本人可代替蔣介石下野，電稱："苟有利真正共存共榮，為彼方轉圜面子，不惜敝屣個人地位。"①萱野對孔祥熙的態度表示敬佩，聲稱對蔣下野一事，可不堅持。7 月 4 日，萱野表示，以人格擔保無欺詐，日本的軍事行為最近暫可"不積極"，但完全停止，須待會見孔祥熙之後。②7 月 5 日，賈存德偕同萱野赴港，繼續談判。行前致電孔祥熙表示：將親自攜帶"切實大略條件"到武漢，詳細面稟。③7 月 6 日，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宣稱，日本政府擬在 8 月以前奪取武漢，兩國談和，最好在此時期。日方條件仍如陶德曼轉達的"訂立防共協定"等四條，希望瞭解中方條件，再行商洽。中村要求孔祥熙直接致電外相宇垣一成商洽，同時表示，希望 7 月 7 日蔣介石發表廣播講話時，"演詞不致過分激烈，以免引起彼方民眾反感"。④同日，孔祥熙將賈存德的上述電報及中村談話一併報告蔣介石：請示"所陳各節，是否可行"。⑤7 月 15 日，孔祥熙又將萱野的老朋友馬伯援以及和萱野有干親關係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參加談判。⑥

7 月 20 日，馬伯援偕同賈存德會見萱野及松本。馬伯援表示：1. 日本軍閥，不協助東亞民族，使之獨立，為九億有色人種之領袖，乃恃強奴隸中華民族，迫中國抗戰，自相殘殺，未免自壞長城。2. 日本不知中華民族之團結，由於日閥之迫逼與凌辱，反欲分化中國，利用漢奸，這種手段，已不適用於現代之中國。3. 中日戰爭結果，必陷日本於污泥中，更陷東亞於污泥中。4. 可惜日本無大政治家，無遠見軍人，理解孫總理的大亞細亞主張，促其實現，致有今日之悲劇，受到白色人種輕視。談話中，馬伯援警告萱野：中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將是共產黨。他盛讚延安青年人所表現出來的艱苦奮鬥精神，說是"膚施之青年男女，日食小米飯兩餐，工作十四小時不倦，精神方面，勝過今日之大和魂"。

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馬伯援的意見，陳述其觀點說：1. 犬養毅臨終時表示，日閥利用大亞細亞主義，強霸東亞，必惹大禍，擬改大亞細主義為亞細亞和平協會，使各國各民族樂於參加。2. 頭山滿最近常說：中日戰爭，起於日本不敬，輕視中國軍人及中華民族；應當止於"誠"。倘中日以"誠"相見，各種問題均可解決。3. 現在中日軍人，愈打愈對立，愈仇視。吾輩工作，以休戰、恢復理性為先。4. 日本軍人，最要假面子，倘蔣先生能理解，一時下野，即可停戰，中日雙方，同時派出代表，和平立刻實現，屆時蔣先生東山再起，亦無不可。馬伯援反駁萱野二人的意見，聲稱"蔣公為現在中國唯一的領袖，假使下野，無論何人，對於這個局面，不敢負責，不配負責，中國依然混亂，仍是抗戰到底為是"。①萱野表示，願回東京傳達上述意見。馬伯援即鼓勵萱野，倘能建議日本取消近衛宣言，不要求蔣下野，伯援可以個人資格，報告孔祥熙

或其他黨中舊友，請其轉陳蔣公，促進和平實現。會談後，萱野、松本等於 7 月 23 日前先後回日，向近衛首相、宇垣外相等人匯報。

蔣介石對宇垣一成的"和平"政策懷有戒心②，自然，他對馬伯援、賈存德與日方的談判仍然持反對態度。8 月 4 日，孔祥熙致蔣介石電稱："前奉尊諭，已切囑馬伯援、賈存德勿再活動，完全作為彼等私人接洽，藉以探取消息，備我參考，絕不能談及任何條件。"①11 日，他在回答蔣關於唐紹儀的批評時再次作了同樣表示。②8 月下旬，已經返回上海的賈存德多次致電孔祥熙，聲稱畑俊六與第三艦隊長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賈會面，表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要蔣介石"下野"，近衛聲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現在日方的條件僅為"防共"與"親善"兩條，如中方採納，希望派負責代表到滬商談。賈並稱，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戰特別委員會，畑俊六、及川古志郎為委員，土肥原等為進行委員。③9 月 1 日，孔祥熙再次將上述情況向蔣介石匯報。6 日，蔣介石復電，命孔祥熙轉告賈存德，向日方表示拒絕。④10 日，蔣介石決定迅速制訂五年抗戰計劃，實行經濟、政治、黨、軍隊、教育、社會各方面的改造，以期自力更生與獨立作戰。⑤11 日，蔣介石再次致電孔祥熙，口吻空前嚴厲：

賈某事，應嚴令停止活動，否則即作漢奸通敵論罪。敵想復訂停戰協定，以亡我國，其計劃極毒，請兄負責制止，免誤大政方針。千萬注意是荷！⑥

蔣介石既甩出狠話，孔祥熙不敢再轉呈賈存德的情報，於是，採取其他

辦法。

不理睬孔祥熙與日方首腦會面的要求

萱野長知等於 7 月 23 日返日後，聯絡頭山滿、小川平吉等人，在政界上層活動。至 9 月上旬，宇垣外相表示，不再堅持蔣介石必須下野，但蔣須"預先作出準備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後自動實行"。①9 月 17 日，萱野再到香港，與馬伯援、賈存德會談，萱野稱：宇垣"酷愛和平"，願意倣傚 1938 年英國首相張伯倫訪問德國的故事，在大海洋的軍艦上與孔祥熙見面，不講條件，僅以"和平"與"防共"兩原則為談話基礎。②馬伯援將兩原則略加修飾，改為：1. 東亞永久和平；2. 中日精神防共。對"精神"二字，萱野深表同意。23 日，日本五相會議議決，同意宇垣與孔祥熙的會談計劃。25 日，馬伯援離港赴渝，向孔祥熙匯報。但是，宇垣因其主張遭到日本軍方的強烈反對，於 29 日辭職。10 月 8 日，馬伯援寫出報告，交孔祥熙轉呈蔣介石。報告稱：萱野等對和平運動，具有決心，正在運動頭山滿組閣。宇垣雖已去職，但近衛仍有決心，日本厭戰心理，已遍全國，因此，中國應該利用這一時機。他說："頭山滿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與總理有舊，現以八十四歲，老而且病之軀，熱心和平，並派六十六歲之萱野，兩來香港，設法溝通，此種精神，吾政府宜利用之。再中日戰爭，孰勝孰敗，總有結束之一日，我政府縱不輕與之和，亦當與之周旋。"他建議重慶國民政府"通盤打算，本乎歷史，鑒於大勢，派得力人員與之接洽，鼓其勇氣，或進而同去東京，察其虛

實，宣傳我政府主義"。③

孔祥熙覺得馬伯援的報告很有用，於 10 月 15 日上呈蔣介石，同時致函說明國際沒有援助中國的可能，而中國國內的財政又已極為困難，無法維持。函稱：

茲據顧大使報告及各方事實觀察，國際援助既不可能，則此後對於內政外交均有切實檢討之必要。最近有西友自日來言，就其國內表面觀察，似無大戰狀態，一切經濟財政尚能勉維現狀。至於我國，在我兄領導之下，雖將士用命，民眾動員，抗戰年餘，已博各國之彩聲，只以戰場盡在我國境內，雖不免土地日促〔蹙〕，交通困難，工廠既遭摧毀，貨物亦難出口，所有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實不可以數計。非惟我兄多年來苦心孤詣之種種建設，付諸東流，而今後財政上之維持，更將難乎為繼。①

該函進一步渲染財政危機和武漢失守後中國的困境，聲稱："後方情形，為我兄所深悉，長此以往，武力固屬重要，而國內物質及人民團結如何，均應顧及。如果軍事方面確有把握，不僅武漢可保，且能繼續支持，日本方面不出三數月即有變化可能，自屬不成問題，萬一無甚把握，恐武漢一經退出，則人心不免因厭戰而動搖，各省態度有無變化，亦難預料，且敵機現已屢向我後方擾亂，將來大多數軍隊究宜退至何處，倘使拘於一隅，補充與給養似皆成為問題。加以目前我之現金及外匯已撥用殆盡，而以貨易貨又因交通困難運輸亦極不易。弟忝負行政責任，對於軍事實

不甚諳，對於財政外交，則不能不悉心研究。近來多病，杞憂尤甚。"他建議蔣介石抓住機會，乘時進行。函稱："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進展，而軍事方面亦無十分把握，則此後遇有解決機會，即應乘時進行，否則機會至時，我無應付之策，稍縱即逝，更難再得，心所謂危，不敢緘默。"

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寫的《最近國際情勢》及《日本最近情勢》報告。前一報告對蔣"攻心"，歷述各國情況，聲稱寄希望於國際援助，無異畫餅充飢。中云：

我以開罪於日本，故英國對我各項借款，非完全拒絕即多所顧慮，而法國對我所購之器械，現亦多方為難。俄雖對我極表同情，然因德、義(意)、英等國對俄均甚歧視，俄內部情形複雜，故斯大林不敢言戰……至美國因鑒於歐洲形勢，雖心理上為我不平，實際上亦難積極助我……若望其為我出力，仍恐等於望梅止渴。①

後一報告說明日本國內和平派的活動，內稱："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現在希望和平者頗不乏人，如頭山滿、近衛、宇垣已合組秘密委員會，暗中活動，設法制止軍閥跋扈……萱野為頭山之代表，現在香港，仍思盡力奔走。"接著，孔祥熙著重說明，宇垣雖已去職，但日本國內的和平派仍在活動。報告稱：

昨接港電雲，松本最近由東京抵港，據言，對和平大綱，近衛與宇垣一致，方針未變。現矢田回國，擬請近衛親自出馬，以效張伯倫。頃

又聞知萱野接東京來電，謂海、陸相急盼與弟及居覺生兄會面。②

還在宇垣一成剛剛出任外相時，蔣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員赴日談判，對此，斥之為"想入非非"、"可笑之至"。③自然，對於"近衛親自出馬"以及陸軍大臣、海軍大臣要與孔祥熙、居正等見面的說法也不感興趣。對孔祥熙此函，蔣介石未加理睬。同年 11 月，褚民誼、樊光致電汪精衛、孔祥熙，再次聲稱"近衛甚願效張伯倫赴德故事，赴華晉謁委座"。①同月 7 日，孔祥熙將此電轉呈蔣介石，蔣仍然未加理睬。

阻止孔祥熙答覆近衛第二次對華聲明

近衛的第一次對華聲明發表後，遭到日本許多人士的批評。11 月 3 日，近衛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題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改變此前"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聲稱"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企圖以此誘使重慶國民政府上鉤。②果然，孔祥熙覺得是個機會，準備在 11 月 7 日的行政院"國父紀念周"上發表講話,給予"非正式答覆"。擬稿稱："我人所注意者，僅彼對我態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亂我者，即我之敵。"擬稿批評日本政府"好用定義不明之詞句以淆惑視聽，如彼所謂安定東亞，是否獨霸東亞之別名？所謂求中國之合作，是否剝奪我經濟之獨立自由之變相？我人於此亟願得知其真意。"③這裡，貌似對日本提出批評、譴責，而實際上將為日本政

府提供答辯、粉飾其侵略政策的機會。擬稿並稱："解決中日之關鍵，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權，而拋棄其侵略政策，則東亞之安定一舉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 月 6 日，孔祥熙將擬稿電送蔣介石審閱。同日，蔣介石以"限卅分鐘到的特急電"通知孔祥熙："此文應慎重斟酌，切不可發表。"④11 月 9 日，孔祥熙復電蔣介石稱："電發之後，弟覺似仍未盡妥，經再修改，原文另電陳聞，頃奉尊電囑為緩發，經已遵辦。"①這樣，蔣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與近衛文麿之間的一次遠距離對話。

用"殺無赦"警告蕭振瀛與日人重開談判

蔣介石對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放心，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沒有第三國的保證，決不與日本直接談判。日本軍部的"蘭機關"負責人和知鷹二懂得蔣介石的心理，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餌，誘使蔣介石破例。1938 年 9 月，蔣介石派原天津市長蕭振瀛到香港談判，由何應欽具體指導。孔祥熙未參預此項工作，但他對談判非常關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 10 月，他耳聞談判因第三國保證問題陷入僵局，功敗垂成，於 21 日致電蔣介石稱："弟意最重要關鍵，乃在對方之條件如何。至於方式，不難覓得合意途徑。現在國內外狀況，兄所深悉，倘軍事確有把握，自無洽商必要，否則如條件相當，直接、間接無非形式問題，條件如能密商妥貼，則運用第三國出面，不致有何困難。"②這封信再次表現出孔祥熙因國內困難而急於與日本妥協的心理，但是，蕭振瀛與和知談判的

主要困難在於日方一面談判，一面進攻，毫無誠意，因此，蔣回函稱："蕭事與兄所談者內容完全相反，我方並未爭執形式問題也。此事我處被動地位，在我限度之內，能否接受，實在於對方也。"蔣並告訴他："此事於武漢之得失無關，請勿慮。"③不久，蔣介石察覺日方談判的虛偽，決心堅持抗戰，下令停止談判，召回蕭振瀛。

第一次談判失敗，和知鷹二繼續在東京政要之間活動。當時，日本正準備扶持從重慶逃出的汪精衛成立政權，和知覺得是個機會，決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蔣介石派人坐到談判桌前來。1939 年 8 月，汪精衛在上海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次月，成立"中央黨部"。17 日，汪精衛致電重慶國民黨中央，要他們毅然改圖，努力與日本實現和平。同月，和知鷹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轉告重慶方面：汪精衛之事，經近衛、平沼兩屆內閣決定，又經阿部信行特使承認，奏明天皇，勢難中止，但日本對汪之信念已經搖動，認為其人大言不實，貪索無厭。影佐禎昭本是汪之主謀，現在亦已失望，引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衛，在於無別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聽其一試。何以之稱：大約 11 月初，汪即可組織政府。意大利已勸日本促成此事，應允即日承認，德國則勸日本與重慶謀和。綜觀內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際，最好乘汪精衛政府成立之前，斷然成立全面停戰協定，而將汪之問題包括於取消偽組織之中。中國如有和平決心，日本定以誠意直接談判。軍部方面，和知可與板垣征四郎負責；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輔等出面商談原則。和知要求何以之轉告蕭振瀛，或派專使來港商談，或仍由蕭先來，以資進行。①31 日，何以之致電時在重慶的蕭振瀛，告以上

述各點。10 月 4 日，何以之兩電蕭振瀛，聲稱和知認定汪精衛為"東亞和平之障，極願剪除"，催蕭即速來港。②10 月 6 日，孔祥熙將何以之各電轉呈蔣介石，同時致函，要求允許蕭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資格與和知"慎密試談"，同時"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備我參考"，函稱："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對於去汪事頗為努力，似可令仙閣前往一行，略與周旋，使其對我信仰益趨堅定。如能達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則仙閣不去，彼必感覺失望，甚或老〔惱〕羞變怒，反又趨於助汪之一途，則前途更多障礙。"③函上，不料卻引發了蔣介石的雷霆之怒。10 月 8 日，蔣介石日記云："蕭、孔見解之庸，幾何不為敵方所輕！國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①9 日，蔣介石復函孔祥熙稱：

兄與蕭函均悉。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希以此意轉蕭可也。②

這封信，表面上對蕭，實際上斷然批駁孔祥熙的意見，語氣嚴峻，沒有給孔留一點面子。蔣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說："蕭、孔求和之心理應痛斥。"③可見，蔣的這封信明確針對孔祥熙。蔣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堅決、激昂，一是蕭振瀛曾將去年在香港與和知談判的部分情況透露給秦德純，秦又秘密轉告馮玉祥，其間訛傳嚴重，馮據此向蔣及國防會議揭發，使蔣很憤怒。④二是自汪精衛在上海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後，蔣即加強了對汪的批判火力，聲稱"汪逆賣身降敵，罪惡昭著"，"人人得起而誅之"，正處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緒中。⑤

同年 11 月，何以之在香港與孔令侃會談，何稱：倘中方確有接受和平可能，則和知願赴重慶面洽。⑥次年 1 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親信盛升頤轉達板垣征四郎的議和條件，並稱：只要中方派大員前來，板垣可以親自出馬，甚至飛往內地亦可。⑦對於這些情報，孔祥熙就不敢再報呈蔣介石了。

1940 年 6 月 28 日，蔣介石在日記"預定"欄中寫道：蕭振瀛"應監禁"。①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慶接洽的蔡森、賈存德

自蔣介石嚴令賈存德停止活動後，孔祥熙雖不敢再向蔣轉呈賈的情報，但仍命其在上海繼續聯繫日方。

早在 1938 年，賈存德即與偽維新政府官員王子惠相識。王為留日學生，早期同盟會會員，與畑俊六、及川古志郎等日軍頭目都有聯繫。偽維新政府成立時，任實業部長。當年夏，王向賈等表示，如能給以自新之路，可隨時脫離偽組織，犧牲一切，專誠為中央效力。賈存德等曾將王氏情形電告孔祥熙，孔即復電勉勵,命其辭去偽職，伺機去東京團結日本主和派，抵制主戰派。王奉令照辦。1940 年 4 月，王子惠自東京返滬，聲稱已將主和派人物閑院宮津子伯爵、頭山滿等聯成一氣，主張和談以重慶國民政府為對手，反對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權。王並透露，板垣征四郎想從速結束對華戰爭。5 月間，板垣在面談時口頭提出五項條件：1.聲

明恢復七七事變前狀態。2.中日以平等互惠之原則，經濟合作。3.共同防共。4.撤兵。5.取消一切偽組織。②在談到第四條時，板垣表示，希望孔祥熙指定地點，以極秘密的方式與板垣等會面；如孔允許，約定會面日期後，可通知板垣，即由板垣等請求天皇下密詔，實行全面秘密休戰。王子惠並稱，板垣親口表示，如孔祥熙同意，將親自簽名發出正式公文，望孔在 6 月 6 日天皇承認汪政權前對上述條件表態。①

6 月 26 日，賈存德化名吳復光到達重慶，孔祥熙表示可以接受板垣的五項條件。但是，7 月 4 日、8 日、9 日、10 日，日機連續轟炸重慶，這使孔祥熙很不滿，對賈存德大發牢騷，責問"日本人搞的什麼鬼"，埋怨因此妨礙了向蔣的"進言之機"。②不久，板垣應允，自 16 日至 22 日止，停止轟炸一周。這一時期，孔祥熙情緒低落，告訴賈存德"事不好辦"，要他"不要著急"。7 月底，王子惠再派蔡森抵渝，會見孔祥熙，聲稱"如有談判可能，彼方即行統一軍、政、黨意見，取消一切枝節活動，決定專責，以資進行"。③其後，日方急於得知蔡、賈談判消息，致電稱，將派專機到廣州迎接蔡、賈。孔祥熙覺得這又是一次好機會，於 8 月 24 日致函蔣介石，摘抄蔡、賈報告及有關電報，函稱："敵思結束對華戰事，以便南進，可以想見。弟意值此抗戰嚴重、外交詭變時期，對於各方消息，似應互相印證，以冀把握機會，決定大計。"函末，孔祥熙特別要求蔣介石"閱後付丙，不必交存"。又附言稱："就最近國際情勢觀察，友邦對我實力援助甚少，我應設法別尋機會，以謀自立自主，蔡、賈所述各節，亦有可以供我利用之處。弟已告其設法各方鼓動，促成敵之南進。一則使其主戰、主和意見分歧，分化團結力量；二則使其侵略政策

轉移方向，減少對我力量；三則證明敵人野心甚大，歐美列強亦必與之發生摩擦，於抗戰前途，或不無裨益也。"④

板垣曾向王子惠表示，可以發出親自簽名的公文。孔祥熙向蔣介石上書後，要求蔡森回滬，取到板垣正式公文。又命賈回滬，暗中監視王、蔡二人。其後，二人即陸續離渝，經香港回滬。8 月下旬，蔡、賈的行蹤被軍統在香港的特務發現，戴笠親自向蔣報告，蔣即命戴笠向孔祥熙查詢。9 月上旬，孔祥熙復函戴笠，謊稱吳復光系中央銀行某職員別名，因受敵偽注意，調令來渝。蔡系靳雲鵬舊部，受靳之命來渝報告北方情形，二人均系"普通人員"，敵人不會相信，更不會贈以巨款。①其後，軍統打入日方的特務毛豐又向戴笠報告，蔡森已於 27 日偕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東條佑銓專機飛滬，此事系日本實業家背後策動，曾撥款二百萬元作為活動經費云云。②9 月 10 日，戴笠將有關情況再次報告蔣介石。同月 19 日，張季鸞致函陳佈雷稱："敵人曾賄買山西人蔡某等二人赴渝，攜孔先生假信而歸滬。現由敵人特許設電台通電，尚在烏煙瘴氣中，此事尊處想早已聞及矣。"③20 日，蔣將有關檢舉報告轉給孔祥熙，要他回答。22 日，孔祥熙復函，首稱檢舉報告"所載各節，恐多揣測誤會，以訛傳訛，原報告人有意邀功，遂不免捕風捉影，或另有作用者希圖對弟中傷"。接著，孔向蔣辯白：一是孔祥熙致函板垣及頭山滿問題，孔稱：蔡、賈來渝時，攜有日本老友名片，向弟問候，弟因多年故交，在情理上不能不理，因此在蔡、賈臨行之時，以名片回報，所謂寄板垣與頭山滿等人的親筆函件，絕無其事。二是蔡、賈與王子惠、板垣的關係與接受巨額資助問題，孔稱：王子惠派人赴港迎接蔡某，或

有其事，但蔡、賈到滬後，是否赴南京，已否晤見板垣，均不得知。孔承認：蔡、賈來重慶之前，確曾與板垣會面，也承認，二人可能得到日方資助，但他說："敵方實業家因反對軍閥厭惡戰事，渴望真正和平早日實現者甚多，既派其來，或有贈送旅費之事。若謂撥款二百萬元，恐未必有此巨額。"他認為這些情況，"真偽無從證明"，屬於敵人"內部互相猜忌，設詞譭謗"。三是關於蔡、賈的身份與賈存德往來滬、渝之間的目的。孔在重申"調回"說之外，又加了一個"遷移眷屬"說。函稱："上海淪陷業已三載，敵偽方面無時不思毀我法幣，俾我財政不能接濟軍事，對中行人員極力壓迫，彼等既無寸鐵，政府亦難為保障，故不能不有一熟悉敵情者為我刺探消息，藉便戒備。賈在過去，雖曾任此項工作，因其參加倒汪運動，為汪方特務隊所注意，前已將其調回。此次赴滬，即擬設法遷移眷屬。至蔡本非弟之屬員，亦無任何名義，在無所謂調回矣。"①

蔣介石下令戴笠調查之後，陳佈雷又於22日接到香港張季鸞的檢舉信，中云："王子惠所賄買之蔡、賈二人之事，其情形甚堪發指。蓋敵人以專機送至廣州，而公然入渝，其歸也，亦由敵人由港接至廣州，而專機送往上海。此輩宵小，本無足深論，然敵人賄買之人而能公然出入重慶，且能帶孔先生之假信而來，再不能以小事看矣。"②陳閱後"甚感離奇"，立即轉呈蔣介石。③蔣閱後再致孔祥熙一函，嚴厲批評孔祥熙等人的行為"搖撼軍心、人心"，顯示"政府零亂"。④同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倭寇軍人之愚拙無才，比我國尤甚，其行動幼稚欺詐，實非常情所能想像，幾乎令人倭寇有不可交手之感。若理會者，必受無妄之禍也。"又稱："

為庸之與季鸞等無方而好事為歎也。"⑤這裡批評到了兩個人。"無方"，指孔祥熙；"好事"，指張季鸞。

蔣介石的批評很嚴厲，顯然，孔祥熙要認真想想對策了。9 月 30 日，孔祥熙於八天之後才復函蔣介石，函稱："今細繹手示，對蔡、賈事實際情形，似尚有未盡明瞭之處，恐系根據一方面之情報所致。既承諄諄相詰，弟不忍不略陳衷曲，期解疑慮。"

孔函除說明蔡、賈的身份及離渝情況外，指責情報提供者"以訛傳訛，竟至張大其詞，駭人聽聞"。孔函特別說明，在接待蔡、賈的整個活動中，自己對蔣既無隱瞞，又持慎重態度，沒有文字貽敵，更未假借蔣的名義，函稱："一言喪邦，古有明訓。事關國家興亡，何敢擅自主張！當蔡來見時即本我兄素來之主張，曉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復七七事變以前之狀態，決不與之談判。此外絕無文字表示貽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義？又何來我兄名片？蔡、賈兩人諒亦無此巨膽敢事偽造。"接著，孔函強調掌握敵情、善於利用反間的重要："惟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偵探重要，無人不知……今如有人，本其愛國熱忱，窺得敵偽隱情，甘冒危險，不遠千里而來，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顏色，使其樂為我用，勢必為淵驅魚，反被敵偽利用。弟雖愚，竊期期以為不可。故蔡之來謁，不能不見，惟所告之言，皆系勉以大義，並未派以任務，且暗示種種，使其有機會時，於不知不覺間言於敵方，以期於我有百利而無一害。"孔函還強調，從事這方面的活動難免遭人誤解，甚至遭到攻擊，但自己完全出於忠誠："弟亦深知接見此種人物，難免物議，小則受人攻擊，

大則自招巨禍，然為效忠黨國，使我兄抗建大業早日成功，故不惜利用各種機會，各方力量，期達目的，從未對自己本身之安危著想。"①

孔函接著分析日本少壯軍人中的兩派。甲派主張先用全副武力，解決中國事件，然後再行南進，此種主張對於中國最危險，非極力破壞不可。乙派主張用溫和手段，得到中方諒解之後，再行南進。孔函由此論證利用乙派的必要及利用蔡森的正當。函稱："至乙派今日之肯降階表示尋求和平者，確因千載不易得到之南進政策，今可不費力拾得之，故不容輕輕放過。弟既認定此時如能誘其南進，確屬於我有益，前曾向兄言及，兄謂恐做不到，弟亦深知其難，不容強求，然苟有時機，弟以為不應放過，必隨機設法暗示，希接近敵方者，於無形中促助其乙派之主張，故蔡來見時，弟亦曉以此意，暗示其促成。於上次報告中最後一頁，業向我兄陳明。"

針對蔣函所批評的"搖撼軍心、人心"之說，孔祥熙辯解道："蔡此來，原出敵方之意。據情報所載，敵既派其前來，又復巨款運動，自系敵方力竭，敵方情急，適足以暴露敵人之弱點，足可搖撼敵人之軍心、人心，而我之軍心、人心，更當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接著，孔祥熙又反駁蔣的"政府零亂"說。聲稱"蔡既來渝傳達敵人之意，是時至今日，敵已深知欲謀全面之和、真正之和，非向我兄請求不可，亦非聽由我兄裁決不可，似無零亂之可言"。

孔祥熙在逐一反駁蔣對謀和活動的批評後，著重說明自己對蔣的耿耿忠

心："在過去二年中，弟對於敵偽或其他方面，凡有利於我兄之抗建大業者，均不惜任勞任怨以謀利用者，一則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責任，不能推諉，一則因我兄為最高領袖，身任統帥，意欲保護其威望，故決志為國為兄，自甘犠牲，決不願使我兄因一言一動，受有半點懷疑，致被奸人藉口攻擊。"①函末，孔祥熙表示，將遵蔣之囑命人查究此事。函稱："現蔡、賈事，既蒙尊囑，遵即飭查，如有假冒招搖情事，賈當撤職嚴辦，蔡已托人設法予以警告。"自然，這是孔祥熙對蔣的敷衍之詞。

孔祥熙這封信寫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還附有《情報摘要》兩份。其內容之一是，褚民誼曾在南京宴會席間對人說："先從倒孔入手，使重慶內政發生糾紛。"孔祥熙附呈這一情報，意在告訴蔣介石，所有反對他本人的行為，均有汪偽背景。其二是，張季鸞對人表示，銜蔣之命到港與日方談判和平，到港前曾見蔣 11 次，等等。孔要求蔣閱讀這些情報後"仍乞准予賜還，以便存查"，並稱："弟向不道人長短，在過去更不欲以此種複雜瑣碎之報告，煩擾我兄心神。現在事既牽涉及弟，恐其中別有作用，不能不請兄注意，但仍不願使他人知之，以為弟亦有所攻擊，或影響人心也。"張之赴港，確係受蔣之命。①孔向蔣呈送有關張的情報，其潛台詞是：你蔣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發生關係嗎？孔祥熙這一手很厲害，蔣自然無話可說，追查蔡、賈一事不了了之。

蔡、賈回到上海後，即列席王子惠與板垣代表巖奇清七所舉行的會談。巖奇稱："中國的維新大業必須由蔣委員長領導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

中國方面就需要邀請日本在華北邊區樞紐地留兵協助"。會議記錄提出，察哈爾、綏遠鐵路線及北平、奉天線各樞紐地均由日本駐兵。至此，賈存德才發現上了王子惠與日方的當，拒絕簽字。會議不歡而散。1944 年 9 月，賈存德在上海會晤日本"蘭工作"負責人和知鷹二，得知和知與板垣之間存在矛盾，深感變化難測，打電報給孔祥熙，聲稱才識不足，難以勝任，自此退出與日方的謀和活動。②可見，此前孔祥熙並未對賈採取"飭查"、"撤職嚴辦"等舉動。

孔祥熙對蔣介石的匯報有重大隱瞞

孔祥熙在 1940 年 9 月 20 日函中向蔣介石表白："弟在過去，凡有所聞，均曾擇要抄陳，後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在與日方謀和中，所有重要事情都曾向蔣匯報，而且奉命即止，沒有違背過蔣的意志。讀者從上文中已可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下文我們將進一步提供新的論證。

根據日文檔案，早在 1938 年 6 月，孔祥熙即派遣秘書喬輔三赴香港與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談判。二人先後在 6 月 23 日、28 日、7 月 1 日、13 日、18 日、19 日多次會談。在 7 月 18 日的會談中，喬曾轉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條件：

1. 中國政府積極實現對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為，希望日本也要為遠東永久和平積極為日華關係好轉而努力。

2. 滿洲國以簽訂日、滿、華三國條約而間接承認。其次深切希望滿洲國自發地成為滿洲自由國，給中國人民以好感。

3. 承認內蒙的自治。

4. 決定華北特殊地區非常困難, 但是中國承認互惠平等的經濟開發。

5. 非武裝地帶的問題，有待日本的具體要求提出後解決，中國軍隊不駐防，希望由保安隊維持治安。

6. 雖然還未充分討論，但清算與共產黨的關係，或簽訂加入防共協定的特別協定等，必須再加研究。

7. 中國現在非常荒蕪而且窮困，因而對中國政府說來，(日方) 雖有賠償的要求，亦無力支付。①

以上七條，包括實際上承認偽滿、承認內蒙"自治"、設立非武裝地帶等問題，都是地地道道的喪權辱國條約，談判中，喬輔三向中村豐一稱："孔曾和蔣見面，除了蔣介石本身下野問題外，其他全部都和蔣商酌過的。"直到今天，也還有學者堅信喬輔三的這一表白。其實，檔案資料證明，這些條件和蔣在對日秘密談判中一貫堅持的條件完全相反；檔案資料也證明，孔祥熙從未向蔣匯報過上述條件。上引 8 月 11 日孔祥熙致蔣函稱，他之所以不拒絕和日方談判，"原欲藉以觀察敵情，供我參考，並未提及任何條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做過類似保證。可見，孔祥熙的上述條件是背著蔣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僅如此，連派喬輔三赴港談判一事對蔣都是完全封鎖的。現存蔣檔中，孔有許多關於秘密談判的匯報，但是，沒有一件提到喬輔三。在必須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飾。如 1938 年 7 月 6 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又由孔轉蔣的電報說："

據所派與駐港日領事密洽者報告：該領事稱："鈞座在位，各事總有辦法。"言下似有議和須以委座下野為條件之意。當以此種觀念決不能任其系懷，故照鈞座在漢面諭，對該領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鈞座負責主持，如確有必要時，鈞座當可辭卸。"該電所稱駐港日領事，指中村豐一；鈞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蔣介石。其中所稱"所派與駐港領事密洽者"，顯然就是喬輔三。之所以不稱其名，說明孔祥熙父子不願意讓蔣瞭解喬赴港談判的真情。

在對日秘密談判中，孔祥熙對蔣介石所做的隱瞞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蔣一再囑咐，令賈存德停止活動，孔也屢稱"遵矚"，但實際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揮賈的活動。又如馬伯援赴港談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馬伯援所寫，經孔祥熙轉蔣的報告卻說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適日友萱野長知亦在該地，時相過從。"之所以這樣寫，完全因為此前蔣介石已不只一次與孔談話，要他停止謀和。此外，孔祥熙還長期利用曾是共產黨員，後向國民黨自首的胡鄂公①在上海與日方談判，次數頻繁，接觸面很廣，但是，孔祥熙也從未向蔣匯報過。

孔祥熙長期追隨蔣介石，和蔣利益相共，榮辱與俱。但是，他卻背著蔣一再向日方謀和，甚至在個別談判中向日方提出喪權辱國的條件，其主要原因在於他對長期抗戰喪失信心。從本文前引他寫給蔣的多通信件看，他認為國內財政極端困難，國際援助又毫無希望，因此才一意主和，謀求妥協。

不過，也應該看到，孔祥熙與日方的秘密談判除謀求妥協外，也還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敵情，擴大日本國內的主和派與主戰派的分歧；阻撓、延緩汪偽政權的成立；引導日軍南進，減弱中國戰場壓力等多種原因在內。因此，孔的謀和活動與汪精衛有別。1940 年以後，孔的謀和活動基本停止。他在協助蔣介石掌控戰時經濟、保證抗戰資源方面還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的。

蔣介石阻遏孔祥熙謀和活動的思想原因

如上文所述，蔣介石對孔祥熙的謀和活動屢加批評、阻遏，而孔祥熙則一再堅持，多方聯繫，並且背著蔣向日方提出嚴重的妥協條件，這種情況說明，蔣、孔二人雖公私關係均極為密切，但二人在對日態度上仍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盧溝橋事變後，孔祥熙在倫敦致電蔣介石，分析美、英、蘇三國的對華態度，反對立即抗戰，電稱："中日事件，如非確有把握，似宜從長考慮。""應付日本，仍須以自身能力為標準"。①21 日，蔣復電稱："情勢日急，戰不能免。"30 日，孔祥熙再次致電蔣介石，詢問"中央今日作何主張"，蔣電復稱："中央必決心抗戰，再無迴旋之餘地矣。"8 月 3 日，孔再次電蔣，以"我軍處處失利"為憂，蔣則復電表示："戰事果起，弟確有把握，請勿念，一時之得失不足計較也。"這些地方，說明二人在對日抗戰問題上確有分歧。1995 年，我在《孔祥熙與抗戰期間的中日秘密交涉》一文中，曾判斷"蔣介石思想中，抗戰成分較孔祥熙為多"。現在看來，這一看法還是可以成立，但是，當時我認為孔的

議和活動"顯然得到蔣的默認和支持"，這一看法需要修正。②

蔣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是一個民族主義者。20 世紀 20 年代，蔣強烈反對英國對中國的侵略，後來又反對日本侵略。1928 年的濟南慘案，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國家主權的侵犯，也是對蔣介石個人威權的羞辱。當年 5 月，蔣日記云："倭軍入城後，將我徒手兵及傷兵盡行射死，發炮二千餘顆，人民死傷二千餘，有一家盡死於一彈者，城內延火甚慘。嗚呼！濟南七日記之恥辱慘痛，甚於《揚州十日記》。凡我華人，能忘此仇乎？"①又云："倭寇第一要求為總司令謝罪。嗚呼！國恥身辱，其可忘乎！"②因此，蔣有抗日的思想基礎。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認為中國不是日本的對手，因而長期對日採取妥協政策，總想盡可能推延對日作戰時間。盧溝橋事變爆發，平津接著淪陷，這就將蔣逼到了"最後關頭"。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戰，必將受到人民的強烈反對，南京國民政府會處於全民的對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與日本議和，簽訂新的喪權辱國條約，他也必將遭到全民反對。1937 年 11 月 5 日，蔣介石曾經"很機密地"告訴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③這確是蔣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 12 月 29 日的日記中寫道："外戰可停，則內戰必起。與其國內大亂，不如抗戰大敗。""除抗戰以外，再無其他辦法。"④所謂"外戰"，指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華戰爭；所謂"內戰"，即指包括中共在內的各愛國力量會起而推翻他的統治。顯然，蔣對這一問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在長期和日本打交道的過程中，蔣介石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完全不講信義，日本政府和軍部之間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軍部強硬派的能力，因而與日本雖可達成協議，但都時時有被撕毀的危險。1938 年 8 月，蔣自記稱："倭非待其崩潰與國際壓迫至不得已時，決不肯放棄其華北之特權，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國際干涉，共同會議則不能解決，故對倭不可望其退讓求和，如其果有誠意，則必須其無條件自動撤兵之後方能相信也。"①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雖有恐日症，但盧溝橋事變後，他在對日作戰的實踐中卻逐漸認識到，日本是個資源小國，其國力、軍力與其不斷鼓脹起來的野心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外雖強而中干，有其的虛弱一面。此外，蔣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終將驅使其和英美衝突，世界大戰必將爆發，只要中國"苦撐待變"，抗戰的勝利終將屬於中國。1937 年 9 月，他在日記中表示："主和意見派應竭力制止。""時至今日，只有抗戰到底之一法。"②次月 31 日，他總結十年來與日本打交道的經驗，認為"與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國格，留待後人之起而復興"。③他本人也有"盡忠竭智，死而後已"的想法。④1938 年 1 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國抗戰最艱苦、最難以看到希望的時候，蔣在日記中寫道："不患國際形勢不生變化，而患我國無持久抗戰之決心。"⑤所謂"國際形勢"，指的就是英、美、蘇聯合，國際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對日作戰。以上，都是蔣介石阻遏孔祥熙謀和活動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蔣在盧溝橋事變後的八年中沒有和日方達成任何妥協協議、將抗戰堅持到最後勝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戰爭都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作戰到底，直至敵方完全被消滅或

投降，一種是雙方談判，達成"和平"協議，適可而止。至於"和平"協議，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利於敵，喪權辱國，一種是有利於己，無損或基本上無損國家主權。以上種種，都需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1941年之前，蔣介石長期陷在戰與和的矛盾中，舉棋不定。蔣曾寄希望於國際共同干涉或第三國調停，以和平方式解決中日戰爭，也有過直接和日方秘密談判，在相對有利的條件下結束戰事的幻想。這就是蔣雖對孔的謀和活動有所阻遏，但又顯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蔣雖批評孔謀和，但又長期付以國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檔案資料證明，蔣本人也親自掌控過幾次對日談判，有關情況，已見本書《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

原載《歷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

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石"抗戰到底"之"底"
--兼述蔣介石如何對待被日本侵佔的東三省

抗戰時期，蔣介石在公開談話或與日方的秘密談判中，曾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作為條件或"抗戰到底"之"底"。部分學者對此的解讀是，蔣準備放棄、出賣東三省，因此他們對蔣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持嚴厲批判態度。但是，批判者實際上並不瞭解這一問題提出的過程及其來龍去脈，往往好從既定觀念出發，對之加以解讀、引申，因此，有關批判也就很難準確。

歷史學應該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們對某一個歷史人物的好惡可能因種種原因而不同，但是歷史科學應該力求還原歷史本相，並給予正確解釋，不離開歷史真實去有意拔高或貶低任何人，要做到愛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惡，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是關涉蔣介石和當時國民政府對日抗戰的大問題，要重建科學的、真實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必須研究清楚。

為《九國公約》布魯塞爾會議準備的預案

提出"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這一問題，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也有較長時期的發展過程。

1937 年 7 月，日軍製造"盧溝橋事件"，中國軍隊奮起抗戰。此後，中國政府一面堅決抵抗日本的軍事進攻，一面仍對和平解決抱有希望。7 月 10 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駐華大使館，要求該館迅速轉電華北日軍當局，"嚴令肇事日軍撤回原防，恢復該處事變以前狀態，靜候合理解決。"①12 日，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接見日本駐華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 雙方出動部隊各回原防；2. 雙方立即停止調兵。②15 日，外交部再次照會日本使館，重申 12 日照會內容，要求日方"將此次增派來華之日軍悉數撤回，並將本案肇事日軍撤回原防，恢復事件以前之狀態，靜候合法解決"。③至此，恢復"事變以前狀態"只是解決盧溝橋事變中雙方軍事衝突的方法，尚非解決中日兩國戰爭的外交原則。

7 月 17 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不能要求任人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領土，不能受任何約束。蔣稱：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蔣的這些主張，已經超出盧溝橋這一具體事件的範圍，發展為解決中日兩國間衝突的一般原則，成為後來提出"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的思想基礎。

盧溝橋事件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一如既往，將問題提交國聯，以爭取

國際的支持和援助。9 月 13 日，國聯在日內瓦開會。會議將問題交給國聯遠東咨詢委員會。遠東咨詢委員會指責日本"訴諸武力"的行為，但拒絕宣佈日本為侵略者，建議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會前，列強的設想是：通過有關國家的共同幫助，"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以斡旋或調停的方法達成一項和平解決的辦法"。為此，列強希望在中日兩國軍隊之間達成停戰或停火，同時邀請日本參加會議，直接對話，勸導日本接受調解。當時，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通過其駐倫敦和華盛頓的同僚們已經瞭解到，有關國家"把重點放在先實現停止敵對行動，然後通過斡旋或調解取得迅速解決"。①但是，現地"停戰或停火"對中國並不利。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日軍已經迅速佔領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廣大地區，上海也正處於日軍的包圍中。現地"停戰或停火"將意味著首先承認日本侵略者的這些"戰果"。

為準備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爭取對中國最有利的結果，中國政府曾在國內外的少數智囊人士中徵求意見，從而形成了一份文件，題為《關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初步研究》。該文件提出，無條件的"先行停戰"對中國不利。文件稱：

會議之時，或先提出一要求雙方停戰，留出時間以便接洽……日本方面若不允停戰，應付極易，但慮日本方面軍事或到利於停戰之時，未嘗不可允許，果爾，中國方面地位極感困難，因中國方面立足在自衛二字，無拒絕停戰之理由……但先行停戰，除軍事上或有作準備之利益外，皆有害無益。

因此，智囊人士建議，中國外交人員應提早與英、美、法、蘇等國暗中接洽："聲明如有先行停戰之要求，至少須附有"日本軍隊應迅速退還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一條件，否則事實上無異幫助日本壓迫中國也。此點為會議前應暗中請英、美等國諒解之一重要點。"①智囊人士的意見是正確的。如果"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作為中日兩國軍隊之間"停戰或停火"的條件，那就意味著剝奪日軍在盧溝橋事變以來所取得的各種"戰果"（包括已經佔領的土地），是一個有利中國而且易於為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的方案。

當時，中日之間的最大問題是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東北廣大土地，並且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怎樣面對這一現實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後之希望，固在收復東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若不先在一強有力中央政府統治之下，完成經濟、社會、軍事上之新建設，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認為：一、在此會議，不必堅持收復東三省失地及修訂條約兩問題；二、於日本要求，應慎重考慮，不必一概予以拒絕，且須以具體對策應付之。②

智囊人士認為，收回東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是中國的奮鬥目標，但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有賴於中國的強大，《九國公約》會議作用有限，因此，不應在會上提出它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智囊人士的意見顯然得到蔣介石的肯定。10 月 21 日，陳佈雷代表蔣介石致電顧維鈞，對出席《九國公約》會議的中國代表作出指示：1. 促動蘇俄參戰決心，並設法減免其未能決心之憂慮。2.繼續運動各參加國政府及社會，加緊對日一致之經濟壓迫，務使國聯譴責日本之決議事實化。3. 向參加各大國請求戰費借款及軍械貸款。同時，陳佈雷要求代表們於會前先向英、美、法、蘇等國說明"最要各點"：

1. 調解方案未妥協前，無條件之先行停戰，於中國大不利，至少必須有"日本軍隊應退還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一條件。

2. 華北已成為中國國家最後生命線……不能容任日本所謂"特殊化"之組織存在。

3. 必須設法令日本將在中國之駐兵及軍事特務機關完全撤退。①

這樣，"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就成為中國代表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預案。

《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於 11 月 3 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中國代表不僅會前做了相應的工作，而且也在會上提出了這一問題。11 月 6 日，顧維鈞偕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會見美國首席代表戴維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經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提出，要求德國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維斯詢問程天放：如果德國真想提出願意為中國調停，中國是否接受調停？什麼樣的條件中國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當即回答："任何調停應有先決

條件，即須恢復7月7日以前之狀態。"②

根據以上敘述可見，在提出"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方案的同時，蔣介石及其智囊人士並未準備放棄東北，而是準備將這一"老大難"的問題留待適當時機，以免干擾當前較易解決問題的解決。此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很長時期內一直採取這一策略。

在陶德曼"調停"過程中的運用與蘇聯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會議決定，以軍事和外交雙管齊下的辦法，迫使中國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棄抵抗。①22日，日本參謀本部派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請德國駐華大使出面"調停"中日戰爭。11月2日，陶德曼會見蔣介石，威脅蔣接受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教訓，及時結束戰爭，不要落到"無條件投降"的悲慘下場。11月3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致電陶德曼，轉述日本外務省提出的7項和平條件：內蒙建立自治政府，與外蒙國際地位相等；沿"滿洲國"邊境至平津以南一線設立非武裝區；擴大上海的非武裝地帶；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華關稅稅率；尊重外國權益。日方同時聲明：如日本被迫延長戰事，則條件必數倍苛刻。②同日，德國外長牛賴特訓示陶德曼，將上述條件轉告蔣介石並勸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會見蔣介石及孔祥熙，轉告日本條件，再次警告蔣：

"千萬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時候再想主意。"蔣介石當即提出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問題。他說：只要日本不恢復原狀，他就不會接受日本任何條件。至於具體條件當然可以討論，但"首先必須恢復原狀"。③可見，蔣提出這一問題，目的仍在剝奪日本盧溝橋事變以來的"戰果"，抵制日方以其武力勝利為基礎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蔣自感當天的談話很強硬，在當日日記中自述云："敵托德使傳達媾和條件，試探防共協定為主，余嚴詞拒絕。"④12 月 2 日，蔣介石在會見陶德曼時重申："中國在華北之主權與行政必須不變，並須保持其完整。""如德國元首向中日兩方建議停戰，作為恢復和平之初步辦法，則中國準備接受此項建議。"⑤當日，蔣介石決定將談判情況通知英、美、法、蘇四國。①12 月 21 日，日本內閣會議提出"基本條件"（新四條），要求中國放棄容共和反抗日、"滿"政策，在必要地區設置非武裝地帶，在日、"滿"、華三國間，簽訂密切的經濟協定，對日本賠款。②中國政府認為"上項條件無考慮之餘地"。28 日，蔣介石密囑楊傑，將上項條件密告蘇聯政府並聽取意見。③

當時，中國和蘇聯在反對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益。10 月 22 日，蔣介石致電正在莫斯科訪問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楊傑，命其向蘇方詢問，如《九國公約》會議失敗，中國用軍事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時期"④。11 月，伏羅希洛夫、斯大林在會見楊傑和張沖時都表示，在緊急關頭，蘇聯將參戰。⑤但是，蘇方的答覆不過是一種表態。因此，當南京危急，蔣介石要蘇聯"仗義興師"時，蘇聯卻藉詞推脫了。12 月 5 日，斯大林、伏羅希洛夫致電蔣介石，聲稱"假使蘇聯不因日方

挑釁而即刻對日出兵，恐將被認為是侵略行動，日本在國際輿論的地位將馬上改善"。斯大林等開出的"參戰"條件是:《九國公約》簽字國全部或其中主要國家的允許和最高蘇維埃會議的批准。電中,斯大林等表示,在上述條件未能滿足時，蘇聯將用種種途徑及方法，極力增加對中華民族及其國民政府的技術援助，同時，支持蔣介石在和陶德曼談判中的立場。電稱："日本如撤回其侵華中及華北之軍隊，並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時，中國為和平利益計，不拒絕與日本實行和平談判。"⑥

這樣，將"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原狀"作為中日談判的前提，就不僅是蔣介石和中國政府的主張，而且也成了蘇聯政府的意見。

蔣介石在對日談判中一貫堅持的先決條件

陶德曼"調停"因中國政府的婉拒而失敗，但是，日本政府和軍方都仍然"戰和並用"，一面軍事進攻，一面暗中談判，蔣介石對日本事實上也採用同樣的對策。在公開的聲明和演講中，蔣介石多次批判與日本的談和、妥協活動，他對孔祥熙通過多種渠道和日方的聯繫也常持嚴厲的批評、阻遏態度，但是，在日本多次伸出"和平"觸角時，蔣介石也曾"姑妄試之"，小心翼翼地親自掌控過和日方的幾次秘密談判。在這些談判中，蔣介石始終堅持非"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不可。它既是與日方的談判條件，也是談判的前提。

1938 年 9 月，蕭振瀛與和知鷹二在香港談判。9 月 23 日，蔣介石在漢口主持匯報會，決定"倭必先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與恢復七七事變前之原狀，然後方允停戰"。①27 日，蕭振瀛在談判中強調："現在日軍進攻武漢，大戰方酣，中國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著，為停止軍事，恢復七七前之狀態。"②當時，和知鷹二以同意"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餌，要求與中國簽訂軍事與經濟協定。28 日，蔣介石致電蕭振瀛，要求蕭向日方堅決表明："原狀未復，誠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國之事實證明以前，決不允商談任何協定。"③10 月 8 日，蔣介石在對參加談判的另一人員雷嗣尚"面訓"時再次指示："談判重點應集中於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①19 日，何應欽又向蕭轉達蔣介石指示："關於經濟合作與軍事佈置等事，必須待恢復原狀後，以能否先訂互不侵犯協定為先決問題。又無論何項合作，必以不失我獨立自主之立場而不受拘束為法則，請於此特別注意。"②

蕭與和知的香港談判中，中國方面曾準備了一份宣言，中稱："中國所求者，惟為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與民族自由平等之實現。日方誠能如其宣言所聲明，對中國無領土野心，且願尊重主權、行政之完整，恢復盧溝橋事變前之原狀，並能在事實上表現即日停止軍事行動，則中國亦願與日本共謀東亞永久之和平。"③在這段文字下面，蔣介石曾經以紅筆加寫了一段：

我政府對於和戰之方針與其限度，早已屢次聲明，即和戰之標準全以能否恢復七七以前之原狀為斷。蓋始終以和平為主，認定武力不能解決問

題也。

中方草擬的《停戰協定》規定："停戰協定成立之同時，兩國政府即命令各該國陸、海、空軍停止一切敵對行動，日本並即撤兵，在本協定簽字後三個月內（恢復）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前之原狀。"④

關於"滿洲國"問題，中方認為，此為"中日間之瘤"，此問題若不能成立諒解，預示未來解決之趨向，以後各項合作協定，均難簽訂成立，因此，蕭振瀛等提出"相機應付"的三條原則：（一）日方自行考慮，以最妥方式及時機，自動取消"滿洲國"，日本保留在東北四省一切新舊特權，但承認中國之宗主權。（二）中國承認東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華一切特權為交換條件（如租界、領事裁判權、駐兵、內河航行等等）。（三）暫仍保留，待商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再談。①其中"待商訂互不侵犯條約時"為蔣介石親筆所加，可見，蔣介石主張先為其易，後為其難，將東北問題留待未來解決。

1939 年 1 月 9 日，蔣介石研究"和平原則"，確定："甲、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乙、以《九國公約》與國際聯盟為保證有效。丙、非先恢復七七以前原狀無恢復和平之可言。（以恢復七七戰前原狀為恢復和平之先決條件）"②同年，在軍統局人員杜石山與萱野長知、小川平吉等人的談判中，蔣介石仍然堅持"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這一原則。當年 3 月 4 日，蔣介石致杜石山電云："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於平等與互讓之基礎之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

後之中國現實狀態。"③17 日，柳雲龍、杜石山在與萱野長知的會談中提出七項條件，其中第三條即為"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同年 5 月，小川平吉通過杜石山致函蔣介石，要求蔣"快刀斬亂麻"，迅速解決中日談判問題。27 日，蔣未拆閱即將原函退回，並且禁止杜石山等與小川往來。小川從辛亥革命時期即和中國革命關係密切，蔣的舉動使小川極為生氣，宣稱將於 6 月 2 日回國，但蔣仍不加理會。6 月 2 日，陳佈雷致張季鸞函云："如彼果延期回國，可知其前所稱欲回國者，全為裝腔。請注意。兄函中有休戰二字，以後如有接談時，應特改變，以我方於未恢復七七戰前原狀之先，決不允其休戰也，亦請注意。"④陳佈雷當時是蔣介石的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代表蔣指導張季鸞的工作，此函當然代表蔣的主張。

在秘密談判中，蔣介石雖然提出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作為先決條件，不過，蔣介石並未對此抱有過大期望。1938 年 9 月，武漢會戰正酣，蔣介石分析形勢，於 3 日自述云："倭寇軍閥不倒決無和平可言。惟有中國持久抗戰，不與言和，乃可使倭閥失敗，中國獨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①5 日又自述云："敵將於武漢未陷以前，求得一停戰協定而罷兵乎？此則無異城下之盟也，應嚴防。"②

從談判先決條件變化為"抗戰到底"之"底"

對如何解決東北問題，蔣介石有一個漫長的搖擺、矛盾、反覆的過程。

1929 年，日本曾向蔣介石提出，希望取得在中國東北的"商租權"，即為了商業和農業需要，日本人可以在東北購買土地。蔣介石覺得可以借此暫時緩和其侵略野心，擬予同意，但受到國民黨其他大員反對，未成。1931 年 12 月，蔣介石因丟失東北，在內外各方指責聲中下野。次年 1 月，日本陸相荒木貞夫以支持蔣介石復出為誘餌，要求蔣贊同日本在東三省的"商租權"，並且假意表示中國可以駐兵。蔣介石即明確表示拒絕。日記云：

荒木甚畏共黨，亟願余主持國事，共同防共，而其商租權，是不欲明訂駐軍，以有限數，不致不能駐兵也等語誘余。倭奴卑劣，亦視余為可欺也，誠不知中國尚有人也。③

同年 5 月 16 日，蔣勉勵自己："對俄外交，當不能放棄外蒙；對日外交，不能放棄東三省。"①隨後，他並制訂對朝鮮和東北的工作計劃，指派齊世英聯絡東北，滕傑、黃紹美聯絡朝鮮。②6 月，蔣決定迅速派定東北義勇軍指導員，並致函張學良，囑其出兵熱河，一面與東三省各義勇軍打成一片，一面威脅山海關日軍。③同月，他在牯嶺聽翁文灝談，東北三省煤礦，幾佔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鐵礦佔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決策錯誤，日記稱："驚駭莫名！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佔。中正夢夢，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④同年 9 月 13 日，他自記稱："預期十年以內恢復東三省。凡為中華人民血氣之倫，當以此奮勉。"18 日，蔣介石在漢口，聽到日本

人在租界鳴炮奏樂，慶祝佔領東北，蔣介石受到極大刺激，在日記中表示，期望能於 1942 年以前，"在中正手中報復國仇，湔雪此無上之恥辱。"⑤這些，都反映了蔣介石思想中確有捍衛東北主權的一面。但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施壓，中日兩國形勢一緊張，他又軟弱、動搖。1933 年 4 月 3 日，他回憶 1929 年的舊事時寫道：

民國十八年，明知應與俄復交，而老朽阻礙。倭寇欲東三省之商租權，余欲以此而暫緩其侵略野心，老朽目短，無識如番人，強持反對。及至蘇俄進攻吉林，張氏屈服，則倭寇野心益熾，致成今日內外交迫之局。及至胡朽事出，宋子文弄權，國益紛亂，是皆余自無主宰之所致也，何怨何尤，惟自承當耳。①

從這頁日記看，蔣在 1931 年 1 月拒絕荒木提出的在東三省的"商租權"後，至 1933 年 4 月，又有所動搖。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這次動搖為時短暫。蔣介石寫下上述日記之後的第 22 天，他就又"研究對倭戰略"，認為"與倭決最後之勝負，惟在時間之持久耳"。②

日本侵佔東北，特別是扶植溥儀成立所謂"滿洲國"後，曾多次向中國政府提出，希望通過談判解決有關問題，但蔣介石大都拒絕不談。其原因，在於蔣認為這種談判只能使中國"喪權辱國"，不如不談；即使談判成功了，日本政府並沒有控制、約束其軍方的能力，談了也等於白談。③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認為"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決心應戰。他預估：再有兩年時間，將可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十年後，不只收

復東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灣，扶持朝鮮獨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④8 月 5 日，胡適和陶希聖聯名給蔣介石上條陳，主張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換得日本讓步，從根本上調整兩國關係。蔣介石即表示：日本沒有信義，"以為局部的解決，就可以永久平安無事，是絕不可能，絕對做不到的。"⑤次年 2 月 2 日，他在日記本中寫道：如去年乘國內統一，對倭形勢較優之時，急謀解決東北問題，或割讓，或策封保留宗主權，而不出於承認形式，非特勢所不能，即使解決一時，以彼倭少壯派軍人之侵略思想，與其政府之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則一二年間仍必向關內侵佔，絕非根本解決之道也。"①此後，蔣介石在 3 月 22 日、23 日的日記中都寫過類似的話。一言之不足而反覆言之，這就說明，在國民黨內部，持此說者非止一人。當時，蔣介石正籌備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在提前寫作的演講要旨中寫道："和戰問題，降不如戰，敗不如亡。若我不降，則我無義務，而責任在敵，否則敵得全權，而我全責。民不成民，國不成國，則存不如亡也。"並說："敵國政府，無權失信。若我放棄東北，徒長敵寇侵略之野心，永無和平之一日。"②當年 9 月 18 日是東北淪陷的第七個年頭，蔣介石自我反省云："收復失土，痛雪國恥，全在一身，能不自強乎？"③

不過，蔣介石雖然希望收復東北，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他又不準備，甚至反對採用戰爭的手段。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說中，他說：""兵凶戰危"，古人常說"不得已而用之"。凡是真正懂得軍事的人，一定不願輕於作戰，尤其自本黨當政以來，一向以和平為職志，決不願輕啟戰爭，這是一定的道理。"話題轉回現實之後，蔣介石表示："我們

這幾年，一方面抱定保持我獨立生存的決心，同時對於和平，始終為最大的努力，也不但是東北問題，就是其他中日之間的懸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經過正當、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無害於中國國家的獨立生存，我都可以負責解決。其理由就是保持和平為我們固有的理想，所以百事應著眼於民族久遠的利害，而不在乎計較一時的恩怨得失。"④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標示國民黨轉變政策、確立抗戰建國方針的會議，但是，即使在這時，蔣介石對解決東北問題的底牌也仍然是"經過正當、合法的外交方式"。

1939 年 1 月 16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發表演講《外交趨勢與抗戰前途》，將這一解決東北問題的"底牌"表達得更明確：一方面，他堅決表示："外蒙有自治之可能，而滿洲完全是中國人，絕對不能獨立。"接著，他解釋"抗戰到底"之"底"時說：

我們要解釋"到底"兩字的意義，先要檢討這回抗戰起頭是在什麼地方，才可以得到結論。我們這次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變。凡是一種戰爭，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隨便瞎撞，會使國家民族自趨滅亡。我們這次抗戰的目的，當然是要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如果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不能和日本開始談判，假使能夠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可以開始談判，以外交的方法，解決東北問題……若在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沒有恢復，即與日本談判，便是我們最大的失敗。……這是我抵抗的機會，也是我們不能不抵抗的時候。這時候我們無論如何只有和他拚命。……若恢復了平津，我們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與日本談判，也

是自趨滅亡之道。①

在這一段演講中，"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仍然是與日本談判的條件和前提。

蔣介石對"抗戰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釋

如前述,將"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作為中日談判的先決條件是可以的，但是，作為"抗戰到底"之"底"則不妥。蔣介石不久改正了這一錯誤。

1939 年 7 月 7 日，蔣介石發表《抗戰建國二週年紀念告日本民眾書》，指責日本侵略中國，搶奪中國東北領土，建立偽滿洲國等行為："把一大群人看成奴隸了，反要說是給了自由；把中國一部分領土佔據了，反要說是建立了獨立國。"①同日，蔣介石發表《告世界友邦書》，指出"今日國際間一切無法律、無秩序之無政府狀態，實由 1931 年之九一八，日本強佔我東北四省始作之俑所造成"。文告表示："在敵人未澈底放棄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國抗戰，無論遭受如何犧牲與痛苦，決不有所反顧或中止也。"②這裡"抗戰到底"之"底"就被說成日本"徹底放棄其侵略政策"，較之"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前進了。
當年 11 月 18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批判國民黨內要求變更抗戰建國方針，及早結束對日戰爭的錯誤思想。他說："如果我們國家民族一天沒有得到獨立自由平等，抗戰就一天不能停止，

而我們的犧牲奮鬥和努力，也就一刻不容鬆懈，更絲毫不容有徘徊觀望、半途而廢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則抗戰失敗，國家滅亡，我們就作了中華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現在如有人以為敵人已無法進犯，他的侵略之技已窮，我們可以乘此機會與他講和，或者以為友邦都不可靠，不如自己早些設法和平，這就是陷入與汪精衛同樣錯誤危險的心理。"蔣介石主張："一面堅持抗戰，一面抓緊建國，再要埋頭苦幹三五年，非獲得徹底的勝利和成功，使敵人根本放棄其侵略政策，決不能停戰言和。"

講話中，蔣介石對抗戰到底之"底"作了新的解釋。他說：

所謂"抗戰到底"究竟是怎麼講呢？我們抗戰的目的，如何乃能達成？我們抗戰的目的，率而言之，就是要與歐洲戰爭–世界戰爭同時結束，亦即是中日問題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我在五中全會說明抗戰到底，要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是根據以中國為基準的說法。若以整個國際範圍來論斷中日戰爭的歸趨，就一定要堅持到世界戰爭同時結束，乃有真正的解決。

他強調："如果那一個國家想單獨調停或想藉此謀他一國的利益，不論出於何種方式，結果都必然失敗。"①這裡，蔣介石所說中國"抗戰到底"的"底"就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合起來，擴大了視野，提升了要求，因而糾正了前說的錯誤。

蔣介石的這一變化和國際形勢的發展密切相關。蔣介石早就認為，中日戰爭是國際問題，它的解決也有賴於國際形勢的變化。1938 年 5 月 26 日日記云："不能引起世界大戰，恐不易使倭國失敗也。"②7 月 27 日自記云："中倭戰事問題，實為國際問題，非有國際干涉，共同解決，則決不能了結。否則，直接講和，則中國危矣。"③當時，蔣介石已在研究，如歐洲戰爭爆發，則中國將與英、法、俄共同作戰。日記云："速謀與英、法、俄進行共同作戰之計劃，以期中倭問題得到根本解決。"又云："向英、法政府懇切商談，使國際盟約中之制裁條款為有效條款，藉以號召多數國家共同制裁，且須同樣運用於歐亞三洲之戰爭。"①1939 年 9 月 1 日，德軍進攻波蘭。同月 3 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這一形勢使蘊藏於蔣介石心中的期待成為現實，因此，他才能在五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將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戰爭聯繫起來，並對中國抗戰目標作了修正和提升。

"最大之成功"與"最小限度之成功"

歐戰的爆發燃起了蔣介石的希望，使他敢於公開倡言，中國"抗戰到底"之"底"與世界戰爭之"底"同步，但是，歐戰最初並不順利，法軍和英軍相繼戰敗。1940 年 6 月，法國向德國投降，英軍撤出歐洲大陸。同月，法國宣佈封閉滇越鐵路。7 月，英日之間達成妥協，宣佈封鎖滇緬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通道先後斷絕。蘇俄則因準備對德國作戰，拒絕對中國的進一步援助。在此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繼續對日本採取戰與和的

兩手策略,同時相應地將抗戰目標區分為"最大之成功"與"最小限度之成功"兩種類型。

當年8月，日軍積極謀劃南侵，向東南亞進軍，力圖結束對華戰事。在這一形勢下，蔣介石曾準備利用時機，爭取與日本實現於中國相對有利的談判。同月，在蔣介石指導下，張群、張季鸞與陳佈雷等起草過一份《處理敵我關係之基本綱領》，中云：

最大之成功為完全戰勝，收回被佔領掠奪之一切，不惟廓清關內，並收復東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則為收復七七事變以來被佔領之土地，完全規復東北失地以外全國行政之完整，而東北問題，另案解決之。以上兩義，前者戰勝之表現，後者則為勝敗不分，以媾和為利益時之絕對的要求。

關於"最小限度之成功",《綱領》提出："滿洲偽國"的土地，"被日本侵佔已久"，"在我國不能用兵力收回之過渡期間"，可以"扶助溥儀之偽政府，第一步使取得滿洲內政上自治之政權，使該地漢、滿、蒙人民先脫離被佔領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與溥儀直接協商，先求得一過渡的解決之辦法"，最後與蒙古等地一樣，作為"聯邦之一，完全復歸於中國"。

《綱領》又將東北問題的解決分為甲案與乙案：

東北問題：1. 甲案，現在不提，戰後另作交涉。2. 乙案。現時先取得

一種諒解，約期交涉。關於此點，我方又分兩案：（1）要求日本承認我國在東北之主權，而中國承認東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駐滿指導長官一人，常駐長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預其通常施政。（2）要求日本先行改革滿洲制度，使溥儀之政府確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廢除日籍官吏制度，還政東北人民。此項改革完成之後，我中央得與溥儀之政府直接協商以求東北懸案之解決。

在此項協商開始以前，中日可訂臨時辦法，以便利關內外人民之交通與經商。我方尤當注意要求日本善遇我東北同胞，廢棄九一八以來仇視、賤視我人民之政策。

蔣介石等估計，和日本談判時，日本可能提出承認"滿洲國"時，《綱領》強調："我國應聲明不能承認。""東北問題，須待和平完全恢復後另案交涉，現在不能提議（但熱河不在東北範圍之內）。"

《綱領》規定："我國為被侵略國家，故和議之發起，必須出自敵方……應深切考查，其條件是否無背於我建國原則，而足以達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須在確認為我作戰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貫徹之時，始允其開始和平之交涉。"張季鸞等還在起草的初稿中提出召開停戰會議的原則：1.（日本）凡作戰而來之軍隊，完全撤退；2.凡所佔領長城以內及察綏之土地完全交還；3.不平等條約定期取消。"①上述原則表明，"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仍然是中日談判的一項前提條件。
該方案先後有幾種稿子，名稱和內容都不盡相同。《中日恢復和平基本

辦法》規定："日本政府保證永不將東北各省劃入日本領土，或採取其他行動使各該省在名義上或事實上成為日本之保護國。"《中日恢復和平協定要點》規定："東北問題即滿洲問題之懸案，於恢復和平後一年以內特開會議，另案解決。"《對敵策略的幾個疑點》規定："我國既不能收回（東北），又不容放棄，故利在延擱不決。"又稱："實質的收回，在將來為可能，此當在我國防完成，而敵人有求於我之時，或敵人在國際戰敗之時，因此，我又決不可自棄東北，以失去將來實質收回之根據。"上述資料表明，蔣的抗戰方案有"最大之成功"和"最小限度之成功"、"軍事"和"外交"兩種。當他著眼於"最小限度"時，也沒有放棄爭取"最大成功"的希望。

9 月 18 日，蔣介石發表《"九一八"九週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明確宣告，將收回東北列為"抗戰到底"之"底"。文稱："我們到今天，還不能解放我們東北的同胞，收復我們的失土和主權，這就是沒有達到我們抗戰的目的，無以安慰已死的英靈。"他明確宣佈："我們九年來忍苦奮鬥，三年來奮勇抗戰的目的，就為要恢復我們國家的主權和領土，要解救我們三千餘萬的東北同胞。"又稱："我們四萬萬同胞和東北三千餘萬的同胞是一脈相承的黃帝子孫，是手足同氣、呼吸相通的兄弟。為了拯救國家，我們大家都負有相同的責任；為要解救我們水深火熱中三千餘萬的東北同胞，我們在關內四萬萬同胞更覺得犧牲奮鬥是自己的責任。""我們今天多抗戰一天，就是恢復我們國家獨立自由和達到我們雪恥復仇目的日子更接近一天，也就是收回東北和解救東北同胞的日子更接近一天。"①9 月 29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東北被侵已足九年，但願為

收回東北開始之日也。"②次日，蔣介石檢閱舊日記中預期收回東北、台灣等地的文字時寫道："以天意與最近時局之發展及上帝護佑中華，不負苦心人之意與力測之，自有可能。"③

反對蘇、美兩國的妥協、錯誤主張，力保東北主權

歐戰爆發，英、法作戰不利，原為西方殖民地的東南亞成為"真空地帶"。日本眼紅該地的富饒資源，叫嚷"不要誤了公共汽車"，力謀冒險南進。這種情況，使英、美更多地關心中國戰場。1941 年 3 月，美國羅斯福總統發表廣播演說，聲明一定要"援華到最後勝利為止"。在此情況下，蔣介石的抗戰信心日漸增強。日記云："此後只要我能自強奮勉，則十年困難，四年苦鬥，……不惟恢復失土已得有把握，而太平洋之和平，亦從此奠定，要在我之自力更生耳。"④但是，國際風雲變幻莫測，一個月之後，就發生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事件。

當時，德軍進攻蘇聯在即，蘇聯為全力對德，避免兩面作戰，力圖穩住在東方的日本。1941 年 4 月，蘇聯與日本在莫斯科締結《中立條約》。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14 日，蔣介石自我檢討云："竟未想到其互認滿蒙之領土，此乃余對事理未能究其至極之過也。"①15 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聲明："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言贅。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所為妨害中國

領土行政權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②24 日，蔣介石密電各戰區將領及各省黨部、省政府稱："只要我能獨立自強，戰勝暴敵，則收回失土，恢復主權，勢所必至，理亦當然。區區蘇、日一紙不法之聲明，豈能永為我領土與主權完整之障礙！"③同年 9 月 1 日，重慶國民政府在被日機炸毀的禮堂廢墟上舉行"紀念周"，蔣介石自勵云："此乃余前年所謂即在瓦礫中，亦在重慶國府原址作紀念周之決心也。安知吾於廿一年立志，欲於卅一年收復東北之志不能貫徹乎？"④

這以後接踵而來的消息有如噩夢連連。9 月 12 日，蔣介石得到情報，美日達成妥協，美國已同意日本佔領中國的華北與滿洲。蔣介石日記云："今日問題，權操在我，非美國默認所能解決。今日中國政府絕非甲午戰爭時之政府可比，在此不惟美國之自殺政策，乃為美國之不利，而於我抗戰政策根本不變之下，顧無損也。"①18 日，蔣借東北淪陷十週年之機，發表《告全國軍民書》，文稱："我們非完全驅逐寇軍於我們的國境以外，徹底消滅他侵略的野心，我們的抗戰，是決不能停止的。我們若非使東北同胞獲得真正的自由，東北的失地完全恢復，在我們神聖的抗戰，亦決不會停止的。""我們東北同胞與全國同胞的生命是整個的，東北四省的土地與全國的土地，也是完全整個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們整個民族和整個領土，是存則俱存，亡則俱亡，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這是我們天經地義的道理。"②蔣介石的這篇文章，明為"告全國軍民"，實為對國際的宣告。同年 12 月 6 日，蔣介石與拉鐵摩爾顧問談話，囑其轉告羅斯福總統："中國決不能放棄東北，否則新疆、西藏皆將不保，外蒙亦難收復。"③此後，拉鐵摩爾即成為蔣介石這一主張在美國的積

極宣傳者。④

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對日宣戰，中國由單獨抗戰進入與同盟國聯合作戰階段，國際形勢對中國越來越有利，蔣介石保護東北主權的意識也就越來越強烈。

還在太平洋戰爭初起時，蔣介石就積極研究同盟條約，確定對英、對俄、對各國要求："東四省、旅順、大連、南滿，要求各國承認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⑤1942 年 3 月，蔣介石設想，在日本"北進"，進攻蘇聯之時，中國軍隊乘機與日本決戰，"收回失地，恢復舊有領土與民族固有地位，以為解放亞洲各民族之張本。"⑥15 日，他甚至樂觀地設想，將於 1961 年之前完成自蒙古庫侖至東北滿洲裡之間的北疆鐵路。同年 8 月 3 日，蔣介石與羅斯福總統代表居裡談話，得知美國方面有人主張東北由國際共管，作為日本與蘇聯之間的"緩衝國"。這對蔣介石說來，宛如"青天霹靂"，感到"國際誠無公道與是非可言，實足寒心"，①但他立即聲明："中國東北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絕無討論之餘地。此實為中國抗戰之基本意義。蓋我抗戰若非為收復東北失地，早可結束矣。"蔣要求居裡盡一切可能糾正美國人的上述包含極大危險的錯誤觀念，讓他們明白，中國民眾之所以甘於忍受重大犧牲與各種困苦，支持抗戰，其原因就在於要收復東北。他並進一步向居裡透露中日談判中的許多機密：日本曾表示，只要中國允許日本保留東北，可以接受中方的一切條件；又曾提出，中日共管東北亦可商量。蔣稱：這些，都遭到中國政府的堅決拒絕。為了讓居裡記憶明晰，蔣用三句話概括說：1. 我等已作

一切犧牲抵抗日本侵略，唯一目的在收復東北。2. 我等之所以尚須繼續抗戰，因尚未收復東北。3. 東北四省就歷史、法律、人種、事實各方面言，五百年來皆為中國不可分之一部。蔣要求居裡轉請羅斯福發表聲明，重申東北是中國的一部分。蔣強硬表示："倘此問題不解決，則平等、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悅耳之名詞，皆無意義可言。"②次日，蔣再次與居裡談話，態度更為強硬，他說："倘和平會議席間，不能返我東北失地，仍為我不可分割領土之一部分，我人仍將繼續抗戰，即招致國家之毀滅，亦在所不惜。凡不承認東北為我領土之一部分者，皆為我仇。"③5 日，蔣介石再與居裡談話，仍然表示"整個東北為中國之一部，望羅總統早日聲明"。④在蔣介石的一再堅持下，美國政府於 9 月 18 日發表聲明，承認東三省為中國領土，蔣介石感到欣慰，日記云："此乃由余對居裡所提問題之一也。"①

同年 9 月，羅斯福派威爾基作為總統特使訪華。30 日，蔣介石研究與威爾基談話要點，其第二條即為："東北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必須完全歸還中國。②11 月 9 日，因宋美齡赴美在即，蔣介石研究須與美國商討事項，有長期同盟；東三省與旅大完全歸還中國；台灣歸還中國；外蒙歸還中國，予以自治等。③這以後，蔣介石日記中頻繁地出現關於東北問題的記載。1943 年 3 月 1 日，蔣介石日記云："偽滿傀儡組織，至今恰九年矣。"④5 月 4 日日記云："溥儀昨日到安東州，汪奸本日六十一歲生日，皆為國家之羞恥也。"⑤25 日，蔣介石研究美國訪蘇代表戴維斯談話，日記云："其提及旅順為自由港一點，是越出余之主張矣。"⑥

在開羅會議上與英國爭論，要求明確聲明，將東北、台灣等地歸還中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形勢急轉直下。1942 年 11 月，蘇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區組織反攻，英、美軍隊在北非登陸。1943 年 9 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重大勝利。11 月 22 日至 26 日，美、英、中三國首腦在開羅會議，商討聯合對日作戰計劃及戰後如何處置日本等問題。

為準備參加開羅會議，蔣介石於 1943 年 7 月起草擬各項文件。當月 9 日，蔣介石研究與羅斯福會談後的共同宣言要旨，提出"必須獲得無條件之勝利"，這就將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目標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⑦8 月 9 日，蔣研究與羅斯福談話要點，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東北問題"。15 日，蔣介石研究戰後中國國防建設，自記云："東北收回後則維持其原有之工業與國防，以其餘力充實我本部之建設。"①24 日，研究對美策略，認為"戰後在台灣與旅順之海、空軍根據地應准與美國共同使用"。②11 月 9 日，蔣介石研究與羅斯福、邱吉爾談話要點，問題之一為"東北"。14 日，研究與羅斯福商討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的處理方案，確定"日本在九一八以來所侵佔中國地區所有之公私產業應完全由中國政府接受"。18 日，確定會談應注意之重大問題，其內容之一為"東北與台灣應歸還我國"。③22 日，再次研究會談要旨，"東北與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仍為重點之一。

在蔣介石指導下，軍事委員會為開羅會議所準備的文件提出：日本應自其在九一八起所佔領之中國及其他聯合國之地區撤退；將旅順、大連兩地一切公有財產及建設，以及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無償交還中國；將台灣與澎湖列島交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賠償中國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損失。國防委員會所準備的文件提出："收復 1894 年以來日本所取得及侵佔之領土。"11 月 23 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在預擬的政府方面提案中提出：日本自九一八事變後自侵佔之中國領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

開羅會議開幕後，蔣介石在與羅斯福總統討論中提出："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應皆歸還中國。"④討論確定的原則為：日本攫取中國之土地應歸還中國，應使朝鮮獲得自由與獨立，戰後日本在華公私產業完全由中國政府接受等。11 月 24 日，開羅會議公報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國攫取之土地，例如滿洲、台灣等，當然應歸還中國。討論中，英國代表賈次干企圖將中國主權模糊化，提出將草案改為："日本由中國攫去之土地，例如滿洲、台灣與澎湖列島，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王寵惠認為，英國的這一修改，"不但中國不贊成，世界各國亦將發生懷疑"。他說："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戰，由於日本侵略我東北而起，而吾人作戰之目的，亦即在貫徹反侵略主義。苟其如此含糊，則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將疑惑不解。故中國方面對此段修改文字，礙難接受。"他表示："如不明言歸還中國，則吾聯合國共同作戰，反對侵略之目標，太不明顯。"美國代表支持王寵惠的意見，英國草案被否決。26 日，草案送請正在討論的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審閱，得到一致贊成。會議定

稿的公報宣稱："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公報稱："我三大盟國將堅韌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這樣，中國對日作戰的目標就進一步提升，遠遠超出"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原狀"了。

1938 年 4 月 1 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曾傳達孫中山的遺志："恢復高台，鞏固中華。"蔣解釋說："中國要講求真正的國防，斷不能讓高麗和台灣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中國幾千年來是領袖東亞的國家，保障東亞民族、樹立東亞和平是中國義不容辭的責任。為要達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國家擾亂東亞的企圖，必須針對著日本積極侵略的陰謀，以解放高麗、台灣的人民為我們的職志。"①現在，這些理想都已納入開羅會議宣言，實現在即，蔣介石很興奮，於 1944 年元旦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內稱："在這次開羅會議中，英、美兩國和我們中國一致同意，要剝奪日本第一次大戰後所奪得或佔領的太平洋上一切島嶼，要將日寇逐出於其以武力貪慾所攫取的土地，要歸還東北四省和台灣、澎湖等島嶼與我們中華民國，要使朝鮮自由獨立。……這不但使熱望歸還祖國懷抱的台灣、澎湖同胞聞而興奮，使我們淪亡十二年以上的東北同胞鼓舞奮發，使不堪日寇奴辱的朝鮮國民聞風興起，而且也是亞洲所有被日寇欺凌壓迫的海上、陸上一切民族，都感到解放之有期，共同為消滅敵人而奮鬥。這樣一個重大而有力的共同

決議，可以說在十年以前我們只是一個志願，而到了今天已成為事實了。"①

國民政府為完全收回東北主權所作的鬥爭、讓步與代價

《開羅宣言》雖然明確宣佈，將東北、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但是要將紙上的宣言轉化為現實並不是容易的事。其關鍵的關鍵是要擊潰日本的強大軍事力量。

依靠國民黨的軍隊嗎？1944 年 3 月至 1945 年 1 月，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雖然在緬北等地的戰鬥中取得勝利，挫敗日軍精銳師團，但是，卻在豫湘桂戰役中潰敗。自 1944 年 4 月日軍渡過黃河，進攻河南始，至當年 12 月，佔領貴州獨山止，8 個月之內，日軍長驅兩千餘公里，佔領中國二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這一切，使羅斯福感到，國民黨的軍隊當時還不具備擊潰日軍的力量。倚靠美國人嗎？在太平洋戰爭中，美國軍隊和日軍實行逐島爭奪與越島作戰，已經付出了慘重的犧牲，羅斯福不願付出更大的犧牲。為了爭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勝利，羅斯福企圖利用蘇聯紅軍的力量。1945 年 2 月，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在雅爾達秘密決定，蘇聯在德國投降和歐洲戰事結束時，協助中國對日宣戰。但是斯大林提出，必須滿足蘇方下列要求：1. 外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現狀應加以保存；2. 蘇聯應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之權利，此權利因 1904 年日本之詭譎攻擊而受破壞者：（1）南庫頁島及其毗連各島應歸還蘇聯。

（2）大連商港應闢為國際港，蘇聯在該港之優越權利應獲保障，旅順仍復為蘇聯所租用之海軍基地。（3）中東鐵路以及通往大連之南滿鐵路，應由中蘇雙方共組之公司聯合經營，蘇聯之優越權利應獲保障，中國對滿洲應保持全部主權。3. 千島群島應割於蘇聯。以上各條，除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的有關規定外，均嚴重損害當時中國的主權。蔣介石對斯大林所提條件強烈不滿，4 月 5 日日記云：

關於旅順問題，寧可被俄國強權佔領，而決不能以租借名義承認其權利。此不僅旅順如此，無論外蒙、新疆、或東三省被其武力佔領不退，則我亦惟有以不承認、不簽字以應之。蓋弱國革命之過程中，既無實力，又無外援，不得不以信義與法紀為基礎，而不能稍予以法律之根據。如此則我民族之大，憑借之厚，今日雖不能由余手而收復，深信將來後世之子孫亦必有完成其領土、行政、主權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時堅定革命信心，勿為外物脅誘，簽訂喪辱賣身契約，以貽害於民族，而得保留我國家獨立、自主之光榮也。①

對於與斯大林達成交易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蔣介石也指斥其"賣華"、"侮華"，"畏強欺弱，以我中國為犧牲品之政策，實為其一生政治難滌之污點"。②他擔心羅逝世後，"美國對華政策恐將比現在更壞"，於 5 月 23 日致電時在美國的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轉告美國新任總統杜魯門，要求其向斯大林說明："美國必堅持其對遠東一貫政策，使中國之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不受損害，凡在華領土之內，不能有任何特權之設置也。"①6 月 3 日，蔣介石在重慶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說明"本人希

望蘇聯早日參加對日作戰"，"希望蘇聯能幫助中國的獨立、行政與領土之完整，希望恢復東三省領土主權完整與行政獨立"。他一方面表示，如蘇聯幫助中國恢復東三省領土，中國將在東三省的鐵路、商港等方面，給予蘇聯便利，蘇方如有軍港需要，亦可與蘇方共同使用。但是，蔣又以委婉語氣表示："我全國人民咸認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及租界等事為國家的恥辱，一致痛恨，吾人為革命黨人，自應注意人民之心理與要求，而期其要求之實現。"②這實際上又在提醒蘇聯，不要將新的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方。6 月 6 日，蔣介石指示宋子文，旅順至少限度必須中俄共同使用，"若俄提歸其獨佔，則我必須反對到底，決不許可也。"③11 日，蔣介石兩電宋子文，表示可以同意與蘇聯共同使用旅順，但"租界"地名稱"為我國之歷史恥辱"，"今後不能再有此污點之發現"，"此點非堅持不可"，"否則所謂東北領土主權與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獨立也"。④12 日，彼得洛夫向蔣介石提出締結中蘇友誼互助條約的五項先決條件，其第一條即是"恢復旅順港之租借"，他表示，蘇聯是一個太平洋沿岸國家，需要有不凍港。蔣介石堅決反對，他從歷史角度說明，此例不可開，蘇聯不應使中國成為"不平等的國家"⑤。

6 月 30 日，蔣介石派宋子文訪蘇，會見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旅順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堅持中國必須承認"外蒙獨立"。宋子文根據蔣介石的指示，企圖將這一問題"擱置"。但是，斯大林的態度極為強硬，毫不讓步。7 月 6 日，蔣介石指示宋子文："若蘇聯能協助我對日抗戰勝利，對內切實統一，則為蘇聯與外蒙以及我國之共同利益與永久和平計，我政府或可忍此犧牲。"①7 月 7 日，蔣介石兩次指示宋子文，在蘇聯保證中國東

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今後不再支持中共與新疆"匪亂"的條件下，可以同意蘇聯要求。7 月 10 日，蔣介石接到宋子文轉來的蘇聯方面所提大連、旅順、中東鐵路、南滿鐵路等多項條件，認為比 1898 年（光緒二十四年）清政府與沙俄所訂條約還要"苛刻"，日記云："明知其為討價，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極矣。"②7 月 19 日，蔣介石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時再次強調："外蒙獨立，則於我國犧牲極大"，蘇聯必須同時"協助我東三省領土、主權與行政權的完整，及解決國內共產黨的問題，和新疆變亂的解決。必須這三點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決外蒙問題"。③他堅持："兩條鐵路和兩個海港的中國主權，一定要完整的。"8 月 6 日，美國向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 月 8 日，蘇聯對日宣戰，數十萬蘇軍攻入中國東北。8 月 14 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改名為中國長春鐵路，主權屬於中國，由中蘇兩國共同經營；大連闢為自由港，行政權屬於中國；旅順口由"兩國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權屬於中國旅順政府。在《條約》所附照會中，蘇聯政府承認"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分，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④同日，日本正式宣佈投降。

蔣介石並非不懂得，中國的抗日戰爭必須首先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礎上。1938 年 8 月 15 日，他就表示過："戰事只有自力為可恃耳。"①但是，蔣介石在事實上無法做到，他還是只能將希望建立在外力上。當蔣介石決定接受斯大林的條件時，中國雖已躋身"四強"，但是，名強而實不強，

外強而內不強。國民政府自身無力全部殲滅日寇，收回東北，爭取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不得不仰仗外力，而其結果是付出了巨大代價。

綜觀抗戰八年的歷史，蔣介石兌現了自己"抗戰到底"的諾言，他為此確定的"底"也逐漸變化，從"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發展為收復包括東北、台灣在內的所有失地，解放朝鮮等東亞被侵略民族，再發展為與盟國共同作戰，爭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無條件之勝利"。這種情況，當然有蔣的個人作用在內。對於這種作用，人們應該承認而不應該抹煞。

原載《中國文化》第 22 期，三聯書店 2006 年 5 月出版，略有修訂。

史迪威事件中的蔣介石與宋子文
——抗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之一

史迪威事件是抗戰期間中美關係上的大事，自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一書出版以來，研究已多，但是，由於此前的研究者都未能利用蔣介石日記和宋子文檔案，甚至，也未能充分利用史迪威本人的日記，因此，就給我們留下了仍可開闢、耕耘的廣大空間，可以進一步瞭解這一事件的全貌、實質、由之激起的中美關係的巨大波瀾以及蔣宋關係的曲折變化。

一、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的發生、發展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即謀求與，美、英、蘇等國結盟，組建國際反法西斯戰線。１９４１年年末，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建議建立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部，以蔣介石為最高統帥。當時，中國抗戰正處於艱難時期，蔣介石對盟軍的合作自然期望甚殷，但是，美國此後並無重要動作，引起蔣介石嚴重不滿。1942 年 1 月 30 日，蔣介石日記云：「美英對於整個戰局與太平洋戰局，仍無具體整個之組織。「彼輕蔑我國，可謂異甚，應嚴加責問。」[1] 3 月，史迪威來華，擔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兼美國總統代表、駐華美軍司令及美國援華物資監理人。最初，蔣介石持歡迎態度，其後，二人間逐漸發生矛盾，並且不斷發展、

強化。

日軍於 1942 年初攻入緬甸，英軍不堪一擊，一再潰敗。2 月 26 日，蔣介石命令中國第五、第六兩軍緊急開進緬甸，協助英軍固守緬南海口城市仰光,確保當時中國僅存的滇緬路這一國際通道。3 月 4 日，蔣介石面諭中國遠征軍副司令長官兼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要他在史迪威到任之後「絕對服從」其指揮。杜問：如果史的命令不符合你的決策時怎麼辦?蔣稱：可打電報請示，但蔣回重慶後，又以手書告訴杜聿明，強調「絕對服從史迪威的重要性。[2]6 日，蔣介石在重慶與史迪威第一次見面，就向他表示，準備將緬甸戰場的指揮權交給他。[3] 同月 8 日，英軍放棄仰光，中國入緬部隊失去目標。蔣擔心日軍乘中國軍隊入緬之際，自越南進攻中國雲南，有調回入緬軍，加強雲南及長江流域各省防務的念頭。日記云：「仰光為敵唾手而得，英軍之怯弱如此，我軍入緬之戰略，應特加審慎，重新研討。此關於我國軍之成敗非鮮，必須自固根基，不可以英人不可靠者而自誤也。」[4] 3 月 10 日，在史迪威赴緬指揮前夕，蔣介石又與史談話，聲稱「我軍此次入緬作戰能勝不能敗」,「苟遭失敗，不但在緬甸無反攻之望，即在中國全線再發動反攻，滇省與長江流域後備不堅，亦將勢不可能」。[5] 他主張保衛當時距離中國後方據點較近的緬甸的首都曼德勒（瓦城），待日軍深入，予以痛擊後再行反攻。

仰光是美國援華物資的轉運站。史迪威視之為「生命線」，認為「一旦失去仰光，供應線將被切斷」，因此，他在入緬後不久，即雄心勃勃地迅速擬定計劃，準備推動中國遠征軍盡量南下，收復仰光。3 月 18 日，

史迪威飛返重慶，向蔣提出此項建議，但蔣介石認為，仰光瀕海，日軍具備海陸空三方面的優勢，中國軍隊如無空軍和炮兵掩護，很難克復該地。史蔣二人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蔣每提一個論點，史迪威即加以反駁。[6]當日，蔣在日記中批評史迪威「無作戰經驗，徒尚情感」,「不顧基本與原則」。[7]3 月 19 日　蔣介石再次與史迪威談話，分析緬甸戰場形勢，提出「目前應取守勢，切勿輕進以求僥倖」。[8] 蔣稱：「如果再過一個月，防線平安無事，他將考慮進攻的問題。談話中，蔣要求史迪威保證不要讓第五、第六軍吃敗仗，但史則表示無法辦到，要蔣「另外找一個能保證這一點的人來，因為我無法保證做到這一點」。[9] 這次談話，史迪威大為不滿，當日即在日記中指責蔣為「固執的畜牲」。[10] 在此期間，美方發表消息，聲稱中國第五、第六兩軍歸史迪威指揮，入緬作戰，蔣介石認為此屬洩密行為，日記云：「此無異以我之秘密，相告於敵，使敵知我入緬只兩軍，其可慮可危，未有如此事之甚者。烏呼！何其不守秘密，不明敵情至此哉！」[11]

為了保衛曼德勒，中國遠征軍第五軍第 200 師戴安瀾部在緬甸南部的同古（東吁）設防。自 3 月 18 日起，與日軍血戰 12 天，殲敵 5 千餘人。其間，史迪威堅主進攻，杜聿明則認為兵力不足，反對進攻，二人發生爭執，以致鬧翻。史迪威要求杜「服從命令」，並派人監督杜執行，但杜認為此舉關係遠征軍存亡，中國軍隊既未能適時集中兵力與敵決戰，即應在予敵一定打擊之後及時轉移，以保存戰力。[12]29 日晚，戴部奉令突圍，安全轉移。蔣介石與杜聿明的想法一致，日記云：「我第二百師在同古予敵以重大打擊後，自動轉進至葉蓮西之東南地區，與新二師

取得聯繫，而敵軍遭此重大打擊，我軍並無多大損失，乃自動撤退，不僅增我軍之榮譽，實足寒敵膽而使之不敢北侵矣。」日記批評史迪威：「以為應在同古全力作戰，此不知敵軍心理與戰地實情，並不知此次放棄同古，乃達成余一貫之意圖，而受英方宣傳與運動之談〔誤〕也。」[13]

史迪威也對杜聿明的抗命不滿，在日記中斥責杜聿明和新編第 22 師師長廖耀湘為「卑怯的雜種」和「十足的懦夫」。[14]3 月 31 日　史迪威憤而返渝，向蔣介石提出：對指揮中國第五、第六軍，「深感所得權限未足，未能令出必行，致有三次可以發動反攻之機會，皆蹉跎坐失。」[15]他要求蔣介石免去其本人職務。對史迪威的態度，蔣介石自然感到不快，當日日記云：「史氏以我軍師長不聽其進攻同古敵軍之命令，乃嘔氣回渝，向我辭職，殊出余之意外。烏呼！我軍此次出國作戰，對敵對友，對當地民心，皆多困難，而以客卿指揮我軍，不熟悉各方內情，使余焦慮，必須面面顧到，較之在國內作戰之單純者，其難易相去有天壤之別。尤其史氏受英方之宣傳與運動，而英軍不自慚無力，必欲掌握指揮權，圖保其虛名，余明知我雖犧牲而無益，然為全局與美國關係計，又不能不撐持到底，苦更甚矣！」[16]同樣，史迪威也感到不快，日記稱：「由於愚蠢、恐懼和態度消極，我們失去了一個在東吁打退敵人的絕好機會，根本原因在於蔣介石的插手。」「他身處距前線 1600 英里的地方，寫下一道接一道的指令，要我們去做這做那，其根據是零散不全的情報和一種荒謬的戰術概念。他自認為懂得心理，事實上，他自認懂得一切，他反覆無常，隨著行動中的每一個微小變化而不斷改變主意。」「其結果是使我本來就很小的權威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沒有軍隊，沒有警衛，沒有

槍斃任何人的權力。」[17]

4 月 1 日的談話，史迪威有意向蔣「攤牌」，自稱「發作了一番，言辭激烈」,「投下的那些炸彈發出了巨大的轟響」。[18]但是，蔣介石仍然極力忍耐。4 月 2 日　蔣介石與史迪威談話，告以杜聿明「少年氣盛」、「過分固執」，決定以年事較高、經驗豐富的羅卓英為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在史迪威指揮下統率中國入緬部隊作戰。蔣並決定親自陪同史迪威回緬。[19] 當日蔣日記云：「對緬戰事，思慮異甚。既憂部下在國外過於犧牲，補充為難。又憂失敗時喪失國威與軍譽，而史迪威乃動氣請辭，並於中美邦交有關。苦慮終夜，不得不決定約史由余陪同回緬，予以全權，以表示余對彼誠意，使之勿加懷疑也。」[20]

4 月 5 日，蔣介石與史迪威、羅卓英同機飛赴緬甸北部城市臘戍。6 日，到美苗（卑謬），與史迪威及英軍司令亞歷山大商談。7 日，蔣與史討論後，又與羅卓英、杜聿明、戴安瀾各將領談話，宣稱史迪威是「老闆」,「有提升、撤職、懲罰中國遠征軍中任何一名軍官的權力」,「他們應無條件服從命令」。[21] 蔣的這些做法，可以說給足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蔣很快又因事對史不滿。8 日，蔣介石向孫立人師長授以曼德勒五萬分之一地圖，面示防守要略，並令與史迪威、羅卓英同往實地設防。蔣在視察新築機場工程時，發覺進度緩慢，日記云：「史迪威稱美苗機場十三天可以完工，是彼受英方之欺，而又欺我者也。可痛極矣。」[22]

當時，英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戰場；在亞洲，其戰略是「棄緬保印，保

存實力」。在緬英軍或聽任中國遠征軍獨立作戰，或利用中國部隊掩護自己撤退。4 月 24 日，蔣介石指示：「國軍今後在緬甸之作戰指導，應以不離開緬境，而又不與敵主力決戰為原則。依此原則，以機動作戰，極力阻止並遲滯敵之發展。」[23] 同時，指示遠征軍守衛臘戍、密支那、八莫等鄰近中緬邊境的城市。但是，史迪威和羅卓英都還醉心於組織曼德勒會戰。5 月 1 日，曼德勒失陷。5 日，日軍攻佔八莫，威脅中國遠征軍的歸國通道。6 日，英軍決定放棄緬甸，史迪威下令中國遠征軍向印度撤退，史本人拒絕美方派來接他的飛機，親率少數人員徒步西行。蔣介石對史迪威未經請示就下令向印度撤退大為不滿，日記云：「史迪威擅令我第五軍赴印度邊境之龐炳，而彼且離開隊伍，先自赴印，並無一電請示。此種軍人，殊非預想所及，豈彼或為戰事失敗，神經不安之故乎！可歎！」[24] 18 日，蔣介石要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格魯德轉告史迪威，「中國軍隊無退入印度之意」。[25]在撤退過程中，遠征軍一度糧盡藥絕，饑病交迫，犧牲慘重，直至 7 月 25 日，杜聿明所部直屬隊等才到達印度。入緬時，遠征軍兵員約 10 萬人，至此，僅餘 4 萬人左右。[26]

6 月 4 日，史迪威自印度德裡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匯報，嚴厲批評中國遠征軍的高級將領：「殊令人失望」，「或缺能力，或缺膽略」，聲稱「彼等居處離前線太遠，且無意親上前線。」「因循遷延為各高級將領之通病」。他甚至點名批評杜聿明「個性剛愎，不易應付」。他自稱這次匯報為「開門見山，指名道性」，「那情形就如同在踢一位老婦人的肚子一樣」。[27] 蔣對這些批評大不以為然，認為史對此次撤退負有重大責任，但卻

「不知自反，專事毀人利己」。[28] 6 月 5 日日記云：「我軍在緬如此重大犧牲，其責任全在史氏之指揮無方，而彼乃毫不自承過失，反詆毀我高級將領至此。當失敗之初，彼乃手足無措，只顧向印度逃命，而置我軍於不顧，以致我第五軍至今尚未脫險。烏呼！史迪威誠不知恥者也。」[29]由此，蔣介石更進一步指責美國軍事代表團，「大半皆自私自大之流」。[30]6 月 16 日，蔣研究對史迪威的處理辦法，產生「軍法審判」的念頭。日記云：「彼為推諉責任，掩護罪過，故不得不毀壞他人名譽，誣蔑我國將領。此應提議開軍法審判，使美國政府能知史之不法與無禮乎！」[31] 至此，蔣介石對史迪威的印象可謂惡劣至極，而史迪威對蔣的印象也同樣很糟糕，日記稱：「中國政府是一個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礎上的機構，掌握在一個無知、專橫、頑固的人手中。」[32]

二　蔣介石指示宋子文等向美國提出史迪威問題

為了援助被侵略國家，1941 年 3 月，美國國會通過《進一步促進美國國防和其他目的法案》(租借法案)，授權美國總統以出售、轉讓、交換或租借等方法向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提供國防物資。先後受援的國家有英國、蘇聯、中國、自由法國等。但是，其間的條件並不平等，給英國、蘇聯的援助物資可直接撥交，而對中國的援助物資，則必須通過監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華盛頓成立的的聯合參謀長會議(參謀團)，也將中國拒之門外。

蔣介石企圖改變上述情況。1942 年 4 月 1 9 日，蔣致電時在美國爭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與羅斯福總統作「肺腑深談」。電稱：「在聯合參謀會議及軍用品供應之主要事項中，中國並非受有英、蘇之同等待遇，不過類似一受保護人而已。」「將來英美聯合參謀會議，如不擴大包括中國，或將中國置於軍用品分配董事會之外，則中國勢必成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須堅執予等有予等本身之立場，予等須維持本身獨立之地位。」[33] 5 月 18 日，蔣介石在重慶接見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格魯德時直率表示：「今日之參謀團，惟有英美參加，擁五百萬大軍與日本作殊死戰之中國反不能廁及，實非中國所願見。」「中國軍民對此措置，刺激實深。深感中國名為同盟國，實被歧視。戰時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跡，如此戰後如何未敢想像矣。」[34]6 月 18 日，蔣介石致函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及宋子文，批評美國方面對中國戰區的組織與籌備工作進行不力：電稱：「中國戰區至今並未有何組織與籌備進行，對於維持中國戰區至少限度與其可能之方案，亦尚未著手，空軍建立與補充以及空運按月之總量，陸空軍作戰與反攻時期之整個方案，彼等皆視為無足輕重，一若中國戰區之成敗存亡皆無關其痛癢。」電報不指名批評史迪威：「不重視組織與具體方案及整個實施計劃」。「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視我國家與軍人，故事多格格不入。」在緬戰失敗撤退過程中，羅卓英與史迪威一度失去聯繫，史向美國軍部報告，羅離開軍隊，逃往雲南保山。[35]蔣介石事後查明，並無其事。對此，蔣極為反感，批評史迪威「謊報」，「完全歸罪於我高級將領」，「彼竟自赴印度，並擅令我軍入印，而彼亦並未對我有一請示或直接報告（中與史本約有特用密本，平時皆直接通電），於情於理，皆出意外」。他表示：從未見過像

史迪威這種「推諉罪過，逃避責任以圖自保」的人，提出應按照國際慣例，實行軍事審判，查明功過。如果美國政府有意，中國政府可將有關高級將領解送華盛頓接受審判。但是，蔣又表示：中國哲學的原則是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為維護中美國交及友邦榮譽計，要嚴格保密，切不可向外人「略露一點」，使人對中國政府有 「以怨報德」之想。可以看出，蔣對史迪威已經不能忍耐，但是顧慮中美關係，因此，在要求宋子文等向羅斯福匯報的時候，顯得特別小心、謹慎。電中，蔣介石也表述了中國作為「弱國」參加「國際戰爭」的心情：「不僅利未見而害先入而已，即將來戰後是否能獲得我所犧牲者相當之代價，實成問題。然而此時我國尚有一塊立足之乾淨土地，而我政府幸亦未托足於外國以寄人籬下，且亦有自立之道耳！」[36]

宋子文對史迪威本具好感。當年 4 月 28 日，宋子文曾致電蔣介石，擔心緬戰不利，將降低中國國際地位，影響美援爭取，要求與史迪威合作，聯合如實向美方提出報告，電稱：「史迪威親歷其境，利害相關，所知當更透徹，此事必能與我合作，設法使聯合國間明瞭真相。」[37] 5 月 6 日，宋子文再次致電蔣介石，報告所聞史迪威在撤退過程中拒坐飛機，率領副官步行的表現，稱讚史迪威「不失軍人本色」。電報提出，史迪威身負如空軍援華、中印空運、軍貨接濟等多重任務，要求蔣介石命其自印回渝。[38]但是，宋子文也親身感受到史迪威掌握美援物資分配大權所帶來的困難。5 月 19 日，宋子文致電蔣介石稱：「美軍部以史梯威有全權，每有所商請，輒以史梯威並未要求，為不負責任推諉之詞」。宋子文再次要求蔣將史迪威調到重慶，「常依左右，遇事隨時飭報，勿

使遠駐印度，否則種種計劃進行愈感延滯」。[39]

宋子文接到蔣介石向美方提出史迪威問題的指示後，感到相當為難。當時，德國正傾全力進攻蘇聯南部，蘇軍情況危急，英美無暇東顧。同年 6 月，宋子文致電蔣介石提出，應盡力於以下工作：（一）中印空運；（二）美空軍多派數大隊來華助戰；（三）美根據史迪威要求，派陸軍二、三師赴印，助我克復緬甸，以利我陸運。根據上述情況，宋子文要求蔣介石「對史迪威萬分忍耐」。[40]

滇緬路封閉後，中國對外通道被堵。美方不得已，將已經撥給中國的十餘萬噸機械大部分收回。此後，美國援華物資只能依賴中國、印度之間的空運。根據中國抗戰需要和美國援華計劃，最低限度每月必須向中國運輸 3500 噸軍械，而中印之間的空運當時實際上只能運輸 500 噸。這種情況，將導致有關援華計劃的取消。為此，宋子文多次致電蔣介石，要求蔣與史迪威切實商談：（甲）中印空運計劃（乙）中美在華空軍計劃（丙）國內及赴印陸軍計劃及附帶軍械問題等等。但是，始終得不到蔣的回答。宋子文詢問美國空軍參謀長，美國空軍參謀長答稱此為史迪威責任；宋子文向羅斯福總統匯報，羅答以史迪威為蔣的參謀長，諸事可由蔣向史下達命令。6 月 12 日，宋子文致電蔣介石：要求蔣明白示知：「文追隨鈞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絕非意存推諉，更不願敷衍因循，事實如此，不得不一再曉瀆，即請鈞座明白示知，鈞座對史梯威感想如何？文各電所列問題，是否已與其商洽？有何困難？美方認定，接濟中國必須史梯威商承鈞座之後來電證實，始克有濟，是以文必須明瞭

鈞座對史之感想及史對我之態度，始可設法相機應付也。」[41]

這時，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已經感到，蔣對史迪威「無十分信任之表示」，二人關係中中出現了不和諧的因素。6 月 12 日，史汀生約宋子文專談史迪威問題。宋稱：如美國將本國陸軍交給蘇俄軍官指揮，將非常困難，而蔣介石卻將中國入緬部隊交給史迪威指揮，這是歷史上的「空前之舉」。史汀生則表示：史為「第一流戰將，美軍官中無出其右，故特派充蔣公參謀長，但余等崇拜蔣委員長及愛護中國之熱切，不能以對史個人感情為比例，如蔣公以為史不適當，務請直言無隱，俾得更換其它將領，決不因此發生絲毫意見。」[42] 6 月 16 日，宋子文致電蔣介石，建議蔣將對史的意見向美方和盤托出，同時大膽對史迪威進行指揮，電稱：「文意鈞座顧顧全大局之苦心，為中外所共見，但如史梯威確不能共事，不妨此時乘機直說。」「鈞座似可表示，對史梯威固至信任，但對其見解當然不能事事俯從。如此一方面不傷感情，一方面可留他日地步。陸長等既自動有另調之意，且自總統以次，均認史為鈞座部屬地位，鈞座盡可照部屬指揮命令之，不必以上賓相待，但善為利用其地位，以推動美軍部充量之接濟。」[43] 可見，宋子文關心的是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動美援，並不希望蔣、史矛盾激化。然後，一件意想不到的風波發生了。

三 《備忘錄》風波

6 月下旬，德國加強了對非洲的攻勢。為解救危機，美國軍方將全部重

型轟炸機和所需運輸機調往埃及，其中包括駐紮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隊。26 日，史迪威將這一「壞消息」告知蔣介石。蔣認為這是美方「置我中國危急於不顧，心殊憤激」，他在「強忍」之下，仍然責問道：「羅斯福總統來電明言已令將美國空軍第十軍由印度調來中國作戰，想令出必行，豈容擅改！」「倘英、美以為中國抗戰實力尚有保持之必要，絕不應一再無視中國之利益如此。蓋中國最近所受之待遇，不啻在英美心目中已失其存在矣。」[44] 事後，宋美齡、宋子文都提出質問，史迪威「狠狠地反駁了他們」。同日，史迪威秘密繳電美國陸軍部，聲稱「蔣公極為激動，囑予電呈總統，其大意為：同盟國家未認中國戰場為同盟國家戰場之一部」，「中國全力抗戰已有五年，而同盟國家並未以全力援華。利比亞戰時固緊張，但中國戰場狀況亦屬緊張。」[45]

6 月 29 日，蔣介石向史迪威面交「手諭」一件，提出保持中國戰區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三項：1、8、9 月間美國派三個去印度，與中國軍隊合作，恢復中緬交通；2、自 8 月份起應經常保持第一線飛機 500 架；3、每月經過駝峰運送 5000 噸物資。蔣批評自美國軍事代表團抵華以來，在建設中國空軍方面，尚無特殊成就；羅斯福對中國戰區，尚有未能完全明瞭之處；太無視中國戰區。[46]7 月 1 日，宋美齡與周至柔、陳納德、史迪威會議。宋美齡要求史迪威將蔣的「手諭」轉交羅斯福總統，並附上史本人的推薦信。史當場拒絕，對宋稱：「這是大元帥給總統的最後通牒，超出了我的職權範圍。我借此機會闡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帥的參謀長，二是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其職權超出中國之外，三是戰爭委員會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維護美國的政策，四是總統負責租借事務的

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維護美國利益的美國軍官。」史並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如果她不懂得這一點，那她就比我想像的還要愚蠢。」[47]

7 月 2 日　蔣介石擬從美國已經撥給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中轉撥兩架運輸機給中國空軍，遭到美員拒絕。史迪威為此向蔣致送備忘錄，一面同意此兩架飛機可由蔣介石支配應用，但同時聲稱自己是「出席中國任何軍事會議之美國代表」,「在任何上述會議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適用」。又聲稱自己是美國「總統代表」,「負責監督及管理租借器材，並決定移轉其所有權之地點與時間。俟所有權轉移之後，委座即具此項器材管理之權。」[48] 史迪威的這份備忘錄意在告訴蔣介石，自己雖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但又是「美國總統代表」，可以不接受蔣的命令。美國租借物資只有在經過他同意之後蔣才能調用。蔣介石長期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令出必行，何曾受過這種對待！

接二連三的類似事件，特別是史迪威的《備忘錄》將蔣惹惱了。同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表示「中國對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憐求施」，指責史迪威「以總統代表資格脅制統帥」。蔣強烈表示：史既在中國戰區內擔任參謀長,「則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適用」。[49]7 月 4 日　蔣介石日記云：「史氏之愚拙虛妄，不法無禮，可謂無人格已極，而余乃自愧國家貧弱，所以遭此侮辱而已。」[50]5 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要他促請美國政府注意。6 日，宋子文電復蔣介石，支持蔣對史迪威《備忘錄》的態度，首次提出撤換史迪威問題。電稱：「史迪威態度殊屬離奇。閱其原函，強詞奪理，謬解職權，非神經錯亂，不能狂妄致此。文日內即進

謁當局，諒能加以糾正。但文函欲知者，重新明確規定參謀長職權後，鈞座是否仍擬留其在華供職，抑或乘機更換，另選他員？」[51] 9 日，蔣介石再電宋子文，要宋觀察美國政府態度，暫不表態：「先看美政府對史之來函如何處理，最好能由其自動召回也。」[52] 18 日，蔣介石與史迪威談話，產生不再要求美援的想法，日記云：「美國對我冷淡接濟事，不如不再要求，亦一對策也。」[53]

宋子文受蔣之命後，即與美方接洽，並親見羅斯福，陳述意見。7 月 23 日，美國軍部向宋子文轉告羅斯福意見：史為中國區參謀長，當然聽命於蔣委員長，同時為美國駐渝租借法案代表，及國際軍事會議美國代表，當然聽命於美方。如蔣以為不便，可將史的參謀長職務和美國代表職務劃開，分由兩人擔任。美國軍部稱：總統因史迪威對中國及蔣公一向友好，而且熟悉中國情形，甚盼蔣公能繼續任用。宋子文認為美方「語氣仍不免袒護」，再次謁見羅斯福，解釋內中情形，說明史函的不當。羅斯福稱：史的職權中有代表美國出席在渝國際軍事會議一項，現在既無此類會議，事實上形同虛設。關於租借法案，此後一切由宋子文代表蔣、霍布金代表我，在華府共同解決。這樣史迪威即成為「專屬參謀長」。「如蔣公仍以史為未妥，余當更換之，但美國幹練適當之軍官甚少，另覓妥員，確有相當困難。」27 日，美國陸軍部代擬羅斯福復蔣介石函，仍取維持史迪威《備忘錄》態度，要求宋子文轉呈蔣介石，宋得悉其內容後，緊急謁見羅斯福，說明理由，告以「未便轉呈」。羅斯福對宋子文所言，「極以為然」，決定撤銷此電。[54]

為了向蔣介石說明同盟國全盤戰略，調解蔣史糾紛，羅斯福於 1942 年 7 月派行政助理居裡再次訪華。7 月 22 日，蔣介石會見居裡，批評同盟國戰略不當。居裡問蔣，是否將史迪威調回美國？蔣答：「此由美國政府自定，余不願參加意見也。」[55] 25 日，蔣思考史迪威的《備忘錄》，認為該函有三大問題：「甲、史函竟有聽命與不聽命由彼自便之意，此為侮辱統帥。乙、彼又以為租界案物資之發與不發，由彼自便，非由余求彼不可，此為欺凌中國。丙、過去之行動，乃以一人而利用兩種職權，實以殖民地之總督自居，以參謀長為名而實行太上統帥職權者也。」蔣稱：「此必於美國助華之平等政策有礙，而其侮辱中國與余革命人格亦何能忍受，此應與居裡說明者也。」[56] 同日，蔣介石再次與居裡談話，進一步確認西方世界歧視中國，美國與英國並無差別。日記云：「談後更覺西人皆視華為此等民族，無不心存欺侮，可以進一步壓迫，必壓迫不止。美國以道義與平等為號召，而其心理與方法，實亦無異於英國致所為也。」[57] 26 日，蔣介石與居裡進行第三、第四次會談，「痛斥史迪威之過惡與美國軍部藐視我華之錯誤」。蔣自覺大義凜然，而居裡則初時「矜持」，最後表示「折服」。蔣介石感到精神上的勝利，日記云：夫彼可欺則欺，可侵則侵之心理，吾人若一味謙恭，則適中其計矣！」[58] 同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聲稱如羅斯福來電肯定史迪威《備忘錄》，則宋可代表自己向羅表明：取消中國戰區，辭去中國戰區總司令職務。[59]至此，蔣介石已向羅斯福擺出「攤牌」架勢。7 月 30 日，宋子文致電蔣介石，要求蔣乘居裡在重慶期間，「凡不滿史梯威之種種事實，最好向其直言無隱。」[60]同日，蔣介石與居裡第五次談話，居裡提出「過渡辦法」，聲稱不可讓史迪威太失體面，以免他回美後反華，可令史先

赴印度，美國另派一人來華暫代。蔣同意這一辦法。[61]

上文已述，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援英戰爭失敗後，部分軍隊退入印度。1942 年 6 月，史迪威向蔣介石提出在印度訓練中國軍隊的計劃，得到批准。同月 24 日，蔣指令史迪威擔任這支訓練部隊的司令。7 月 16 日，蔣進一步任命史迪威為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羅卓英為副總指揮。8 月上旬，史迪威赴印，以藍姆伽為營地訓練中國部隊。他提出，「要中國士兵，不要中國軍官，尤其不要中國將領」，從美國調來三百多名軍官，擬將駐印軍營長以上軍官均改由美國人擔任，受到中國將士的強烈反對。史遂將這部分美國軍官改為聯絡官，派往各部。[62] 但這部分聯絡官權力很大，可以直接調動營以下部隊，而無須通知中國部隊長官。同年 9 月，史迪威下令將第 38 師改為 10 個炮兵營，將原師長孫立人及廖耀湘等改任炮兵指揮或步兵指揮。12 日，杜聿明致電蔣介石，聲稱：「國家軍制系我政府法定之建制，史將軍擅權改制，實屬毀辱國體，損害主權。」[63]同年 12 月，美國政府決定向中國撥濟 30 個師的軍械。11 日，蔣介石與來重慶參加會議的史迪威談話，史乘機竭力批評中國軍隊辦事延緩，羅卓英有「十大罪狀」。蔣介石雖然不高興，但尚能「忍耐」，決定撤換羅卓英，代之以邱清泉。[64] 不久，因擔心邱脾氣暴躁，不易與史迪威相處，又改為鄭洞國。[65] 至 1944 年 1 月，藍姆伽營地共訓練中國軍官 2626 人，士兵 29667 人。這支部隊在後來的反攻緬甸戰鬥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除退入印度者外，中國遠征軍的主力大部分退入雲南西部。1943 年 2 月，

軍事委員會決定重建遠征軍，以陳誠為司令長官。3 月 10 日，陳誠與史迪威商量，決定在昆明設立訓練基地，調集幹部分批輪訓後空運至藍姆伽實習。

四　計劃攻緬，蔣、史矛盾再度激化

日軍佔領緬甸全境後，史迪威多次提出反攻緬甸計劃。1942 年 7 月 19 日，史迪威向蔣介石提交《反攻緬甸計劃》，其要點為「南北緬水陸同時夾擊」：1、中、英、美三國聯合出兵，自印度攻入緬甸，同時，另一路中國軍隊則自雲南進攻。兩路會師曼德勒，會攻仰光。2、在盟軍從陸路進攻的同時，英國海軍確立在孟加拉灣的制海權，從仰光登陸。這一計劃後來被稱為「安納吉姆」計劃。8 月 1 日，計劃得到蔣介石的批准。11 月 3 日，史迪威自印度到重慶，向蔣介石匯報和英軍統帥韋維爾商談結果，要求在 1943 年 3 月 1 日前後發動攻勢。蔣介石表示，中國可由雲南方面出動 15 師，但勝利關鍵在於英方是否能調撥足夠的海空力量，掌握制海權和制空權。他說：「倘海空實力不充，中國實不願派一卒參加此役。反攻開始以前，余必須知英國用於緬甸海空軍之實力，方能下令前進。」「此次不反攻則已，一旦反攻，非勝不可，絕不能再受第二次之失敗。」[66]

1943 年 1 月，蔣介石致電羅斯福，要求羅敦促英方，調動陸、海空力量，共同克服緬甸。[67] 同月，羅斯福、邱吉爾在在北非的卡薩布蘭卡（卡

港）會議，決定實施「安納吉姆」計劃。2 月 4 日，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阿諾爾、空軍補給司令薩默維爾（Somervell，或譯薛莫維爾、索摩微爾）、英國聯合參謀代表團團長迪爾到重慶，向蔣介石通報卡港會議情況及 1943 年戰略。同月 7 日，雙方會談，蔣介石同意英美方案，但要求英美方面增加空運與空軍，切實支援中國。其標準為：空運物資每月一萬噸，飛機 500 架。蔣強調，必須達到這一標準，並有確切日期。史迪威對蔣所提要求不滿，當即質問蔣：「是否不達到標準，即不對日抗戰？」史的質問含有明顯的輕蔑成分，蔣認為史迪威作為自己的參謀長，提出這一質問，「可恶不敬已極」，但是，他忍著沒有發作，只回答說：「中國抗戰已六年，即使太平洋戰爭不起，英美不來援助，中國亦可獨立抗戰。」史迪威再問：所謂標準是否為條件？蔣答稱：「非條件，乃余負責作戰者最低限度之要求耳！」接著，蔣以溫和的語氣要求阿諾爾轉告羅斯福與邱吉爾：「當盡我所能，不惜犧牲一切，以期不辜負友邦之期望。」[68] 8 日，蔣介石打電話給宋子文，指責史迪威會議上的「不敬」，要宋轉告史，「使彼戒懼，並限彼應切實設法，達成余之標準，以贖過失。」[69] 9 日，中、英、美三方印度加爾各答會議，一致同意實施「安納吉姆」計劃，以 1943 年 11 月至 1945 年 5 月為入緬作戰期。會議期間，宋子文向史迪威轉達了蔣的批評。據宋致蔣電稱：「彼極為懊喪，並謂當時談話有失體統，甚以為慊，但信鈞座必諒其忠實及一番熱忱。」[70]，不過，史自己的日記則是：「見他的鬼吧！」[71]

5 月初，史迪威與飛虎隊的陳納德之間在對日實施「空中攻擊」問題上發生分歧。陳納德主張，只要中美用 500 架飛機對日軍進行空中攻擊，

即可消滅日本大部分在華空中力量，阻遏其船運，破壞其交通線，使緬甸和中國本部的陸戰易於進行。史迪威則認為，中國軍隊缺少軍械給養補充，也缺乏訓練，不足以保護機場。如對日「空中打擊」實施過早，引敵來攻，則雲南、廣西、湖南各地的機場均將喪失，以中國本部為基地空襲日本的計劃也將落空。爭論雖發生於史、陳二人間，但不久即發生於史迪威與宋子文之間。5 月 5 日，美國海陸空三方會議，邀請史迪威、陳納德、宋子文參加。宋支持陳，主張當前急務為增強空軍力量，史則認為，中國陸軍勇敢苦戰，損失巨大，「目前實不堪一戰」。宋即批評史「對中國陸軍未免過於悲觀」。[72] 同日晚，宋美齡謁見羅斯福，羅表示，擬將反攻緬甸計劃縮小為佔領緬北。[73]

史迪威早就制訂過一份「有限度的進攻北緬的計劃」，但遭到蔣介石的否定。蔣的理由是：六年來，中國對日作戰得到的經驗是「迫使機械優越之敵人，運用惡劣之交通線，使其機械設備失其效用」。而在北緬，日軍可以利用伊落瓦底河及仰光鐵路，中國方面可利用的只有正在建造中的兩條公路。即使中國軍隊在北緬成功，日本人仍可利用交通便利，派軍增援。他向史迪威一再說明，「不可再蹈覆轍」。[74]5 月 8 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要他在羅斯福、邱吉爾會談期間，力爭照卡港會議及其後的重慶會談決議實施，首先以英、美海空軍截斷日軍供應線，佔領仰光，然後收復整個緬甸。電稱：「如果僅僅佔領北緬甸至蠻德勒為止，非僅無益於中國戰場，而且費力多，犧牲大。結果必不能達成目的，徒然犧牲兵力。」[75]5 月 13 日，宋子文專訪到華盛頓參加太平洋軍事會議（三叉戟會議）的邱吉爾，要求英方照卡港、重慶、加爾各答等會議決

定，如期攻緬，但邱態度消極。宋問：是否準備放棄攻緬？邱答：英美軍事專家正在研究。[76] 邱吉爾的回答使宋子文倍感緊張，立即致電蔣介石匯報，蔣也跟著緊張起來。

1943 年春，蔣介石為準備進攻緬甸，曾將原來部署在長江兩岸的第六戰區主力抽調赴雲南、貴州，司令長官陳誠也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隨部隊入滇，鄂西空虛。同年 5 月，日軍在湖北宜昌集結大軍，進攻三峽地區，威脅重慶。當蔣得知太平洋軍事會議有放棄攻緬計劃的可能後，大為惱怒，致電宋子文稱，如此，「則我軍民對聯合國從前所有各種宣言與決議之信約，不僅完全喪失信用而已」。他覺得，又上了史迪威的當。電稱：「史迪威始則強催我軍集中攻緬，今乃因抽調部隊，而使重慶門戶大受威脅，而結果則謂可以取消打通仰光與滇緬路計劃，則我軍上下對美國用意與作為，豈啻視為兒戲，直認為有意陷中國於滅亡之境，不啻協助日本完成其大東亞之新秩序，豈不令人惶慄不已！」[77]他要宋子文將這一看法明告史迪威及羅斯福左右。

5 月 17 日，宋子文應邀出席聯合參謀長會議，轉述蔣的態度，堅決反對放棄攻緬，也反對史迪威僅攻緬北的計劃，闡述其理由說：「我如不佔領緬南，斷其後路，必歸失敗，徒作無為〔謂〕之犧牲。蔣委員長彼時之決心如此，今日對此之決心益強。」[78]在此前的聯合參謀長會議上，史迪威公開批評蔣介石：「諸事猶豫，於戰略無一定見解」。針對史的批評，宋特別為蔣辯護，聲言蔣並非初次與外國軍事專家合作。他以蔣曾任用與蘇聯的加倫、崔可夫、德國的塞克特及佛采耳為顧問為例，說明

他們在任期內「無一不恪遵蔣委員長意旨」。[79]18 日，蔣介石從宋子文電來電中得知有關情況，日記云：「邱吉爾固毫無進攻緬甸之意，而史迪威之污蔑我軍，輕侮我國，尤令人痛憤憂戚之至！」[80] 21 日，在太平洋軍事會議上，宋子文再次要求，堅決執行卡港會議及加爾各答會議的攻緬決議，邱吉爾辯稱，當時「只有計劃，並無決議」，「英軍事當局如有允諾，實屬越權」。他表示：「將來當極力設法使印度與中國軍隊得以連合，或須經緬甸北部。」[81] 宋子文擔心羅斯福會向英方妥協，於同日謁見羅斯福，重申史迪威的進攻北緬計劃，「徒耗軍力，蔣委員長絕不能接受」。羅斯福則稱：「攻復仰光，確有困難，但可先向西南岸進攻，以從後面襲擊仰光」，將來擬派新銳部隊赴緬。羅要宋子文轉告蔣介石：「攻緬計劃，余有決心進行。」[82]

重慶危急加深了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惡感。5 月 22 日，蔣介石日記云：「我此次戰局危急，乃被史迪威之所玩弄而陷入也。烏呼，此人誤華不淺矣！」[83]27 日，蔣介石致電宋美齡云：「近日戰況確甚緊急，本星期內關係最大，所以致此之故，實由史迪威催促我精兵抽調入滇，準備攻緬，以致前方空虛，為敵所乘。其實去年至今，自緬戰至此次戰爭，皆為史所陷害也。」[84]6 月 21 日，蔣介石致電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要求她在向羅斯福告別時，相機提出史迪威問題：「甲、史對余不能合作，余為大局計，均能容忍，惟其對中國軍民成見太深，以廿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之革命軍民。乙、故自史來華，我軍隊精神因之消沉頹喪，蓋史視中國無一好軍人，無一好事，而根本不信我軍能作戰，更不信我勝利，故欲其指揮盟軍以求勝利，無異緣木求魚。而彼對自己所處理之事與計劃，

以為無一不好，固執不變，毫無商洽餘地。丙、故現在我軍對史失望，以為如再聽其指揮，不惟無勝利，必大受犧牲，非至全敗不可。」電末，蔣介石稱：「彼之態度，是來脅制中國，而非協助抗日，其結果與美國之熱忱援助及友愛精神相反。余為史對於一般軍官嚴加勸戒，令與合作。惟長此以往，時時發生誤會，則不勝防制之苦。故為作戰及大局計，深望羅總統明瞭此事真相與現狀，蓋甚恐其對華盛情將來失望，故不敢知而不言也。」 [85] 但是，蔣介石又叮囑宋美齡，不必太正式，也不必採取「不可不撤換」的強硬方式，只告以「實情」即可。

在羅斯福的堅持和說服下，原來堅決反對攻緬的邱吉爾同意一致進行，英美參謀團會議隨即制訂新的攻緬計劃。史迪威曾答應向蔣呈閱會議記錄，但史迪威第一次交給蔣的並非全文，而且缺乏重要部分。當時，蔣認為「海軍是這次行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除非保住孟加拉灣，否則進攻緬甸也就沒有用處。因此，他關心英美「將提供多少海軍」。[86]6 月 27 日，蔣介石命外事局局長商震催史迪威來見，詢問會議關於海軍兵力數量等文件是否帶來。史稱，此件不能交任何人，繼而改稱，回去後交商震代呈。在商震去史處催索後，交來者仍非蔣所需要的文件。[87] 6 月 28 日，史迪威致函蔣介石，說明聯合參謀團為取得孟加拉灣制海權所必須派遣的「適當之兵力」。據史自稱：「列了一長串戰艦、重型巡洋艦、航空母艦及驅逐艦等，而且第七次解釋了『適當』一詞」[88] 史迪威非常不情願這樣做，日記云：「這超越了所有界限。這個小人令人厭惡，他十分傲慢地詢問我們將能做些什麼，誰在妨礙我們幫助他，以供應一切——軍隊、裝備、飛機、醫藥、通訊、汽車運輸、建立他該死的

後勤供應部，訓練他的劣等軍隊，甩下他那後娘養的參謀總長和總參謀部，而他卻對我們的準備工作挑三揀四，對海軍問題支支吾吾。主啊，救救我們吧。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饑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89]同日，蔣介石召見史迪威，當面加以批評。日記云：「此人之卑劣、可恨極矣！」。「烏呼，此人之無常識、無人格，實難令人想像者。」[90]這說明，彼此之間的惡感都發展到了極點。

美國是強國，史迪威是美國派到中國的將軍，因此，蔣介石將他和史迪威的關係看成弱國和強國之間的關係。6 月 29 日，蔣介石日記云：「凡弱國參戰，無論如何努力與犧牲，強國皆視為不能與彼相比。例如史迪威指揮我軍在緬作戰，彼總不以我軍之犧牲為英勇，而為怯弱，蓋彼仍以北洋軍閥之軍隊視我也。」[91]

不久，史迪威又有幾件事加劇了他和蔣介石的矛盾。一是擅自撤委中國軍官。8 月 14 日，總指揮部副參謀長溫劍銘，因事與國內軍政部通電，被史認為「有違軍紀」，下令調溫為高參，委美國人博金為副參謀長，引起全軍大嘩。新編第一軍軍長鄭洞國勸史收回成命，為史拒絕。史的助手參謀長波德諾甚至說：「駐印軍是由美國裝備訓練的，因此軍中事務，包括人事必須聽命於總指揮部，即使中國政府也不得干預過問。」[92]鄭及參謀長舒適存、師長孫立人等憤而致電蔣介石。鄭電稱：「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則人無保障，勢必媚外圖存，軍隊紀綱如何維持，國家體制其何以堪！」[93]舒電稱：「美方一貫政策，為打破中國高級指揮機構。」「美方微員僚佐，皆代表史將軍，須聽其命以馳驅，稍不遂意，責難侮

辱隨之。」蔣介石批示：「為何史於人事，不先請准本委員長，而擅自撤委？」[94] 一是給蔣介石寫報告、備忘錄時所署職銜和語氣。史通常均署「美國陸軍中將」，引起中國將領不滿。[95] 9 月 21 日，史在給蔣介石的意見書末改署「中國戰區參謀長」。蔣介石閱後稱：「其內容仍有不遜之言，此種恣職態度，殊令人難受，隱痛極矣！」[96] 三是史迪威對中共的態度。 史對蔣失望，自然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抗日部隊寄以希望。1942 年 6 月至 10 月，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多次在重慶訪問周恩來。1943 年 3 月，戴維斯再次訪問周恩來，周提議美國派代表常駐延安。6 月 24 日，戴提出報告，主張接受周恩來建議，向延安派駐觀察員。9 月 6 日，史迪威向蔣介石提出《備忘錄》，建議調動中共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及胡宗南、傅作義、鄧寶珊等部向山西出擊，這些都觸犯了蔣的大忌。當日，蔣日記云：「此受共黨所主使，故其語含威脅之意。且名為備忘錄，乃欲於將來制裁中共時，證明曲在我也。史氏誠最卑劣、最糊塗之小人哉！余亦不屑駁復矣。」[97]9 月 10 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指責史迪威「不知共黨十年來經過之歷史，更不明瞭最近共黨之內容及其陰謀之所在，徒聽共黨之煽惑，助長共黨之氣焰，殊為可歎！」[98]

---

[1] 《困勉記》卷 70，1942 年 1 月 30 日。本文所引蔣介石日記，均采自台北「國史館」所藏未刊《困勉記》、《省克記》、《愛記》、《事略稿本》，

以下均同，不一一註明收藏地點。

[2]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 4 卷，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71 頁。

[3] 黃加林等譯:《史迪威日記》，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 頁。

[4]《困勉記》卷 71，1942 年 3 月 8 日。

[5]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作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81 年版，以下簡稱《作戰經過》(三)，第 238 頁。 史迪威當日日記稱:「蔣大談中國人的氣質和他們所受到的局限，他們不能去進攻的理由…在緬甸失敗對於士氣將是災難性的一擊。第五軍和第六軍【是】『軍隊中的精華』必須慎重。」見《史迪威日記》，第 54 頁。

[6]《史迪威日記》，1942 年 3 月 18 日，前引書第 60 頁。

[7]《困勉記》卷 71，1942 年 3 月 18 日

[8]《作戰經過》(三)，第 257 頁。

[9] 瞿同祖編譯《史迪威資料》，中華書局 1978 年版第 19 頁；黃加林等《史迪威日記》譯文作「頑固的傢伙」，見前引書第 61 頁。

[10]《史迪威日記》，第 61 頁。

[11]《困勉記》卷 71，1942 年 3 月 20 日。

[12]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前引書第 875 頁。

[13]《困勉記》卷 71，1942 年 3 月 29 日。

[14]《史迪威日記》，1942 年 3 月 30 日，前引書第 71 頁。

[15]《作戰經過》(三)，第 271 頁。

[16]《困勉記》卷 71，1942 年 3 月 31 日。

[17]《史迪威日記》，1942 年 4 月 1 日，前引書第 72—73 頁。

[18]《史迪威日記》，1942 年 4 月 1 日，前引書第 73 頁。

[19]《作戰經過》(三)，第 274 頁。

[20]《困勉記》卷 71，1942 年 4 月 2 日。

[21]《史迪威日記》，1942 年 4 月 7 日，前引書第 77 頁；參見《作戰經過》第 290 頁。

[22]《困勉記》卷 71，1942 年 4 月 8 日。

[23]《作戰經過》(三)，第 299 頁；參見羅卓英:《報告》，1942 年 6 月 25 日。宋子文文件，第 64 盒，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以下均同。

[24]《困勉記》，1942 年 5 月 6 日。

[25]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1981 年版，以下簡稱《戰時外交》(三)，第 146 頁。

[26]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前引書，第 882 頁。

[27]《史迪威日記》，1942 年 6 月 4 日、7 日，前引書第 103、104 頁。

[28]《困勉記》卷 72，1942 年 6 月 6 日。

[29]《困勉記》卷 72，1942 年 6 月 5 日。

[30]《困勉記》卷 72，1942 年 6 月 6 日。

[31]《困勉記》卷 72，1942 年 6 月 16 日。

[32]《史迪威日記》，1942 年 6 月 19 日，前引書第 105 頁。

[33] 熊式輝文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藏。

[34]《戰時外交》(三)，第 145 頁。

[35]《宋子文致蔣介石急電》(1942年5月9日)：「軍部密告，接史梯威電，羅卓英離軍隊遁寶〔保〕山。」見林孝庭等編：《胡佛研究所所藏蔣介石、宋子文往來電稿》，初稿，未刊。

[36] 熊式輝文件，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藏。《戰時外交》(三)第603—604頁所載文字有小異，此據熊式輝文件引。

[37] 宋子文文件，胡佛研究所藏，第60盒。

[38] 宋子文文件，胡佛研究所藏，第60盒。

[39] 宋子文：《加碼呈委員長電》，1942年5月19日，林孝庭等編：《胡佛研究所所藏蔣介石、宋子文往來電稿》，初稿，未刊。

[4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同上

[41]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12日。同上。

[42] 《作戰經過》(三)，第514—515頁。

[43] 同上。

[44]《戰時外交》(三)，第168頁；參見《史迪威日記》，1942年6月26日，前引書第109頁。

[45]《戰時外交》(三)，第613頁

[46]《戰時外交》(三)，第171—175頁。

[47]《史迪威日記》，1942年7月1日，前引書第110—111頁。

[48]《戰時外交》(三)，第608—609頁。

[49]《戰時外交》(三)，第609—610頁。

[50]《困勉記》卷73，1942年7月4日。

[51]《戰時外交》(三)，第611頁。

[52]《戰時外交》(三)，第611頁。

[53]《困勉記》卷 73，1942 年 7 月 18 日。

[54]《戰時外交》(三)，第 615 頁。

[55]《困勉記》卷 73，1942 年 7 月 22 日。

[56]《困勉記》卷 73，1942 年 7 月 25 日。

[57]《困勉記》卷 73，1942 年 7 月 25 日。

[58]《困勉記》卷 73，1942 年 7 月 26 日。

[59] 《戰時外交》(三)，第 614 頁。

[6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 年 7 月 30 日，前引林孝庭等編未刊初稿。

[61]《困勉記》卷 73，1942 年 7 月 30 日

[62] 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團結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5—296 頁。

[63]《作戰經過》(三)，第 515 頁。

[64]《困勉記》卷 75，1942 年 12 月 11 日。

[65] 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第 272—273 頁。

[66]《作戰經過》(三)，第 355、357 頁。

[67]《戰時外交》(三)，第 211 頁。

[68]《困勉記》卷 76，1943 年 2 月 7 日。

[69]《困勉記》卷 76，1943 年 2 月 8 日。

[7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 年 2 月，前引林孝庭等編初稿。

[71]《史迪威日記》，未註明日期，前引書第 175 頁。

[72]《戰時外交》(三)，第 224—226 頁。

[73]《戰時外交》(三)，第 226 頁。

[74]《戰時外交》(三)，第 236 頁。

[75]《戰時外交》(三)，第 227 頁。

[76]《戰時外交》(三)，第 228 頁

[77]《戰時外交》(三)，第 229—230 頁、

[78]《戰時外交》(三)，第 231 頁。

[79]《戰時外交》(三)，第 232 頁。

[80]《困勉記》卷 78，1943 年 5 月 18 日。

[81]《戰時外交》(三)，第 234 頁。

[82]《戰時外交》(三)，第 236 頁。

[83]《困勉記》卷 78，1943 年 5 月 22 日。

[84] 轉引自《古達程渝來電》，1943 年 5 月 27 日，宋子文文件，第 58 盒。

[85] 轉引自《古達程渝來電》，1943 年 6 月 21 日，宋子文文件，第 58 盒。

[86]《史迪威日記》，1943 年 6 月 28 日，前引書第 187 頁

[87]《困勉記》卷 78，1943 年 6 月 28 日。

[88]《史迪威日記》，1943 年 6 月 28 日，前引書第 187 頁；《戰時外交》(三)，第 628 頁。

[89]《史迪威日記》，1943 年 6 月 28 日。

[90]《困勉記》卷 78，1943 年 6 月 28 日

[91]《困勉記》卷 78，1943 年 6 月 29 日。

[92] 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第 301 頁。

[93]《作戰經過》(三)，第 516—517 頁。

[94]《戰時外交》(三)，第 630—631 頁。

[95]《史迪威日記》，1943 年 9 月 18 日，前引書第 200 頁。

[96]《困勉記》卷 80，1943 年 9 月 21 日。「恣職」二字，疑有誤。

[97]《困勉記》卷 80，1943 年 9 月 6 日。

[98]《戰時外交》(三)，第 632 頁。

五　蔣、史衝突轉化為蔣、宋衝突

在羅斯福的推動下，邱吉爾勉強同意實施攻緬計劃。其內容為：於 1943 年雨季結束後自印度對緬甸西北部進行陸空有力攻勢作戰，中國軍隊由雲南進攻，同時以海、陸軍攻襲緬甸海岸。[1]5 月 26 日，羅斯福將關於此項決定的通知書交給宋子文。29 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要他提醒羅斯福，陸軍對北緬進攻與海軍對仰光進攻，務須同時行動。8 月 18 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邱吉爾，告以雨季將過，不能再事遷移。同月，羅、邱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開會，決定在未來的乾燥季節中，反攻緬甸，同時決定成立東南亞戰區統帥部，以英國海軍中將蒙巴頓為統帥(旋升大將)，史迪威為副統帥。

1943 年 9 月，宋子文鑒於英美聯軍對日攻勢漸趨積極，認為有調整與英美軍事關係的必要。他設計了兩項調整方案：(一)最高級的組織，如華府的聯合參謀團及支配軍械委員會，均應有中國代表參加。供給中國

的軍械，由中國直接申請，毋須史迪威或其它駐中國的美國軍官過問。(二)史迪威即行撤調，同時改組中國戰區。以蔣介石為最高統帥，美國將領為副統帥；以中國將領為參謀長，以美國將領充副參謀長，統帥部各處長、副處長均以中美軍官分任。[2] 宋計劃先與羅斯福總統作原則上的討論，在 10 月偕同美國陸軍次長麥克洛來渝時，再與蔣商量決定。

9 月 16 日，宋子文會見美國總統助理霍浦金斯，霍贊成宋所擬調整方案，並稱：在參加聯合參謀團及改組戰區大前提之下，更換史迪威輕而易舉，史汀生雖反對亦將無效，馬歇爾也不像以前那樣對絕對維護史迪威。[3] 同月 29 日，宋、羅見面。事後，宋子文電蔣匯報：美方同意撤換史迪威，調整中國戰區，在華盛頓另組包括中國在內太平洋軍事參謀團。電稱：本人將陪同蒙巴頓到重慶，向蔣報告國際情形，並洽商蔣與羅斯福、邱吉爾會晤問題。[4]10 月，宋子文偕蒙巴頓及美國後勤部長薩默維爾中將來華。薩默維爾是美方預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還在途經印度德裡時，宋子文就對薩透露說：「事情正在成功，他與大元帥（指蔣介石）一同進行了謀劃。」[5]他完全沒有想到，蔣介石會改變主意。

10 月 2 日，蒙巴頓等向蔣介石轉呈邱吉爾致蔣介石密函及魁北克會議決議。同月 11 日，蔣介石與宋子文談話，宋向蔣談了他自己對史迪威的不滿，當日蔣日記云：「子文能自美國轉印度回國，報告史迪威言行。烏呼！史氏真卑劣小人，無恥極矣！」[6]顯然，這時，蔣宋在對史迪威的態度上仍是一致的。同月 14 日，蔣開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問題，一是去史之後的代替人選，一是撤換史迪威的可能性。蔣認為：美國人員

中無人適合出任東南亞戰區副統帥，也無人能出任駐華美軍主任。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非常袒護史迪威，美國政府未必決心將其撤換。[7] 這樣，蔣介石原來的決心就動搖了。

10 月 16 日，薩默維爾將蔣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一事告知蒙巴頓，蒙巴頓強烈反對。他說：如果指揮中國軍隊兩年之久的官員（指史迪威—筆者）在軍事行動前夕被免職，他無意於使用中國軍隊。蒙巴頓委託薩默維爾將他的觀點轉達給蔣介石。[8]同日　蔣介石與薩默維爾談話稱：「史氏到華一年半以來，彼雖努力，然總勿能與我軍合作，殊為遺憾。至於去留問題，余不作主張，惟望美國政府重加考慮而已。」[9] 談話之後，蔣介石決定，「只要史氏能悟改，則以不撤換為宜」。他囑咐宋美齡詢問史迪威本人，同時，與宋子文談話，將新決定告訴他。二人之間發生激烈衝突。宋堅持原見，反對蔣改變主意，憤而宣稱「不能與蔣共事」，並指責蔣：「你又不是野蠻人，為何說話不算話！」蔣則怒而逐宋離開。據唐縱日記稱：「宋部長不知因何使委座見氣，委座摔破飯碗，大怒不已，近年來罕睹之事。」[10]。當晚，蔣與宋美齡談話，日記云：「史氏已表示悔過改善，余當宥之，不可再聽子文之言，堅持撤換矣！」[11]17 日，蔣介石本人通過宋美齡約史迪威談話，告訴他：「如被撤職回美，個人之損失太甚。如能悔過改善，或可轉回庶宥。」據云：「史乃完全自認錯誤，並表示澈底改過，余乃允而宥之。」[12]又云：「彼果已悔悟，表示絕對服從，不再違令，當可信也。此於國家抗戰之成敗得失，所關豈淺哉！」[13]

1931 年，蔣介石與胡漢民發生衝突，一怒之下，將胡漢民軟禁於南京湯山，汪精衛、孫科等因而在廣州另立政權，引起國民黨內長達五年的寧粵之爭。蔣擔心撤換史迪威會嚴重影響中美關係，帶來新的巨大災難，日記云：「史迪威去留問題，為本周最重要之一事。宋子文力主去史，余之既定方針，幾乎被子文搖撼，最後幸能自動補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關係與戰局影響一大轉機，否則其危有甚於二十年時對胡漢民案者也。不能再為子文造成大禍。乃知安危禍福，全在最後五分鐘幾微之間也。此後應益戒懼。」[14] 18 日，蔣介石再次會見薩默維爾，向他通報自己允許史迪威「悔過自新」的新決定，據稱：薩「欣然甚感余寬大為懷之精神」。但是，蔣對宋卻餘怒猶存，當日，蔣日記云：「此事子文大不以為然，彼竟不顧大體，不知余之苦心，可恨孰甚！」[15]21 日，薩默維爾向蔣告別，蔣察言觀色，覺得薩的詞色與初見時大不相同，感到安慰。當日日記云：「此與余不被子文所脅制，而允史迪威之自新大有關係也。」[16]

蔣宋關係中曾多次發生矛盾，蔣在日記中指責宋子文也屢見不鮮，但是，指責宋子文「可恨」，卻並不多見。處於局外的唐縱記載說：「日來委座火氣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17]

蔣介石對史迪威態度的轉變既與他擔心影響中美關係，損害抗戰大局有關，也是宋藹齡、宋美齡姊妹共同斡旋的結果。據史迪威自述：他曾經向這一對姊妹談過當時中國軍隊的真相，使她們非常震驚；也曾經研究過改革的辦法——讓宋美齡代替何應欽，出任軍政部長。於是，史與這

一對姊妹「訂了攻守同盟」。[18]10 月 17 日晨，宋美齡打電話給史迪威，聲稱宋靄齡認為「仍有個轉敗為勝的機會」。史表示「不想呆在不受歡迎的地方」。於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談起『中國』和職責來」，要史」大度一些，堅持一下」。宋靄齡對史稱：「你的星正在升起」，闖過這件事，你的地位就會比從前更為穩固。姊妹二人表示，將代史見蔣，對他說，史只有一個目標，即中國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錯誤，那也是由於誤解而非有意，史準備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二人的堅持下，史點頭同意，宋美齡表示「那我們馬上就去做」。其後，史迪威見蔣，其情況，據史自述：蔣「改變了立場，演起了戲，竭力顯得態度和解。他說了兩點：1、我應該明白總司令和參謀長的職責。2、我應該避免任何優越感。這全是廢話，但我有禮貌地聽著。蔣介石說，在此條件下我們可以和諧地再次繼續合作。」[19] 20 日，宋靄齡向史解釋說：「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國的利益之間作出選擇。」「我們已經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蔣介石），並讓他來了個 180 度的大轉彎。她認為這是一個大勝利。宋靄齡保證，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強，將來不會再有進一步的進攻」。

蔣介石改變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擊」。[20] 但是，蔣自感對宋的態度也有不妥之處。10 月 24 日，蔣介石日記云：「本周以宋子文橫暴，觸餘憤怒，實近年來未有之現象，此乃修養毫無成效之徵象也，自慚之至！」[21] 31 日，日記再云：「子文言動，令人憤怒，自不為過。然余之暴戾無狀，不能逆來順受，是毫無修養之征也。何以自解？」[22]11 月 6 日，日記又云：「宋子文夜郎自大，長惡不悛。二十年來，屢戒屢恕，終不能使之覺悟改過。彼之野心難馴固矣，然余無感化之力，

不能不自愧也。」[23] 這一段時期，蔣介石不見宋，宋也不見蔣。11 月 16 日，宋子安出面調解，要求蔣召見宋子文一次，遭到蔣的拒絕。日記云：「彼誠幼稚而天真之人也。」[24]最後，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 月 23 日，宋子文致函蔣介石，自稱兩月以來，獨居深念，自感「咎戾誠多，痛悔何及」。接著，闡述與蔣的關係「在義雖為僚屬，而恩實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勵者，惟知效忠鈞座，以求在革命大業中，略盡涓埃之報」。信件著重說明抗戰以來，自己「無論在國內、國外，惟知埋頭苦幹，秉承鈞座指導，為爭取勝利，竭其綿薄」，但因「個性愚戇，任事勇銳，對於環境配合之考慮，任事每欠周詳；甚或夙恃愛護過深，指事陳情，不免偏執而流於激切」。信件自承在蔣前無禮、「粗謬」、「頑鈍」，要求蔣「曲予寬容」。函稱：「此誠文之粗謬，必賴鈞座之督教振發，而後始足以化其頑鈍，亦即文於奉教之後，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鈞座琢磨之厚。今文以待罪之身，誠不敢妄有任何瀆請，一切進退行藏、均惟鈞命是聽。伏乞俯鑒愚誠、賜以明示，俾能擇善自處，稍解鈞座煩憂、則文此身雖蒙嚴譴，此心轉可略安、而曲予寬容。文無論處何地位、所以圖報鈞座之志始終不渝、尤必與青天白日，同其貞恆。」[25] 宋子文的這份「悔過書」打動了蔣介石。12 月 24 日，蔣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後，始終未准其相見，今日彼來函，表示悔悟，求見迫切，余乃從親戚與內子之懇切要求，並為慰岳父母之靈，允於孔寓與之相見，當觀其以後事實如何，如果能真誠覺悟，則公私皆蒙其福矣。」[26] 26 日，蔣介石日記云：「對子文訓斥以後，拒而不理者已逾兩月。

本周得痛切表示之悔書，乃於聖誕前夕，准予相見，亦以其為西安共同患難之關係也。」[27] 31 日，蔣介石年末反省，日記云：「本年修養，雖較進步，然暴戾傲慢之氣，仍未能減除，對張道藩、文白、孫哲生、陳辭修、宋子文、董顯光等各種行態，尤為粗暴失態。雖子文、辭修之驕橫跋扈，自應斥責，而其他同志則不過愚拙無能，實為無心之過，是余指導無門之所致也。乃不責己而責人，是為本年最大之羞慚。」[28]

六、史迪威的「除蔣」計劃與美方掌握中國軍權的圖謀

蔣介石留用史迪威，雙方和解，固然與史迪威模模糊糊地承認錯誤有關，但關鍵原因還在於緬北雨季即將結束，中國軍隊計劃反攻緬北，不能臨陣換將。

10 月 19 日，蔣介石在重慶黃山官邸召集會議，蒙巴頓、史迪威及何應欽等出席。史迪威對中國軍隊參與反攻緬甸的計劃作了介紹，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迪威日記云：「『花生米』現在又討人喜歡了。」[29] 與之相應，蔣對史的印象也有改變。11 月 24 日，蔣日記云：「史迪威態度改變甚速，表現頗好，是亦感召之力乎？幸未為子文所脅制，否則，必得相反之惡果。[30] 不過，蔣介石看到的只是一時的現象。

美國軍部早就密令史迪威「應利用一切機會，統率中國軍隊」。[31] 11 月 22 日　史迪威隨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期間，史迪威準備了一份與

羅斯福的談話資料，中云：「無論蔣介石作何承諾，我們如不將掌握中國軍隊之權，早獲明文規定，所有努力均將成為廢紙。」[32] 但當日史、羅見面時，史未獲提出機會。12 月 6 日，史迪威會見羅斯福，羅問史：「你以為蔣能維持多長時間？」史答：「局勢很嚴重，日本人再來一次 5 月份的那種進攻就會把他推翻。」羅斯福稱：「好吧。那我們就該找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繼續幹下去。」[33] 12 月 12 日　史迪威自開羅回重慶，途經昆明。本日，與其助手多恩（Frank Dorn，或譯竇恩）上校談話。[34] 其內容，據多恩回憶：史迪威聲稱奉上官密令，對蔣實施暗殺。事後，多恩擬具辦法三種：用毒、兵變、墮機。史迪威選擇最後一種，令其準備，候令實行。[35] 此後，暗殺計劃始終沒有付諸實施。但是，史迪威愈來愈明確地認為：「中國問題的藥方是除掉蔣介石。」[36] 「他們所應該做的是打死大元帥和何（應欽）以及這幫人中的其他人。」[37]

開羅會議中，蒙巴頓提出了一項在北緬作戰的計劃，蔣介石向羅斯福及邱吉爾陳述：攻緬勝利關鍵在於海軍與陸軍配合作戰，同時發動，掌握制海權，阻絕日本的海上補給線。[38]24 日，邱吉爾向蔣表示，英國海軍須至明年 5 月，才能在南緬登陸，這使蔣大為失望。[39] 次日，羅斯福向蔣介石保證，北緬作戰時，英海軍必提早在南緬登陸。[40]蔣介石對邱吉爾已完全失去信任，認為「英人無論軍事與經濟，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但他為了不給英方今後提供推諉借口，勉強表示同意蒙巴頓的北緬作戰計劃。[41] 30 日，蔣介石在歸途經過印度藍姆伽，視察史迪威指揮部與鄭洞國軍部。鄭早就感到，史迪威及其美國同事不願他過問軍事，不允許中國師級將領行使前線指揮權，事事要由美國人

決定，因此向蔣訴苦，稱史迪威視之如傀儡，不給他絲毫指揮權。[42]同日，蔣與廖耀湘、孫立人談話，認為蒙巴頓、史迪威對中國軍隊的批評「皆非事實」，而且史迪威的指揮戰略也「甚不當」。蔣並立即召見史迪威的參謀長白克，「據實用地圖指正其誤，並囑轉告史氏改之」。[43]

開羅會議結束後，羅斯福、邱吉爾與斯大林於 11 月 28 日又在德黑蘭會集會，斯大林表示，在打敗德國後，將對日作戰。英國對在緬甸作戰本來就沒有多大興趣，便借此機會企圖取消原來在緬甸作戰的承諾。12 月 7 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說明德黑蘭會議希望在 1944 年末結束對德戰爭，需要大量巨型登陸艦艇，詢問可否將對緬甸的總反攻計劃推遲到 1944 年 11 月。[44]蔣介石覺得此為羅斯福與斯大林的決定，已無法更改，只能表示同意，但提出中國經濟危機較軍事尤為緊急，要求美國貸款 10 億美元，用以支持中國繼續抗戰。

羅斯福雖然有將總攻緬甸延期的打算，但並未最後決定，因此，史迪威仍在作及早攻緬的努力。12 月 14 日，史迪威到重慶，企圖說服蔣介石，談話很不愉快。蔣介石日記云：「此人之神態與見解引人不快。嗚呼凡事靠己，必須我能加強本軍為第一義也。」[45]15 日、16 兩日，蔣、史二人反覆討論攻緬戰略。據史迪威日記，史向蔣反覆說明「放棄進攻緬甸的可能後果」，蔣則表示：「我們不能冒在緬甸失敗的危險，那對中國人所產生的後果將極為嚴重」，以致史在日記中怒罵：「這個小畜牲根本不想打。」[46] 據史迪威稱，宋藹齡和宋美齡也同時出面勸說，宋美齡甚至向史宣稱：「昨天夜裡她祈求了他」，「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殺了

他」。16日，再次開會討論，蔣稱：「我們只有1%的獲勝希望。」「除非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兩棲行動，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又稱：「如果我們採取守勢而讓日本人進攻的話，我們獲勝的機會就會多一點。」[47]據蔣介石日記，史「竭力慫恿如期攻緬」，但蔣「決心展期至明秋為止」。日記稱：「此人既無軍事常識，更無政治常識，余應表示展期之決心，勿使其再為我害也。」[48]此際，1942年遠征軍初戰失敗仍像夢魇一樣壓在蔣的心頭。蔣日記云：「為攻緬展期問題，內外阻力甚大，如余無堅定決心，則此舉必被根本動搖，將蹈去年失敗覆轍矣。」[49]他擔心如攻緬再敗，則昆明不保，空運根據地全失，國際通道斷絕，國內軍心，民心動搖，將更為美、英、蘇所輕侮。蔣估計，最多不過兩年，太平洋大戰必將爆發，「屆時，如中國兵額未足，毫無精強部隊參加決戰，則我國地位絕無矣。故此僅有之資本，決不願再作浪費，而被英國之欺弄，致我國於萬劫不復矣」。[50]17日，蔣介石復電羅斯福，聲稱如登陸部隊所需戰艦及運輸艦不能按原計劃集中，則陸海的全面攻勢延期至明年11月，一舉殲滅在緬日敵，較為妥適。[51] 不過，蔣介石並不反對局部攻緬。

10月18日，蔣介石在重慶召見史迪威，佈置自印度東北的列多（力多、立多）向北緬進攻的作戰方針。19日，蔣介石與蒙巴頓、史迪威開會，確定以 12 月中旬為期，攻取緬北。蔣並且表示同意由蒙巴頓指揮全部在緬作戰的中國部隊，史迪威為副。[52] 會議結果使史迪威欣喜若狂。他在日記中寫道：「有史以來頭一次。大元帥授予我指揮使用（中國駐印軍）部隊的全權，沒有繩索——他說沒有干預，那是『我的部隊』，給了我解除任何一名軍官職務的全權。」在給史迪威夫人的信中，他也

表達了同樣的欣喜，甚至哼起了歌曲：「叮叮噹，叮叮噹，鈴兒響叮噹，聖誕節多快樂，我們坐在吉普上。」[53] 第二天，史迪威即飛返緬甸，轉赴列多，與新編第 38 師師長孫立人研究作戰計劃。其後，駐印軍在胡岡河谷、孟拱河谷等地迭獲勝利。

蔣介石所同意動用的只是中國駐印軍，但是，在雲南，還有另一支待命進攻緬北的遠征軍。12 月 21 日，羅斯福又致電蔣介石，要求中國駐滇部隊向北緬作戰，以支援英、美部隊由印度向北緬的進攻。蔣介石仍然覺得沒有海軍從緬南配合，並登陸協助，乃是自取滅亡之道。12 月 23 日，蔣介石復電羅斯福，重申開羅會議南北海陸軍同時發動的意見，批評「盟軍戰略置中國戰區於不顧」，聲稱中國駐印遠征軍已交給蒙巴頓、史迪威指揮，不能同意駐滇遠征軍再行出動。[54] 1944 年 1 月 15 日，羅斯福再電蔣介石，要求出動滇西部隊，盡力進逼，配合蒙巴頓。3 月 20 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說明緬甸形勢已經發展到一個重要階段，要求滇西遠征軍前進至騰沖及龍陵地區，以配合駐印遠征軍奪取緬北重鎮密支那。[55]。當時，蘇聯空軍與外蒙軍隊入侵新疆，正在與中國軍隊對峙。27 日，蔣介石復電羅斯福，說明中國已抗戰七年，國力、兵力均極疲憊，在新疆未安定，中國正面戰場對日軍的防線未有把握之時，中國主力軍不可能由雲南發動攻勢。他重申在開羅時對羅的諾言，一旦英軍發動對緬甸的海陸兩棲作戰，中國主力軍必全力攻緬。但是，蔣仍然表示，將盡量抽調雲南部隊空運西線，增強列多方面的作戰力量。[56] 當日，史迪威飛到重慶，蔣介石即批准由滇西空運第 14 師、第 50 師赴印作戰。4 月 4 日，羅斯福再次要求滇西遠征軍佔領雲南邊陲要地騰沖與

龍陵。在電報中，羅斯福不無牢騷地向蔣表示：「去年吾人裝備並訓練閣下之遠征軍，現正當利用此機會。如彼等不能用之於共同作戰，則吾人盡其最大之努力，空運武器與供給教官，為無意義矣。」[57] 此函語含譴責與批評，此前還不曾出現過。5 日，蔣介石日記云：「措辭傲慢，為自直接通電以來第一次也。」他認為，此電必為其軍部所擬之稿，但現在尚非駁斥之時，應暫忍耐。[58] 6 日，宋美齡特約史迪威助手賀恩（Hearn）參謀來談，告以「美國此種壓迫行動，實非中國所能忍受」。7 日，宋美齡致電史迪威，聲稱羅斯福致蔣電，「如此措辭，余恐其將使吾人共同企求之目的未克達成」，希望史設法向華府擬稿人說明，「當此緊要之際，應竭盡全力，以促使吾人共同勝利之早日來臨」。[59]10 日，馬歇爾下令暫時停撥援華軍事物資，至滇西遠征軍出動時再予恢復。蔣介石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囑何應欽答覆美方：中國抗戰與出擊，自有一定計劃，決不為美國武器之接濟與否所轉移」。[60]

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決定調整對緬作戰方針。4 月 13 日，軍事委員會電令滇西中國遠征軍於月底前完成作戰準備，相機攻佔騰沖，策應西線駐印軍攻擊緬北重鎮密支那。17 日，擬定怒江作戰計劃。5 月 11 日，反攻怒江作戰開始。

然而，就在中國遠征軍東西兩路同時出動之際，日軍的「1 號作戰」卻在節節進展。1944 年 4 月，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掃蕩美軍在中國的空軍基地，首先向河南進攻。5 月 25 日，攻陷洛陽。5 月底，日軍開始向粵漢路進攻，蔣介石致電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要他提請美

國軍事當局注意其嚴重性，將成都存油、配件及飛機全部交陳納德作為粵漢路空戰之用。同時，蔣介石兩電召史迪威回渝商量，史迪威均置而不答，蔣深感痛憤，在日記中批評史「誠非可以情義感之」。[61]6 月初，蔣介石自我反省，深悔「去年已決心解除其職務，而復留用」的「失計」，批評自己用人辦事尚為環境所轉移，而關於重要問題皆不能主動自決」。[62] 史迪威早就認為，蔣介石過於重視陳納德的空中打擊力量，忽視陸軍的建設與改造，因此他對中國部隊在河南的失敗並不驚訝，日記稱：「中國的局勢相當糟糕。我相信『花生米』將要為他的愚蠢遲鈍付出重大代價。這個傻瓜蛋，救世軍主動來拯救他，而他卻不接受。現在一切都太晚了，他卻大叫了起來。」[63]6 月 5 日，史迪威到重慶，如他所料，蔣的目的在於要求史迪威同意，為陳納德的第 14 航空隊增加汽油供應。這使史迪威很不屑，在日記中批評蔣說：「他想要整個世界，但又什麼都不想吐出來」。[64] 自然，史迪威拒不加撥。[65]6 月 18 日，日軍攻陷長沙，向粵漢、湘桂兩路交叉點和戰略基地衡陽逼近，情勢更為危急。史迪威於 7 月 2 日致夫人函云：「如果危機到了足以擺脫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毀了整艘船的程度，那就值了。」7 月 4 日，史迪威致電馬歇爾，報告中國戰場危機，要求羅斯福致電蔣介石，「以劇變形勢應采劇烈手段」為理由，迫使蔣將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自己。電中，史迪威並稱：「出兵晉豫以攻漢口，應是扭轉中國局勢之方法，此須使用中共部隊。兩年以前彼等願聽我指揮，今或仍能聽命。」 [66]其實，中共長於敵後游擊戰爭，不會輕易「聽命」於史迪威，匆促去進攻漢口這樣的大城市。

馬歇爾同意史迪威的意見。7 月 6 日，馬備妥電稿，由李海簽呈羅斯福，聲稱「中國局勢近已頹落至可驚之程度」,「目下已到須將中國軍權交與一個人物指揮抗日，使生效果之時，環顧中國政府與其軍隊之中，尚無一人能夠綜持軍力以應日方之威脅,有之即是史迪威。」[67] 7 月 7 日　羅斯福按擬稿致電蔣介石，提出日軍進攻華中，局勢嚴重,「應責任一人，授以調節盟國在華資力之全權，並包括共產軍在內」，同時告以已升史迪威為上將，建議蔣將其從緬甸戰場召回,「置彼於閣下直屬之下，以統率全部華軍及美軍,並予以全部責任與權力,以調節與指揮作戰」。[68] 這一電報雖宣稱將史迪威置於蔣介石「直屬之下」，但實質上是架空蔣介石，賦予史迪威以指揮全部中國軍隊的權力。7 月 8 日，史迪威日記云:「羅斯福給蔣介石去電，喬治・馬歇爾給我來電。他們在我的事情上一直在向他施加壓力。羅斯福要蔣介石給予我指揮的全權。」[69]

七　蔣介石、羅斯福的衝突與史迪威的被召回

宋子文最先得知要蔣介石向史迪威交出全部軍權的消息，因而最先致電霍浦金斯反對，電稱:「今天華盛頓又作出了一項錯誤的決定，陸軍部要強迫蔣接受史迪威將軍」,「我個人可以無保留地向你擔保，蔣委員長在這個問題上決不會而且也不能屈服。」[70] 蔣介石覺得難以硬抗，企圖拖延。7 月 8 日　蔣介石致電在美代表孔祥熙，要他轉呈羅斯福，聲稱「原則」贊成關於史迪威的建議，但中國軍隊及政治情況複雜,「必須有一準備時期」，建議羅派私人代表來華，調整蔣與史迪威之間的關

係，增進中美合作。[71] 羅斯福看出了蔣意在拖延，於 15 日復電蔣介石催促，表示形勢「需要有一迅速之處置」，盡早向史迪威交權。[72]7 月 16 日　蔣介石日記云：「抗戰局勢，至今受美國如此之威脅，實為我夢想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猶豫之時間，必欲強派史迪威為中國戰區之統帥，以統制我國。如余不從其意，則將斷絕我之接濟，或撤退其空軍與駐華之總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誘敵深入，以致中國之速亡，其計甚毒。」[73] 8 月 6 日　蔣日記再云：「最近內外形勢之壓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國在精神上無形之壓迫更甚。彼必欲強余無條件與共黨妥協，又欲余接受其一史迪威為總司令，此皆於情於理不能忍受之事。」[74] 可見，蔣對羅雖表面順從，而內心卻充滿強烈的對抗情緒。19 日，蔣介石聽說羅斯福將派美軍副參謀長來華面遞公文，估計必是催逼自己委派史迪威指揮對華軍事，對羅斯福更加怨憤，日記稱：「自本年七七以來，羅斯福對華已竭盡威脅壓迫之能事矣。」[75] 但是，蔣介石一時還不敢得罪羅斯福，與戴季陶、陳佈雷研究後，決定「暫用妥協政策為宜」。[76] 7 月 23 日，蔣介石兩電孔祥熙，要他當面向羅斯福陳述：蔣對羅的主張「原則上表示接受而毫不躊躇」，但實行上不可無「程序」，「須有一相當之準備時期」；羅所稱指揮全部華軍，應指在國民政府統轄下在前線的作戰部隊，其指揮範圍與辦法，應另行規定。要孔特別說明：「抗戰七年，而中國全國國民之所以百折不撓者」全為求得國家之獨立與自由，保障國家之尊嚴」，意在含蓄地指出羅斯福主張之不當。關於租借物資支配權，蔣提出：應完全歸於中國政府或最高統帥，但可授予史迪威「考核監督之權」。[77]

羅斯福不容蔣介石拖延，於 8 月 10 日致電蔣介石，聲稱中國戰場形勢危急，授予史迪威全部指揮權一事「必須立即行動」，同時提出，將派曾任陸軍部長、中東特使的赫爾利為私人代表來華，調整蔣、史關係。至此，蔣介石已不能閃躲。同月 14 日，蔣擬任命史迪威為「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兼中美聯軍前敵總司令」，並擬在復羅電中表示「余已積極準備，甚望其能於短期內可以順利實現」。[78] 蔣既鬆動，羅斯福也不想使中美關係弄得很僵。於 8 月 23 日致電蔣介石，繼續催蔣盡早採取必要的措置，讓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電稱：「稽延之思考及審慎之部署，於此軍事嚴重之時，容有嚴重之後果。」同時，羅斯福也表示，正擬訂新程序，使史迪威不再負責撥發租借物資。[79] 這通電報，意在進一步催逼，但也有所讓步。

9 月 6 日，羅斯福特使赫爾利與納爾遜抵達重慶。9 月 9 日至 11 日，宋子文、何應欽與赫爾利、史迪威、納爾遜談話。其間，宋子文根據蔣介石指示，堅持美國租借物資到達中國後應交中國政府處理，聲稱「必須記住一個大國的尊嚴」，但史迪威、赫爾利均反對。[80]赫爾利指斥宋子文「胡說」，對宋稱：「記住，宋先生，那是我們的財產，我們生產的，我們擁有他們，我們願意給誰就給誰。」[81] 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如果大元帥控制了分配權，我就完了。共產黨人將什麼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帥的親信才能得到物資，我的部隊（遠征軍）將只能去舔別人的屁股。」[82] 12 日　宋子文向蔣介石報告，赫爾利、史迪威不願交出租借物資支配權，蔣稱：「此事非堅持不可。」[83] 同日　赫爾利與納爾遜拜會蔣介石，給蔣的印象是「言辭雖婉而意甚嚴」。他認為，抗戰以來，舉凡軍

事挫折、經濟疲睏、「共匪猖獗」、政治惡化等各種問題，都是美國的「粗疏盲昧、無端詆毀」的結果。對於談判再三而美國仍不願將援華物資交給自己支配，以及不願就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一事訂立協定，蔣介石猶感惱怒，再次萌生「獨立應戰」的想法，日記云：「對余之侮辱欺妄，竟至於此。故余決據理力爭，不能再事謙讓，並須預作獨立應戰之準備，以防萬一也。」[84] 9 月 16 日，美國大使高斯對蔣介石稱：「希望將來中國在和會中能代表中國與亞洲，不失為四強之一之資格。」蔣自稱聽了這段話以後，有如「利刃刺心」，在《反省錄》寫道：「若不自力更生，何以立國？何以雪恥，而史迪威之刁難輕侮，更令人難堪。」[85]

史迪威所指揮的中國駐印軍迭獲勝利。8 月 5 日，駐印軍攻克密支那。但是，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也進展迅速。9 月 12 日，日軍攻佔廣西全州，威脅桂林、柳州。滇西方面，遠征軍於 9 月 14 日克服騰沖，與盤據龍陵的日軍則陷於苦戰狀態。9 月 15 日，蔣介石要求史迪威命令駐印軍乘勝進攻緬北的另一要地八莫，以此策應滇西遠征軍，否則，即擬將遠征軍撤回怒江以東，保衛昆明。史迪威聲稱，在密支那的中國遠征軍需要休息，建議蔣調在陝西監視陝北的胡宗南部來援，同時反對滇西遠征軍撤回怒江以東。他在日記中斥責蔣介石為「瘋狂的小雜種」,「一如既往的荒誕理由和愚蠢的戰略戰術觀念。他很難對付而又令人討厭。」[86]事後，史迪威緊急電告馬歇爾，聲稱「長江以南的災難主要是由於缺乏適當的指揮和照例的遠在重慶的遙控。麻煩仍然來自最高當局。」[87] 18 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認為日軍進攻中國東部是「詭計」，要求蔣介石立即補充緬北部隊並且立即派遣生力軍，協助怒江方面的中國軍

隊。該電同時嚴厲批評蔣延擱委任史迪威指揮中國所有之軍隊，以致損失中國東部的重要土地。羅斯福以威脅的口吻稱：「務希立採行動，方能保存閣下數年來英勇抗戰所得之果實，及吾人援助中國之計劃。」「不然，則在政治上及軍事上種種之計劃，將因軍事之崩潰而完全消失」。[88]這通電報有如最後通牒。史稱讚說：「這一槍打中了這個小東西的太陽神經叢，然後穿透了他。這是徹底的一擊。」[89]19 日，史迪威向蔣面交此電，蔣只說了一句話：「我知道了」，但內心憤怒異常，日記云：「實我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今年七七接美總統羅斯福侮辱我國之電以後，余再三忍辱茹痛，至今已有三四次之多，然尚可忍也。今日接其九一八來電，其態度與精神之惡劣及措辭之荒謬，可謂極矣。」[90]20 日，蔣介石對赫爾利、納爾遜說：「中國軍民恐不能長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為中美兩國合作之障礙也。[91]

赫爾利來華後，曾與史迪威長談。史稱：自己與蔣之間，兩人個性均極強硬，工作上不免發生困難。今後願意接受蔣之命令。關於援華租借物資，赫批評史全面操控的做法，史同意今後全部交蔣支配。關於中共問題，史提出由彼提出調整方案，國共兩黨彼此諒解，將中共以及中央用以防共的部隊，均調出抗戰。赫稱此為中國內政，吾人雖盼中國統一，但只能以「純客觀之立場贊助中國政府解決中共問題」，使所有中國抗日部隊均聽命於蔣的指揮。24 日，赫爾利會見蔣介石，匯報與史晤談情況。蔣稱：羅斯福關於將中國軍隊交史迪威指揮提議，出於好意，有利中國，但「軍隊乃國家命脈，而軍隊之指揮權，乃操國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自己不能不慎重處理。蔣要赫爾利轉告羅斯福：「有三點不能稍事

還就：1、三民主義不能有所動搖，故不能任共產主義之赤化中國。2、國家主權與尊嚴不能有所損失。3、國家與個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強制式之合作也。」[92] 蔣稱：已對史迪威「失去最後一分之希望與信心」，希望美國另派人員來華。宋子文當即配合，聲稱美國派任東南亞的盟軍總部某參謀長，即可勝任。[93] 25 日，蔣介石命宋起草致赫爾利備忘錄，表示同意美方遴選將領一員為中美聯軍前敵總司令，兼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備忘錄稱，自赫爾利來華後，本人曾不顧以前之感覺與判斷，考慮以史迪威為前敵總司令，但「史將軍非但無意與余合作，且以為受任新職後，余將反為彼所指揮，故此事因而中止」。[94]

蔣介石拒絕羅斯福的意見，自知事關重大，中美關係有破裂的危險，準備恢復「獨立抗戰」。9 月 26 日．蔣介石致電在美國的孔祥熙與宋美齡，聲稱羅斯福來電「其措辭實不堪忍受，余對其來電決置之不復。」「吾人如再恢復獨立抗戰之態勢，則對內政與軍事情勢，決不能比現在更壞。只要內容簡單，無外力牽制，則國內一切措施方能自如，決不如今日皆受人束縛之苦也。史決難再留，如有人來說情，應嚴正拒絕，並請其從速撤換，以免阻礙今後之合作也。」[95] 27 日　蔣介石日記云：「自史迪威由印回渝，半月以來，彼即作有計劃有系統之威脅宣傳：一則曰，彼即離渝回美，再則曰，共黨要求其赴延安，三則曰，彼擬飛往延安，四則曰，第十四航空大隊將完全撤退。五則曰撤退駐渝美軍總部人員。以上種種荒謬言論，無非欲余將華軍指揮權，無條件交彼而後已，而美國國內亦對華軍作種種不堪之妄報，遂使其國人對華輕視，以為中國真至絕望之境矣。即以羅斯福上周在記者招待會上對華軍事不滿之表示，更

可見非達到統制中國之目的不可也。若不決心據理力爭，將何以遏制其野心而暴露其陰謀乎！」[96] 28 日　蔣介石致電在華盛頓的孔祥熙，囑咐他今後不可再向美國要求任何物品，以免為人輕視，並要求他迅速離美回國。這時候，蔣已經作了和美國斷絕外交關係的準備。30 日，他在《本星期反省錄》中寫道：「美國態度之惡劣已至極點，如其再不自悟，惟有出於絕交之一途。」「萬不料參加同盟戰爭，竟得此惡果與窘境。」[97]

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雖是弱國，但是，中國畢竟是大國，是抗擊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主要力量。蔣介石既然寸步不讓，美國不願丟掉中國這個戰略夥伴，就只有向蔣讓步了。10 月 6 日　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表示接受蔣的建議，解除史迪威的參謀長職務，命他不再負責租借物資，但羅堅持，為保證中印空運，仍須史負責指揮在緬甸及雲南的中國軍隊。[98]10 月 7 日　蔣介石接見赫爾利，拒絕羅斯福建議，聲稱史迪威既不能服從命令，又缺乏與中國合作精神，故不能再委以指揮中國戰區任何軍隊之名義與職務，要求美方另派人員。蔣並擬就致赫爾利的說明文稿和答覆羅斯福電稿，當場由宋子文口譯。[99] 8 日　蔣介石約陳佈雷談話。陳認為羅斯福適可而止。蔣不贊成，表示：「應已要求撤回為唯一目的。」同日，孔祥熙也致電蔣介石，說明羅斯福召集美國陸海軍首腦商談，軍方對撤換史迪威頗多顧慮，馬歇爾又對史極為支持，史現升四星上將，與麥克阿瑟、艾森豪威爾權位相等，如另派他人，至為難得等為理由，要求蔣令史辭去中國戰區參謀長職務，專心負責滇緬路聯軍軍事。[100] 但是，蔣也不為所動。9 日　蔣介石致電羅斯福，要求調回史

迪威，另換他人。[101]

此際，蔣介石認為對美交涉已至最後關頭，做了最壞準備。他在日記中表示，如羅斯福不改變其現在態度，則不能不準備決裂。在歷史上，蔣在碰到困境時，曾經有過兩次下野的記錄。這次，蔣自稱：「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可為內外形勢惡劣之故而灰心下野，以放棄我革命之責任也。」[102] 10 月 13 日 美國駐華大使高斯會見宋子文，希望留住史迪威，聲稱撤換史將損害羅斯福的威信。宋向蔣匯報，蔣雖感到形勢的「危險與惡劣」，但是，也還是不準備收回決定。[103]10 月 15 日 蔣介石日記云：「當此內外夾攻，困難重重之秋，惟有求其在我，我能自立自強，則一切外物自可迎刃而解也。」[104]

赫爾利來華，本負有勸說蔣介石接受羅斯福決定的任務，但是，他在與蔣的接觸中，卻逐漸被蔣說服。10 月 13 日，他致電羅斯福，聲稱「中國以劣勢裝備之弱國對其強大敵寇，抗戰至七年以上，尚不能使之屈服，則美國對華交涉，決非用壓力與威脅所能奏效」。他力勸羅斯福改變決定，另派能與蔣合作的人員年輕將領來華。電稱：「如我總統支持史迪威將軍，則將失去蔣委員長，甚至還可能失了中國」。[105]自然，羅斯福不願失去中國，只能向蔣妥協。10 月 19 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聲稱現正頒發命令，即將史迪威回國。在一場比賽智慧、比賽意志的較量中，羅斯福敗在蔣介石手下了。蔣介石志得意滿，10 月 22 日 蔣介石日記云：「如果此次請調史迪威不成，則美在東方必演成軍國主義之禍首，是以此舉不僅救我國，抑且救美國矣。」[106]28 日，美國正式發佈調史

迪威回國命令。10 月 31 日，蔣在日記中自誇云:「此實我中國解放之開始。」 [107]

宋子文最早提出撤換史迪威，在蔣改變主意後又因堅持己見而受到蔣的斥責，這時，自然很高興。10 月 30 日，宋子文致宋子安電云:「此次史迪威撤調回國，兄助回合（暗指蔣介石——筆者），出力不少。蓋為糾正一年前歷史上之錯誤也。」[108]

1945 年 1 月 5 日　　美國政府自動撤回史迪威的助手多恩，蔣介石日記云:「此人為史迪威手下第一驕橫侮華之人，美竟撤去，則其援華之誠意又進一步矣。」[109]同年 7 月 8 日，蔣介石想起一年前羅斯福強制自己交出軍權的情況，認為「幾等於宣判中國之死刑，為抗戰以來所未有之恥辱」。」[110]6 月 23 日，史迪威出任美國第十集團軍司令，與日軍在充繩島作戰。 8 月 2 日，蔣介石得知，馬歇爾決定由史率領第十軍由琉球來華登陸，史則倡言「必先倒蔣」。[111]當晚，赫爾利拜會蔣介石，蔣將《史迪威事備忘錄》交赫，囑其轉交杜魯門總統，拒絕史迪威再次來華。[112] 史迪威和中國的關係自此結束。

八　是非討論

史迪威是個優缺點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國通，真心誠意地幫助中國抗日，對中國社會、中國軍隊與蔣介石其人有許多敏銳的認識。遠征軍

第一次緬北作戰失敗後，他在印度訓練中國軍隊，增強了中國軍隊的作戰力。遠征軍第二次緬北作戰勝利，顯然與他的訓練、指揮有關。鄭洞國曾回憶說：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華的軍事將領。在對日作戰問題上，他的態度不僅始終是認真、積極的，而且頗具戰略眼光，在指揮上很有一套辦法。最難得是是他身為異國高級將領，卻毫無官架子，待士兵們十分友善，喜歡同他們交朋友，慢慢贏得了不少中國將士對他的欽敬。」[113] 應該承認，他是對中國抗日戰爭作出重大貢獻的國際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點，例如傲慢、主觀、急躁、偏激，特別是，作為美國將領，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國主義的思想和作風。

蔣史矛盾，開始於戰略分歧。史迪威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際，中國遠征軍剛剛入緬，人地生疏，英國在緬軍隊則根本沒有鬥志，在這種情況下，就急於要求中國軍隊對日軍發起強力進攻，是其不妥之一。蔣介石和中國將領與日軍作戰多年，熟悉日軍的優勢和特點，反對貿然進攻，後來又反對在缺乏盟國有力的支援和協同下由中國軍隊孤立作戰，求穩防敗，有其合理性，但史迪威卻視之為「卑怯」，由此對蔣介石和中國將領的抗日積極性作了過低的估計，是其不妥之二。中國入緬軍初戰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張，未經請示就決定向印度退卻，途中環境惡劣，給養困難，造成部隊非戰鬥減員過大，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責，是其不妥之三。

中國與美國、英國等共同抗擊日本侵略，是同盟國之間的相互配合、相

互支援的關係。蔣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盡可能多地得到美國的援助，但是，同時又不能容忍對中國的任何歧視，要求待遇平等，能和英國、蘇聯等受援國一樣，自己掌握租借物資分配權，也有其合理性。當時，中國有關機構腐敗嚴重，蔣介石又歧視和排斥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部隊，因此，史迪威等應該也完全可以堅持對援華物資分配的建議權和監督權，但是，史迪威等卻堅持援華物資是美國人生產的，必須由美國人分配，中國人無權過問，這就是大國主義的作風了。史迪威批評蔣介石是「一條貪婪、偏執、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其中所說「偏執」姑置不論；說蔣「貪婪」，無非是指蔣對美援的不斷爭取；說他「忘恩負義」，則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賜」心態。

抗戰時期國民黨領導的軍隊確實存在著較多問題，需要訓練和改造，蔣介石對軍隊的指揮也確實有不少問題，需要改進、改革，但是，史迪威作為外國人，不應越俎代庖，大量任用美國軍官來控制和操縱中國軍隊，更不應圖謀全面掌握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甚至制訂暗殺計劃，企圖除去當時還是中國政府和抗日領導人的蔣介石。1943 年 10 月之後，中國軍隊兩面作戰，既需要迎擊日軍旨在打通大陸交通線的 1 號作戰，又需要開闢緬北、滇西戰場，應付為難。在這一情況下，羅斯福聽信史迪威、馬歇爾等人的意見，利用中國軍隊在河南、湖南等地的失敗，要求蔣介石將中國軍隊、中國戰場的全部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自然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軍權是國家權力的核心部分，蔣介石堅決抵制羅斯福的要求，甚至不惜為此與美國決裂，獨立抗日，反映出蔣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成分和他性格中的倔強一面。

宋子文是史迪威來華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議者，為此，他在美國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蔣介石卻臨事而懼，改變主意，由此引起兩人間的巨大衝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蔣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連開羅會議也不讓作為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參加。但是，蔣宋之間畢竟基本觀點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書「悔過」之後，蔣介石就原諒了他。此後，蔣宋合作，共同促使羅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決定。

---

[1]《戰時外交》(三)，第243—244頁。

[2]《戰時外交》(三)，第262—263頁。

[3]《戰時外交》(三)，第265頁。

[4]《戰時外交》(三)，第267頁。

[5]《史迪威日記》，1943年10月21日。

[6]《困勉記》卷74，1943年10月11日。

[7]《困勉記》卷74，1943年10月15日。

[8]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376—377.

[9] 《困勉記》卷74，1943年10月16日。

[10]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第386頁。

[11] 《困勉記》卷74，1943年10月17日。

[12] 《愛記》，1943年10月17日。

[13] 《困勉記》卷 80，1943 年 10 月 17 日。

[14] 《省克記》卷 22，1943 年 10 月 17 日。

[15] 《困勉記》卷 80，1943 年 10 月 18 日。

[16] 《困勉記》卷 80，1943 年 10 月 21 日。

[17]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1943 年 10 月 21 日，第 387 頁。直到 11 月 5 日，唐縱才弄明白所以，見該書第 389 頁。

[18]《史迪威日記》，1943 年 9 月 13 日，前引書第 199 頁。

[19]《史迪威日記》，前引書第 205—206 頁

[20]《史迪威日記》，1943 年 10 月 21 日，前引書第 207 頁。

[21]《省克記》卷 23，1943 年 10 月 24 日。

[22]《省克記》卷 23，1943 年 10 月 24 日。

[23]《省克記》卷 24，1943 年 11 月 6 日。

[24]《愛記》，1943 年 11 月 16 日。

[25] 宋子文文件，第 64 盒。

[26]《愛記》，1943 年 12 月 24 日。

[27]《愛記》，1943 年 12 月 26 日。

[28]《省克記》卷 24，1943 年 12 月 31 日。

[29]《史迪威日記》，1943 年 10 月 21 日。前引書第 207 頁。

[30]《愛記》，1943 年 11 月 24 日。

[31] 史迪威政治顧問（美國國務院所派）戴維斯告友人語，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 年 6 月 8 日，林孝庭等編:《胡佛研究所所藏蔣介石、宋子文電稿》，初稿，未刊。

[32] 轉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2 年版，第 194

頁。

[33]《史迪威日記》, 前引書第 220 頁。

[34]《史迪威日記》, 前引書第 228 頁。

[35]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 New York, Y. Crowell, 1971, pp.75−79. 轉見前引《史迪威事件》, 第 196—197 頁

[36]《史迪威日記》, 時間不明，前引書第 279 頁。

[37]《史迪威日記》, 1944 年 9 月 9 日，前引書第 284 頁。

[38]《戰時外交》(三), 第 537 頁。

[39]《困勉記》卷 81，1943 年 11 月 24 日。

[40]《困勉記》卷 81，1943 年 11 月 25 日。

[41]《困勉記》卷 82，1943 年 12 月 1 日。

[42]《困勉記》卷 81，1943 年 11 月 30 日；參見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 第 296—297 頁。

[43]《困勉記》卷 81，1943 年 11 月 30 日。

[44]《戰時外交》(三), 第 286 頁。

[45]《困勉記》卷 82，1943 年 12 月 14 日。

[46]《史迪威日記》, 1943 年 12 月 15 日。前引書第 230 頁。

[47]《史迪威日記》, 1943 年 12 月 16 日，前引書第 231—232 頁。

[48]《困勉記》卷 82，1943 年 12 月 15 日。

[49]《困勉記》卷 82，1943 年 12 月 16 日。

[50]《困勉記》卷 82，1943 年 12 月 17 日。

[51]《戰時外交》(三), 第 289 頁。

[52]《作戰經過》(三), 第 385—394 頁。

[53]《史迪威日記》，1943 年 12 月 19 日，前引書第 233 頁。

[54]《戰時外交》(三)，第 291 頁。

[55]《戰時外交》(三)，第 296 頁。

[56]《戰時外交》(三)，第 297—298 頁。

[57]《戰時外交》(三)，第 299 頁。

[58]《事略稿本》，1944 年 4 月 5 日。

[59]《事略稿本》，1944 年 4 月 6 日、7 日。

[60]《事略稿本》，1944 年 4 月 13 日。

[61]《事略稿本》，1944 年 6 月 1 日。

[62]《事略稿本》，1944 年 6 月 3 日。

[63]《史迪威日記》，1844 年 6 月 2 日，前引書第 262 頁。

[64]《史迪威日記》，1944 年 6 月 5 日，前引書第 262 頁。

[65]史迪威的助手賀恩稱:「史迪威正想令華東機場失去，以證明其在華府會議中預測之證實。」，見 Way of a fighter, p294. 轉引自《史迪威事件》，第 307 頁。

[66]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380—381.

[67]《史迪威事件》，第 265—266 頁。

[68]《戰時外交》(三)，第 634—635 頁。

[69]《史迪威日記》，1944 年 7 月 8 日，前引書第 267 頁。

[70] 巴巴拉:《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重慶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22 頁。

[71]《戰時外交》(三)，第 637 頁。

[72]《戰時外交》(三)，第 642 頁。

[73]《事略稿本》，1944 年 7 月 16 日。

[74]《事略稿本》，1944 年 8 月 6 日。

[75]《事略稿本》，1944 年 7 月 19 日。

[76]《事略稿本》，1944 年 8 月 19 日。

[77]《戰時外交》(三)，第 645—648 頁。

[78]《戰時外交》(三)，第 651 頁。

[79]《戰時外交》(三)，第 655 頁。

[80]《史迪威事件》，第 278 頁

[81]《史迪威日記》，1944 年 9 月 16 日。前引書第 287 頁。

[82] 同上。

[83]《事略稿本》，1944 年 9 月 12 日。

[84]《事略稿本》，1944 年 9 月 12 日。

[85]《事略稿本》，1944 年 9 月 16 日。

[86]《史迪威日記》，1944 年 9 月 15 日，前引書第 287 頁。引文參考了瞿同祖所譯《史迪威資料》，北京：中華書局 1978 年版，第 121 頁。

[87]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435-436.

[88]《戰時外交》(三)，第 658—659 頁。

[89]《史迪威日記》，1944 年 9 月 18 日，前引書第 289 頁、

[90]《事略稿本》，1944 年 9 月 19 日。

[91]《事略稿本》，1944 年 9 月 20 日。

[92]《戰時外交》(三)，第 675 頁。

[93]《戰時外交》(三)，第 667—671 頁。

[94]《戰時外交》(三)，第 673—674 頁。

[95]《戰時外交》(三)，第 675 頁。

[96]《事略稿本》，1943 年 9 月 27 日。

[97]《事略稿本》，1943 年 9 月 30 日。

[98]《戰時外交》(三)，第 677—678 頁。

[99]《戰時外交》(三)，第 678—679 頁。

[100]《戰時外交》(三)，第 683 頁。

[101]《戰時外交》(三)，第 684 頁。

[102]《事略稿本》，1944 年 10 月 11 日。

[103]《事略稿本》，1944 年 10 月 13 日。

[104]《事略稿本》，1944 年 10 月 15 日。

[10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 1944, Vol.6. p.726. 参見《事略稿本》，1944 年 10 月 21 日。

[106]《事略稿本》，1944 年 10 月 22 日。

[107]《事略稿本》，1944 年 10 月 31 日。

[108] 宋子文文件，第 47 盒。

[109]《事略稿本》，1945 年 1 月 5 日。

[110]《事略稿本》，1945 年 7 月 8 日。

[111]《事略稿本》，1945 年 8 月 2 日。

[112]《事略稿本》，1945 年 8 月 3 日。

[113]《我的戎馬生涯》，第 302 頁。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第 3 集

如何對待毛澤東：扣留、"審治"，還是"授勳"、禮送？
——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的心態考察

抗戰勝利，蔣介石電邀毛澤東"共商大計"

1945 年 8 月 10 日。下午 8 時多，蔣介石做完默禱，忽然聽到設於附近求精中學的美軍總部傳來一陣歡呼聲，緊接著，是噼裡啪啦的炮竹聲。蔣介石問身邊的蔣孝鎮，怎麼回事，為何如此嘈雜？蔣孝鎮回答：聽說敵人投降了。蔣介石心頭一陣驚喜：日本投降了？！他讓蔣孝鎮再去打聽。不久，各方傳來正式報告，日本政府宣佈，除保持天皇尊嚴外，其餘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條件投降。消息證實，日本確實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當時，蔣介石正在宴請墨西哥駐華大使。抗戰勝利，蔣介石有許多事急待決定、處理。偏偏這位大使不識相，不斷提出各種問題，糾纏不休。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兩次提醒，這位大使才很不情願地離去。蔣介石立即召開軍事幹部會議，按照早就擬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戰區發電，並令吳鐵城、陳佈雷提出宣傳與各黨部應辦之事，已經深夜 12 點了。

8 月 11 日清晨，蔣介石約見美國大使赫爾利（Hurley，PatrickJay，蔣介石日記作哈雷），對杜魯門總統提出的咨詢意見做出答覆。蔣稱：自己一貫主張，日本國體由日本人民自選。至於要求天皇出面簽訂降書以及將日本置於聯軍統帥之下各條，完全同意總統的意見。9 時，再次約見

赫爾利和魏德邁，就淪陷區軍事緊急處置等問題表示看法。11 時，到國民黨中央臨時常會，提出今後大政方針與各種處置。

蔣介石最焦慮的是接受日軍投降問題。早在 8 月 10 日深夜 12 時，朱德就以延安總部總司令的名義發佈第一號命令，要求敵軍"於一定時間內向我作戰部隊繳出全部武裝"，如"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第二天，又連發第二至第七號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隊"積極舉行進攻，迫使敵偽無條件投降"。①當時，在華日軍有百萬之眾，不僅佔有中國許多城市和交通線，而且擁有大量戰略武器和物資。誰最早、最多接受日軍投降，誰就將取得最多、最大的勝利果實。因此，11 日這一天，蔣介石給各方發了許多電報，其中一份最緊急的就是給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的。該電聲稱："政府對於敵軍之繳械、敵俘之收容、偽軍之處理及收復地區秩序之恢復、政權之行使等事項，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要求該集團軍"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②這份電報實際上剝奪了共產黨人接受日軍投降的權利。8 月 14 日，蔣介石做出了又一個重大決定，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來"共商大計"。電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①

抗戰八年中，蔣介石和共產黨維持著一種複雜而微妙的關係。他的日記

中時而稱"共黨"，時而稱"共匪"，飄忽不定。現在，他要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來，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斯大林兩電催勸，毛澤東決定赴渝

對於蔣介石的邀請，毛澤東頗感意外。1937、1938 兩年，蔣介石實行和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戰，毛澤東比較滿意。在延安作報告的時候，給過蔣很高的評價。但是，1939 年，特別是 1940 年皖南事變之後，毛澤東對蔣的印象就愈來愈壞。接到蔣介石的邀請電後，毛澤東的第一個反應是不想去。8 月 16 日，毛澤東為朱德起草致蔣介石的電文，提出六項要求，其主要內容為：解放區一切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有權接受所包圍的日偽軍投降，收繳其武器資財；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解放區軍隊接受投降，國民黨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國民黨軍隊接受投降。抗戰八年中，國民黨的部隊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部隊則深入敵後，因此這當然是一個有利於共產黨人的方案。緊接著，毛澤東復電蔣介石：

朱德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②

毛澤東的這通電報，沒有說不去重慶，而是要蔣表態，待表態以後再看。當時，美國正在調派飛機、軍艦，向原為日軍佔領的地區運送國民黨軍，

毛澤東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計劃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等地發動武裝起義，奪取這些大城市。①18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朱之抗命，毛之復電，只有以妄人視之，但不可不防其突變叛亂也。"②當晚，他夜半醒來，反覆思考，推敲詞句，於 20 日再致毛澤東一電，聲稱"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接著聲稱，受降辦法由盟軍總部規定，不能破壞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盟軍規定，亦持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資格將置於何地"？批評、責問之後再給朱德戴高帽子，聲稱"朱總司令果為一愛國愛民之領袖，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電報最後重申邀請：

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收益百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③

電報的這一段話寫得情詞懇切，似乎不容拒絕。不過，毛澤東仍然不想遽爾應邀。22 日，毛澤東再次復電蔣介石：

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到後希予接洽為懇！④

抗戰中，周恩來長駐重慶，多次和蔣介石折衝周旋，由周作前驅，作"偵察戰"，瞭解蔣的意圖，自然再合適不過。①蔣介石看到毛澤東仍然

不想來，於 23 日再次發電邀請：

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周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②

古有劉備"三顧茅廬"的美談，現在蔣介石是三電邀請，毛澤東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間，斯大林曾兩次致電毛澤東，聲稱"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又稱："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際、國內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你到重慶去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③毛澤東收到電報後很不高興，"甚至是很生氣"，但是，斯大林是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指導者，毛澤東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見。23 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說："我們要準備所有讓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國會講壇去進攻。""先派恩來同志出去。我出去，決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職務。"④24 日，毛澤東復電蔣介石：

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①

對毛澤東的這份回電，蔣介石的感覺是"溫馴已極"，"橫逆與馴順，一週

三變"。②在蔣介石三電毛澤東期間，赫爾利大使也曾兩電表示，願意到延安迎接。25 日，毛澤東復電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人魏德邁（Wedemeyer，Albert），對赫爾利來延表示歡迎，聲稱願與周恩來將軍偕赫爾利大使同機飛渝。同日，他和即將回太行根據地的劉伯承、鄧小平談話，要他們回到前方以後，放手打，"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③28 日，毛澤東由赫爾利與蔣介石的代表張治中陪同，與周恩來、王若飛同機抵渝。抵達時，毛澤東身穿藍灰色中山裝，腳穿黑色布鞋。一手揮著巴拿馬式的盆形帽，微笑著走下飛機。舉世矚目的重慶談判開始了。

初談不順

早在 8 月 26 日，蔣介石就在日記中寫下了"與毛商談要目與方針"，包括"共部之處理"、"國民大會辦法"、"參加政府辦法"、"釋放共犯辦法"等內容。④27 日日記云："對共方針，決予其寬大待遇，如其果長惡不悛，則再加懲治，猶未為晚也。"⑤28 日，蔣介石召集幹部會議，討論對毛澤東來渝後的方針，確定"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⑥28 日下午 3 時許，毛澤東等人到達重慶機場，毛對中外記者發表書面談話：

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

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民主、團結與富強的新中國。①

當晚，蔣介石在林園設宴招待毛澤東一行，特意將毛安排在自己的對座，以示"誠懇"。宴會後，又邀請毛澤東下榻林園。

毛澤東等來渝前，中共中央曾發表《對時局宣言》，要求國民黨立即實施六項措施：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嚴懲漢奸；解散偽軍；公平合理地整編軍隊；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人物會議，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對於這六條，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皆應留有餘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絕，但須有確定前提。"②8月 29 日，蔣介石與毛澤東舉行第一次會談。蔣稱願意聽取中共方面的意見，並稱中國無內戰。毛澤東則稱，說中國沒有內戰是欺騙。蔣提出談判三原則：一、所有問題整個解決。二、一切問題之解決，均須不違背政令、軍令之統一。三、政府之改組，不得超越現有法統之外。這個"三原則"，就是他在日記中所說的"確定前提"。　當晚 7 時，蔣介石親赴毛澤東所住蓮屋訪問，約談一小時，蔣自稱屬於"普通應酬"。③31 日，蔣在日記中寫道："毛澤東果應召來渝，此雖為德威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④

9 月 3 日，毛澤東通過周恩來、王若飛向國民黨代表張群、張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條談判要點，其主要內容為：

一、確定和平建國方針，以和平、團結、民主為統一的基礎，實現三民主義。

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

三、承認各黨各派合法平等地位並長期合作，和平建國。

四、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

五、嚴懲漢奸，解散偽軍。

六、重劃受降地區,（解放區抗日軍隊）參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裝衝突，令各部暫留原地待命。

八、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辦法：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會議，各黨派參加政府，重選國民大會；由中共推薦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五省主席、委員，及綏遠、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廣東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特別市副市長。

十、軍隊國家化之必要辦法：公平合理的整編全國軍隊，分期實施；解放區部隊編成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駐地集中於淮河流域及隴海路以北地區；中共參加軍委會及其所屬各部工作；設北平行營及北方政治委員會，任中共人員為主任。

十一、黨派平等合作之必要辦法：釋放政治犯；保障各項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務機關。①

毛澤東所提十一條中的"實現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等內容，蔣介石自然滿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條，批評其為"要求

無饜"。9 月 3 日，蔣介石日記云：

余以極誠對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誠之言，反要求華北五省主席與北平行營主任皆要委任其人，並要編組其共軍四十八萬人，以為余所提之十二師之三倍，最後將欲廿四師為其基準數乎？共匪誠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賴帝力之成全矣！①

4 日晨 5 時，蔣起身禱告，"願共毛之能悔悟，使國家能和平統一也"。上午，他約張群、張治中、邵力子談話，聽取昨晚與周恩來談話經過。蔣自感"腦筋深受刺激"，歎息"何天生此等惡劣根性，徒苦人類乃爾"！②他將自擬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給張群等。其主要內容為：

一、中共軍隊之編組，以十二個師為最高限度。

二、承認解放區，為事實絕對行不通。

三、擬改組原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政治會議，由各黨各派人士參加。在國民大會產生新政府後，各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均可依法參加中央政府。

四、原當選之國民大會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額。③

國民黨 1927 年執政後，長期實行黨治，因此受到國內外各階層的嚴厲批評。1936 年，國民黨提出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成立政府，宣稱將通過此途徑"還政於民"。除選舉代表 1200 人之外，國民黨的中央及候補執、監委為當然代表，國民政府並直接指定代表 240 人。中共主張

代表重選，蔣介石則主張增補、調整，堅決反對重選。

按蔣的想法，要將毛澤東的提議從速公佈示眾，但張治中等認為為時過早。同日下午 5 時，毛澤東應蔣介石邀請，參加軍事委員會召開的抗戰勝利茶會。會後，蔣、毛再次直接商談。從 9 時起，張群、邵力子、張治中受命與周恩來、王若飛開始第一次會談。至 10 月 8 日止，雙方共會談 13 次。

從 9 月 4 日起，蔣介石即將和中共談判的任務交給張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則退居幕後。但是，他仍然時時研究蘇俄與中共動態，牢牢掌控談判，日記中有許多對談判情況的記載：

9 月 8 日，蔣介石《上星期反省錄》云："共毛各種無理要求與不法行動，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處之。"
9 月 11 日日記云："余今日對俄、對共，惟有以誠與敬對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 月 12 日正午，蔣介石約毛澤東、周恩來到林園共進午餐。日記云："余示以至誠與大公，允其所有困難無不為之解決，而彼尚要求編其二十八師之兵數耳！"①
9 月 13 日日記云："囑毛澤東訪魏德邁。"
9 月 15 日《上星期反省錄》："共毛近來從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國政策之轉變，期望國際共同干涉內政也。"
9 月 17 日日記云："正午，約毛澤東、哈雷照相談話。據岳軍言，恩來

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對余所言，可減少其提軍額之半數者，其實為指四十八師之數，已照其共匪總數減少一半之數也。果爾，則共匪誠不可與言也。以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二十八師之數字也，其無信不誠有如此也。"

9 月 20 日日記云："目前最重大問題為共毛問題。國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於此。""不能不為國相忍，導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 月 21 日日記云："考慮共黨問題對國家禍福利害甚久，此時主動尚在於我，不患其作惡賣國，吾仍以理導之。""晚與哈雷談共黨問題，示以軍額最大限為廿師，如其仍要求華北各省主席，則不再談矣。"

9 月 22 日《上星期反省錄》云："中共陰謀與野心雖被阻制，但險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則惟置之不理，任其變化，以此時主動全在於我也。"

從上述日記可以看出，蔣介石對毛澤東、周恩來等雖然笑臉相迎，但內心卻充滿敵意。

談判中，張群等根據蔣介石的指示，曾於 9 月 8 日對寫了一份書面文件，逐條回答中共所提談判要點。其第一項稱："和平建國自為共同不易之方針，實行三民主義亦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項稱："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項稱："各黨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為憲政常規，今可即行承認。"其他如嚴懲漢奸、解散偽軍，參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裝衝突，釋放政治犯，嚴禁特務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原則，國民黨代表都表示"自可考慮"，或"自無問題

"，蔣介石和國民黨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選國民大會代表"、"解決解放區辦法"以及"軍隊國家化之必要辦法"等問題。①當時，毛澤東要求將中共部隊改編為 48 師，而蔣介石只允許以 20 師為最高限額。至於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長、北平行營主任等職，蔣介石覺得中共是"獅子大開口"，根本不想考慮。

就在兩黨談判僵持不下之際，蔣介石卻於 9 月 27 日偕宋美齡飛往西昌，休息去了。

蔣介石的心態發生 180 度大變化，企圖扣留並"審治"毛澤東

在去西昌的飛機上，蔣介石讀到了毛澤東回答路透社記者的提問。提問中，毛澤東談到，解放區已經擁有 120 萬人以上的軍隊和 220 萬人以上的民兵，除分佈於華北各省與西北的陝甘寧邊區外，還分佈於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各省。①毛澤東的這段談話勾起了蔣對中共所提十一條的回憶，也勾起了蔣鬱結在胸中對中共和毛澤東長期的仇視。其實，在蔣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國民黨並肩抗敵的戰友，而是"漢奸"、"叛逆"；毛澤東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貴賓，而是"罪魁禍首"。他在日記中憤憤地寫道：

如欲不懲治漢奸，處理叛逆則已，否則非從懲治此害國殃民，勾敵搆亂第一人之罪魁禍首，實無以折服軍民，澄清國本也。如此罪大惡極之禍

首，猶不自後悔，而反要求編組一百二十萬軍隊，割據隴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區，皆為其勢力範圍所有，政府一再勸導退讓，總不能饜其無窮之欲壑，如不加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②

蔣介石表現在這裡的情緒已經不是他在日記中一再表達的"誠"與"敬"，而是一股強烈的剛暴之氣。他明確表示，要對毛澤東加以"審治"。

西昌，當時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於今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於漢。蔣介石夫婦到達西昌後，下榻當地名勝邛海。從霧霾層層的重慶轉移到風清鳥囀，花笑山明之地，蔣介石心情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慶談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鬥爭，反覆考慮"共毛對國家前途之利害與存亡關係"。29日，他在日記中寫下了"中共之罪惡"六條：

甲、資抗戰之名義，而行破壞抗戰之實。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階級獨裁之陰謀。

丙、違反四項諾言之事實與經過，欺民欺世，忘信背義，莫此為甚。

丁、藉民選之名義以行其擁兵自衛，割據地盤，奴辱民眾，破壞統一之實。

戊、破壞外交政策，捕殺盟軍官兵，阻礙聯軍行動，破壞國軍反攻計劃，詆毀英美參戰為帝國主義之戰爭。不僅反對政府聯合英美作戰，而且始終破壞中蘇國交之增進。

己、勾結敵軍，通同漢奸，傾害國本，顛覆政府，以組織聯合政府為過渡手段，而達到其多數控制，成立第四國際專政之目的。

宋美齡看到蔣介石如此忙碌，笑著說：你到西昌來哪裡是為休息呀！蔣

介石沒有解釋，但他心想："孰知余此來，比之平時之思考與工作更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統一如能告成，或得之於西昌游程中也。"蔣接著寫其所謂中共"罪狀":

庚、企圖割據華北各省，盤踞熱察，隔絕中蘇聯絡，破壞中蘇聯盟，以期擾亂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設軍事委員會名義，劫持第十八集團軍，促使新四軍之叛變，反抗軍令，毅然以共產紅軍自稱。

壬、擅設延安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割據地盤，反對中央政令，私發鈔票，擅征租稅，強種亞片，私設關卡，與敵偽公開貿易，交換貨物，以接濟敵軍，助長侵略，此即中共所謂對敵抗戰也。

癸、跡其宣傳，直接以攻訐政府，誣蔑盟軍，間接以協助敵偽，毀滅國本，必欲中華民國變成為第四共產國際而後已。

子、共軍所到之地，所謂民選政府之實情：（甲）信仰言論行動皆為絕對統制而無自由，否則即以反動漢奸與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傳教士絕對不能傳教，且不准其進入其民選區。（乙）人民之納租、出捐、抽丁、派糧不惟因戰後而不奉令停止，且變本加厲，各種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民不聊生，而抗戰期間到處煽動人民，對政府抗糧抗役，以不出糧、不徵兵，且借各種神道邪教以愚惑民眾。

寫到這裡，蔣介石特別補充了一句："以危害國家、破壞國家之事實，應略舉要點述之。

蔣介石寫這些"罪狀"，當然不是一時興至，"無所為而為"，顯然，他是在為扣留並懲辦毛澤東作準備。

然而，毛澤東應邀，為兩黨談判而來，要扣留並懲辦毛澤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蔣介首先想到的是美國大使赫爾利的保證和美國政府的態度，也想到蘇聯政府可能的反應。所以，他在日記裡為提醒自己而特設的"注意"欄下寫下了兩條：一、哈雷（即赫爾利）保證共毛之安全函電，美國政府之地位及其預想之態度，應加研究。二、俄國之表示如何，亦應切實研究。①

當時，蔣介石既要依靠美國，也不敢得罪蘇聯，甚至還想討好。例如，在倫敦的中、美、英、蘇、法五國外長會上，英、美、法為一方，蘇聯為一方，而重慶國民政府則"中立"，"對俄表示同情"。自然，蔣介石在採取行動之前，不能不將美、蘇這兩個大國的可能反應想清楚。

10 月 1 日，蔣介石見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澤東來渝的安全以及赫爾利的保證問題。蔣介石看到這篇"公告稿"以後，十分反感。日記中寫道：

此與會談全無關係，僅為其賊膽心虛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國商談要由外人保證之恥。不思哈雷即使為其保證，亦已失效也。蓋哈雷保證共黨統一團結提議者之安全，並未保證其通敵賣國反動派之生命。次此為內政問題，無論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對內亂犯之處治，而且哈雷回國

之前已對共黨聲明，今後國共問題全為中國之內政，不能如往日敵軍未投降時，可由其盟國共同作戰之關係參加調解，今後應由中國雙方自動直接解決也。①

蔣介石要扣留並"審治"毛澤東，赫爾利事前的保證是一道不能迴避的門檻。可以看出，蔣介石的這篇日記實際上是在為自己找解脫，力圖證明，他的舉動和赫爾利的保證沒有衝突。

1936年國民大會的代表選出後，由於第二年抗戰爆發，代表大會一直未能召開。抗戰後期，蔣介石為了對抗中共提出的召開黨派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便於 1945 年元旦宣佈，可以不待抗戰結束，提前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選舉政府，以使其統治合法化。同年 3 月 1 日，蔣介石又向憲政實施協進會宣佈，定於當年 11 月 12 日召集國民大會。毛澤東到重慶後，中共在談判中除主張國民大會代表須重選外，當年制定的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五五憲法草案》等也都須修改，召集大會的日期須延緩。對此，蔣介石都強烈反對。10 月 2 日，蔣介石日記云：

共黨反盜為主，其到重慶，在軍事政治上作各種無理要求猶在其次，而且要將國民政府一切法令與組織根本推翻，不加承認，甚至實施憲政之日期與依法所選舉之國民大會亦欲徹底推翻重選，而代之以共黨之法令與組織，必使中國非依照其主張，受其完全控制而成為純一共黨之中國，終不甘心。①

想來想去，蔣介石"審治"毛澤東，徹底解決中共問題的衝動越來越強烈，幾乎難以遏制了。

龍雲長期統治雲南，形成半獨立狀態。蔣介石早就想解決龍雲，其辦法是任命龍雲為軍事參議院院長，將他從昆明老窩中調到重慶。但蔣介石又擔心龍雲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強迫的準備。10 月 3 日，杜聿明的軍隊武裝包圍雲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龍雲的滇軍僅有小反抗。蔣介石很高興，認為龍雲"經此一擊，彼當不能不俯首遵命乎"！②幾天之後，龍雲被迫到重慶接任新職。

龍雲問題解決了，蔣介石的思緒再次回到中共問題上。當時，倫敦的五國外長會議因美蘇對立，無果休會。蔣介石認為"俄國實力已耗，外強而中已干"，是他解決中共問題的好時機。10 月 5 日日記云：

故於此時應不必為俄多所瞻顧，積極肅清內奸，根絕共匪，整頓內政，鞏固統一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強佔我東北，擾亂我新疆，則彼干涉我內政，侵害我主權，否則仍使共匪餘孽搗亂邊疆，此乃彼一貫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為最多新疆暫失，東北未復而已，而本部之內，只少可以統一矣，此乃天予之時也。

讀者應該特別注意這一段日記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顯然，其內容就是扣留毛澤東，"審治"毛澤東，和共產黨決裂，掀起剿共

戰爭，"根絕共匪"。蔣介石估計，一旦他做了"此事"，蘇聯不會善罷甘休，有可能佔領新疆，拒絕從東北撤兵。但是，蔣介石覺得還是合算，他還是要做。

毛澤東在重慶，如魚游釜內，有點"懸"了。

蔣介石再次180度大轉變，決定授予毛澤東等"勝利勳章"，並且禮送回延安

然而，就在蔣介石破釜沉舟，準備豁出去做"此事"的時候，他卻又猶豫起來了。

10月6日，蔣介石反省上周作為，覺得龍雲問題解決，西南鞏固，"建國已有南方統一之基礎"，"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對於解決中共問題，他覺得國內、國外反對者很多，困難很大。日記寫道：

對共問題，鄭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紛擾，最後惟有天命是從也。

蔣介石的"鄭重考慮"是必要的。如果他扣留並"審治"毛澤東，不僅美國、蘇聯通不過，在抗戰八年中發展起來的百萬中共武裝通不過，那時已經站在中共一邊的民主黨派自然也通不過。其結果，必將出現"再起紛擾"

的嚴重局面。這麼一想，蔣介石又把他那顆強烈跳動的想扣留並"審治"毛澤東的心摁住了。當天正午，蔣介石與左右討論中共方面所起草的《會談紀要》以及毛澤東的離渝時期，蔣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慮"。①

10 月 8 日，正午，蔣介石宴請國民黨中央常委，討論兩黨談判情況。當時已經有了一份《會談紀要》的初稿，準備公佈。吳稚暉反對發表這份《紀要》。關於國民大會召開日期，會上意見分歧，莫衷一是，蔣介石只能宣佈休會，另加研究。會後，蔣介石審閱《紀要》，採納中常委們的意見，作了部分修改。又派葉楚傖去做吳稚暉的工作，說明這是將中央對共產黨的"政治解決"的方針明示中外，可以體現中央"仁至義盡"的態度云云，吳才同意公佈。

10 月 9 日，毛澤東向蔣介石告別。蔣問毛：對國共合作辦法有無意見?據蔣日記記載："毛吞吐其辭，不作正面回答。"蔣對毛稱："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蔣繼稱：

余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上、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劃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戰爭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後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①

這段話，蔣介石覺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窩子，毛的反應，據蔣日記記載："彼口以為然"，但是，蔣不大相信，所以接著寫道："未知果能動其心於萬一，但余之誠意或為彼所知乎？"當日正午，蔣介石繼續與毛澤東談話，並且設宴招待。

10 月 10 日下午，周恩來、王若飛與王世傑、張群、邵力子、張治中在桂園客廳共同簽署《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這個《紀要》由周恩來起草，是毛澤東、周恩來到重慶後和國民黨代表多次商談的結果，也是雙方求同存異、互諒互讓的結果。共十二條，其中《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屬於總綱性質，雙方一致確認："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將在蔣主席的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雙方又同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紀要》宣佈，雙方"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采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①《紀要》並稱：現雙方正與各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其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

其他雙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條文有人民自由問題、黨派合法問題、特務機關問題、釋放政治犯問題、地方自治問題等。毛澤東後來曾說："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於中國人民的。"②有些問題，難度較大，如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表示願縮編至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國民黨則表示二十個師的數目可以考慮，雙方意見趨近。有些問題，雙方爭持不下，如"國民大會問題"，中共堅持代表重選，延緩召開等主張，國民黨則堅持原選出之代表有效，名額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願見因此項問題之爭論而破壞團結"，雙方同意將此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中共先後提出四種方案，國民黨均以"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為理由加以拒絕，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繼續商談。

《紀要》的簽字是大喜事。飽經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終於向避免內戰、化干戈為玉帛前進了一大步。這一天還發生了另一件喜事。這就是，國民政府發佈授勳令，對大批抗戰文武有功人員授予"勝利勳章"。蔣介石考慮再三，在受勳人員名單中加進了朱德、彭德懷、葉劍英三人，又加進了毛澤東和董必武，還加進了鄧穎超。事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他這麼做的原因：

雙十節授勳，特將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為有罪，惟恐政府發其罪狀，故亟欲抗戰有功表白於世，以掩蓋其滔天罪惡。余乃將順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為之悔改乎？然而難矣哉！①

世界授勳史上大概還不曾有過這樣的前例：內心深處認為其人有"滔天罪惡"，但是，還要為其授勳，表揚其功績。"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領導人心理，自作聰明！

同日下午 4 時，蔣介石到桂園訪問毛澤東，為其送行。毛澤東提出，今晚住到蔣介石的林園官邸去。蔣介石覺得毛澤東可能"另生問題"，但仍然表示歡迎。蔣介石的這次拜訪，前後只有 10 分鐘。會談後，毛、周同蔣一起乘車到國民政府禮堂參加國慶祝酒會。酒會後，蔣、毛再次談了半小時。毛澤東住到林園後，向蔣介石提出：1.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開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後再定辦法；2.國民大會提早至明年召開亦可。由於蔣早就宣佈，要在當年 11 月 12 日召集國民大會，聽了毛澤東的意見後，覺得國民大會召開無期，氣得在心裡狠狠地咒罵毛澤東。②不過表面上，蔣介石仍故作平靜，努力"和婉"地對毛說："如此態度，則國民大會無期延誤，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於民也。"又說："如政治協商會議能在本月底開會協商，則國大會議政府可遷就其意，改期召開，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確定會期，示民以信也。"③蔣還向毛表示，即使政協會不能如期召開，政府也不能不於 11 月 12 日下令召集國民大會。談至此，蔣向毛告辭，約定明晨再談。

10 月 11 日晨 8 時，蔣介石約毛澤東共進早餐。餐後，二人再次對談。除重複前幾次談話要旨外，蔣介石用非常堅決的口吻向毛澤東強調，"

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所遷就，否則不能成為國家"。①毛澤東則答以此事留待周恩來與王若飛在重慶繼續商談。通過抗日戰爭，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 19 個解放區，擁有 1 億多人口。蔣介石無論如何不能容忍這麼大一塊土地，這麼多人口處於中共統治之下。

9 時半，毛澤東由張治中陪同，乘車到九龍坡機場。陳誠代表蔣介石到機場送行，重慶各界和八路軍辦事處以及《新華日報》工作人員到機場送行的共約 500 餘人。毛澤東發表了簡短談話："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澤東離開延安前，對到重慶後可能的危險作了最充分的估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準備坐班房"，"如果是軟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裡辦點事"。但是，他估計，"國際壓力是不利於蔣的獨裁的，所以重慶可以去，必須去"，"由於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②歷史證明，毛澤東的分析是正確的。

毛澤東告辭離去後，蔣介石獨自在林園中逛了一周，心裡想的是："共黨不可與同群也。" 12 日，蔣介石回想他和毛澤東在重慶的多次接觸，覺得共產黨的這位領袖不好對付。日記云："共毛態度鬼怪，陰陽叵測，硬軟不定，綿裡藏針。"對於中國的未來，他有"荊棘叢生"的感覺，不過，他仍然充滿自信，相信在今後的較量中，他可以戰勝毛澤東。其《反省錄》云："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

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範也。政治致曲，不能專恃簡直耳！"①蔣介石一生作過許多錯誤判斷，但是，其中最大的誤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斷。歷史證明，蔣介石的"一握"並沒有能控制毛澤東，相反，倒是毛澤東跳身出來，讓中國在三四年的時間內天翻地覆，並且將他趕到了海峽彼岸。

原載遼寧《萬象》雜誌，2008 年 1 月號。

蔣介石親自查處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債舞弊案
--且看蔣介石如何反腐敗

孔祥熙等貪污巨款

發行公債是吸收社會資金，解決國家財政急需的重要辦法。1942 年，抗日戰爭進入第五個年頭。國民政府為解決日益膨脹的財政需要，用美國對華 5 億貸款中的 1 億元作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區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公債"。每元折合國幣 20 元。人民以國幣購買，待抗戰勝利後兌還美元。當時宣傳稱："公債以美元為基金，本固息厚，穩如泰山；國人踴躍認購，功在國家，利在自己。"其手續是，蔣介石以全國節約建國儲蓄勸儲委員會主席名義，致函各省分會主任委員（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員（財政廳長兼），轉令各市縣勸儲支會正副主委，按規定指標向各階層攤派，照比率折繳國幣，上解省勸儲分會，向中央銀行分行兌換美金公債券。實際上，由國民政府財政部交中央銀行國庫局分發各地銀行銷售。

同盟勝利美金公債雖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採取多購不如少購，少購不如不購的消極態度，發行情況並不很好。至 1943 年秋末，全國實際售出還不到預定計劃之半，約 4300 萬美元。已購之人，也不很相信將來會兌還美金，因此大多在購得後即轉手求脫。在黑市上，美金公債券一元僅值國幣 17-18 元。但是，其後由於通貨膨脹，國幣貶值，美金

公債券的價值逐漸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國幣 30 元發展至可值 273 元。

由於美金公債券價格持續上漲，身為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於 1943 年 10 月 9 日致函蔣介石，以"顧全政府之信譽"，"如不籌維辦法，將來再請援助恐有妨礙"為由，申請於 10 月 15 日結束美金公債的發售。他向蔣表示，"當督促行局主管人員妥為辦理，以期早日完成。"①屆期，財政部密函國庫局，命令立即停止銷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數由中央銀行業務局購進，上繳國庫。

按道理，美金公債在銷售了一段時期後停止銷售，並無不可。但是，當時的國庫局局長呂鹹卻從中看到機會，企圖乘機舞弊，損公肥己。他於 1944 年 1 月命債券科科長熊國清代擬了一個簽呈，中稱："查該項美券銷售餘額，為數不貸，擬請特准所屬職員，按照官價購進，用副國家吸收游資原旨，並以調劑同人戰時生活。"這份簽呈寫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國家發行公債的目的，而且照顧到國庫局員工的利益。但是，當時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經飛漲到國幣 250 元，而國庫局的同人卻可仍以 20 元的低價購得；尚未售出的美券 5000 餘萬元，其市價將達 125 億國幣。按照呂鹹的辦法，這一筆天文數字的巨款就可以成為國庫局少數"同人"的囊中財富。對於這樣一個損公肥私的簽呈，身為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個"可"字，並且加蓋了"中央銀行總裁"的官章。②

事實上，"調劑同人戰時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話。據後來在國民參政會上提案揭發的參政員陳賡雅說：呂鹹取得合法手續後，於

1944 年 2 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債券 350 萬元，其後，又用以票換票，買空賣空的辦法貪污美券近 800 萬元。兩項合計，共 1150 餘萬美元，折合國幣約 26.47 億元。①

國庫局同人檢舉，蔣介石開始密查

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孔祥熙、呂鹹等人如此明目張膽地舞弊、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無縫、船過無痕。1945 年春，國庫局的幾個知情的年輕人開始向重慶國民政府秘密檢舉。3 月 19 日，蔣介石日記云："研究中央銀行舞弊案。"②這一天的日記說明，幾個年輕人的檢舉已經為蔣介石知悉，他開始注意美金公債的舞弊案了。此後，蔣介石日記中連續出現相關記載：

3 月 29 日："昨晚約侍從第二處組長與俞財政部長聚餐。與俞談中央銀行美金公債不清之數，責成其徹底追究。"
3 月 31 日《本月大事預定表》："徹查美金公債案。"
4 月 3 日："追究美金公債。""處理戰務以及中央銀行美金公債案徹查計劃。""督促俞鴻鈞辦案。"

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發現中央銀行美金公債賬目不清，開始重視，並且決定交財政部長俞鴻鈞徹底查究。俞鴻鈞（1898~1960），廣東新會人。1919 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37 年 7 月，任上海市長。1941 年 6

月任財政部政務次長，步入財界。同年，兼任中央信託局局長。1944 年 11 月，孔祥熙卸任財政部長，俞鴻鈞繼任。

俞鴻鈞雖然和孔家淵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債案出於蔣介石的"欽命"，自然不敢怠慢。從蔣介石的下列日記可見，調查有進展，蔣介石逐漸發現問題所在。

4 月 7 日蔣介石《上星期反省錄》云："美金公債與黃金舞弊案正在徹查中。""黃金舞弊案"是差不多與美金公債案同時發生的另一案件。1944 年 3 月，重慶國民政府宣稱出售黃金，收縮通貨。28 日，財政部預定自當晚起，每兩黃金售價由 2 萬元增加至 3.5 萬元。但財政部官員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預知內情的達官貴人投機搶購，致使當日重慶出售黃金數字劇增，成為轟動一時的"黃金加價舞弊案"。4 月 20 日，財政部將該案移送重慶實驗地方法院審理。

俞鴻鈞接手美金公債案後，於 4 月 8 日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賬報告，其情況是："美金公債自停止出售以後，所剩五千萬左右也幾乎售完。買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別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淪陷區的地址。"①蔣閱後認為"其中顯有弊竇，應徹查"。當晚，蔣介石約陳佈雷等人談話，"指示查賬手續"。②陳佈雷當時擔任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是蔣介石的親信。蔣介石向陳佈雷等"指示查賬手續"，說明蔣進一步重視此事並且加強了調查力量。4 月 10 日，蔣介石滿有把握地在日記中寫道："考慮徹查美金公債案已得要領，不難追究

也。"

要查，蔣介石碰到的第一個困難是，孔祥熙不在國內。1944 年 6 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會議。他患有膀胱結石病，會後即留在美國治病。1945 年 4 月 10 日，蔣介石致電在紐約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債後，仍有 1100 萬餘債券在繼續交易，應予追繳。電稱："擬查美金公債剩餘部分有壹千壹百餘萬元，預定户在停售受，付價給券，不合手續，應即將此壹千壹百餘萬元之債券，飭令該行經管人員負責，全數追繳歸還國庫，不得貽誤，並將追繳之確數呈報。"4 月 11 日，孔祥熙復電稱："此事當時經過實情為何，弟不詳悉，已將鈞電轉主管局長迅剋遵辦，並嚴令責成負責，追繳齊全。俟弟病稍愈，即當回國親自處理。"①說"不詳悉"，不是不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可進可退；至於"迅剋遵辦"，"嚴令責成"等語，都是老於官場的說法。

通過追查，蔣介石已經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國，調查難以深入。4 月 14 日，蔣介石日記云："美金公債舞弊案已有頭緒，須待庸之病痊回國也。"接到孔的復電後，蔣介石很失望，4 月 30 日日記又云："接庸之電，令人煩悶，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銀行問題甚難解決也。"中央銀行長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勢力盤根错節，蔣介石已經感到，美金公債舞弊案和中央銀行的問題比較棘手。

後來，蔣介石逐漸發現，有大量債券去向不明，曾經在日記"雜錄"欄中記下了一組數字："美金公債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萬元。乙、

國庫局交業務局五千四百萬。丙、預售户有收據者只四千二百萬。丁、尚差數一千六百六十餘萬元。"這 1660 餘萬美金公債的差額就是蔣介石要追查的地方。5 月 22 日，蔣介石因中央銀行業務局的黃金舞弊案發現重大嫌疑，電召孔祥熙速回。②

同年 5 月 5 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 日，選舉國民黨新一屆中央委員。長期以來，孔祥熙的貪瀆名聲早已流傳在外，口碑甚壞，但是，孔是蔣的姻親，宋藹齡、宋美齡都"護孔"，蔣在財政上也要依賴孔，因此，外間雖反孔，而蔣介石卻常加維護。選舉中，孔祥熙和糧食部長徐堪的票數都很低。後來選舉常委時，孔祥熙竟至於落選。蔣介石感歎地在日記中寫道："其信望墜落至此，猶不知余往日維持之艱難也。可歎。"③同月 28 日，六屆一中全會開幕，任務之一是解決行政院的改組問題。1938 年 1 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長，至 1939 年 11 月，蔣介石自兼行政院長，孔祥熙改任副院長。此後，社會"反孔"情緒更趨強烈，蔣介石不能不考慮"換馬"。六屆一中全會期間，蔣介石日記云："為庸兄副院長職務亦甚煩惱，但為黨國計，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極矣。"①從這一頁日記不難看出，蔣介石既想甩開孔祥熙而又難於決斷的矛盾心理。次日，蔣介石宣佈，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別辭去行政院正副院長職務，改以宋子文、翁文灝充任。6 月 1 日，蔣介石考察幹部狀況，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對孔祥熙的考語："（庸之）不能為黨國與革命前途著想，而徒為本身毀譽與名位是圖。"②至此，孔祥熙不僅在政治上失勢，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陳賡雅、傅斯年聯合，向國民參政會提案揭發

國庫局的知情年輕人除了向國民政府秘密檢舉外，有些人又將所掌的舞弊情況提供給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陳賡雅。陳原任雲南勸儲分會委員，兼主任幹事，負責雲南全省的美金公債推銷工作，熟悉情況。同年 7 月 7 日，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大會在重慶開會，陳賡雅根據所掌握的資料寫成提案，題為《請政府徹查三十一年度同盟勝利美金公債發行餘額大舞弊嫌疑案》，該案揭發：國庫局局長呂鹹"利用職權，公然將該項未售出之債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圖私利，以致不可究詰，構成侵蝕公款至美金一千一百五十萬餘元巨額之舞弊行為嫌疑。該項債票市價因之狂漲，由二十元遞漲至數百元，刺激物價，擾亂金融，莫此為甚。"③該案共提出三筆可疑賬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筆就是：呂鹹"借推銷公債之名，簽呈中央銀行當局，慫恿購買美債餘額三百五十萬零四千二百六十美元"。這裡所說的"中央銀行當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陳賡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屬實，國庫損失之巨，與官吏膽大妄為，可雲罕見"，要求國民參政會送請政府"迅予徹查明確，依法懲處"。

7 月 10 日，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到參政會報告。此前，參政員傅斯年也多次聽到該局美金公債的舞弊情況，即在謝冠生報告後提出口頭質詢。他說："中央銀行國庫局同人分購成都沒賣完的兩百多萬美金公債，因為分贓不均，便向主管當局告發，已經在查了。這比黃金透漏消息還要嚴重，因為國庫局事先呈請該行核准了"可"字。"他要求法院、檢察官

"自動檢察"。傅斯年的發言引起大會震動，被稱為當天七個口頭詢問中最響的"一炮"。①會後，陳賡雅向傅出示所擬提案，原原本本，既有數字，又有證據。傅為之大驚，立即簽名聯署。這一提案也得到其他幾位參政員的支持，簽名者共九人。

王世傑時任參政會主席團主席，他得知陳賡雅等人的提案情況後，便出面做工作。王稱："此案提出，恐被人借為口實，攻擊政府，影響抗戰前途，使仇者快意，親者痛心。同時，案情性質尚屬嫌疑，若政府調查事實有所出入，恐怕對於提案人、聯署人以及大會的信譽都會有損的。為此，擬請自動撤銷，另行設法處理。"陳答以證據確鑿，請不必代為顧慮。接著，陳佈雷又以新聞前輩的身份訪問陳賡雅，對陳說："這提案資料的搜集，可謂煞費苦心，準備在大會上提出，當然也很有價值。不過，有個投鼠忌器問題，就怕一經大會討論，公諸社會，恐使英、美、蘇等友邦更認為我們真是一個貪污舞弊的國家，對抗戰不繼續予以支持，那麼，影響之大，將不堪設想。"陳佈雷建議陳賡雅將議案改為書面檢舉，由參政會主席團負責人親交蔣介石，認真查辦。當年 5 月，美國財政部長毛根韜曾嚴厲指責中國在抗戰期間的各種經濟失策與舞弊，國民政府的國際信譽大受影響。陳賡雅覺得王世傑、陳佈雷的說法有道理，便同意了。該項提案因此未提交大會討論。

傅斯年性情剛烈，嫉惡如仇。除了在陳賡雅的提案上聯署外，7 月 15 日，他在陳案的基礎上又草擬了一份提案，題為《徹查中央銀行、中央信託局歷年積弊，嚴加整頓，懲罰罪人，以重國家之要務而肅官常案》。

這份提案已經超出美金公債這一個案，而是要求對孔祥熙所掌握的財政金融系統進行一次總清算。聯署者達 21 人。①該案稱：

中央銀行實為一切銀行之銀行，關係國家之命脈。然其組織直隸國府，不屬於財政部或行政院。歷年以來，以主持者特具權勢，道路雖嘖嘖煩言，政府並無人查問……其中層層黑幕，正不知幾許。

這裡所指"特具權勢"的主持者，當然就是孔祥熙。傅斯年等提議：1.由政府派定大員，會同專家、監察院委員、參政會公推的代表，徹查其積年賬目與事項，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組。使中央銀行改隸財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託局。兩者歷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產生眾多觸犯刑章之事，應負責一齊罷免。其有牽涉刑事者，應一併送交法院。②對此案，17 日的重慶《大公報》立即作了報道，還特別強調："其中國庫局職員私購美金儲券一案，情節重大。"③該案經參政會大會討論，決議修正通過，送請政府迅速切實辦理。

17 日以後，傅斯年幾次會見揭發弊案人員中的兩位青年人，得知他們的揭發動機至為純潔，也得知更多舞弊情況，並拿到全部證據。這兩位青年人揭發說：呂鹹其人，"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給於公，其所行為，儼然孔公館之縮影，彼更使人隨便寫不合手續之賬，亦不以為諱。因習為故常，更恃靠山也。"他們也將此案發現經過向傅作了傾訴："局中青年愛國之士久感不安，並因記賬等事與呂氏心腹衝突者。""故有七八人常在商議，並有債券科科長熊國清之親筆信稿為其中一青年所拾得（此

人今已出洋)。彼輩見之，大為駭異，遂星夜另托一人抄出最重要之賬兩紙，共推一人向政府密告。"他們還告訴傅斯年，其中有人已多次受到警告、恫嚇。為了預防可能出現的危險狀況，已立下遺囑。傅斯年聽了這幾位年輕人的敘述，深為感動，安慰他們說："諸君愛國熱情，不避險難，至可佩。我雖前已同意不在大會提，但此事總當使之發生效力。"①

傅斯年在參政會上慷慨陳詞，堅決揭發貪污腐敗分子，使他獲得很大聲譽。有些人特意到參政會旁聽，就是為了看傅斯年一眼。還有素不相識的人打聽："傅先生今天發言不？"7 月 20 日下午 5 時，國民參政會閉幕式。傅斯年"唱了最精彩的壓軸戲"。他向會議主席團提交了一份書面報告，交由副秘書長雷震在會上宣讀。內容有三點："1.國庫局舞弊證據已有一部分蒐集在手，已以之呈交主席團。2.請法院提出公訴，傅自願為證人，並已得提供證據之友人之同意，願同為證人。3.傅願絕對負法律責任，如無其事，亦願受反坐之罪。"②傅斯年的書面報告使全場激動、興奮。傅的好友羅家倫為傅捏了一把汗，會後問他說話何以如此肯定。傅稱："我若沒有根據，那能說這話。"③

蔣介石的質問與孔祥熙的答辯

陳佈雷勸止陳賡雅在國民參政會上捅出美金公債舞弊案，但他不能不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也不能不及時處理這一問題。7 月 8 日，孔祥熙回

到重慶。7 月 11 日，陳佈雷告訴蔣介石，已有人在參政會提出美金公債舞弊案，蔣於是立即召見孔祥熙，將此案調查經過、事實、人證、物證，一一告訴他，"囑其好自為之"。蔣這時的態度還是要保護孔祥熙，不料孔卻"不肯全部承認"，以致蔣在日記中寫下"可歎"二字。①次日，蔣介石審讀陳賡雅等揭發舞弊案的提案，研究有關情節，決定"全數追繳，全歸國庫"，同時決定或親自"負責解決"，或"任由參政會要求徹查"。日記云："此固於政府國際信譽大損，然為革命與黨國計，不能不如此也。"②13 日下午，蔣介石再次召見孔祥熙。這一次，蔣就不只是空口白說，而是向孔展示證據了："直將其人證、物證與各種實據交彼自閱。"但是，孔仍然堅決否認舞弊，甚至賭咒發誓。蔣介石看在眼裡，大不以為然，覺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對這位與自己多年共事的老姻親，蔣介石不得不拉下臉來，"嚴正申戒"，孔這才"默認"。蔣介石見孔祥熙不再強辯，態度又轉為溫和，"囑其設法自全"，將主動權交給孔，要他自己尋找解脫辦法。當日蔣介石日記云："見庸之，彼總想口辯掩飾為事，而不知此事之證據與事實俱在，決難逃避其責任也。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恥之至！"③蔣孔關係一向良好，認為孔"可恥之至"，這是很少有的現象。14 日上午，蔣介石再次與孔祥熙談話，據蔣介石日記記載："彼承認余之證據，並願追繳其無收據之美金公債，全歸國庫也。"④15 日，蔣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記中寫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國銀行美金公債舞弊案，而庸之又不願開誠見告，令人憂憤不置。內外人心陷溺，人慾橫流，道德淪亡，是非倒置，一至於此！"⑤

孔祥熙一面在蔣介石面前承認有問題，但同時緊急佈置國庫局採取應付措施，據傳，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提出舞弊案的當夜，孔祥熙審問呂鹹。盛怒之下，打了呂鹹兩記耳光。①其後，就組織 18 個人連夜造賬，對付審查。②孔祥熙甚至向審查者出示蔣介石交給他閱看的檢舉資料。7 月 16 日，蔣介石審讀中央銀行的審查報告，再次召見孔祥熙。當日日記云："彼將余所交閱之審查與控案而反示審查人，其心誠不可問矣！"③17 日，蔣介石約見俞鴻鈞及侍從室秘書、中央監察委員陳方，指示對舞弊案的"批駁要點"。④17 日，蔣介石接閱國民參政會通過的傅斯年等 21 人對中央銀行，實為對孔祥熙的"彈劾案"，蔣介石自稱"苦痛無已"。⑤

停售後的剩餘的美金公債既由孔祥熙、呂鹹等人私分，自然交代不出購券人的真實姓名等資料。7 月 13 日，孔祥熙曾向蔣介石遞交《關於美金公債銷售情形之折呈及節略》各一份，以購券人"無可查考"相推諉。孔稱"人民購買均系款債對交，至各户户名均系來人自報，按照售債向例，無須詳細記載"。7 月 19 日，蔣介石連致孔祥熙三函。其中第一函駁斥孔祥熙的購券人"無須詳細記載"的說法。蔣稱：

門市現款購債自可如此辦理，但既稱為認購户或預售户，而認購之户一不繳納分文定金，二不填具認購單據，中央銀行亦不給予准許認購若干之證件，三無確實姓名住址之記錄，則停售之後，各認購户究竟憑何證據向中央銀行交款取券？行方人員又憑何根據付給其債券？是否僅憑該認購户口頭申報或人面熟悉，即行付給債券？此種情形，即一普通商

號對私人定購些微貨物，亦決無此理，何況政府機關之國家銀行！辦理巨額外匯債票之收付，乃竟如此草率，何能認為合法有效?

蔣函進一步向孔祥熙提出質問：各有關購券人購券均在停售命令公佈之後，美債價格均已高漲，何能尚按最初的低價出售？函稱：

查認購各户取券時期皆在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至三十三年六月一段時間，距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之期少則月餘，多則六七個月。其時美債價格高漲一倍至十餘倍之多，而認購各户仍按國幣二十元折合美債一元之原價交款取券。以在法理上毫無拘束之認購，此時何得享此意外之特殊利益，而損失國家寶貴外匯?

蔣函最後嚴厲提出："此一期間，認購各户所領去一千六百六十萬餘元之美金公債，必須由兄責成經辦人員，負責全數繳還中央銀行，限期嚴密辦妥。"在這段話之後，蔣又轉變語氣，特意寫了一段："此純為稍減當前情勢之應付困難，決非故意苛求。想兄當能深諒，務盼兄迅速處理，即日具報勿延為要。"

蔣介石的第三函則就孔祥熙所報賬目進一步查問。函云："查美金公債除去售出 4310 萬餘元及國庫局繳交業務局 5401 萬餘元外，尚短 287 萬 4 千餘元，此款著落如何？應即詳細查明具報。又據報三十三年 8 月 19 日，國庫局曾收進美債 35 萬 5 千元，賬上僅列國幣 710 萬。該項債券下落如何，並盼查報。"①7 月 21 日，蔣介石在《上星期反省錄》中寫

道："庸之對一六六零萬美金公債總不願承認也。"②

21 日，孔令儀攜孔祥熙復函來見蔣介石，報告對陳賡雅等九人檢舉提案的調查情況，內稱：美金公債券一千一百五十餘萬元，系由各地分銷處分三次解繳而來，其銷售情況為：

第一次， 三百五十餘萬元（3504260 元），已由國庫局交業務局，並經業務局將債款國幣七千餘萬元（70085200 元）送交國庫。其中二百零二萬餘元（2024760 元）系以前認購各户交款交割，餘數一百四十七萬餘元（1479500 元）系由中央銀行自購。

第二次， 七百六十五萬元（7650660 元），由國庫局交業務局，當經業務局將應行繳庫債款國幣一億五千餘萬（153013200 元）送交國庫。

第三次， 第三次，三十五萬五千元（355000 元），由中央銀行同仁認購，共收債款七百十萬元。①

孔祥熙的這份復函對陳賡雅等人檢舉的一千一百五十餘萬元美券的下落作了交代，仍然不肯承認這一過程中有任何舞弊不端行為。

孔令儀是孔祥熙的長女，自幼即深得蔣介石的喜愛。孔祥熙讓令儀來遞送報告，自有其考慮，但是，對令儀的喜愛和對舞弊案的查究是兩回事。當日蔣介石日記云："庸之圖賴如前，此人無可理喻矣！"②面對如此棘

手的美金公債案以及孔祥熙的強詞辯解，蔣介石深感苦惱，整夜"為庸之事不勝苦痛憂惶，未得安睡"。③22 日下午，陳佈雷向蔣介石匯報：孔祥熙曾表示，"恐此美金公債或落於外人手中"。蔣介石聽後，覺得到了此時，孔還不肯承認自己舞弊，深為痛憤。日記云："更覺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因之未能午睡。"④

蔣介石 19 日函中的兩個問題很尖銳，何以在決定停售以後繼續出售？何以在美券市值高漲後仍按最初所定低價出售？7 月 24 日，孔祥熙致函蔣介石，試圖回答：

（一）關於認購戶。孔函說明，發行美金公債歷時年餘，債券分散各地，不能預計何時到渝，故主管局對於認購各户只能請其待券到後繳款交割，不能責其預繳價款，或交納一部分定金。後來各地陸續繳到債券，黑市市價雖然略漲，但認購在先，自不應以黑市價漲而不交割，致失國家銀行信用。孔稱："以今視之，手續誠不無可議，而證以當時情形，實非故意草率可比。"

（二）關於損及國家。孔函說明：當初發行美債，原意在於協助民生經濟、生產建設，戰後據以購進機器材料，藏富於民。因此，就整個國家言，並無損失。抗戰中，中國為美方在華人員墊付過大量經費，需要美方用外匯歸還，因此，"必須盡力設法壓制外匯黑市之上漲，方屬於國有利"。

（三）關於購户。孔函說明：債券發行本屬無記名交易，向無記錄賬冊，僅記債券面額款項即可。券款交割之後，承購人在此戰時遷徙無

常，自難尋找。

（四）關於繳回停售後的餘額債券。孔函稱：鈞命雖限期繳回，但據主管陳復，限於事實，無法奉行。經再三籌慮，反覆研討，都認為"此事處理設有不慎，影響國家信譽過巨"。孔建議，以"停付凍結"的辦法"秘密取消"，請蔣考慮決奪。①

孔祥熙的這封信，強詞奪理，不僅不承認有任何舞弊行為和任何不當之處，而且還企圖證明，以每券二十元的低價出售是為了"壓制外匯黑市"，"於國有利"云云。美金公債券由重慶中央銀行發往各地銷售。因此，孔函所稱"債券分散各地，不能預計何時到渝"的情況，只能發生在宣佈停售，命令各地將銷售餘額解送重慶之後。這時，既已停售，何能再次廣泛發行，接受認購？此外，孔函並以"限於事實"為理由，拒絕繳回停售後的餘額債券。蔣介石接讀此函後，決定不能讓孔繼續擔任中央銀行總裁了。他在日記中寫道："正午，發孔庸之辭中央銀行總裁職照准，其遺缺由俞鴻鈞補之命令。"以下蔣自塗約 16 字，當系對孔祥熙的極度憤怒譴責之詞。可能事後蔣覺得過於粗魯，所以又塗掉了。

蔣介石止步停損

7 月 24 日，蔣介石發佈命令，准予孔祥熙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同日，又手諭孔祥熙：

該行經辦人員辦事顢頇，本應嚴懲。姑念抗戰以來努力金融，苦心維持，不無微勞足錄。茲既將其經辦不合手續之款如數繳還國庫，特予從寬議處。准將國庫局局長呂鹹、業務局局長郭錦坤免職，以示懲戒為要。①

國庫局美金公債舞弊案不是"辦事顢頇"的問題，蔣介石這樣寫，是一種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為以後的進一步調查規定基調。

抗戰期間，孔祥熙長期兼任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為從財政上支持抗戰做了許多工作，"苦心維持"云云，則是對孔祥熙的撫慰。當時，宋子文很想安排自己的親信擔任中央銀行總裁，曾向蔣表示，中央銀行總裁必須由自己推薦，否則將不擔負行政責任，暗示將不出任行政院長。②但是，蔣介石毫不為之所動。7 月 25 日，蔣介石召宋子文談話，告以"中央銀行總裁人選，非絕對服從余命令，而為余所信任者不可，以此二十年來所得之痛苦經驗，因此不能施展我建軍、建政，而且阻礙我外交政策莫大也"。孔祥熙在其兼任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任內，始終不肯將中央銀行的實際存款數字告訴蔣介石，致使蔣在 1944 年向美方"強制要求"援助，導致中美關係緊張，"幾至絕境"。蔣介石想起這一段歷史，對孔祥熙更加不滿，深悔撤孔不早。日記云："庸人不可與之再共國事矣。撤孔之舉，猶嫌太晚矣。"①

與俞鴻鈞接任中央銀行總裁的同時，宋子文則接任孔的"四聯總處"副主席。至此，孔祥熙在國民黨黨政系統中的重要職務，幾乎全部失去。7 月 28 日，蔣介石日記云："免除孔庸之中央銀行總裁之職，實為公私兼

全與政治經濟之成敗最大關鍵也。"所謂"公"，指的是當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統治；所謂"私"，指的是蔣介石本人和孔祥熙之間以及和宋藹齡、宋美齡的關係。蔣介石要"公私兼全"，自然不可能有徹底的調查和公正的處理。31 日，蔣介石日記再云："免除庸之中央銀行總裁與改組行政院實為內政重大之改革也。"

傅斯年於 1938 年 3 月上書蔣介石，認為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作來一切若不相似"。此後，傅斯年一直走在"反孔"前列。1938 年 7 月，1939 年 2 月、4 月，1944 年 6 月、9 月、11 月、12 月，傅斯年多次致函蔣介石，揭發孔的腐敗、貪污等問題，並且在國民參政會上大聲疾呼："辦貪污首先從最大的開刀。"②至此，傅斯年算是大獲全勝，功德圓滿了。7 月 30 日，傅斯年會見蔣介石，蔣肯定傅的揭發，表示"極好"。8 月 1 日，他致函夫人俞大彩，高興地寫道："老孔可謂連根拔去（根是中央銀行）。""老孔這次弄得真狼狽。鬧老孔鬧了八年，不大生效，這次算被我擊中了，國家已如此了，可歎可歎。"③

陳賡雅等 9 人的提案雖然沒有提交國民參政會大會討論，但是參政會主席團決議"徑請政府嚴查，依法辦理"。7 月 31 日，參政會秘書處正式將提案簽呈蔣介石，建議密送國民政府，指派人員查明辦理。①同時，司法界對此案也關注起來。重慶地方法院向中央銀行發函詢問，最高法院總檢察署發公函向傅斯年要材料，"以憑參考"。檢察長鄭烈在報上發表通告，號召各界揭發腐敗、貪污分子。8 月 2 日，鄭烈致函傅斯年，告以"此事以鄙意度之，決可成案，已交本署葉、李檢察官偵辦，弟親自

主持"。鄭烈要求得到傅斯年的支持，函稱："滿腔熱血，不知灑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國法獲申，當泥首雷門以謝也。"②8 月 8 日，傅斯年撰寫《在本屆參政大會中提案及詢問有涉及中央銀行國庫局舞弊事說明書》，敘述他瞭解的有關情況及提案經過，保證所述各節，"經斯年詳核，確信其為真，故可在參政會會外，負法律之責任"。末稱："深望政府嚴辦，以警官邪焉。"③

蔣介石不僅再次接到了國民參政會轉呈的陳賡雅等人提案，而且也瞭解到鄭烈主張徹底查究態度。④8 月 4 日，他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列入"美金舞弊案之根究"一項。8 月 6 日，他決定將此案交由國民政府主計長陳其采與中央銀行新總裁俞鴻鈞密查具報。同日，以孔祥熙官邸秘書處原秘書夏晉熊接替呂鹹，出任國庫局局長。9 日、10 日，他在日記中兩次記載"處理美金公債案"、"處理美金券案"等字。但是事實上，他並不想徹底查清。8 月 16 日日記云："晚檢討中央銀行美債案，處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惟庸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提高其行政效率，蔣介石願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反對貪污、腐化現象，但是，徹底查下去，反下去，就會"夜長夢多，授人口實"，發生影響、危害自己統治，所以他要下令"速了"。17 日，他約請司法部長謝冠生、俞鴻鈞及陳其采會商辦法。8 月 26 日，陳、俞二人向蔣書面報告，將此案的性質輕描淡寫地定性為："未按通常手續辦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而且，債票已經追繳，呂鹹、郭錦坤亦已免職，云云。①蔣接到報告後，未有新的指示，一場轟動一時的舞弊案件就此畫上休止符。

一個腐敗的政權是不能真正反腐敗的。

1945年年末，國民黨元老張繼偕夫人到昆明舉辦書法展覽。他告訴陳賡雅說：監察院長於右任對此案也有彈劾，從孔祥熙等承認吐出款項多寡中，可以瞭解到，其分肥比例是：孔祥熙最多，佔七成，呂鹹二成半，其餘所謂應行調劑戰時生活的經辦人，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②

本文收集資料過程中，承汪朝光教授、楊雨青副教授協助，特此致謝。

蔣緯國的"身世"之謎與蔣介石、宋美齡的感情危機

多年前，我在台北閱讀根據蔣介石日記編輯的《困勉記》稿本時，曾經發現其 1941 年 2 月 4 日條云：

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盡其道復之。淡泊靜寧，毫無所動也。①

當時，宋美齡在香港養病，拒絕返回重慶，蔣介石對此頗為煩惱，但努力克制，回信僅稱"夫妻各盡其道"，要宋美齡自便，看著辦。"淡泊寧靜，毫無所動"云云，說明蔣介石儘管遇到了妻子不肯回家這樣嚴重的事態，但仍處之泰然。

蔣介石自 1927 年與宋美齡結婚後，雖偶有矛盾，但這種情況，還從來不曾有過。蔣宋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一謎團，直到今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閱讀蔣介石日記手稿本時，經過反覆參詳，才最終解開。

宋美齡留港不歸，蔣、宋之間發生衝突

事情要追溯到 1940 年 9 月 21 日，當日蔣介石日記云：

妻工作太猛，以致心神不安，腦痛目眩，繼以背疼、牙病，數症並發，

渝無良醫，亦不願遠離重慶。以被敵機狂炸之中，如離渝他往，不能對人民，尤不願余獨居雲。此三年來戰爭被炸之情形，其心身能持久不懈，實非其金枝玉葉之身所能受，不能不使余銘感更切也。①
這段話說的是，宋美齡身患數疾，重慶沒有好醫生，但宋仍不願離渝治病。一是出於對戰亂狀況下重慶人民的感情，日本飛機不斷狂炸，宋不能獨自避難，二是不願離開蔣介石，使其獨居。

同年 10 月 15 日，蔣介石日記云："晚餐與佈雷共食，以妻赴港養病未回也。"從這段日記看，為了養病，宋美齡最終還是去了香港。蔣介石很想念，也很寂寞，只能找陳佈雷一起吃飯。

12 天之後，蔣介石派蔣經國赴港，探望宋美齡的病況，同時迎接蔣緯國自國外留學歸來。②蔣介石本意要宋美齡和經國、緯國一起回渝，但宋美齡表示，待蔣介石的陽曆生日時即歸。然而，屆時宋美齡仍杳如黃鶴。10 月 31 日，蔣介石日記云：

令緯兒來見，以今日為余陽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約今日回來，尚未見到，亦無函電，不知其所以也。
不僅人不回來，連一封函電都沒有。蔣介石著急了，"不知其所以"一句，充分表現出蔣的焦躁與不安！

蔣緯國歸來，兩個兒子都在身邊，蔣介石很高興，但宋美齡留港未歸，蔣介石覺得不足。11 月 9 日日記云：

經、緯兩兒在港得皆見其母，回渝父子團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變殉國，則兩兒皆未得今日重見矣，實感謝上帝恩惠不盡也。惟愛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

11 月 30 日，蔣介石日記再云：

兩兒親愛，兄弟既翕，此為本月最大之樂事，亦為十五年來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滿團團，此非天父賜予至恩，決不能至此，能不感激上蒼乎?
愛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

1925 年，蔣經國赴俄留學，和緯國分離。1936 年，蔣緯國赴德留學。同年，蔣經國自俄歸來，蔣緯國已不在國內。緯國此次歸來，蔣介石得以與經國、緯國兄弟同時相聚，享受天倫之樂。至此，恰為十五年。不過，宋美齡留港，蔣介石總覺得遺憾，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可見，蔣介石思念宋美齡之般。

"聖誕"是西方人的團圓之日，但是，宋美齡仍無歸訊，蔣介石開始感到"苦痛"了。12 月 24 日，蔣介石日記云：

三年來聖誕前夜，以今日最為煩悶，家事不能團圓，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緯兒得以回來陪伴，足慰孤寂，得聞家鄉情形，聊以解愁。

蔣緯國從國外回到重慶後，曾回浙江溪口一行。蔣介石於百無聊賴之中，只能以聽緯國談"家鄉情形"略解愁悶。此後，蔣介石的這種"孤寂"感日漸強烈。12 月 28 日日記云："惟妻留香港未回，以致家庭缺乏欣興之感。"1941 年 1 月 12 日、13 日、14 日，蔣介石連續三天在日記中寫道："為家事心多抑鬱，應以澹定處之。""昨夜為中共與家事，憂不成寐。""下午與緯兒游汪園，各種梅花盛放，綠萼尤為可愛，惜妻今年未得同游也！"值得注意的是 14 日這一天的日記，受蔣家委託的審讀者在開放前塗去一行，顯然認為不宜公開。這以後，蔣的"孤寂"感有增無減：

1 月 26 日日記云："本夕為舊曆除夕，孤單過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帥，恐只此一人耳。"
同月 30 日日記云："近日寂寞異甚，時感孤苦自憐。惟祈上帝佑我，與我同在，使我不至久寂為禱也。"
同月 31 日日記云："妻滯港未歸，子入團就學，故時以寂寞孤苦為憾耳！"

蔣介石為何有如此強烈的"孤寂"感？顯然，和宋美齡滯港不歸有關。宋為何滯港不歸？則顯然與蔣宋之間發生了某種衝突有關。從上引"心多憂鬱"、"憂不成寐"等語推測，蔣與宋美齡之間的"衝突"不小。2 月 4 日，蔣介石接到宋美齡"不返渝"的函件。蔣、宋"感情危機"終於爆發。

蔣一再要求宋美齡返渝而宋一直不理，至此正式發函通知。宋的函件今不可見，但無疑可以感知，蔣宋之間發生了重大矛盾。2 月 9 日，蔣緯

國回"黨政訓練班"學習，蔣介石手寫《寂寞淒愴歌》相贈。

怎麼辦？蔣介石的態度是向宋美齡闡述"夫妻各盡其道"，不卑不亢，既不生氣，也不告饒，將皮球踢給宋美齡。

蔣介石堅決保守家中"秘密"，採取"權變"之計，化解矛盾

蔣的冷靜、沉穩態度起了作用，宋美齡於 1941 年 2 月 12 日自港返渝，但是，蔣介石的家裡並沒有平靜。同月 23 日，蔣介石日記云：
家事不宜過於勉強。只有勿助勿忘，以待其自然著落耳！

"勿助勿忘"，語見《孟子?公孫丑》："心勿忘，勿助長也。"意為（修養時）心裡不要忘記，也不要人為地去助它增長。2 月 24 日，蔣介石日記再云：

家事致曲，不宜太直、太急與太認真，應以澹然處之，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耳。

"致曲"，語見《禮記?中庸》，舊解較多，其中一種解釋為：將真誠推致到細微之處。2 月 25 日，蔣介石日記又云：

家中之事，不能與家中之人直道，同家親人不得晤面，是為余一生最大

之遺憾，然亦惟有勿忘勿助，以待其自覺。家事切不可強勉而行，自信修身無虧，上帝必加眷顧，終能使我家母子親愛，家庭團圓耳。令緯兒離重慶赴贛。①

家事以委屈求全為主，不能與普通交道並論，只求母子親愛無阻，雖權變尚無損也。

"家中之事，不能與家中之人直道"，說的是：蔣介石有些事情不願告訴宋美齡。"同家親人不能晤面"，說的是蔣氏父子與宋美齡之間不能同時相處。但是，蔣介石"自信修身無虧"，所以開始時採取聽其自然的方針，但是，思考再三，為了使母子之間"親愛無阻"，還是決定"委曲求全"，採取某種"權變"的辦法。顯然，這一時期，宋美齡與蔣緯國"母子"之間"親愛有阻"了。

蔣介石自述的"權變尚無損"的內容，他沒有說，其內容之一大概就是"命緯兒離渝赴贛"，避免和宋美齡見面。蔣要緯國到江西去看看哥哥、嫂嫂，"還有，你母親也在那裡。"①蔣緯國聽命，到贛州會見蔣經國夫婦，也拜見將自己一手帶大、從蘇州逃難到此的蔣介石的第二任夫人姚冶誠。就在蔣緯國"離渝赴贛"期間，蔣、宋之間的"感情危機"有了顯著緩和。3 月 6 日，蔣介石日記云：

本日在參政會講演，自覺過於滯鈍，詞不達義，而妻則以為甚得體也。

顯然，宋美齡不僅與蔣介石和解，而且政治上支持蔣介石。蔣在國民參

政會的演講，自己不甚滿意，但宋美齡卻認為"甚得體"。3 月 9 日為夏歷二月十二日，系宋美齡誕辰，蔣介石邀集親友 10 人為之祝壽。當日氣氛融洽。蔣介石為夫妻關係好轉欣慰，日記云："夫妻諧和為人生唯一之樂事也。"但是，他同時也為經國、緯國不在身邊遺憾。日記云："兩兒未能參加耳！"。

3 月 27 日，蔣緯國自江西歸渝。大概此前蔣介石已經做好了宋美齡的工作，因此，蔣緯國"認母"順利。當日，蔣介石命其向宋美齡行隆重的"叩拜"大禮。日記云：

緯兒已到，令叩拜其母，親愛如古，不勝欣慰。使我家庭之得有今日之團圓，以償我一生最大之宿願，惟有感謝上帝大恩於無涯矣。十四年來之家事，一朝團圓，完滿解決，寸衷之快慰，殊有甚於當年之結婚時也。①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至此約為 14 年，多年沒有能解決的問題一朝解決，蔣介石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快樂感"。3 月 29 日，蔣介石在《上星期反省錄》中說："心神愉快之時較多，尤以母子親愛、夫妻和睦為最！家有賢婦與孝子，人生之樂，無過於此。"31 日，在《本月反省錄》中又說："家庭間夫婦母子之和愛團團，此為一生幸福之開始，是亦修身、正心與祈禱之致也。"至此，蔣宋之間的"感情危機"結束。不過，問題似乎並未完全解決。

對家中的風波以及宋美齡和自己的隔閡，蔣緯國似乎有所覺察，但又不明究竟。1943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日記云：

近日緯兒心神頗覺不安，彼不願訴衷，但其衷心自有無限感慨。昨晚乘車外行，彼稱前夜夢寐大哭，及醒，枕褥已為淚浸，甚濕，不知其所以然雲。彼復言哥哥待我如此親愛，是我平生之大幸，亦為我蔣門之大福雲。言下甚有所感。

第二天，蔣介石在晨禱時，想起家事，不禁泫然飲泣。他寫道："余如何能使彼母子之親愛亦如其兄弟哉？""惟禱上帝，能保佑我家庭，使彼母子能日加親愛以補我平生之缺憾也。"②

此後，蔣介石見到宋美齡和蔣緯國之間關係良好時，就特別高興。當年 12 月開羅會議之後，蔣介石、宋美齡與蔣緯國在藍溪相會，同機返國。12 月 1 日，蔣介石日記云：

登機視緯兒猶熟睡，頗安。以彼於下午忽發瘧疾，熱度竟至百零二度以上，見母子談話與母詢問兒病，親愛之情，引為余平生第一之樂事。

由此可見，擔心宋美齡與蔣緯國關係不好是蔣介石長期的心病。

蔣緯國的身世之謎是蔣、宋矛盾的原因

研究蔣介石上引日記可知，蔣宋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的"感情危機"，既和宋美齡懷疑蔣介石的"私德"，又和懷疑蔣緯國的來歷有關。

蔣緯國並不是蔣介石的親生兒子，而是戴季陶和日本護士重松金子所生，時間為1916年10月6日。戴季陶因懼內，事先和蔣介石說好，由蔣出面認子。蔣緯國出生後，由日人山田純三郎帶到上海，交給蔣介石，蔣交給當時的夫人姚冶誠撫養，取名緯國。後來甚至有過一種說法：蔣介石也同時和重松金子相好，蔣緯國為蔣介石與重松金子所生。抗戰期間，戴季陶在重慶的一次演講中就曾公開這樣宣佈過。①

1920年，蔣緯國隨姚冶誠到溪口。1922年隨姚遷居奉化。不久，再遷寧波。10歲時到上海，入萬竹小學就讀。1927年，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姚冶誠攜蔣緯國遷居蘇州。1928年，蔣緯國考入東吳大學附屬中學。1934年畢業，進入東吳大學理學院物理系，兩年即修完相關課程。又奉蔣介石命，進入文學院，學習政治、經濟、社會等課程。在此期間，蔣緯國從未和宋美齡見過面。①1936年10月，緯國奉父命遠赴德國研習軍事。這時候，宋美齡本應和緯國見面了，然而，仍然沒有見，可能還因此鬧了矛盾。蔣介石日記云："緯兒如期出國，不稍留戀，其壯志堪嘉，而私心實不忍也。"又云："家事難言，因愛生怨，因樂生悲，痛苦多而快樂少也。"②

蔣緯國到德後，先後加入德國山地兵團及慕尼黑軍校，被授予陸軍少尉

銜。歐戰前夕，奉命赴美，先後進入陸軍航空隊空戰訓練班和裝甲兵訓練中心受訓。1940 年 10 月，蔣緯國自美返國，途徑香港。宋美齡當時正在香港養病，蔣緯國自然要前往拜見。但是，這是宋美齡和蔣緯國的第一次見面，所以，蔣介石很重視，特派蔣經國到香港。一是為了迎接緯國，也是為了讓經國充當緯國和宋美齡之間的"中介"。關於蔣緯國和宋美齡的第一次見面，據蔣緯國回憶：

當時見面非常自然而且親切。我喊她"Mother，並且在她頰上吻了下，因為出國四年，一些禮節就很歐化了；她親熱地問我在國外好不好等等。我們談話的氣氛可以說一點都沒有第一次見面的尷尬。她給我的印象，就好像是長輩看見自己的孩子回來一樣。③

蔣介石很關心宋美齡與蔣緯國的這次見面，事後得知"母子相見，甚為親愛"。蔣介石非常高興，日記云："快慰無量，甚感上帝施恩之厚重也。"④但是，蔣介石沒有想到，宋美齡和蔣緯國第一次見面時的"親愛"只是當時的"表面文章"，事後宋感到不妥，於是就發生拒不返渝等情況。

蔣緯國的曖昧身世，今天人們已經很清楚，但是，當時的蔣緯國本人並不清楚。據他本人回憶，回到重慶後不久，在宋美齡的書房中發現約翰?根瑟所寫 InsideAsia 一書，其中影射蔣緯國為戴季陶所生，為了某種原因過繼給蔣介石了。蔣緯國為此詢問戴季陶，戴拿出蔣介石送給他的十二寸帶框相片以及一面鏡子，對著蔣緯國坐下來，把鏡子放中間，自己的頭擱在一邊，蔣介石的相片擱在另一邊。他要蔣緯國照鏡子，然後問

蔣緯國："你是像這邊的，還是像那邊的？"當蔣緯國回答還是像蔣介石"多了些"時，戴季陶笑著說："那不就結了嗎！"①可見，蔣緯國身世之謎當時還是"機密"，宋美齡顯然並不清楚。蔣、宋結婚之後，蔣介石也沒有向宋美齡談過有關情況。宋美齡自然會想：緯國到底是哪個女人所生？為何蔣會相認？蔣介石是否"私德有虧"等等。過去，蔣緯國和宋美齡從未見過面，宋可以不想這些問題，但蔣緯國自海外回渝，宋美齡就面臨是否承認並接納這個"兒子"的嚴肅問題；上述問題不清楚，宋美齡如何坦然承認並接納？在這一情況下，宋美齡必然對蔣有所質問，蔣又不願坦率說明（"家事不能直道"），矛盾因此而生；及至蔣"委曲求全"，採取"權變"後，二人之間的矛盾也就化解了。

蔣介石在世的時候，始終不曾將身世之謎告訴過蔣緯國，很可能，也不曾告訴過宋美齡。

原載遼寧教育出版社《萬象》雜誌，2008 年 2 月號。

關於宋美齡與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的"緋聞"
--駁考爾斯，兼辨李敖之誤

1985 年，美國人邁可考爾斯（GardnerMilkCowles）出版了一本回憶錄，題名《邁可回顧》(MilkLooksBack)，其中寫到，1942 年 10 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特使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LewisWillkie）訪問重慶時，宋美齡曾與之有過"風流韻事"，蔣介石發覺後，氣憤地率領手持自動步槍的士兵前往捉姦。由於考爾斯是威爾基當年訪華時的隨員，因此，上述情節很容易取信於人。1986 年，香港《九十年代》雜誌 10 月號譯載了考爾斯的有關回憶。1995 年，李敖等在其合著的《蔣介石評傳》中加以引用，並作了詳細的論證和分析。其後，李敖又單獨署名，寫作《宋美齡偷洋人養洋漢》、《蔣介石捉姦記》、《宋美齡和誰通姦》等文，陸續發表於《萬歲評論叢書》、《真相叢書》、《烏鴉評論》、《李敖電子報》、《禮敖大全集》等處。近年來，大陸出版的某些圖書、刊物以及網站，也都樂於傳播此說，競相宣揚。某著名編劇甚至寫到了電視劇劇本中。

如果是里巷兒女之間的偷情，並不值得重視，但是，事情發生在中美兩國的三個重要歷史人物之間，又經過上述出版物的渲染，就不得不認真加以考察了。

考爾斯細緻、生動的回憶

為了考察方便，並利於讀者思考、判斷，筆者不得不首先引述考爾斯的有關回憶。《邁可回顧》一書寫道：

我們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國。宋子文--蔣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棟現代化的豪華巨宅，是我們在重慶六天的總部。

六天的活動相當緊湊，有威爾基和蔣介石委員長--國民政府領導人之間的數次長談；有政府官員的拜會活動；還有委員長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儀態和風度，令我和溫德爾兩人都感到心神蕩漾。有一晚在重慶，委員長為我們設了一個盛大的招待會。在一些歡迎的致詞之後，委員長、夫人和威爾基形成了一個接待組。大約一小時後，正當我與賓客打成一片時，一位中國副官告訴我，溫德爾找我。

我找到威爾基，他小聲告訴我，他和夫人將在幾分鐘後消失，我將代替他的地位，盡最大的努力為他們做掩護。當然，十分鐘之後，他們離開了。

我像站崗似地釘在委員長旁邊。每當我感到他的注意力開始遊蕩時，就立刻慌亂地提出一連串有關中國的問題。如此這般一小時後，他突然拍掌傳喚副手，準備離開。我隨後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溫德爾和夫人去了哪裡，我開始擔心。晚餐過後不久，中庭傳來一陣巨大的嘈雜聲，委員長盛怒狂奔而入。伴隨他的三名隨身侍衛，每人都帶了把自動步槍。委員長壓制住他的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禮。

"威爾基在哪？"禮儀結束後他問。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爾基在哪？"他再次詢問。

"我向你保證，委員長。他不在這裡，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裡。"

我和侍衛們尾隨其後，委員長穿遍了整棟房子。他檢查每個房間，探頭床底，遍開櫥櫃。最後，他對兩個人的確不在屋裡感到滿意後，一個道別的字都沒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見到溫德爾站在一排射擊手前的幻影。由於無法入眠，我起身獨飲，預想著可能發生的最壞的事。清晨四點，出現了一個快活的威爾基，自傲如剛與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後的大學生。一幕幕地敘述完發生在他和夫人之間的事後，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請夫人同返華盛頓。我怒不可遏地說："溫德爾，你是個該死的大笨蛋。"
我列舉一切的理由來反對他這個瘋狂的念頭。我完全同意蔣夫人是我們所見過的最美麗、聰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瞭解他們彼此之間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慶的報業圈已經有足夠多關於他們的流言蜚語了。我說："你在這裡代表了美國總統；你還希望競選下屆總統。"我還表示屆時他的太太和兒子可能會到機場接他，夫人的出現將造成相當尷尬的場面。威爾基聽了氣得跺腳離去。當時我已經非常疲倦，於是倒頭便睡。

我八點醒來時，威爾基已在用早餐，我們各吃各的，半句話沒說。九點鐘他有一個演講。正當他起身準備離開時，他轉身對我說："邁可，我要你去見夫人，告訴她她不能和我們一起回華盛頓。"

"那裡可以找到她？"我問。他靦腆地說："在市中心婦幼醫院的頂層，她有一個公寓。那是她引以為傲的慈善機構。"

大約十一點。我到醫院要求見夫人。當我被引進她的客廳後，我愚鈍地告訴她，她不能和威爾基先生一起回華盛頓。

"誰說不能？"她問。

"是我，"我說，"我告訴溫德爾不能隨你同行，因為從政治上說，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還沒有搞清楚怎麼回事之前，她的長指甲已經朝我的面頰使勁地抓了下去。她是這麼的用力，以致在我臉上整整留下了一個星期的疤痕。

考爾斯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裡斯論壇報》（MinneapolisTribune）和愛荷華州《狄盟市註冊報》（DesMoinesRegister）記者，後來創辦《展望》（Look）週刊，應該說，他的這段故事寫得很細緻、很生動，但是，這實在是一個破綻百出，編造得非常荒唐，非常拙劣的故事。

威爾基在重慶的日程足證考爾斯"回憶"之謬

威爾基於 10 月 2 日由成都到達重慶，7 日下午離開重慶，飛赴西安，其間行程斑斑可考。為了以確鑿的證據揭露考爾斯所編"緋聞"的荒唐，筆者現依據當時重慶《大公報》的報導及相關檔案，將威爾基與考爾斯在重慶的活動排列於下：

10 月 2 日，威爾基等一行於下午 3 時 46 分，由成都抵達重慶。旋即驅車入城參觀市容。6 時許至旅邸休息。

10 月 3 日，上午 9 時起，在美國大使高斯陪同下，威爾基偕其隨員考爾斯（當時翻譯為高而思）、白納斯、鮑培，陸續拜會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秉常、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軍委會總參謀長何應欽。

10 時 40 分，拜會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齡，談至 11 時 15 分。

11 時 3 刻，威爾基、考爾斯、白納斯、鮑培赴國民政府，拜會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2 時，林森設宴招待威爾基。出席者有居正、於右任、孔祥熙、美國大使高斯、考爾斯、白納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等。

下午 3 時半，威爾基參觀中央訓練團，發表演說，長達一小時余。

5 時至 6 時，美國大使高斯假座重慶嘉陵賓館舉行茶會，招待威爾基，到場有孫科、於右任等中外來賓三百餘人。6 時許散會。

晚 8 時，蔣介石及宋美齡假軍委會禮堂設宴歡迎威爾基。參加者有威爾基及其隨員考爾斯、白納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美國大使高斯、史迪威將軍、陳納德司令、蘇聯大使潘友新、英國大使薛穆及澳、荷、捷克等國外交使節與夫人。中國方面參加者有宋慶齡、孔祥熙夫婦、孫科

夫婦、居正、於右任、王寵惠、吳鐵城、馮玉祥、何應欽等多人。

10 月 4 日晨，威爾基由翁文灝陪同，參觀重慶工廠。中午，翁在中央造紙廠設宴招待。下午，威爾基返城。

同日下午 4 時，宋美齡以美國聯合援華委員會名譽會長名義假外交部舉行茶會，歡迎美國總統代表、美國援華會名譽會長威爾基。出席宋慶齡、孔祥熙、孫科、史迪威及威爾基隨員考爾斯、白納斯、皮耳海軍少校、梅森陸軍少校及中外記者百餘人。威爾基首先參觀兒童保育院及抗屬工廠作品展覽，宋美齡為之"一一加以說明"。參觀後，茶會開始，由兒童保育院兒童表演歌舞及合唱。進茶點後，宋美齡致歡迎詞，威爾基作答。6 時散會。

晚，蔣介石與威爾基長談 3 小時半，宋美齡任翻譯。

1 月 5 日，上午 9 時，威爾基由顧毓琇陪同，參觀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中央工業專科學校及南開中學。12 時返城，參加教育部長陳立夫舉行的宴會。下午至晚間，蔣介石、宋美齡繼續與威爾基晤談。同日，受到威爾基接見的還有史迪威、胡霖、張伯苓、周恩來等人。

10 月 6 日，上午 9 時，威爾基由俞大維陪同，參觀兵工廠。

中午，何應欽在軍委會設宴招待威爾基。午後四時，中美、中英、中蘇、

中法文化協會等 18 個團體在嘉陵賓館舉行聯合茶會，歡迎威爾基一行。到場有美國大使高斯、蘇聯大使潘友新及王世傑、馮玉祥等三百餘人，由吳鐵城致歡迎詞。

5 時 50 分，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訪問威爾基。

午後 7 時，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長及中美文化協會主席的身份在重慶范莊私邸設宴招待威爾基，宋美齡、宋慶齡、孫科、周恩來、鄧穎超、馮玉祥等及美國大使高斯、史迪威、陳納德，威爾基的隨員白納斯、皮爾、梅森等一百餘人參加。席設范莊草坪，所用為"新生活自助餐"。

10 月 7 日晨，蔣介石、宋美齡共同接見威爾基，同進早餐。

9 時，威爾基舉行記者招待會，向新聞界發表談話，並回答提問。

10 時，威爾基由董顯光陪同，參觀婦女指導委員會，宋美齡出面招待，導往各辦公室參觀。至 11 時結束。

下午 4 時半，由重慶飛抵西安。

綜觀上述日程，可見整個威爾基訪渝期間，由蔣介石主持，宋美齡參加的歡迎宴會只有 10 月 3 日晚一次。這次，威爾基和考爾斯都參加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次宴會，而不是考爾斯回憶中所說的會後

還需要回到宋宅補進"晚餐"的"招待會"。會後也不如考爾斯所述，客人們分散談話，以致威爾基可以乘機和宋美齡相約，溜出去偷情。關於宴後情況，重慶《大公報》報道說：宴畢，由中央廣播電台表演國樂。"音樂節目進行時，威氏傾耳細聽，極為注意。每一節目奏畢時，威氏即向蔣夫人詢問甚久，蔣夫人則詳加解釋。""全部音樂節目完畢，威氏即登台參觀樂器。各大使亦繼其後。威氏對每一種樂器均詳加研究，蔣夫人以極愉快之情逐予解說。蔣夫人並親撫古琴以示威氏，威氏歎為觀止。""十時半許，一夕盛會盡歡而散。"這其間，有威爾基與宋美齡調情、相約、出溜的機會嗎?

重要的是，威爾基來華前和宋美齡從未謀面，到重慶後，3 日中午，和蔣氏夫婦僅有 35 分鐘的談話。晚宴時，威爾基和宋美齡之間的感情怎麼可能迅速升溫，達到互相默契，外出偷情的高熱度呢?

人的記憶常常不很準確。是不是事情發生在其他日子，考爾斯的回憶發生部分誤差了呢？也不是。

4 日。這一天，宋美齡為威爾基舉行歡迎茶會，考爾斯是到會者之一。有無可能，偷情發生在這一天晚上呢？然而，檔案記載，當晚，蔣介石與威爾基談話，宋美齡任翻譯。雙方長談三小時半，不可能發生威爾基要考爾斯掩護，自己和宋美齡開溜的事。

5 日。根據檔案記載，蔣介石、宋美齡與威爾基之間的談話自下午 5 時

15 分起至 8 時 15 分止，地點在重慶九龍坡蔣介石官邸。談話後，同至曾家巖進晚餐，飯後繼續談話，宋美齡始終在場，也不可能發生和威爾基共同開溜之事。

6 日。孔祥熙在私邸草坪設宴歡迎威爾基。此次宴會取"自助餐"形式，有點兒像考爾斯回憶所述的"招待會"了，然而，這次宴會，蔣介石並未參加，考爾斯也未出席，自然，不可能產生威爾基要考爾斯打掩護，糾纏蔣介石以分散其注意力一類情節。據《大公報》報道，當日的情況是：孔祥熙致歡迎詞。8 時 15 分，威爾基致答詞，其後即在范莊向中國全國發表演講詞。詞畢，繼續進餐。餐畢，放映電影。8 時許，宴會結束。又據威爾基自述：晚飯吃過之後，他即受宋美齡之邀，一起入室，與宋藹齡"大聊特聊"，一起談到晚上 11 點，然後是孔祥熙進來，加入"龍門陣"。這是威爾基等在重慶度過的最後一個晚上。第二天下午，威爾基等就離開了。

可見，在威爾基停留在重慶的六天中，不可能發生考爾斯"回憶"所述的一類情節。

此外，現存的蔣介石和威爾基之間的談話記錄表明，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都很融洽。根據蔣介石本人的統計，他和威爾基的談話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之多，分別之前，蔣並友好地向威爾基表示，將來旅順、大連可由中美共同使用。這種情況也表明，他們之間不存在任何隔閡。

考爾斯"回憶"的其他明顯破綻

考爾斯的"回憶"還有其他不少明顯的破綻。

第一，蔣介石舉行的"盛大招待會"，來賓眾多，蔣介石要一一會見、寒暄的高貴來賓也很多。考爾斯只是威爾基的一介隨員，怎麼可能用"一連串有關中國的問題"纏住蔣介石達"一小時"之久？

第二，蔣介石僅僅在"招待會"上一時不見了威爾基與宋美齡，何以就輕率地斷定二人出外偷情，以致於"盛怒狂奔"，率領持槍衛兵衝進威爾基住地，親自搜查？蔣介石手下特務無數，要瞭解威、宋何在，何須親自操勞？此類事情，越秘密越好，蔣介石帶著衛兵，當著考爾斯的面搜查，一旦果有其事，當場捉出，一個是羅斯福的特使，一個是自己的夫人，蔣介石將何以善其後？

第三，蔣介石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中國方面的最高軍事統帥，又在盛怒中，怎麼可能先向考爾斯"一鞠躬"？

第四，威爾基是美國共和黨的領袖，羅斯福的特使，考爾斯怎麼可能謾罵他："你是個該死的大笨蛋"？

第五，宋美齡作為蔣介石夫人，出訪美國是件大事，中美雙方都需要做很多準備，簽證也需要時間，威爾基預定 10 月 9 日離華，怎麼可能邀

請宋美齡"同返華盛頓"；宋美齡作為蔣介石夫人，自然懂得她的出訪並非小事，數日之內不可能倉促啟程，怎麼可能在聽說不能與威爾基同行之後，就用"長指甲"朝考爾斯的面頰"使勁地抓下去"?

第六，考爾斯對威爾基說："在重慶的報業圈已經有夠多的關於他們的流言蜚語了。"威爾基在重慶停留的時日不過 6 天，即使威、宋之間有什麼"風流韻事"，報業何從知曉？傳播何能如此之快？如此之"足夠多"?

以上六條，條條足以證明，考爾斯的"回憶"是編造的，而且編造得極為拙劣、低下。

宋美齡訪美並非肇因於威爾基

威爾基於 1942 年 10 月 14 日回到美國。同年 11 月 26 日，宋美齡相繼抵達，開始了對美國的長達 7 個多月的訪問。此事是否肇因於威爾基呢?答案是否定的。

根據檔案記載，邀請宋美齡訪美的是羅斯福總統夫婦，1942 年 8 月 22 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表示他本人及夫人都非常盼望"蔣夫人能即來敝國"。9 月 16 日，羅斯福夫婦再次致電蔣介石，重申這一邀請。這兩次邀請都在威爾基訪華之前，可見，宋美齡訪美，既非肇因於威爾基，

也不需要依賴威爾基的力量。

威爾基確曾積極推動宋美齡訪美。根據威爾基的回憶《天下一家》（OneWorld）等資料，可知 10 月 5 日，威爾基在和宋美齡的談話中，曾建議宋美齡去美作親善訪問。10 月 6 日晚,威爾基在和孔祥熙談話時，又說明其理由是：美國人亟需瞭解亞洲與中國，中國方面有頭腦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應該幫助教育美國人。蔣夫人將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極大的能力，會在美國產生極為有效的影響力。他說，憑借蔣夫人的"機智、魔力、一顆大度而體貼的心，高雅美麗的舉止與外表，以及熾烈的信念，她正是我們需要的訪客"。威爾基回美後，還曾向羅斯福轉達過宋美齡希望訪美的口信。但是，威爾基的這些舉動，都是在執行羅斯福總統的政策和指示。在很長時期內，美國採取孤立主義政策，漠視中國正在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戰。威爾基反對日本侵華，對中國友好，積極主張援助中國抗日。1940 年，他在競選美國總統時，就主張"應予中國以經濟上之援助"。1942 年，他多次發表演說，指責日本"以野蠻手段肆意侵略較弱之國家"，認為"日本為吾人之敵"，而"中國為吾人之友"。他高度評價中國抗戰，認為"過去五年來，美國人民甚少能認識中國抗戰對於吾人全部文明之重要意義者"。在這些方面，他和羅斯福是完全一致的。

至於宋美齡訪美，則一是為了向美國人宣傳中國抗戰，爭取美援，二是為了治病。

抗戰爆發後，宋美齡即積極投身對外宣傳，特別是對美宣傳。她積極利用報紙、雜誌、廣播、接見外國記者等多種形式，宣傳中國抗戰。她的宣傳受到美國輿論的重視和高度評價。1942 年秋，中國抗戰還處於艱難時期，自然有進一步爭取美國支持的必要。

同時，這一時期，宋美齡的健康狀況惡化也迫使她下決心赴美治療，抗戰初期，宋美齡到淞滬前線勞軍，突遇日機空襲，宋美齡的座車在匆忙躲閃中傾覆，宋美齡不幸受傷。自此，宋美齡即長期多病。1942 年 10 月下旬，宋美齡的身體狀況日差，蔣介石擔心宋患有癌症，決定命宋赴美治療。同月 27 日，蔣介石日記云："妻體弱時病，未能發現病因，甚憂。"29 日日記云："妻子體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慮也。"30 日日記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決令飛美就醫，早為割治。"

可見，宋美齡訪美也與她和威爾基之間的所謂"私情"完全無關。

這一階段，蔣介石、宋美齡之間並無感情危機

如果宋美齡和威爾基之間確有"風流韻事"，蔣介石又曾"發怒狂奔"，率兵搜查，那末，他們二人之間一定會發生感情危機，但是，現存蔣介石日記（未刊）卻看不出任何蛛絲馬跡。

宋美齡訪美啟程前，蔣介石依依不捨，愁腸百結。如：

11 月 2 日日記云："為妻將赴美，此心甚抑鬱，不知此生尚能有幾年同住耶？惟默禱上帝保佑而已。"

11 月 17 日日記云："下午與妻到聽江亭廊前談對美總統談話要領十項後回寓。夫妻依依，甚以明日將別為憂也。"

11 月 18 日日記云："五時醒後不能安眠，默禱妻此行平安成功……九時，送妻至九龍鋪機場，同上機，送至新津大機場，換大機……十二時，送妻登機，見其機大……別時妻不忍正目仰視，別後黯然銷魂，更感悲感。並願上帝賜予生育子女，默禱以補吾妻平生之不足也。"

宋美齡啟程後，蔣介石倍感惆悵，11 月 19 日日記云：""平時不覺夫妻樂，相別方知愛情長。"別後更覺吾妻愛夫之篤，世無其比也。"

宋美齡抵美後，蔣介石仍然思念不已。如：

11 月 28 日日記云："妻於二十六日平安飛到美國，並據醫者檢查，決無癌症，此心甚慰。"

11 月 29 日日記云："妻於十八日赴美，臨別淒愴，兒女情長，今又獲一次經驗也。"

12 月 1 日日記云："本日為余夫婦結婚十五週年紀念日，晨起，先謝上帝保佑與扶掖成全之恩德。接妻祝電。晚，往孔宅大姊處舉葡萄酒恭祝余妻康健。"

12 月 31 日日記云："惟以妻在美不能共同團圓為念。"

1943 年 2 月 4 日日記云："今日為舊歷除夕，孤身獨影，蕭條寂寞極矣。"

類似的記載還很多。如果宋美齡與威爾基有私情，蔣介石又確有所覺，他能寫得出上述日記嗎?

在蔣介石和宋美齡漫長的婚姻生活中，有過兩三次感情危機。例如，1940年 10 月，宋美齡赴香港養病，曾長期拒絕回渝。次年 2 月 4 日，蔣介石日記云："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盡其道覆之。淡泊靜寧，毫無所動也。"這段日記表明，蔣宋之間發生了某種矛盾（關於此，筆者有另文分析）。而蔣在宋美齡赴美前後的日記表明，二人之間當時不存在任何隔閡。

考爾斯"回憶"的由來與宋美齡在美國所打"誹謗官司"

考爾斯並非威、宋"緋聞"的始作俑者。早在 1974 年，美國人艾貝爾（TylerAbell）整理、出版的其父皮爾遜日記（DrewPearsonDiaries）的上冊中就有記載。該書談到，威爾基以羅斯福總統特使名義訪問重慶時，與蔣夫人有染，蔣委員長盛怒之下，帶憲兵到南岸官邸去捉姦，並無所獲；威爾基臨行去向蔣夫人辭行，閉門二十分鐘才出來，等等。考爾斯所述正是皮爾遜日記有關說法的細緻化。

皮爾遜是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其人文品不佳，專門挖人陰私，曾被羅斯福斥為"習慣造謠的人"。威爾基訪華期間他並不在重慶，更與威爾基沒有密切關係。其日記始於 1949 年，止於 1959 年，所述宋、威之間的

風流韻事完全是事隔多年的道聽途說，本無多大價值。然而，由於其事具有"商業價值"，所以日記出版後，迅速受到注意，被美國的每月書會列為重點推薦書目。該會當月的書訊在介紹該日記時不僅刊出威爾基與宋美齡的並列照片，而且下題"匆匆的結合"（Ahastyliaison）數字。事為台灣駐紐約新聞處主任陸以正發現，上報台灣新聞局，新聞局不敢再繼續上報，但宋美齡已讀到了一位好事的美國老太太寄來的書訊，大為震怒，指令陸以正在美國《紐約時報》等十大報紙刊登全頁廣告闢謠。陸以正經過反覆考慮，並經宋美齡同意，先向該書的出版公司交涉，要求更正，遭到拒絕。其後，陸以正即收集證據、證詞，代表宋美齡向紐約州最高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要求出版公司與艾貝爾賠償宋美齡的名譽損失三百萬美元。經過一年多的談判磋商，出版商最終接受三項條件：一、公開道歉；二、承諾在本書重版時，將誹謗的文字刪除；三、律師費由雙方各自負擔，被告方賠償起訴方訴狀費、送達費、存證信函費等共七百多美元。此三項條件經宋美齡批准。

後來，《皮爾遜日記》上冊再未重印，中、下兩冊則胎死腹中，永未出版以上情況，俱見陸以正所著《微臣無力可回天》一書，台北天下文化書坊 2002 年 4 月出版，茲不贅述。

考爾斯反覆無常

據說，按英美制度，提出誹謗訴訟，原告如為公眾人物，有責任提出對

方誹謗不能成立的證據。陸以正代表宋美齡控告皮爾遜日記的出版者及編者，就必須設法證明該書所述純屬子虛。

在找尋證據的過程中，陸以正找到了考爾斯（陸書譯作柯爾斯）。其情況，陸書寫道：

我去見柯爾斯，他沒想到事隔三十年。還有人記得他曾在戰時到過重慶，相談甚歡。我問他《皮爾遜日記》所提的故事是否正確，他大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絕對沒有！"我說可否請他給我一封信，以當年陪伴威爾基訪華記者的身份，說明絕無此事。他馬上喚女秘書進來，口授了一封信，簽名交給了我。這樣豪爽的個性，至今令我難忘。

陸以正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大概也一直沒有發現，當年這位保證"絕對沒有"此事的"證人"十一年後又在"回憶"中，以當事人的身份，活靈活現地描述了本文一開始引錄的那段"風流韻事"。

怎樣理解考爾斯的反覆無常呢？看來，只能用"商業價值"來解釋了。為了吸引讀者，考爾斯在寫作自己的回憶錄時，終於覺得那段"八卦新聞"還是很有用；而且，即使再為台灣方面發現，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皮爾遜日記》的官司不是七百多美元就了結了嗎？

原載台北《傳記文學》2003 年 5 月號及《百年潮》2003 年第 10 期。

蔣介石的「婚外情」傳說

1944 年 7 月 9 日，中國抗日戰爭處在最艱難的時候，宋美齡突然離開重慶，去巴西休養，自此長期不歸。直到一年後抗戰勝利，宋美齡才翩然回國。關於此事，許多宋美齡的傳記和相關著作都認為其原因是：蔣介石在重慶有了「婚外情」，宋美齡因此一怒而去。

事實是否如此呢?

可疑的送別茶會

蔣介石的《事略稿本》(未刊) 1944 年 7 月 5 日條云：

約集各院院長及各部會高級幹部與歐美友好，計共 60 人，舉行茶會，為夫人餞行並坦白說明外間之流言蜚語與敵黨陰謀之所在。繼夫人亦起而說明對公人格之信仰，措辭均極有力也。而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長亦各先後發言，僉謂公之為人，厚重嚴謹，久為眾所敬服也。

這段記載很含糊。考察有關史籍可知，當年 7 月，宋美齡即將離開重慶去巴西養病。「為夫人餞行」云云，說明會議主題是為宋美齡送行。會

上，蔣介石坦白說明了「外間之流言蜚語與敵黨陰謀之所在」。接著，宋美齡起而發言，表示相信蔣的「人格」。又接著，居正、戴季陶以及國民政府各院院長紛紛幫腔，對蔣的「品格」大唱讚美歌。這就奇怪了，餞行會為何變成為蔣介石辨誣的「闢謠會」呢？所辟之「謠」為何？

查蔣介石日記當年 7 月 4 日條云：

下午，回林園，與妻商談，約幹部與友好聚會，說明共產黨謠诼，對余個人人格之毀譽無足惜，其如國家與軍民心理之動搖何！乃決約會，公開說明，以免多加猜測。

這則日記說明，會議是在 7 月 4 日與宋美齡商談之後決定的，目的在於闢謠，謠言內容有關蔣的「人格」。至於謠诼來源，《事略稿本》僅模糊地說明出於「敵黨陰謀」，而這則日記則點明是「共產黨」。蔣介石長期敵視中共，所以並未調查，也未加論證，就武斷地確定是「共產黨謠诼」。

再查當年 7 月 6 日蔣介石的日記，中云：

妻近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對余個人謠诼、誹謗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語句文字，乃為英國[美]人之筆。此函不僅詆毀余個人，而乃涉及經、緯兩兒之品格，尤以對經兒之謠诼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為其外遇之母留養為言。可知此次蜚語，不僅發動於共黨，而且有英美人為之幫同，其用意非只毀滅我個人之信譽，且欲根本毀滅

我全家。幸余妻自信甚篤，不為其陰謀所動，對余信仰益堅，使敵奸無所施其挑撥離間之技倆。可知身修而後家齊之道乃為不變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

蔣介石 7 月 8 日的日記中又一次談到，「匿名信」的內容是挑撥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夫妻情感」，其目的在於使蔣「家庭分裂」，進而毀滅蔣的「人格」。

蔣介石到底蒙受了什麼樣的誹謗，要在宋美齡出國前隆重召開有「高級幹部和歐美人士」參加的會議，鄭重「闢謠」?

蔣、宋同場表態

查王世傑 1944 年 7 月 5 日日記云:

蔣先生今日約黨部、團部、幹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會。在會中，蔣先生宣佈兩事：一、蔣夫人將赴巴西養疴，休養畢將訪若干友邦；二、外間近有人散佈謠言，誣蔑蔣先生私德，謂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有人欲藉此類造謠以搖動同志與軍隊對彼之信心。蔣夫人亦有演說，指述此類誣蔑之用意，與彼對蔣先生之敬信。

蔣介石的日記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王世傑的日記則寫得比較坦率，

「謂其有外遇」，原來，是一則有關蔣介石私德的「緋聞」。王世傑當時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監察會監察，第三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顯然，他是參加了「闢謠會」的。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收藏的《史迪威文件》中藏有一份「闢謠會」的會議記錄，也可以解決我們的大部分疑問。

記錄為英文打字稿。其一為《委員長在 75 位客人參加的會議上的講話》，譯為中文為：

在我的妻子因神經衰弱出發去巴西之際，我決定為她舉行送別會。你們都是我的朋友。我想坦率地說明某些事情的時刻已經到了。
……
最近，在重慶社交圈裡有不少謠言，有些牽涉我。你們已經聽到，但是，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只有一位朋友告訴我這件事。他是真正的朋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此，當他們聽到此事時應該告訴我。這個謠言說我的個人行為不光明，說我和一個女人有不正當關係，說我和一位護士有非法關係並且生了一個兒子。
……
民國二十三年，我的妻子和我提倡新生活運動。由於這種道德力量，我們得以成功地反對共產主義並抵抗外國侵略。如果我像傳說所稱那樣，我的真誠何在？我的將來和中國的將來相聯繫。作為領導者，任何對我的污辱就是對國家的污辱。我們必須詢問自己，我們的道德標準是否足

夠高。如果我的道德標準被玷污了，我如何面對國家？我怎能成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主席？

……

在上一個十年中，如果我曾經有過一些貢獻，這就是道德上的貢獻。我是一個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並且絕對服從。假如我不遵從這些戒律，我就是異教徒……我和妻子的感情絕對純潔。我們的關係中沒有任何污點。我的生活裡沒有任何事情不能公開。如果謠言所傳是事實，那就稱呼我為偽君子就是了。我召開此次會議，是為了挫敗敵人的有害目的。只有當所有人都已經達到道德的高標準，我們才能面對公眾；只有我們能引導戰爭走向勝利的時候，我們才能面對孫逸仙的在天之靈。

蔣講話後，宋美齡接著表態。她說：

委員長提到的謠言已經遍傳重慶。我已經聽到這些謠言，收到許多就這一問題寫給我的信。不是作為妻子，而是作為真誠的愛國者，我覺得使委員長知道這些謠言是我的職責。

但是，我希望說明，永遠不可能讓我為這些謠言低首彎腰；我也不會向他詢問，這些謠言是否真實。如果我懷疑委員長，將是對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領導。我不能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結婚已經 17 年。我和他共同經歷了所有危險，嚴重者如西安，所以我瞭解委員長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瞭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些惡意的誹

謗。

昨天，當委員長告訴我，他正在召集朋友們到一起，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要麻煩，謠言會自行消亡。」他回答說，這不是對個人的誹謗，通過誹謗他，他們正在誹謗作為一種道德力量的中國。這些惡意的誹謗應該立即消除。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不是經濟，不是軍事，不是工業。中國的貢獻是道德力量。

委員長的領導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標。不斷追隨主的腳步，那時，他是中國的力量。

宋美齡的講話強烈表達了他對蔣介石道德上的信任，並且將是否相信這些提升到是否愛國的高度。

蔣介石「闢謠」之言可信嗎？

蔣介石為個人生活「緋聞」召開如此隆重的「闢謠」會，這是罕見的。其原因，當然在於這一謠言在重慶，特別在國民黨黨內流傳甚廣，嚴重影響蔣介石的個人威信。其次，宋美齡即將赴巴西休養，也容易給人「謠言」屬實的印象。當年，日本軍隊在河南發動一號作戰，中國軍隊節節敗退，正處於中國抗戰的關鍵時期，作為抗戰統帥的蔣介石的私人道德自然與抗戰相關。蔣介石召開「闢謠」會的目的很容易理解。

那末，蔣介石的「闢謠」可信嗎？這須要從多方面嚴謹地加以分析。

一、蔣介石不僅在公開會議上「闢謠」，而且在其日記上多次否認此事。早在 1944 年 5 月 8 日，蔣介石就在日記中寫道：「共匪倒[搗]亂，造謠中傷誣蔑，甚至以敗德亂行之污穢謠諑，想入非非之匪[誹]語加諸吾身，以圖毀滅吾身家。此種誣蔑與橫逆之來，自民國十五年以來，雖非一次，然至今更烈，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乃由今日經歷所得，更覺其真切也。然余自信此種謠言，一經證明其誣妄，則增益余品性之時，故毀言之來，賢者實以為福也。」這是蔣介石日記中關於此項「緋聞」的第一次記載。一直到 1945 年末，蔣介石仍念念不忘去年他所經歷的「私德」風波。其年終《雜錄》云：「共黨破壞我個人之信譽，毀滅我個人革命之人格，造作我私生活不道德、各種各樣不同之方式謠諑，使全國民眾對我絕望而為之遺棄不齒，以達其傾陷領袖奪取抗戰領導權的目的。」又云：「離間我夫妻，污蔑我父子，傷害我家庭，夫婦、父子、骨肉之愛情，以期滅絕我血統，非使我國亡種滅而不止。」蔣介石的日記生前並未發表，也無發表打算。在公開的場合，蔣介石有意說謊，欺騙公眾，可以理解；在自己不打算發表的私人日記裡說謊，自我欺騙，似無必要。

二、蔣介石「緋聞」的最大衝擊者是宋美齡。作為蔣的妻子，宋美齡不會容忍蔣在個人感情上對她的背叛與欺騙。即使她為了維護蔣作為抗戰統帥的形象而委曲求全，但也決不會輕易出席茶會，和蔣介石同步

發表上述鮮明而堅決的聲明。這一時期，她對於蔣介石必然怨憤有加，衝突勢所難免。然而，宋美齡不僅出席茶會，而且堅決「闢謠」。可見宋美齡不相信所傳屬實。

三、蔣介石早年的生活確實荒唐，但是，他努力以儒家的道德修養規範自己，致力於「存天理，去人欲」。在經過漫長的自我反省和鬥爭後，漸見成績。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運動後，特別是他承擔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要職之後，仍然繼續履行儒學的修養工夫。這一方面，他的日記多有記載。 因此，他在思想中不斷進行「天人交戰」，狠鬥自己的「妄念」、「邪心」和「欲心」，其自我修養有很嚴格的方面。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過時，就一再反省，自我譴責。又如，他生活淡泊，不抽煙，不飲酒，基本不喝茶，一旦違反，也會反省、自譴。抗戰以來，蔣介石對自己的「私德」有相當嚴格的要求。在這種狀態下，他與某一護士發生不正當的關係，並且育有私生子的謠言當然不可信。

四、宋美齡患病是事實，醫生要她遷地休養也是事實。宋美齡長期多病，1942 年 10 月 29 日，蔣介石日記云:「妻子體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慮也。」30 日日記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決令飛美就醫，早為割治。」這是宋美齡抗戰期間第一次赴美的主要原因。到美國後，經檢查，發現並無癌症，但是，身體仍然不好。蔣介石日記中關於宋美齡疾患的記載很多。

1943 年 12 月，蔣介石偕宋美齡飛赴埃及參加開羅會議，宋美齡一直在

病中，特別是宋氏家族許多成員共有的皮膚病，嚴重地困擾著宋美齡。

開羅會議後，蔣氏夫婦回到重慶。但重慶氣候潮濕，多霧多雨。進入 1944 年，宋美齡的病情日益加重，蔣介石不得不強制她去昆明休養。宋美齡到昆明休養後，病情不僅毫無好轉，反而更重了。

此後，蔣介石日記常見他對於宋美齡的病況的憂慮。如 6 月 13 日日記云：「晚回林園，妻病日弱，誠家國兩憂集於一身矣。」可見，宋美齡皮膚病確實很嚴重，易地治療確有必要，並非無病呻吟。

至於為什麼遠赴巴西，筆者 2007 年在美訪問期間曾詢問宋氏家族的曹璇女士。璇女士向其夫、宋子安之子宋仲虎先生及宋靄齡之女孔令儀作了調查。據稱，當時聽說巴西有個醫生善治皮膚病，又因得到巴西總統邀請，所以就去了巴西。璇女士的這一說法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可以得到部分佐證。當年 6 月 29 日，蔣介石日記云：「預定：一、寫巴西總統信。」7 月 1 日，蔣介石在《本星期工作課目》中列入「妻往巴西養病」。由此可以得知，宋美齡的巴西之行是蔣介石通過巴西總統安排的。

五、蔣宋之間這時不存在嚴重衝突，甚至可以說二人之間的關係相當不錯。

1944 年 2 月 29 日，蔣介石日記云：「上午，批閱軍事公文，以妻病懸念不置。」3 月 4 日日記云：「下午，寫妻信及手抄《真美歌》，祝妻四十六

歲誕辰。」3 月 6 日日記云：「晚以夫人誕辰，獨自飲食，感慨不置。」

宋美齡自昆明回重慶後，蔣介石經常陪宋美齡散步、遊覽、散心。這在日記中都有記載。

這一時期，蔣介石為宋美齡的疾病擔憂，宋美齡則為蔣介石的勞累操心。當時，由於戰況緊急，蔣介石從凌晨 3 時起就以電話指揮河南軍事，宋美齡很為蔣憂慮。7 月 2 日，宋美齡決定去巴西養病，當日深夜，二人話別，頗有前途難測，依依不捨之慨，據蔣介石日記云：

今日子刻與寅刻，余妻以即欲飛往巴西養病為念，發生悲感心情。彼甚以最近國家形勢甚危殆，而其精神與夢寐之間，皆多各種不利之徵兆，甚以此去恐不能復見為慮。彼云：須君牢記世界上有如我愛汝時刻不忘之一人乃可自慰。又云：君上有天父之依托，而下有汝妻為汝竭誠之愛護，惟此乃可自慰也。余心神悲感更重，不能發一言以慰之。惟祝禱上帝保佑我夫妻能完成上帝所賦予吾人之使命，使余妻早日痊癒，榮歸與團聚而已。

宋美齡去巴西之後，蔣介石不斷給宋美齡打電報。根據現有資料，自當年 8 月 4 日起，至同年 9 月 11 日宋美齡轉往美國，入紐約長老會就醫前夕止，蔣約致宋電 9 通。這些電報尚未全部公佈，但已有部分可以見到。

從電報看，蔣介石如常向宋美齡通報國內情況，甚至向她提供有關中共的機密情報，並且關心宋美齡的身體狀況，對她的外交活動提出建議，並無任何芥蒂。

綜合以上，筆者認為，蔣介石的「闢謠」之言可信。

無風不起浪

謠言有多種形式。一種是毫無根據，一種是有某些影子，在流傳中逐漸變形、扭曲，在不同程度上背離事實，甚至面目全非，所謂「無風不起浪」是也。

上引蔣介石所記，當時重慶流傳的關於蔣經國的「緋聞」:「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為其外遇之母留養」云云，顯指其與章亞若的戀情及生育孝嚴、孝慈一事，只不過將發生在贛州的事移到重慶了。同樣，蔣介石在重慶時期的「婚外情」也有某些「影子」。

一是戴季陶在重慶時曾公開聲言，他和蔣介石在日本時共同喜愛一位日本女子，蔣緯國即為蔣介石與該日女所生。

蔣緯國的身世長期不明，戴季陶關於緯國為蔣介石早年與日本女所生的說法自然會在重慶流傳開來，並逐漸演變為蔣介石在重慶時與某護士生

子的「緋聞」。

蔣介石「婚外情」另一「影子」是其前夫人陳潔如自上海來到重慶，蔣介石與之重修舊好的傳言。對此，陳潔如的女婿陸久之曾函告筆者的同事嚴如平教授說：「當年轟動山城傳說紛紜的『陳小姐』，原來就是陳潔如。」陸久之在抗戰勝利後與陳潔如的養女陳瑤光結婚，與陳潔如關係密切，所言當出於陳潔如口述，自有相當的可靠性。

這樣，有了蔣介石與「日女」生子的情節，有了「陳小姐」的身影，有關傳說在重慶不脛而走就不難理解了。

宋美齡對蔣陳關係很敏感。1931 年 6 月 19 日，蔣介石收到陳潔如自美國的一封來信，為宋美齡所見，蔣於慌亂中將陳函撕毀，宋美齡一氣之下，於第二天晚上回滬。6 月 21 日，蔣介石趕忙給宋美齡與宋靄齡寫信解釋，事情才得以緩解。抗戰期間，蔣介石與陳潔如再度相晤，宋美齡有較強烈的反應是必然的。

陳潔如到達重慶的時間說法不一。王舜祁《蔣氏故里述聞》稱：陳潔如第一次到重慶時，曾參加軍需署署長周駿彥的悼念活動。當時在侍從室為蔣收發電報的周坤和回憶，他在貴賓室發現蔣的身邊有一位「中年婦女」，不是宋美齡，而是陳潔如。周駿彥逝世於 1940 年 7 月 30 日，故陳此前必已到達重慶。陳的到來激起了蔣的感情波瀾。

1940 年 10 月 5 日蔣的日記云:「最近每夜失眠，回憶青年時代往事，更自慚愧悔恨，而今於性慾舊情，亦時發現不忘，可知此心惡根未盡，何能望其與聖靈交感相通耶！戒之。」

同年 10 月《反省錄》云:「心神較安，對於交感上帝之修養，似有進步，但雜念與性慾時有發現，以舊日孽緣太多，不易滌蕩盡淨耳!」

同年 11 月 14 日日記云:「性慾漸起，舊念重生，應以靈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縱。」

上述日記中,「性慾舊情」、「舊日孽緣」、「舊念重生」云云，應該指的就是他和陳潔如的一段老關係。陳潔如在重慶住到什麼時候,已不可考。但是，根據周坤和的回憶，1943 年，陳潔如第二次到渝，周曾目睹她出席「中美之友社」的成立大會。陳先來，蔣後到。

沒有可靠的資料能夠說明蔣、陳的「老」關係發展到了什麼樣的「新」程度，但是，卻有蛛絲馬跡可以說明，蔣、宋關係因之發生裂痕。

宋美齡 1942 年 11 月開始的訪美之行獲得巨大成功。1943 年 7 月，宋美齡回到重慶。初時，蔣、宋感情不錯。但是，到了 8 月 12 日，蔣介石日記中就出現了蔣獨住重慶黃山官邸,而宋住到新開寺孔祥熙宅「留醫」的記載。8 月 16 日，宋美齡病癒，夫妻二人同住黃山，但是，不知什麼時候，宋美齡又單獨住回孔宅。9 月 14 日，蔣日記自稱:「心緒鬱結。」

15 日,蔣的日記起首部分被蔣本人罕見地塗去了五行。這被塗去的部分,應是蔣有不願告人的秘密。日記末段云:

「禱告畢,默然就寢。自覺今日之忍痛、抑悲、制憤、茹苦,可謂極矣。」

這一則日記顯示出,蔣當日精神上受到很大衝擊而又不能發作。有誰能擁有如此巨大的本領呢?除了宋美齡,恐怕沒有第二人。次日,蔣日記又云:「觀月獨坐,意興蕭然。」9 月 19 日,蔣又將日記起首部分塗去三行。這以後,蔣的日記中連續可見「獨到黃山休息」、「獨自靜觀自然」的記載,足證蔣、宋之間發生矛盾,處於分居狀態。聯繫上文陸久之所述相關情節考察,這應是宋察覺蔣、陳之間「新」關係的結果。9 月 27 日,蔣介石日記云:「正午到新開寺孔寓,與妻談話後即回。」這一段記載頗可玩味。夫妻之間的一般談話,沒有記載的必要;特別記載而又不記述內容,說明其中有秘密。至 10 月 3 日,蔣介石日記又云:「本晚靜坐後,與妻同往新開寺孔宅敘談,即宿於此。」這則日記說明,蔣宋之間達成和解,蔣介石的獨居生活結束了。

陳潔如畢竟是蔣介石的前任夫人,因不願當漢奸而投奔大後方,蔣介石自然要加以接待並妥善安置。蔣介石此舉,名正言順,理由正當。至於是否「鴛夢重溫」,這是無從確證之事。所以宋美齡對蔣、陳的重會雖然不高興,但也不能過加指責。「醋意」不能沒有,但畢竟不能成「海」。經蔣「談話」解釋之後,也就煙消雲散了。不久以後,蔣介石成為國民政府主席,宋美齡榮膺主席夫人,自然更不能揪住蔣、陳舊情不放了。

1944 年 5 月至 7 月流傳於重慶的蔣介石的「緋聞」, 所謂與某護士的「不正當關係」，所謂「私生子」云云，對於局外人也許新鮮，對於宋美齡來說，自然不屑一聽。她之所以能在「闢謠會」上慷慨陳詞，為蔣介石的「私德」背書，其原因在此。

美國人對蔣介石「婚外情」最感興趣

7 月 9 日，蔣介石送宋美齡上飛機。7 月 13 日，中央社自巴西里約熱內盧發電報道：宋美齡於 13 日到達當地，同行者有孔夫人宋靄齡等。宋等一行受到美國駐巴西大使及巴西高級官員的歡迎。宋將下榻關納巴拉灣內的波羅柯伊奧島的旅館，預計將在此休息數周。14 日，中國駐美大使館在華盛頓正式宣佈蔣夫人已抵里約熱內盧。

16 日，《中央日報》發佈消息稱：「蔣夫人於本月 9 日離渝赴國外養病，業於 13 日下午到達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本社有關方面探悉：蔣夫人從自去年訪美加歸來以後，以工作關係，迄無休息機會，致健康未能全復。據診治之醫生言，渝地氣候不宜，必須易地療養，且屏除工作完全休息，則最近期內即可全愈雲。」

儘管中央社和駐美使館陸續發佈上述新聞，但是，傳言並未止息。8 月 19 日，蔣介石披閱有關情報，日記云：

最可憂者，美國朝野對我個人生活之謠諑層出不窮，尤關於我夫婦家庭間之猜測亦未已。此次吾妻出國養病，為於公於私，皆有損失，然虛實是非，終有水落石出之時。無稽荒謬之談，必不能盡掩天下耳目，而且美國內亦有主持公道者，故余並不以此自餒也。

可見，「謠諑」的最大市場在美國。不僅美國民間社會（野），連美國政府（朝）都關注此事。

文獻證明，首先向美國傳播「謠諑」的就是美國駐重慶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美國的媒體、輿論大炒特炒蔣委員長的「緋聞」，使蔣覺得臉面無光。1945 年初，英美社會甚至流傳蔣氏夫婦已經離婚的說法，使得蔣多次慨歎「對余夫妻之謠諑如故也」。

美國人為何要這樣做？這和當時美國方面企圖讓蔣介石將軍權交給史迪威的圖謀緊密相連。

美國軍政兩方早就對蔣介石及其政府不滿。1944 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以後，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當年 7 月，馬歇爾向羅斯福提出，中國局勢頹落，必須讓蔣介石將其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美國將軍史迪威。同月，羅斯福晉陞史迪威為上將，並於 7 日致電蔣介石，提出這一要求。15 日，再次電蔣催促。中國的抗日戰爭有賴於美國的援助，蔣介石不敢得罪羅斯福，企圖以拖延時日的方式軟磨。羅斯福於 8 月 10 日、23 日，

兩電蔣介石，要他立即採取必要措施，讓史迪威及早指揮中國軍隊，並且威脅他：稽延拖拉，「容有嚴重之後果」。隨後，美國特使赫爾利、納爾遜及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先後出面，對蔣介石施加壓力。羅斯福再次警告蔣介石，「務希立採行動，方能保存閣下數年來英勇抗戰所得之果實，及吾人援助中國之計劃」。話說得很清楚，你要是不聽話，就別想再得到美援了。然而，蔣介石就是不為所動。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自然樂於傳播並擴展蔣介石的「緋聞」，把他搞臭，促其下台。

進入 1945 年，蔣介石終於恍然悟到美國人在其中的作用。他在《民國三十四年大事表》中寫道：「去年一年間，中共與美國駐華大使館協以謀我之陰狠，實有非人想像所能及者，今春美國大使館之失火，其內容乃為滅絕其對我各種陰謀文書，故而故意縱火也。思之寒心。」同年末，他感慨地寫道：

「以如此毒辣、卑狠、陰險之行動，以常理論之，決無倖免之理，而且已見其大效。美國且已斷絕我接濟，各地國民亦已信謠諑以為真，幾乎街談巷語皆以為資料，尤以五、六月間美副總統華萊士來華時為極點，而美國自其大使高斯拜辭（十月間）回去後，直至十二月方派哈雷接任，但其政府仍不令其提國書，竟至卅四年一月方提國書，中美國交至此方得初步恢復。言念及此，誠不寒而慄矣。」

原載《世紀》2008 年第 1 期

